

尼赫魯著
畢來譯

尼赫魯自傳



傳記叢書之四
新知書店印行

綠營圖書館



號 816-6040

記號 934

422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1 4768B

尼赫魯自傳

著者 尼赫魯
譯者 沈雁冰

保持書本原狀



新

1852185

自來書

尼赫魯自傳

每冊實價 元

著者 尼赫魯
譯者 者者者
出版者 版出
知新書局

上海·重慶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八日初版



魯 赫 尼

作者自序

本書除「後記」一章和某些小處修改而外，都是從一九三四年六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之間，在獄中寫成的。撰寫此書的最初目的，本在於藉此消磨獄中的寂寞辰光，同時，把那些與我本身有關聯的印度發生的過往各事，加以回憶檢討，俾使自己能對他們作清晰的考慮。在開始寫的時候，係出以一種自問（Self-Questioning）的心情，而此種自問心情竟亦相當地貫徹始終。我並非居心爲一羣讀者撰寫，即使我想起一羣讀者，那也是我的一羣男女同胞。如果是爲外國讀者而作，寫法一定不同，願強調者亦必不同，必定要強調某些在本書內一筆而過的地方，而於本書相當詳盡的所在，必定又予以簡略的敘述。後者有很多方面，在非印度人的讀者來看，或不感趣味而覺其無關緊要，或以爲過於明顯，無庸置辯；而在我，則以爲牠們對於今日的印度，頗爲重要。書中提及的很多國內政治，以及一些個人，也許對於外國人看來會感到很少意義而引起多大的興趣。

我希望，讀者要記着：這書是在我一生之中最最苦惱的時期中寫成的。其中有着這種苦惱的明顯的痕跡。如果在較爲正常的環境之下撰寫，其內容必與此不同，而用字亦必較爲謹慎。然而，我現在亦擬任其如此。因爲，他既然可以表現出我寫作時候的感情。或者別人會因此感到趣味。

我的企圖，是想盡其可能地回溯我自己的心理的發展情形，並不想檢討最近的印度歷史。書中的記載，讀去好像是在作這種檢討，容易使讀者誤認，因而賦予牠以比牠本身所應得者爲多的

重要性。因此之故，我要告訴讀者，本書的敘述，乃完全單方面的，因而也不免是自我本位的；有很多重要的事件，完全忽略了，而很多形成各種局勢的重要人物，差不多沒有提及。如果是真正地檢討過往之事，這種疏忽，一定是不可原諒的，然而，一本關於私人的敘述，則敢於如此。欲對於我們印度最近的過去作深入研究的人們，則不得不另尋他途。但是，本書以及其他別的人記載，或亦可予以協助，補其不足，而對於一些困難事實的研究，也可以值得做為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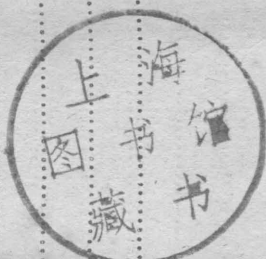
對於某些我幸能與之多年共事而且敬之愛之的同事，我曾作坦白的評論；我也批評到一些集團和個人，而且，態度是相當嚴厲的。然而，我倒並不因這些批評而不敬重他們。我不過覺得大凡參與於公衆事業的人們，彼此之間，必然坦白，對於他們申稱爲之服務的公衆，必須出於坦白態度而後可。一種矯揉造成的客氣，或者竭力避免開罪於人，有時，避免苦惱的問題，這些，都不能使彼此之間有真正的了解，不能使吾人了解當前的問題。真正的合作，必須由彼此互相了解異同之點而來，必須不管任何不方便，要正視事實。然而，我敢於相信，書中所寫，毫無對個人抱怨恨之心或懷有惡意的地方。

我會有意的避免論及印度今日之問題，除非模糊地或間接地。我身在獄中，完全無法從事此項工作，甚至亦不能在腦筋之中，決定應作何事。甚至當我出獄之後，也覺得不宜對此一題目，加上任何意見。因爲，這樣做，似乎與我業已撰就的內容，頗不適合之故。於是乎，這些「自傳性質的敘述」，結果仍是關於過去的，概略的，不完全的私人記載而已。雖已接近於目前，而仍小心的避免牠，未與牠發生接觸。

目錄

作者自序

- 一 我的父親莫蒂拉爾·尼赫魯
- 二 幼年時代的生活
- 三 家庭教師布魯克司給我的影響
- 四 哈洛與劍橋的求學時代
- 五 大戰時期的政治活動
- 六 大戰後的印度及「沙他格拉哈」
- 七 印度農村情形
- 八 農民運動
- 九 國民大會之轉變與不合作運動
- 一〇 英國皇太子印度之遊
- 一一 國民大會的分化
- 一二 格林武德爵士的引誘



一三	印度土藩王國的行政	八〇
一四	印度教與回教	八六
一五	歐洲之遊及不魯塞爾會議情形	九二
一六	西門委員會	九九
一七	「領袖會議」與職工聯合會的活動	一〇六
一八	那哈爾大會與文明抵抗	一一五
一九	妥協企圖之失敗與抗租抗稅運動	一二三
二〇	茄夢娜之入獄	一三〇
二一	父親之死	一三四
二二	德里協定	一三八
二三	第二次圓桌會議	一四五
二四	大逮捕	一五三
二五	文明抵抗的停止與白皮書之公佈	一六二
二六	長時期徒刑之終了	一六八
二七	獨立乎？自治領乎？	一七三

二八	印度的今昔	一八〇
二九	英國統治印度之功過	一八五
三〇	克呂惜娜的革命婚禮	一九三
三一	分區自治主義者的真面目	一九八
三二	印度的「民主政體」	二〇七
三三	甘地咕的思想基礎	二一二
三四	國民大會憲法鬥爭派與社會主義派	二三二
三五	茄夢娜之病	二三八
三六	吾人之目標，究何在乎？	二四七
三七	結尾	二五六
三八	最近五年（一九三五——一九四〇）的生活	二六〇
	（一）第二任國民大會主席的職務	
	（二）歐洲之遊與重慶之遊	
	（三）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印度	
尾聲	分道揚鑣	二八〇

一 我的父親莫蒂拉爾·尼赫魯

大凡富家獨子，易於被誤，此在印度爲尤甚，如果他碰巧在其有生以後十一年之久仍爲獨子，則被誤一事，幾乎是無可避免。我的兩個妹妹，年紀都比我小了很多，第一個是在我十一歲的時候才出世。因此，我童年的初期，是十分寂寞的。甚至連學校同齡伴侶也不曾有過，因爲我這段時期的教育，家里是把牠托付與保姆和家庭教師去了，不會走入幼稚園或小學校的門檻。

不過，我們所居住的房子，卻遠非寂寞所在。照着印度的俗習，這一所房子裏，住了很多的家族。我的好幾位堂哥哥都和我們住在一塊。可是，這仍無補於我的寂寞；因爲他們年紀都比我大了許多，並且都是高等學堂或大學校裏的學生。我太小了，够不到和他們攀談。所以，我只好獨自游戲，或者把時間化費在冥想之中。

我們一族都是喀什米爾人 (Kashmiris)。大約在兩百年以前，還是十八世紀的時候，我們的祖先由那高原地帶遷到沃野千里的平原地帶來。這正當蒙哥爾王朝 [註一] (Moghal Empire) 衰頹之年。這位祖先名叫拉吉·高爾 (Gaj Kaur)。他是一位有聲望的波斯文和梵文學者，甚爲當時的皇帝所器重。大約卽以此之故，我們一族人，卽於一七一六年左右，移居皇城德里

(Delhi)，還得到一份封地，包括一座在一條運河上的住宅。所以，「尼赫魯」(Nehru)一字，係由 Nehar 一字而來，Nehar 之寫為運河。) 一字，便和這位祖先的名字連在一起，成為他的姓名的一部分，「高爾」為族名。後來，「高爾」一字漸漸取消，我們便單叫「尼赫魯」了。

由喀什米爾移到德里以後，這族人幾經盛衰，結果那份封地用盡。後來又遇到了一八五七年的大暴動「註二」，合族人便離開了德里。這時，正是我的祖父時代，父親還沒有出世。不過，我的兩位伯父卻已成人。受了此次暴動的影響，失掉了所有的一切，便只好加入難民之羣，流亡到今聯合省的亞格刺城 (Agra)。祖父以三十四歲的青年死於一八六一年。祖父死後三個月，我的父親莫蒂拉爾·尼赫魯 (Pandit Motilal Nehru) 才出世。這是一八六一年五月六日。大詩人泰戈爾 (Rabindranath Tagore) 先生，亦於同年同月同日出世，可謂巧合之至。

由德里逃難之時，父親仍未出世。兩位伯父攜帶了我的年幼的姑母同行。途中不幸遇到英國兵士。姑母當時年雖幼稚，卻長得十分美麗。英兵見了，以為印度人決無如此美麗的女兒；一定說伯父們拐帶了英人的女兒逃跑。這罪名非同小可，在兵荒馬亂的當年，如果不能證實是自己的妹妹，一家老小便會馬上給英兵殺死。幸好，一位伯父，懂得幾句英語，才把這事的嚴重性減了不少。碰巧又有一個熟人過路，可作證人，這事才化險為夷。

此後，一族人便在亞格刺住下來了。祖父死後，家庭重担落在兩位伯父的身上。大伯父係在英國政府司法機關內任事，時常給派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工作，因此，常和家庭隔絕。二伯父本

在印度一個土藩王國里工作，後來又在亞格刺城執行律師職務，因此，我的父親便在二伯父的養育之下成長起來。父親的年齡，和二伯父的，相差得很遠。兩人互相依戀，情感一半像父子，一半像弟兄。父親因爲是最幼的一個兒子，甚爲祖母所疼愛。我的祖母卻是一位個性甚強的人。鄉里之中，大家都有點懼怕她。甚至於在死了幾十年以後，里中婦女提起她來的時候，還常時說她是一位惹不得的老太太哩。

家庭在亞格刺城，爲時亦不甚久。因爲二伯父的工作，和那時剛成立的高等法院，極有關聯。這個法院後來遷移到阿拉哈巴德 (Allahabad) 去的時候，家庭也就跟着搬了去。從此以後，阿拉哈巴德便成了我們的家鄉，以迄於今。——我也就出生於該地。生日是一八八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二伯父後來在高等法院的律師羣中，成了領袖人物；父親也就在這些時日，於孔波 (Cawnpore) 和阿拉哈巴德完畢其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他最初學的是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很久以後才開始英文的研究。因爲波斯文學得很好，甚爲同儕所敬重。不過，他之所以出名，與其說由於學問好，無寧說由於頑皮。他不甚高興校中功課，只喜歡運動或從事冒險。在學校中的數年，總常時是校中搗亂份子的領袖。他平生喜歡修飾，喜歡過愜意生活。當年在印度，除很少的大城市如加爾各答 (Calcutta) 和孟買 (Bombay) 等地而外，穿西裝的人，極不易見，而父親則喜歡穿着很漂亮的西裝。他在校中雖然不甚留心功課，而先生們卻喜歡他這一股活躍的精神，因此很喜歡

他。每當考試到來之時，他每每以突擊方法，作功課準備，結果，在班中常時得到相當好的等第。他對於很多次的各種考試都及格了，可是，大學畢業考試却始終沒有完成。他對大考本來不十分在意，第一場考下來，他自以為卷子做得不很好，便連第二場考試也不參加，自己到別地方去遊玩去了。後來，他的一位教授寫封信給他，頗為發氣，說，他第一場的卷子做得很好，為什麼却自暴自棄，連考場也不來了呢？——父親便這樣地結束了他的大學生活，從未畢業。

離開學校以後，他便學習做律師。後來往應高等法院的考試，不但考取，而且名列第一。於是，便從此開始他的律師職業。他執行職務的地方，最初是在孔坡，後來才到阿拉哈巴德的高等法院去。

但是，此後不久，我的二伯父去世了。這對於父親，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一方面，是失掉了一位相依為命的親愛的哥哥；另一方面，是家庭中主要生產者之死亡。因此，父親甚覺傷心。自此以後，家庭負擔便落在他的身上來了。他負上了這一個重担，便只得加倍地努力於自己的職業。結果，二伯父法庭上的律師陳辯書，差不多全部落到父親的手中來。又因為他做事認真，業務日盛，因之，家庭經濟亦大見寬裕。

正當父親熱心於他的職業的這些時候，國民大會〔註三〕，也正大大地吸引了當年懂英語的中產階級上層份子。父親也會參加過大會的最初一些會議。不過，因為他對自己的職業，十分專心，對於國民大會的活動，極不熱心。他差不多把全部時間化在職業上去，甚至假日也埋頭於律

師工作，毫不放鬆。除此而外，還因為他從前並未注意政治，他恐怕自己的基礎不夠，還是不問爲好。父親幼年和青年時代的那股富於戰鬥性的精神，在外表上，似乎略爲減殺了。其實，不過是走入另外一種表現形式，他用之於職業上的努力去了。他是富於戰鬥性的，然而，當時他却竭力避免在政治方面活動，大概當時國興大會的工作，並不十分富於戰鬥意味，也是引不起他的興味的原因罷。

我的父親，如果就「民族主義者」這一名詞的廣泛含意而論，他當然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不過，他個人對於英國人及英國人的態度作風等，却十分傾心，並且努力模倣。有時，他甚至於覺得印度同胞們自己過於墮落，目下所受痛苦，似亦罪有應得。當時的政治活動，總引不起他的趣味。主要是因為他覺得當時的活動家們，大抵空言而無實際。但是，他自己却也拿不出什麼一定的主張來。究竟如何始爲實際，他也不說。除此而外，他還有這末一種思想——這當然是由於他在職業方面的成功所產生的自負而來——以爲開始從事政治活動的那些人們，多半是——當然不會全是——在生活方面沒有辦法的人。結果，他自己專心致志於自己的事業去，因而在事業方面獲得了很大的成就。

父親因爲能力很強，所以職務上的收入極爲可觀。再加以父親對歐洲文明的癖好，結果，我們的生活方式，十分歐化。父親極會用錢，也極能找錢。多找多用，他毫無一點儲蓄的想法。

我幼年初期的家，就是這樣。

註一：即蒙古人在印度的統治。成吉思汗約在紀元後十四世紀侵入印度。十八世紀中葉即已開始衰頹。

註二：此次大暴動，乃印度在十九世紀的一次民族革命，後被英國勢力平定，自此時起，英國國會和英國國王便正式統治印度，以迄於今。

註三：印度國民大會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係於一八八五年成立。

二 幼年時代的生活

我幼年時代的環境，就是這樣一個尊重屬性的環境。我年紀太小，無法和堂哥們攀談。只好當他們彼此之間談話的時候，立在旁邊靜聽。但是，他們所講的，我却不能完全懂得。在這些時候，我常時聽到堂哥哥們談到英國人以及英印混合種之如何欺凌印度人；印度人應如何起而反抗，不應逆來順受。他們還談到當時印度人民與英國政府之間衝突的事實，有時還加以討論。一個英國人在印度被殺死一個印度人，兇手終於被其同胞審判官宣告無罪而予以釋放，乃司空見慣的公開發事。在鐵路火車上，房間是必須留候英國人前來受用。房間明明空着，印度人也不得走進去。公園裏椅凳，也必須留候英人享受，印度人不得佔據不讓。

聽了這些，我心中因此充滿了對外族統治的憤恨。每遇英國人無法無天地欺凌印度人而印度人予以還擊時，我心里便感到很高興。我的一位堂哥，身體很好。他就時常和英國人以及英印混合種，發生衝突。這些衝突，時常在火車上或公共場所發生。他尤其常和英印混合種衝突。這些混血兒，也許是想表示他們與統治民族之同根，有時比英國人還來得可惡。

雖說我這時即已開始痛恨外族統治者的不法行爲，然而，如我所能記憶的，我當時對個別的

英國人，確毫無痛恨的心理。我的保姆和家庭教育師都是英國人。再則，父親的英國朋友，也常常到我們家里來談話。在我的心裏，我對他們卻是相當敬慕的。

卽當黃昏之際，父親的英國朋友，時常來拜訪他。他們縱情談笑，十分快樂。房間裏充滿了父親那出了名的笑聲。他藉此卽一日勞苦之悶。有時，我爲好奇心所驅使，想一窺這些大人們彼此之間究竟一個對一個談些什麼，便到廳後去偷聽。有一次，給父親發見了，他便把我捉了去，抱在膝上，繼續和朋友談話。他們談話之時，常時飲酒。當時我對酒類的眼界不大，只看見過威士忌酒。有一次，我看見父親飲着一種紅色的液體。心理十分害怕，馬上跑去報告母親，說，父親正飲着人血。

我對父親，心中甚愛他，也甚崇敬他。那時，心里想，自己長大之時，一定要成爲父親這樣的人。但是，我雖然愛他，崇敬他，却也怕他。我曾經看見過他向別人發脾氣，有時向用人們發脾氣時，十分虐待他們。當此之時，我對父親又怕又恨。父親的脾氣，真是一件可怕的東西。不過，幸好他爲人亦有着很強烈的仁者之心，理智也時常能控制他的脾氣。年事越長，這種控制力量也越強。當他晚年之時，這種老脾氣幾乎完全沒有了。

在父親這種壞脾氣之下，我曾做過一次犧牲。有一天，當他不在家的時候，我在他桌上看見有兩枝自來水筆。心中考量，以爲父親一人怎麼能夠同時用二枝之多。自己便拿了一枝。他回來時，看見一枝筆不在了，便在家中到處搜索，良久仍無結果。我看見他正迫切地尋找這枝筆，感

覺到自己做下的事原來很嚴重，心中恐懼，更不敢自首。然而，結果，筆的失掉原因，終被查出。父親大發雷霆，痛痛地鞭撻我。一直打得遍體鱗傷。打後很多天，身上各處都纏着綳帶。——這時，我大概六歲光景。

但是，我記得我當時却並未因此對父親懷抱惡感。我以為父親是對的，仍很愛他，很崇敬他；不過，略略也有一點怕他了。對母親則不然。母親從來連罵也不罵我一句。所以，有時在她的面前，我甚至還欺侮起她來。母親的家庭，也是喀什米爾人。他們離開這個老家鄉，還不過兩代人的光景。

那時，除母親以外，我還有一位知己，那是父親的朋友慕巴拉克·阿里先生 (Mubarak Ali)。其人出身於富裕之家，但因一八五七年的大暴動，大受損失。再加以英國軍隊之來，家產全部毀滅。家破人亡之後，他氣質變得很好。對人非常之溫和，對小孩子們，態度尤為可親。當我受了什麼委屈的時候，往往跑到他的住所去，吊在他的頸上，聽他談天方夜譚一書中的故事。有時，他把一八五七年大暴動的詳情，講給我聽。可惜，這位先生當我長大成人之時，他却死去了。不過，對於他的記憶，還老留在腦子里，歷久不衰。

除阿里先生而外，我還由母親和姑母口中，得知由拉媽亞那 (Rameshwar) 和摩訶婆羅多 (Mahabharata) [註一] 中引出來的許多故事。尤其是我的姑母，南特·拉爾 (Parvati Nand Lal) 的遺產，她知道很多印度古書，提供了不少的補充故事。因此之故，我很小時，對印度民間文學

和神話，都有了相當的知識。

對於宗教，我的認識十分模糊。宗教信仰，似乎不過是婦女們的花樣，無多太意思。我的父親和堂哥哥們，對此都往往以兒戲視之。在印度，有着各種各樣的節氣，母親常時帶我去慶祝。男人們雖都不大有趣味，家庭中婦女們却認真得很。單流行於我們喀什米爾人當中的，也有着各種各樣的迷信節氣。但是，在這些很多節氣慶祝之中，我只對一個感到最大的趣味，那便是我的生日之慶祝。在這個節氣里，我本人充任主人翁。早上起來，穿好漂亮衣服，便在一架大秤上量體重。我站在一邊，另一邊攤上麵粉或其他別的東西。這些東西用了以後，便施捨給窮人們去。這一天里，我穿新衣，吃好食，十分愜意。甚至於還大發議論，主張每年應該多慶祝幾次生日哩！誠不知有一日終將到來，這一日，提及自己的生日，會深深地感到年事已長，心中不快哩。

有時，全家人旅行到很遠的地方去參加親朋的婚禮，也是我們最感趣味的時候。在這些場合，我們往往毫不顧及大人們的責罵，暢所欲言。這種時候，往往是很多的人都在一起，十分熱鬧。我們便無法埋怨生活寂寞了。印度的婚禮，無論貧富，都極奢侈之能事。這種鋪張，即便放下花費一節不談，其作風之俗，亦實大不可耐。只有少數的場合，能免於此。這種罪過，可以說，中產階級要負責大部份。窮苦人民，當然也力求奢侈，甚至胃負重債之險，亦必須力事鋪張。但是，如果即因此斷言其貧困之由，即為此種不良風俗所致，乃十分糊塗的話。說話的人，往往忘記貧苦之人，終年勞苦，生活極為無聊單調。這種婚禮慶祝，使他們暫時忘了憂苦，作一時之娛

樂，實不爲過，蓋亦未可厚非。誰能如此殘酷，竟至於反對他們這種少有的大笑機會呢？不要花費，不要奢侈，（奢侈一字，用之於此情，實爲不當。）這都是對的，可是，我們決不可使他們的生活，較目前所過的，再無聊，再無趣啊！

其實在中產階級，其情形亦復如是。奢侈一項不去談他。婚禮慶祝，確也是一種特殊集會，可以因之得與久別的遠親老友會面。印度是一個很大的國度。要與親朋會面，十分不易。要大家共集一堂，尤爲難能。於是乎乃有這種擴大的婚禮之慶祝。其規模之大，人數之多，只有近年來

的政治集會，各種會議和國民大會會議等，才堪與比擬。

喀什米爾人，在印度人之中，可說較爲開通。如深窗制度(Burdah)〔註二〕這種古舊惡習根本便沒有。後來我們移到平原地帶來了以後，看見有這一種風俗，爲適應環境起見，才略事模倣。但是，這仍只就與非喀什米爾人接觸之時而論。在我們喀什米爾人當中，却仍舊男女共處，毫無拘束。在喀什米爾人的晏會里，也是男女共堂。不過，女子們却往往坐在一塊而已。喀什米爾人當然還沒有歐洲那種文明，這是不消說的。

我的童年初期就這樣在良好環境之中，在家人鍾愛之下過去了。

註一：拉媯亞那和摩訶婆羅多，乃印度有名的二大史詩。

註二：印度有一種女人應該靜處深閨毫不露面的風俗，大抵講究的人家都必須如此，此種風俗名曰深窗制度。

三 家庭教師布魯克司給我的影響

我十歲左右的時候，父親新建築了一間高大而寬敞的住宅。他取名爲阿難館 (Anand Bhawan)。有一個花園，還有一個游泳池。當年，在游泳池內安置電燈，在阿拉哈巴德，還是一樁了不起的新奇事。池子造成前，我天天去注視工人們工作的情形；落成後，我一天要到池子里去游泳幾次。俯游仰游，各種花樣都玩得很好。在夜里，父親的友人們也都來此游泳。我對於怕水的客人，常時尋他們的開心。一拖一推，弄得他們叫怕時才止。其中最遭殃的，怕是德吉·巴哈多爾·薩普魯博士 (Dr. Tej Bahadur Sarda)。他那時是阿拉哈巴德法庭的新人物，是父親的好友。他不善游泳，也不想學習。到游泳池來的時候，必定坐在水下一尺五寸的地方，絕對拒絕前進一步。如果推他一下，他必定要大聲叫喚。我的父親也不能游，不過，他却咬緊牙關下水去。正當我十一歲光景的這個時候，布爾戰爭 (Boer War) 正進行着。我完全同情於布爾人 [註一]。每日由報紙上去找戰爭的消息。

與此同時，我的第一個妹妹出世。這時，父親正在歐洲未回。我十一年以來，覺得人皆有兄弟姊妹，而我獨無，甚感寂寞。這一個妹妹之出世，無疑地使我十分興奮。我還記得，她出生那

天，我在涼台上焦急地等候着她之落地。一個醫生走出來把生產了的消息告訴我，更加上一句道：「是一個妹妹，這也許更使你高興，因為，如果是一個弟弟，他將來會來和你平分財產的。」他意在取笑，不過，我聽了之後，却十分不悅。心中想，竟有人會想像我可能懷抱此類的壞念頭，實在氣人。

父親這次歐洲之游，回印之時，在印度婆羅門教的社會里，引起了一場大風波。他回來時，拒絕舉行任何一種「潔身式」(Prayashchit)。幾年以前，另外一位婆羅門教徒到英國去請領執律師職務的許可證，回來之時，社會中的正統人士便把他開除。後來他雖舉行「潔身式」，也無濟於事，他們仍與他斷絕往來。此事的結果，在社會中造成了差不多相等的兩派。後來喀什米爾年青人之往歐美留學者，回來之時，便馬虎地舉行了一次「潔身式」，而自成一派。這種「潔身式」，這時不過是一種形式，目的在敷衍耳目，完全沒有宗教的意味了。我的父親，是更進一步，他拒絕舉行任何一種儀式，即使只是形式上的也不行。這樣一來，他造成了第三派，很多喀什米爾的年青人都追隨着他。不過，後來這些拘束漸漸鬆懈，三派人也互相混合起來。最後，青年男女之往游歐美者，越來越多，回來之時，連「潔身式」這回事也忘記了。

我們喀什米爾人，是自命人種高尚的。一向怕與他種混合，破壞了本身的純潔。所以不與外種結婚。我的家庭也打破了這種迷信。我的兩位妹妹，都和非喀什米爾人結婚。同族的一位青年，適近結婚，妻子是匈牙利人。

大約十一歲的時候，由於畢善夫人(Mrs. Annie Beant)的介紹，費蒂南·布魯克司(Ferdinand T. Brooks)來充任我的留宿家庭教師了。我和他共處，幾及三年。他給了我很多影響。除他而外，我還有一位伴地特(Pandit) [註二]充任教師。請他來，主要是教我的身毒文(Hindu)和梵文(Sanskrit) [註三]的。不過，結果教了很少。我的梵文程度極為不行。只可與我後來在哈洛(Harlow)所學的拉丁文相若。這罪過當然在我，因為我不長於語文之學習，而文法一端，又是最使我頭痛的東西。

布魯克司引起了我對文學的趣味，在這方面，閱讀了不少的東西，雖然是漫無目的地。最初讀的是兒童文學讀物。由Lewis Carrall的東西讀起，甚感興趣。接着讀The Jungle Books和Kim。對Gastave Dore在Don Quixote一書中的插畫，更覺有趣。Fridtjof Nansen在Farthest North一書，向我展開了一幅冒險的新境地。我記得曾經讀了很多Scott, Dickens, 和Thackeray等人的長篇小說，H.G. Wells的傳奇，以及Mark Twain和Sherlock Holmes的小說等。Prisoner of Zenda一書，使我驚奇。而Jerome的Three Men in a Boat一書，可謂極幽默之能事。在現在還突出在記憶之中的書，還有Du Maurer的Trilogy一書，Peter Ibbetson也仍記得清清楚楚。對於詩歌，也發生了趣味，這種趣味，後來雖歷盡滄桑之變，而仍保持不衰。布魯克司還引起了我的科學方面的興趣。我們建立了一個小小的實驗室。有個時候，我埋頭在實驗室內做關於物理化學方面的實驗，動輒數小時之久，不外出。

除了關於我的功課方面而外，布魯克司還給了我一種影響，雖然是暫時的，却十分深刻。那是他的接神學 (Theosophy)。他本是一位接神學者。常和很多朋友一塊在他的屋里開週會討論關於接神學方面的問題。他們說的都是一些形而上的理論；旁徵博引，提到很多大哲學家以及很多深奧的古書。我雖不甚了了，心中却頗向往。我以為這就是了解宇宙之謎的門徑，便努力學習。把那些古奧難懂的老書拿來閱讀。不很懂牠，但卻有趣地讀牠。正在這個時候，畢善夫人到阿拉哈巴德來，作了好幾次關於接神學方面的講演。我聽了之後，便決心加入他們的接神社 (Theosophical Society) 回到家里，把這意思告訴父親。父親若無其事地笑着說：「可以！」，我看他這種冷淡態度後，心中大覺不滿。我心想，父親雖然在各方面都很偉大，而於接神學之信仰，獨付缺如，殊為遺憾。其實，父親倒是一位過來人。他年青的時候，也曾加入接神社。後來知道這玩意無甚意思，這才退出了的。

於是，在十三歲上，我便加入接神社。入社式是畢善夫人舉行，極為隆重。過後不久，布魯克司離開了我，接神學這才與我斷緣。後來我自己又到英國讀書去，這玩意兒才整個地與我的生活告別了。

正在這些時候，日俄戰爭開始了，我對於此次戰爭，甚感興趣。日本方面的戰事勝利，甚使我高興，每天我都焦急地等着報紙，好讀關於戰爭的消息。因了日俄戰爭之故，我開始對日本感到興趣，便買了很多關於日本的書籍來，加以研究。讀讀日本的歷史，甚覺不過爾爾。不過，

古老日本的武士道故事，我却十分喜歡。小泉八雲 (Lafcadio Hearn) 的小品文，尤使我喜歡閱讀。

從這時起，民族主義的思想，充滿了我的全部腦子。我夢想着印度的自由和亞細亞洲完全脫離歐洲的羈絆的自由。我幻想着很多英勇事業，幻想到自己如何手持寶劍，為印度而戰，爭取印度之解放。

十四歲時，家庭中起了較大的變化。年紀較大的堂哥哥們，已經成家立業，搬出去自立門戶去了。我思想中也起了新的波紋，對於異性也感到一種莫明其妙的趣味了。不過，我却寧可遠離女孩，而常和男孩們一起，因為我總覺得，和她們在一塊，是一樁有傷尊嚴的事。然而，每當親朋遊宴之時，有女郎在座，秋波一轉，玉臂一觸，也往往使人銷魂罷了。

一九〇五年五月，當我十五歲的時候，我到英國去。同船前往的，有父親和母親，還有尚在襁褓中的妹妹。

註一：布爾人，乃南非的一種由荷蘭來的移民。

註二：伴地特一字，意思是學問高深而德高望重。在印度，通常用以稱有此種資格的人。

註三：現在印度的文字，大別之可有二種，一為身毒文，一為烏圖文 (Uthra)，寫法不同，大抵身毒文多含梵文的成分而烏圖文多受波斯文的影響，在印度，印度教徒多使用身毒文而回教徒多使用烏圖文。

四 哈洛與劍橋的求學時代

五月末的一天，我們抵達倫敦。在多佛（Dover）時，得知日本在對馬島（Tsunashima）的大勝利，使我十分興奮。次日，正值答彼競馬節（Derby Day），我們便去看賽馬。

哈洛的入校年齡係十五歲以內，我那時稍稍超過了這年齡。但，幸好終於取得入學資格。父母等便離開了我，到歐洲大陸去，接着回印度去了。

這是我第一次離開家庭而生活，最初頗感寂寞，但不久也就自然了。在校內，雖然我力求與同學合得上，但是，結果總不能好到百分之百的境地。我自己總覺得並非英國兒童們的一夥，而他們也如此地看我。幸好功課既忙，我又好運動，精神有所寄托，寂寞之感也就不甚厲害。

入校之初，因為拉丁文程度不夠，給編在低級班。可是，不久也就升了級。在很多課程上，尤其是一般常識，我比同學們知道得更多。班中以我一人讀的課外書和報章雜誌為最多。英國兒童們只知談論運動，很使我看不起他們。我記得曾把英國兒童之無聊，寫信告訴父親。不過，這種看不起英國兒童的感覺，後來進了較高的班次，改了一點。

一九〇五年底英國的大選，我對牠甚感興趣。此次大選的結果，是自由黨（Liberals）的大

勝利。一九〇六年年初，我們的班主任向全班叩詢對於新政府的觀感。出乎班主任之意外，班中唯一發表意見的人便是我。除了功課而外，對於當時正發展着的航空事業，我也甚感興趣。那時，還是雷特弟兄 (Wright Brothers) 時代，尚屬幼稚時期。

當我在哈洛的時候，其中只有四五個印度人。後來來了加普爾塔那 (Kapurdhala) 的大君的長子帕那吉德·新德 (Paramjit Singh)。他是最與英國學生合不上的一位。他們時常開他的玩笑。他大發脾氣，但又無可如何，只好說：「你們對我們加普爾塔那去的時候，再來和你們算賬。」然而，如此說，仍無補於事。他們好像決心不到加普爾塔那去似的，仍舊拿他來當開玩笑的材料。他本來在法國住過很久，法國語也說得很好，然而，在校中的法文一科，成績却不好。英國的教育方法，正是如此。

我們班上也有一些猶太人，他們都過得很好。但是，仍有一種反猶太的空氣存在着。不過，我却毫無反猶的意味。在後來的年頭里，我還交了很多猶太朋友。

我在哈洛，漸漸習慣於生活了，可是，也漸漸感到厭煩起來，開始想到大學去了。這時，印度正在紛亂之中，民族運動，蓬勃向上。整個一九〇六年到一九〇七年之間，由印度來的消息，都使我激動。在英國報紙上，我們看到很少的消息。然而，這少得可憐的消息，已經告訴我們，在家里發生些什麼事情了。孟加拉 (Bengal) 已在混亂之中。蒂拉克 (Tilak) 的名字，也由浦那 (Poona) 傳來了。斯瓦底習 (Swadeshi) [註1] 和抵制外貨的呼聲，也聽到了。但是，我在哈

洛，却無一人可與交談此類事體，心中甚悶。一直到在假期之中，會到一些由印度來的親友，才得一吐積悶。

在校中因為功課好得到的獎品，是 G. M. Trevelyan 的關於加里波的 (Garibaldi) [註 11] 叢書中的一本。這書深深地感動了我。我設法把同集的其餘二冊也找了來，仔細研究加里波的的事業。夢想着自己將在印度做同樣的事業，為印度的自由而鬥爭。在我的腦中，印度和意大利似乎奇怪地混成一塊了。這一來，哈洛這個環境，我覺得太小了，容不了我的這種思想活動，便決定到大學那樣較寬的園地裏去。我把這意見與父親磋商。得到了他的同意，便在留哈洛僅僅二年之後，提早離開，到劍橋 (Cambridge) 去了。

入劍橋大學時，是一九〇七年的十月之初，我是十七歲近十八歲了。這時成了大學肄業生，有着更多的自由。一方面，擺脫了兒童時代，可以自號為成人了。這使我心里萬分高興。與高采烈地在劍橋的大街小巷漫遊，碰到熟人，心中十分快活。

在劍橋的三年，是安穩而平靜的三年。我選的科目是自然科學。主要是化學，地理，植物等科。但是，我的興趣却不局限在這些範圍以內。我在劍橋所碰到的朋友們，大抵都博學地談及文學，歷史，政治以及經濟等科。在這些談話之中，我最初茫然無所知。後來看了一些書籍，也就一樣地談起來了。我們動輒便討論到尼采 (Nietzsche)。那時，尼采正是劍橋學術空氣中的時髦品。談到蕭伯納 (Bernard Shaw) 以及迭克孫 (Lowes Dickinson) 的最近著作等等。也談到性的

問題，動輒援引到依凡·布拉克 (Ivan Block) 依利士 (Havelock Ellis) 等等。我們都自己覺得對於這些，一個並非專家的人應該知道的，我們都知道了。

但是，在事實上，雖然我們大胆地談論着性的問題，而我們之中，敢於作性行動的，恐怕很少。所以，我們的談論，其實仍只局限於口談而已。至少我是如此。但是，這也並非由於某種宗教性的禁慾思想所致。我們是把這事認為既非不道德也非道德的事，乃是一種超乎道德問題以上的事體。雖然如此，一種羞澀之感，終於使我竭力避免性的行爲。

當時我的人生態度，是一種廣泛意義的逸樂主義，(Cynicism) 這一半由於此乃一般青年的自然天性，一半由於受了王爾德 (Oscar Wilde) 和配脫 (Water Pater) 二人的畫的影響。當然，對於這種好逸的慾望給予一個希臘的學術名字，是十分容易的，但是，我總覺得我所企圖的生活，却略多於逸樂二字。我並不特別希望過一種安逸的生活。我對宗教不感到興趣，此種自然的結果，使我不得不另尋其他標準。於是，人生的審美方面，便引動了我的心。我便懷抱着一種理想，想有價值地過此人生，不以下流的方式放縱情慾，但是，又能盡量享受。我享受人生就行，何必去考慮牠，把牠認為是罪惡。同時，冒險生活，也仍引動我心。我有點兒和我的父親一樣，我們都是好賭的，最初以金錢爲賭注，其後以生命爲之。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八年的印度政治活動，是一種暴動的形式，然而，我仍決心投身其中。這就並非一種求安逸的企圖，不啻可知。所有這些思想，彼此混和着，矛盾着，共存在我的腦中。不過，雖說各種情感，極其模糊混

亂，但我仍不耽心牠，因為最後決定之期，尙未到來。同時，生活在身心雙方，都很爽快，新的前途即將到來，有着很多新的事要做，很多新的東西好看，也還管不到這些。決定之期，還在遠處的將來呢。有時，我和青年同伴們談及此類的問題，直至夜闌爐盡，不免洵拳拳。若將不及。然而，這一切其實不過是裝腔作勢而已。真實的生活還未到來。人生問題還不是我們的真問題。這時正是大戰之前的世界，這世界即將死亡而讓位給另一個世界，充滿了死亡，毀滅，憤怒等的世界，可是，未來之幕，把這情形遮住了，我們只在我們的周遭，看見一個將有更美好的秩序存在的前途。

我在此談着逸樂主義之類的名詞，如果以為我對此有着一定而明確的認識，那是錯誤的。這些都不過是當時存在於腦中的模糊概念而已。我那時並未關心這些。每天忙的其實還是功課和運動。有時使我十分興奮的，還是在印度的政治鬥爭情形。當時在劍橋，最於我有影響的書，是唐遜特 (Meredith Townsend) 的亞洲與歐洲 (Asia and Europe)。

一九〇七年以後，印度都在不安之中。可說是自一八五七年大暴動以來印度以英勇姿態反對向英國屈服的第一次行動。蒂拉克被判刑罪以及孟加拉民衆宣誓實行「斯瓦底習」和抵制英貨的情形，激動了全部在英的印度學生。我們差不多毫無例外都是蒂拉克急進派 (Extremists) 的信徒。

在劍橋的印度同學，成立有一個「馬吉利士社」(Majlis)，大家在這兒討論政治問題，但

都空洞無物。我當時雖也參加，却很少開口。在「馬吉利斯社」里或在私人談話之中，印度同學們，都以激烈的態度，談論印度革命問題。他們甚至主張使用暴力以求獨立。可是，離英回印而後，他們有些加入印度文官部 (India Civil Service)，有些則規規矩矩地做律師。很少有參加實際革命鬥爭的。

這幾年的革命運動，把我的父親也捲入活動之中去了。很自然地，他加入了溫和派 (Moderates) 之羣中。其中領袖，多半是他在職業上的同事。我雖然不贊成他的政治立場，但是，他終於參加政治一事，甚使我高興。他在當地的省會議上充任主席，採取了堅決的立場，反對孟加拉和馬哈拉習特拉 (Maharashtra) 的急進派。他也曾充任國民大會聯合省省委員會的主席。一九〇七年，在蘇拉特 (Surat) 的會議，他也出席。那時，國民大會業已破裂，成爲混亂局面，其後即完全成爲一個溫和派的集團。

蘇拉特會議之後不久，納文生 (H. W. Nevins) 到阿拉哈巴德來，當作父親的客人，和父親相處了相當時間。後來，他在他的本書里，提到父親時，他說，我的父親平生爲人，是「除了慷慨一端而外，一切都中庸溫和。」其實，這並非正確的觀察。父親可以說是，除了政治一端而外，一切他都不中庸溫和。並且，後來連殘留在政治上的這一點中庸溫和的態度也取消了。不過，在一九〇七年，一九〇八年以及其後數年之間，他是無疑地溫和透頂的。他拚命地反對急進派。不過，我相信，他對於蒂拉克却很崇敬。

爲什麼會這樣的呢？父親一向是充滿了法理的思想。作爲一個律師的清楚的思考，使他感覺到當年革命者所採取的手段不會產生好結果。對於「斯瓦底習」以及抵制英貨，他不甚贊成。他以爲把印度與歐洲文明隔離，重新走上古老印度之路，便等於反動。他對於印度很多古老風習都不贊成，他是主張歐洲文明的。他認爲印度可以精與英國的合作而達到其西方化的目的。

以社會的觀點而論，一九〇七年當年的印度民族精神復興運動，是相當反動的。因此，溫和派在當時，還代表了較爲進步的一種力量。不過，他們只是寥寥數人而已，未與羣衆接觸。同時，他們不主張經濟的革新，除非這種革新有益於中產階級的上層份子。他們代表着的，就是這一階層，牠是正要求着發展的機會的。所以，他們也主張局部的革新，剷除足以阻礙這一階層發展的障礙。

既然加入溫和派之羣後，父親便採取堅決的立場，反對急進派。他並且爲文痛責他們。我在劍橋讀到他的文章，深覺不滿，會因此寫過一封信給他。在信中暗示說，也許：英帝國主義正需要他這種論調。他接待信後，大發雷霆，幾乎決定把我叫回印度去。

當我在劍橋之時，出路問題即已開始考慮。到印度文官部去，也會計劃過。可是，父親和我，都不十分有興趣於此。我想，當時的理由，是因爲我的年齡不夠。如果決心走這條路，則在大學卒業之後，還得多等三四年。因爲加入文官部的年齡，是二十四歲。除此而外，還有另一原因，即父母均不願我久離家鄉，不贊成這一計劃。結果，決定做祖傳的律師職業。

當時，我的思想已經十分急進，而加入文官部成爲英國行政機構之一環，亦予以考慮，頗爲希奇。這種計劃，如果在其後數年，是想也不要想的。

一九一〇年，取得了學士學位後，我離開了劍橋。其後二年，都勾留於倫敦。關於法律的研究，不需甚多時日，很容易地，我便通過了律師考試。其餘多的時間，我都用在一般的閱讀上去。這時，費邊社 (Fabians) [註三] 以及社會主義的思想，對我影響甚深。愛爾蘭的婦女參政運動，我也大大地感到趣味。我記得，當一九一〇年夏天我到愛爾蘭去遊歷的時候，尙在早年的新芬黨 (Sinn Fein) [註四] 也大大地吸引了我。

這時，我偶然碰到昔年哈洛時代的一些襁褓老友。因此和他們一塊生活。把父親給我的津貼，用過數目。這很使父親不悅，他怕我就此墮落下去。不過，這種生活，不久也就終止了。

在劍橋的幾年，假期到來，曾兩次到歐洲大陸上去遊歷過。一九〇九年夏天，和父親偶然在柏林碰頭，那時，正是齊伯林 (Count Zeppelin) 作第一次長途飛行的時候。飛機由康士坦士湖 (Lake Constance) 起飛，到柏林來，觀者千萬，情形極爲令人興奮。其後數月，我又到巴黎去勾留一會。一九一〇年我離開劍橋後，曾和一個英國友人到挪威去。因爲在路上翻過了很多山，天又熱，到旅舍時，很想洗澡，但是，旅舍甚小，並無洗澡的設備，我們二人便到附近的一條河里去洗澡。我失足滑下水去，幾乎滅頂，幸好給同伴拖上水來，得免於死。

一九一二年夏天，我取得了執行律師職務的資格。同年秋天，我終于回印度了。在英國一共

勾留了七年之久。

註一：「斯瓦底習」一字，本意是「自國的」，因此，意思是提倡本國的工商業，同時，對英國貨予以抵制。

註二：加里波的係意大利民族運動中建立意大利民族國家的革命者之一。即意大利所謂「建國三傑」之一。

註三：費邊社是英國社會主義者的一種組織，主張一種漸進社會主義，一八八四年成立。大文豪蕭伯納亦即其中分子之一。

註四：「新芬」二字，在愛爾蘭本是「我們自己」(We ourselves)的意思，新芬黨成立於一九〇五年，主張愛爾蘭獨立自治，一方面不與英國合作，一方面主張自己的文藝復興運動。

五 大戰時期的政治活動

一九二二年底的印度政治活動，正是低潮時期。蒂拉克業已被捕入獄，急進黨被政府殘酷地壓迫着，走到地下去了，不能發生任何有效的領導。孟加拉自反對省區劃分的運動以後〔註一〕，現在已寂然無聞。溫和派的人士則熱衷於明托莫萊改革案(Minto-Morley Scheme of Concessions)〔註二〕這改革案的內容，對於印度海外僑民，略略有一點好處。尤其以對南非印僑爲甚。這時的國民大會，是溫和派把持的集團。每年開會一次，通過一些不能引動人民的無力的議決案。

我回印後，即在同年聖誕節參加國民大會的旁克波爾大會，(Balkipore Congress) 充任代表之一。這次會議，充滿了紳士風味。好像一種社交集會，毫無政治鬥爭的氣色。會中唯有郭哈爾(Gokhale)一人，把政治活動當着正經事做。那時，他剛從南非回來，在會中成爲注目的人物。他給我的印象最深。

回印後，我繼續律師職務。回家之初，因爲一切都是久別重逢，尙稱新鮮，心中還略爲興奮。但是，時間一久，一切變陳，我便開始感覺到無聊了。左右又無足與交談者，只有我的家庭中

的空氣，還算不壞。但是，這也醫治不了這種死氣沉沉的無聊之感。當時的政治活動，只局限在少數的上層份子之間。我雖然參加了國民大會的工作仍覺不甚有趣。那時，大會的工作，毫無生氣。照我的看法，印度的政治活動，應該是反對外族統治的一種攻勢的活動。而事實却不如此。很使我感到苦悶。有時偶然碰到一二富於鬥爭性的工作，我便馬上投身其中，積極活動。可是，這類的機會少有，而且往往是為時甚暫的。

這時，郭哈爾組織了印度服務社 (Servants of India Society)。我對這一組織，甚感興趣。但是，我却無意加入，一方面，因為我以為這種工作，性質過於溫和，無濟於革命。另一方面，我暫時還沒有想到放棄自己的職業。不過，雖然印度服務社的工作路線也許不是正確的，但，社中人員的犧牲精神，却大可佩服。他們犧牲了一切，為國家服務。而且是繼續不斷地做下去。

世界大戰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在最初，因為戰場離得很遠，對印度影響尚小，大家都不甚關心，也並不對牠存懼怕之心。當時的印度防衛條例 (The Defense of India Act) 實際上是大英帝國防衛條例 (The British Defense of The Realm Act) 的相等物。整個地把印度據在手掌之中。大戰第二年以後，在印度便時常聽到「謀叛案」之類的消息，而旁遮布 (Punjab) 的強制征兵的手段，也開始了。

全國人士雖然都高聲地宣誓效忠英國，然而，暗地里差不多都不同情英國。急進派也好，溫和派也好，聽到德國的勝利，心中反而高興。當然，印度人不是對德國抱着好感，不過看到自己

多年的仇人倒斃，心中不禁痛快而已。這也是無告的弱者的自然心理。差不多人人都以這種混合的感情來注視大戰。就我個人而論，在參戰各國之中，我最同情的，怕只有法蘭西一國。不過，同盟國在印度的宣傳，雖然我們常時替牠打些折扣，也仍然發生相當大的效果。

這時，印度的政治活動，又漸漸復活了。蒂拉克此時已被釋放出獄。他出獄之後，馬上組織了一個自治同盟 (Home Rule League) 畢善夫人也同時組織一個自治同盟。我兩方面都參加。不過較多的時間是和畢善夫人一塊工作。死氣沉沉的國民大會，現在也略有聲色了。同時，回教聯盟 (Modern League) 也開始和國民大會合作，齊步前進。一時，空氣極爲令人興奮。大家都興高采烈，等候着，以爲最近的將來，便有大事發生。後來畢善夫人之被拘押，更進一步地掀動了知識分子，加強了自治同盟的力量。自治同盟不但吸收了自一九〇七年以後即被驅出國民大會之外的急進派人士，還吸收了很多由中產階級出來的新鮮份子。溫和派的很多領袖也給激動了。可是，牠却還沒有驚動廣大的羣衆，還沒有和他們發生接觸。

畢善夫人之被拘押，激動了我的父親，也激動了別的溫和派領袖。他們都加入了同盟。幾個月後，他們之中，有很多退出同盟了，而父親却仍舊留下，並且担任同盟的阿拉哈巴德支部的主席。

自此以後，我的父親便漸漸和溫和派的正統分子遠隔了。他那富於戰鬥的天性使他不願意繼續對政府老是退讓。不過，對於急進派，他却始終不贊成。畢善夫人被捕的一段時間，政治局勢

· 大大的影響了他的態度，然而，他仍然拒絕前進一步。在這些日子內，他常說，溫和派的策略，當然也無多大效果；不過，如果印回問題無法作適當之解決，則亦無法作更進一步的有効行動。他並且說，如果能够在印回問題上謀取合理的解決，他願意捨掉他的溫和派立場，與年青的一輩共同前進。一九一六年國民大會的勒克瑙大會（Lucknow Congress）通過了大會聯盟連合案（The Joint Congress-Jerigue Scheme），這項草案，是在我們家里召開的一次國民大會全印委員會（All-India Congress Committee）會場上起草的。這事使父親大大地高興，他便決定和他溫和派集團破裂而與青年人連合，共同邁進。

這時，正是我開始政治工作的初年。我本性羞澀，不肯開口。在最初的這些時候，也不敢當眾講演。除羞澀而外，還有一個原因，即我以為這類的講演，不可使用英語，而我自己用印度土語作相當長時間的講演，究竟有無此種能力，又無把握。所以每每避而不講。我還記得，大約是一九一五年的光景，有一次我在阿拉哈巴德被迫上台當眾講演。我只好上台以英語作很短的演說。出乎意料之外，我一下台，薩普魯博士當眾擁抱我，吻我。這並非因為我說話的內容，只因為我竟敢於當眾講演了，使他高興。以為這樣一來又多了一個工作者，因為，那時的工作，也不過就是這樣的講演而已。

這些時候，在我們家庭中作政治問題之討論，往往不是平靜的事體。結果時常產生一種嚴肅的空氣。父親對我，十分耐心。因為他見我越來越走向急進派了，並且，我又常時批評當時的政

洽，主張實際行動。究竟是怎末樣的實際行動，並無具體意見。父親想，我的所謂實際行動，大概就是從前很多青年在孟加拉所採行的暴動方式。因此，他心中大為苦惱。其實，我的意思並非如此。我只覺得我們不能夠馴伏地屈服於既存情形之下，必須有所作為。當然，就整個民族而論，一個有勁的行動，遠非容易之事。不過，我總以為，爲了我們個人的或民族的光榮，我們這時對於異族統治，應該採取一種進攻的態度，一種鬥爭的態度。父親呢，他此時對於溫和派的理論和策略，已經不滿意了。但是，他卻不肯向前一步。他往往必須在理智地詳思熟慮之後，才走一步。向前移動一步，在他便是一次內心的激烈鬥爭。但是，一經決定，走了以後，便誓不回頭。他的自負之念，使他決不回頭。但在未決定之時，他却決不輕易動步。

他的政治活動，外形方面的轉變，係始於畢善夫人被拘押的一段時期。從此以後，他便一步一步地漸漸離開了他的溫和派同事們。再加以一九一九年在旁遮布所發生的慘案，他便最後拋掉了溫和派投身於甘地咭（Gandhiji）〔註三〕所發動的新的運動。

但是，這種進一步的轉變，是後來的事。在一九一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當時。父親尚未決定，再加以對我的耽心，所以，和他談話，頗不容易。往往是他發了脾氣後，談話結束。

我第一次會見甘地咭，是一九一六年聖誕節假中開勒克璣大會的時候，因爲他在南非的苦鬥，我們都十分尊敬他。不過，他那時在我們的心目之中，似乎是一位遠離政治的人，也不易接近。那時，他拒絕參加國民大會的工作，仍專心致力於南非印僑問題。後來他在南非的鬥爭勝利，

便準備把同樣的方法「註四」到印度國內來應用。

我記得在勒克瑙大會後，奈杜 (Sarojini Naidu) 在阿拉哈巴德的數次雄辯的講演，深深地感動了我。他的講演內容，是純粹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愛國主義思想。我當時是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大學時代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想，已經不存在了。羅傑爾·凱士門特 (Roger Casement) 一九一六年遊歷時的講演，向我指出被征服民族的正確道路。

這是我當年思想的大輪廓。但是，廣泛的閱讀，還不時地惹動社會主義的理想。不過，當時我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模糊的概念。可以說，只是一種人道主義的 (Humanitarian) 或烏托邦的 (Utopian) 而非科學的。那時很喜歡的作家，是羅素 (Bertrand Russell)。

這種思想和希望，漸漸使我發生了一種內心的衝突。我雖繼續地執行我的律師職務，心中却頗不滿意。我之所以繼續牠，原因是尚無其他之事好做。這時，我漸漸感覺到我的職業和工作不能共存了。這也並非政治方面的問題，而是時間與能力無法分配的問題。因此，我決定拋棄職業。這時，加爾各答的名律師拉希·貝哈呂·郭雷 (Sir Rash Behary Ghosh)，因了一種莫明其妙的原故，很喜歡我。他向我勸告如何可在職業上有更大的成就，並且叫我寫一本關於法律的書。一方面借此學習，一方面可因而增加地位。他甚至願意向我提供意見，願意負責校正。然而，這些都無法使我感到興趣。我想，當此之時，竟化很多時間去寫這樣一本書，那是最無味的事了。

註一：英國政府見歷次革命都以孟加拉作中心，認為孟加拉乃革命策源地，便決定縮小省區，分而嚴治。

註二：此係一九〇七到一九〇九年所施行的一項改革案，唯一特色，是在各色各樣的諮詢機構中增加印度的出席代表。莫萊為當年印度事務大臣，明托為印度總督。

註三：咕字，是敬稱的語尾。印度人敬稱甘地，都用「聖哲」一字，甘地頗不喜此。尼赫魯也主張以「咕」稱之。此字等於「先生」，但却很含尊敬親愛之意。

註四：指省地的不合作非暴力政策

六 大戰後的印度及「沙他格拉哈」

我和茄夢娜 (Kamala) 的結婚，係在一九一六年的報春節 (Vasanta Panchami) 那一天。婚禮係在德里舉行。結婚後不久，我們會到喀什米爾去住了幾個月，渡過了炎熱的暑天。在喀什米爾的這一段期間內，我曾到喜馬拉亞山 (The Himalayas) 去過一次。

歐洲大戰結束了。這時，印度工業化已經大量發展。資本家階級因此成長起來，又富又強了。這些少數人飛黃騰達，還努力找更多的財富和更大的保護財富的權力。廣大的羣衆却不甚幸運，只期待着能够減輕那壓碎人的重担。在中產階級的隊伍里，到處都有着一種期待的空氣。他們等候的，是憲法即將改變。藉這種改變，他們可在政治上獲得自治的權力。這種等於幻想的希望，甚至在大衆之中，尤其是農民羣中，也都存在着。由前線回來的士兵，則略與從前不同。他們已經在智力方面進步了許多，已經覺得不滿了。在回教徒，則因政府對土耳其的態度「註一」，和基拉發特 (Khalifat) 問題發生了很大的反感。這時，對土耳其的條約尙未簽定，不過，大勢業已了然，這個回教國是一定被欺凌的了。

總之，當時的印度，主要空氣，是等候。大家都焦急地期待着，靜看着事態的發展。然而，

等着等着，却等來了羅拉特法案 (Rowlatt Bills)。這個法案之中，包括着很多條款，對於人民的逮捕以及審問，規定可以不必經過法律認為必需的手續。這不啻晴天霹靂，震動了整個印度。甚至於溫和派也表示反對了。然而，雖然全國都反對，但是，反對是反對，事實是事實。這項法案結果經政府頒佈，成爲法律了。全國反對的結果，政府唯一的讓步是，答應此項法律的實施期間，限於三年。

甘地咕這時剛由大病好來，尙未完全復原。差不多還在病榻之上，他便寫信給當時的印度總督，懇請他不要批准這項法案。然而，他的請求，和其他很多人的請求一樣，完全被置若罔聞。於是，甘地咕在無可如何後，只得違反着自己一向的態度，發起組織「沙他格拉哈會」(Satyagraha Sabha) [註1]。第一次領導起反對政府的工作來。參加該會分子，必須宣誓不服從羅拉特法案。如果引用到他們身上來，必須堅決反對。對於政府不許增發出的同類可以反對的法令，亦採取反對態度。這，換一句話說，就是大家準備犯法入獄。

我得知此項消息後，雀躍欲狂。心想，我所企待着的實際行動終於到來了。這是混亂之中的出路，是正大光明的公開手段，也許還是很有效的手段。因此，對於「沙他格拉哈會」，我的第一個反應，便是決定加入。加入該會的結果，是犯法，是被捕入獄。但是，當時我幾乎完全沒有去考慮這些。即使考慮到，我也決心不管牠們了。可是，我馬上便發覺這事不能一帆風順。父親得此消息，堅決反對我之加入。他平生爲人，是不易爲一陣狂風捲走的。他必須對發生的事，

詳細地加以理智的考慮後，再行決定。他越把「沙他格拉哈會」的性質和工作綱領加以考慮，他越不贊成。他以爲很多個人的入獄，毫無良果，這對於政府能够施以何種壓力呢？除此而外，還另有一個原因，即私情問題。他總不願意自己的兒子入獄受苦。當時，有組織地入獄之事，尙未開始。印度人對入獄的觀念，和現在兩樣。父親的外表，有時是十分嚴肅的，其實，他心里對子女之愛，卻深不可言。

關於此事，我和父親雙方都感痛苦。我們雙方都竭力諒解對方。我自己雖然已經決定加入該會，但是，我卻深思熟慮，想設法減輕父親那明顯的苦惱。有很多夜里，我獨自漫遊園中，考慮這一問題，想尋出一條出路。父親呢，甚至於倒在地板上去睡覺，想體會出此種滋味究竟如何，因爲他想，如要我入獄，其結果是睡地板，那是一定的了。

不久，父親把甘地咕請到家裏來。他們二人談了很久。談話時，我都不在場。最後，甘地咕來勸告我，叫我對於凡足以使父親苦惱傷心的事，都不要去做。我心里很不快活，不過，不久，印度的局勢改觀，「沙他格拉哈會」也無法活動了。

在「沙他格拉哈」紀念節這一天，旁遮布發生了很大的慘案。阿木里普爾 (Amritsar) 和阿米達巴德 (Ahmedabad) 羣衆暴動。德里和阿木里普爾的軍警，開槍掃射羣衆，死亡極重。整個旁遮布下了戒嚴令了。其中消息既無法傳出，外面人也不能進去。完全隔斷了。我們中一些人想不顧戒嚴令，衝將過去，却又被一一攔回。最後，才由國民大會組織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前去。

後來戒嚴令在主要區域撤消，很多國民大會開人都到旁遮布去慰問。達斯(Deshbandhu Das)特別負責阿木里昔爾區。我便被分配在他之下工作，協助他進行一切。因此機會，我得親眼看見英將代爾(Dyer)在阿木里昔爾的殘酷的屠殺。他站在高地向民衆掃射，弄得屍積如山，血流成河。

在那一年(一九一九)年底，我記得，當我由阿木里昔爾坐火車到德里去的時候，車廂擠滿了，只剩下一個舖位，我佔據了這舖位，次晨，在車上一看，原來是很多英兵。他們談笑甚樂，我不由偷聽一二。原來正興高采烈地談話得最起勁的一個，便是代爾。他正若無其事地敘述他如何把阿木里昔爾置在掌握之中，如何開槍掃射茄利安華拉·巴格(Jalliwala Bagh) [註三]的英勇事跡。其爲人之殘酷，令我驚駭不已。

在旁遮布慘案調查期間，我時常有機會和甘地晤碰面。他常向我們的委員會建議。他的建議，往往在委員會看來，十分新奇，不肯接受。然而，甘地晤終於有辦法說服大家，要大家接受。後來的事實，也往往證明甘地晤之正確。

旁遮布的慘案，給父親的影響甚大。他全部的憲法思想，從此根本動搖。他的思想便從此漸漸轉變了。他本已和溫和派不完全合作，這次，使他更進一步。他覺得溫和派的報紙領導報(The Leader)已經不行，自己重新在阿拉哈巴德，創辦獨立報(The Independent)，那是一九一九年年初的事。這份報紙得到相當的成功。不過，管理方面却自始便不良。這罪過，從董事到編

輯，大家都要負責。我本人也是該報董事之一。曾竭力協助父親，辦理報社一切事宜。但是，後來當我們到旁遮布去的時候，報館弄得一場糊塗，甚至於牽入經濟困難之境。從此以後，便一蹶不振。雖然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曾經極盛一時。最後，終於在一九二三年年初死亡了。得了這一次辦報經驗後，我以後就不敢再負上任何報紙的董事之責了。不過，事實上我後來時常坐牢，也無法負這一類的責任。

一九一九年國民大會在聖誕節召開的阿木里昔爾大會，主席便是我的父親。父親向他的溫和派的同事們發出呼籲，說，目下局勢改變了，請他們拋棄老態度，大家合作，共同前進。然而，那時的溫和派首領們，正熱心於「蒙塔古齊姆斯福特改革報告書」(Montagu-Chelmsford Recommendations)，對於他的呼籲，毅然拒絕。這次拒絕，使父親和自由黨(這時，溫和派的首領們自稱「自由黨人」了)間的距離，越來越遠了。

阿木里昔爾大會，可說是第一次的甘地的國民大會。當時蒂拉克也出席，而且是會中的重要人物。然而，無論會內或會外的民衆大家都屬意於甘地咕的領導。「擁護甘地」的口號，開始佔優勢了。阿里弟兄(Ali Brothers)剛釋放出獄，也來出席。因此，國民大會的政治活動，從這時起，走上了新的道路。

穆罕默德·阿里(M. Mohamad Ali)後來以基拉法特(Khilafat)的代表資格到歐洲去了。在印度回教的基拉法特委員會，「註四」也越來越在甘地咕的影響之下了。我記得在一九二〇年

春天，基拉法特委員會在德里開會，決定派遣代表團，前往謁見總督，決定甘地咭也參加。但是，甘地咭尚未到達德里，一份請願書已經送到總督處去了。甘地咭到時，讀了請願書的草稿，深表不滿。他認為請願書內容過於空洞，並且頗多討價還價的條件，他主張必須修改，把回教徒的基本要求一一寫出，能達目的便好，不達目的，便須誓死爭取。既不該徒向辭藻，更不該流於空洞。他並且申明，如果不予以修改，他便不參加代表團。然而，請願書既已送去，他只好另外寫信給總督的私人祕書，補送各具體請求。但是，總督的答覆却很妙，他說，前次送來的請願書，已經很好了。他拒絕接受甘地咭的附加條件。甘地咭覺得自己已經申明了態度立場，便加入了代表團。

很顯然的，政府決不會答應基拉法特委員會的任何要求，於是鬥爭必然到來。甘地咭在此時，力勸他們接受他的非暴力主義，不合作主義。基拉法特委員會接受了牠們，並且決定以八月一日為第一日，開始運動。

我記得在那一年年初，一次回教的會議，（大概是回教聯盟的政治會議）也開會討論是否採取甘地咭的不合作政策。會議在許德·拉真·阿里 (Syed Paza Ali) 的家中舉行。這時，穆罕默德·阿里，仍留歐未回。梭加特·阿里 (M. Shankat Ali) 却在場。因為這次會議很使我失望，所以還記得清楚。除了梭加特·阿里而外，其餘都很怕事。他們既無力提出異議，也無力作任何有力的行動。甘地咭向他們致辭。告訴他們，如果決心從事鬥爭，必須犧牲一切。「你們如要我

領導，必須聽從我。」一經宣戰，則必須堅持到底。這些話，幾乎把他們嚇怕了。然而，結果當表決之時，他們竟也投票贊成提案——贊成作戰！

當我和甘地咭一塊回來之時，我對他說，這實在不是一個發動鬥爭的樣子。我們去開會之前，我以為會場一定十分熱烈，空氣十分緊張。不料，看到的却是一批中年先生，毫無生氣。然而，結果也仍贊成鬥爭。當然，到後來，回教聯盟的許多份子，都沒有參加鬥爭。他們反去找政府機構作為安全的保障。所以，回教聯盟，實在趕不上一九二〇時的基拉法特委員會。該會確實代表了回教的輿論，實際地投身於當年的鬥爭之中。

註一：大戰時，土耳其加入德國一方，德國敗後，英國壓迫土耳其，減削土耳其回教教主的權力。

註二：沙他格拉哈字意本是「真理把持」，乃甘地的一種宗教性的政治上的活動手段，亦可稱為「甘地主義」，其主要內容主張以文明抵抗的不合作方法反抗暴力的壓迫。

註三：這是民衆們出入城中的一個通路。

註四：基拉法特本是土耳其回教教主的名字，英國大戰後，侵犯他的權力，廢除他。印度

回教乃組織此會以擁護之（可參考本段「註一」之注解。）這時，甘地和回教徒一同反對英國此舉。

七 印度農村情形

我的政治活動，是我本階級——布爾喬亞階級——的政治活動。真的，當時的政治活動，可以說都是代表着中產階級的。無論急進派也好，溫和派也好，都是一樣。不過，溫和派所代表的，是這一階級的少數上層，他們是在英國統治之下發生成長起來的，他們並不需要重大的變革，因為，這種變革會影響到他們的地位和利益。他們和英國政府以及大地主階級都有着密切的連繫。急進派則代表這一階級的下層分子。至於產業工人，數目因大戰而激增，也只在某些地方有着地方性的組織，無甚力量。農民則在尚未醒覺的階段，馴伏地一任與他們接觸的一切人們剝削壓迫，如政府、地主、債主、小官僚、警察、律師以及教士等等。

在一九二〇年的當時，我對於工廠農場的勞動條件，茫然無所知。我的革命觀點乃是布爾喬亞階級的觀點。直到甘地咕的土地運動以後，我這才稍稍注意到農民問題來。然而，我仍被當時發展着的政治活動所吸引，不甚注意到這一方面。

這時，我以非常之特別的機會，得與農民接觸。事情是這樣的：

我的母親和茄夢娜，都在病中，我便在一九二〇年五月里把他們送到莫沙里 (Mussorie) 去

。那時，正是一九一九年英國與阿富汗 (Afghanistan) 戰爭之後，阿富汗的代表們正在與英國的專使談和平條件；地點就在莫沙里，而且，這些阿富汗的代表們，恰巧和我們住在同一間旅館里。代表們雖生活在一個地方，却分開食宿。我對於他們，並未有特別的趣味。整整一個月裏面，並未和他們之中任何一位代表碰過面。即使偶然碰到，也不認識。有一個晚上，忽然來了一位警察署長，拿了當地政府的一道命令來找我，要我保證自己不與阿富汗的代表團有任何接觸。事實上我並無和他們接觸的企圖和機會。警察署長有着秘密情報員注意此事，他應該是很了解的。所以，我不肯給予此種保證，因為這等於無的放矢。警察署長請我去見德赫拉東 (Dehra Dun) 區的行政長官。我遵命前往，仍然拒絕給予保證。於是，一道驅逐令下來了，跟我二十四小時以內，離開德赫拉東區域。這命令，事實上是要我在數小時內離開莫沙里，我心里不願意離開病着的母親和妻子，但，那時，文明抵抗運動尙未開始，也不擬違抗命令，便馬上離開莫沙里，回到家中。

父親得知此舉，心中不悅，馬上寫了一封私人信函給當時的聯合省省長哈爾郭特爵士 (Sir Harcourt Butler)。他和哈爾郭特間本有着很篤厚的私交。他在信中說，哈爾郭特當然不會發出這樣無理的驅逐令，必是其他的人弄出來的。哈爾郭特却回信說：這道命令本身對於加瓦哈拉爾 (註一) 無害，他只要離開就是了。父親回信說，也不是居心違令，不過，如果我的母親和茄夢娜的病狀要求時，那末，我還是要到莫沙里去的。後來，碰巧我的母親病狀轉劣，父親便決定和我一塊兒去探望。恰在出發之前，接到了一個撤消該項驅逐令的電報。

第二天早上到莫沙里的時候，我在庭中看見的第一個人，就是一位阿富汗人。他正抱着我的小女兒玩耍。這人原來是阿富汗政府的大臣，充任代表團代表之一。原來，阿富汗的代表們由在報上看到我被驅逐的消息以後，對此事非常之有興趣。代表團團長開始每天送一束花來給我的母親，探問她的病狀。

我這次被驅逐的結果，使我在阿拉哈巴德與大批的農民接觸，因為在被逐的二周內，我碰到了他們。這使我開始與農民運動發生關係，這種關係繼續發展，對於我的革命觀，影響甚大。那大概是六月初。有兩百光景的農民，由怕他加爾(Patpargah)區的中心地帶，一直結隊步行五十英里之遠，到阿拉哈巴德來。目的在於向勾留在該處的政治家們，表示表示，希望政治家們注意及他們的生活之窮困。他們的領袖，本人不是一個本地的農民，名叫拉媽康得拉(Ramesh Chandra)。我得和他們休息在贊木納河(Jumna)的一條支流岸上，便和幾位朋友一塊兒去探看他們。到時，農民們圍繞着我訴苦，講到收稅區主(Talukdar)如何剝削他們，並請求我們和他們一道回去，一方面調查他們的生活實況，一方面保護他們，免得收稅區主知道他們懷抱着如此的目的到阿拉哈巴德來，因而向他們報復。最後，我答應他們在二三日後去看他們。

後來，我和友人一塊到他們的鄉村里去住了三天。地方極為偏僻，農民們見我們來了，大喜欲狂。把我們認為是救星一般，好像我們來了，就可以一下結束了他們的悲苦命運似的。農民們用口大聲呼喚，聲音極高，這一村落傳到那一村落，那一村落又傳到下一村落。在很短的時間內

，附近很多村落的人，都潮湧一般來了。他們大抵都穿着破碎的衣服，形容憔悴，目光閃灼着，懷抱着黃金般的希望來歡迎客人。我看見這羣農民這樣地向我表示敬愛，心中頓時感到既羞恥又傷心。羞恥的，是自己那一帆風順百事如意的物質生活，和自己那忘掉了廣大農民的政治活動，只在城市中兜圈子。傷心的，看到印度農村破壞到這一步，農民們半裸着身體，半飢半飽，更受着百般的欺凌。這種情形，頓時使我張惶失措，同時，深深地感到自己應該要負上一種新的責任了。

我靜聽着他們很多悲慘的故事，他們如何地領家破產，以應付收稅區主，債主以及各種各樣的人們的勒索。如何因高利貸的剝削以致於被由土地上驅逐而為佃農等等。

他們的領袖拉媽康得拉，是一位西部的印度工人。他曾到歐德省 (Orissa) 各處周遊。給農民們講述着拉媽啞那史詩裏的很多故事。他本人並未受過很高的教育，但却長於組織能力。他在各地教育農民如何開會，如何商討本身的困難問題。他還教育他們如何以口頭呼喚作為集會的信號等等。前次集會到阿拉哈巴德去，便是他領導着。

歐德這個地區，是一個最好鼓勵土地革命的地方。這地方是所謂收稅區主的領有地，他們自稱為「歐德的諸侯」。采邑領土制度 (Zamindari System) 在此是集其殘酷之大成。差不多所有自耕農都因經不起重重的壓迫與剝削，變成佃農了。不過，由另一觀點看，農民方面，只有此一純粹的階級，所以很有利於集體的統一行動。

印度的采邑領土區，主要是孟加城，倍哈爾（Bihar）以及歐德亞格拉聯合省這些地方，采邑領土區域內的農民，所受的壓迫與剝削，最為厲害。在旁遮布和古者那特（Gujrat）那些非采邑領土的地方，農民已經窮困得透頂了。可是，如果拿來和歐德區的農民們比較，却又幸運了不少。不過，在旁遮布這些地方，農民羣中，種類很多，有自耕農，半自耕農，佃農等等。而他們彼此之間，又復有利害衝突，以致在行動上極難連合一致鬥爭。而歐德則稍異於是，差不多全體都是短時期的有約佃農，自己毫無土地。本來都是有着土地的，都因債台高築結果喪失了所有權，而被驅逐了。因此之故，對於倡導一種聯合的鬥爭行動，大有裨益。這些無土地的佃農，甚至連短期的佃權，也常常毫無保障。地主收租時，很少給予收據的，他隨時可以說農民並未繳租而將他們驅逐。再把土地租給另一些願多出額外費的佃農去。農民們在這種時候，又無法證明確已繳租，往往忍氣吞聲，任其欺凌。即使除掉這種情形不談，農民們在平常的狀態之下，亦難堪其剝削。其勒索名目種類之多，幾乎多到使人不相信的一步。據說，某一采邑的租稅名目，曾有五十種以上。一句話說完，土地所有者是把他人一切的消费，都轉嫁在佃農的身上了。甚至厚顏到創立各種奇怪的名目，如「購車稅」（Motrauna）、「購象稅」（Hathana）等。甚至兒女婚嫁和出洋留學等費用，也都要佃農供給。因此，在歐德區會發生土地革命的運動，誠非偶然。不過，這種在農村中的廣大要求及其活動，竟和印度風靡一時的國民大會以及不合作運動等革命行動，完全無關，真是一種憾事。印度的城市革命家們，絲毫沒有注意到這種在農村中的廣大

要求，而新聞報章當然更是一句不提，一聲不響了。

我見了這種情形，思想方面所受影響極大。我深深地感覺到印度革命的主力，不應該單由城市中去找，應該以廣大的農村為主，我感覺到從前的活動與農民完全無關，真是很大的錯誤。

註一：加瓦哈拉爾乃尼赫魯之名，此處暱稱也。

八 農民運動

我在鄉村中過了三日，便回到阿拉哈巴德城，因了這一次的旅行，得到了很大的啓示，覺得農民是印度革命的主力，比較中產階級更重要了許多。自己應該多去和他們接觸，不久，便又再去一次。

這次再去，我便和農民們一塊坐，一塊吃，一塊兒宿在草屋裏，心裏十分痛快。有時他們舉行各種大小集會，我也去對他們講演。因此農民們都非常之信任我。初去，本是坐了一架汽車去的，農民們特別趕工修築馬路，以便汽車直達鄉村中心去。有時車子拋錨在土坑中，他們甚至出死力把牠抬出。後來我連車子也不坐了，步行了很多路途。我一向的生活，可說是養尊處優的。此次在六月陽光之下，步行很久，做了很多勞苦的事體，而居然能够支持。這很使我高興，也增長了我對身體的自信。

農民們在無形之中，給我以很大的教育。一方面他們使我從那時以後，無論何時，只要當考慮政治問題的時候，腦中都存在着這一幅窮苦農村的圖畫，把他們當作主要對象計劃工作。這可說是使我由小資產階級的小圈子里脫出，加入廣大的農民羣衆羣中去，另一方面我從前本來是怕

用印度土話講演的，這次站在農人們的集會上，不得不講，不得不用印度土話講，因此使我在這方面也增長了很多技術。

接着，我便離開了農民們，回到莫沙里看母親和妻子去。可是心中却充滿了這次和農民接觸的印象，總企圖着還有機會再到他們羣中去。

在一九二一年一年之中，我常時到鄉村地帶去，差不多走完了聯合省全境。當時的不合作運動，也傳到了這遼遠的鄉村裏來了。很多國民大會的工作者，都到鄉下來工作。他們宣傳着不合作運動，有時加上一二句，說，此種運動的目標，亦在於取消農民的貧苦。當時不合作運動與土地運動，雖然仍是獨立的，但，彼此之間，已經互相給予影響不少。國民大會工作者所到之地，都強調他們非暴力政策的信條，這使得農民們在運動方式上也不大使用暴力。這一種結果，甚為重要，土地革命在本質上說來，本是富於暴力性的。而歐德地方的農民們，又正是憤怒得一觸即發。當時若果一味亂動，不惟得不到好結果，反而使農民遭受到很多的不幸。開始的時候，因為國民大會人士的這種努力，免除了一些衝突。後來專斷發展下去，在農民與政府之間，很多衝突，終於不免，這當然也是一定的結果。這時，農民們已經認為政府的機杼和他們是本地對立的了。在各方面都反對牠。有時，很多的農民乘坐火車不肯買票，尤其以當他們急於要去參加自己的羣衆大會時為然。鐵路管理當局干涉的時候，他們只簡單地答覆道：「現在舊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後來，鐵道當局在管理方面嚴格起來，才除去了這種現象。可是，農民們這種日漸增長

的反抗性，已使得政府阻礙了。政府便決心來壓抑這種「惡劣」的趨勢。

一九二〇年的秋天，農民的少數領袖，因小故給政府逮捕了。案子決定某日在怕他加爾(Obstergaß)開審。可是，這一天到來時，農民羣衆大批地堆到法庭上來。並且一直排隊直達監獄門口，因為他們的幾位領袖就關在這監獄內。縣長看見這種情形，怕起來了，只好把審問時間拖延一日；可是，農民們却不肯分散，相反地越集越多，幾乎完全把監牢也包圍好了。農民們身邊只要攜帶少數乾糧，便可經久不散。政府無法，只好把這幾位領袖暗地裏在監牢中開審，予以釋放。這事，在農民方面，當然是一次大勝利。自此以後，他們便誤信單靠羣衆的數目巨大，即可獲得鬥爭的勝利。至於政府方面，當然更爲恐懼，從此謹爲提防，也嚴加處置了。所以，後來又發生一椿性質相類的事件，而結果就不同了。

事情是這樣的：

一九二一年元月初，我接到由雷巴里(Riese Barz)發來的一通電報，要我馬上到該地去，因為恐怕將有要事發生，我第二天便起身前去。原來農民領袖又有幾人因事被逮捕了，農民們鑒於前次在怕他加爾的戰略之成功，便決定如法泡製，再來一次。大批的農民又集隊到雷巴里去示威。可是，政府方面的對付方法却不同了。牠調集了大批的軍隊和警察，決心制止農民們的隊伍，不許前進。農民的隊伍到達了鎮外的一條河岸上，被阻止了。只有少數由別的方向混進城內。我一到車站，得知此事，馬上就到河邊去。在途中時，縣長派人送給我一張字條，請我回頭。我

便在字條的背後寫回信道：「請問究竟根據法律的何條何款，要命令我回去，除非能說個清楚，不然，我還是要前進的。」於是，我繼續前進。到走近河邊之時，便聽到開槍掃射之聲。走近一洞橋邊時，守衛兵士阻止了我，不准過橋。我只好就等在那兒。馬上躲四周路旁的農民們圍了上來，大約有二千人光景，我便和他們舉行了一次會議，想努力使他們鎮靜。結果很好，農民們的恐懼心理，減了不少。這時，縣長先生正由「火線」上歸來，他請我和他一塊回去。用了別的一些藉口，把我扣留在他的家里兩小時之久，主要是使我不能和農民羣衆以及其他同事們接觸。

這次的掃射，農民們被打死不少；可是，他們却不肯就此解散，仍矗立不動。當時如果由我去叫他們解散，很有可能。可是縣長不願出此，他輩肯失敗。事實上，曾經有人向他如此提議，他毅然拒絕了。

當時，向農民開槍，不止一處，別的地方也有同樣情形發生。可見當時英國政府是決心粉碎農民羣衆的這種力量的。

後來在一九二一年後半，非查把德 (Fryzabad) 縣也發生了一次。那一次發生的原因，却很奇怪。有些農民們，成羣地跑去把一個收稅區主的家裏搶個精光。這事後來才弄清楚，原來是另外一位采邑領土主的僕人和那位收稅區主有私仇。因此鼓動農民們去如此行動，藉以報復。並且告訴農民們說，這是甘地先生的意思，所以，當他們前往搶劫時，大家還高呼「擁護甘地」的口號。

事後一二日，我便奔出事場所去，心中非常不滿於農民們的這種使用暴力的舉動。馬上召集了一次大會，嚴厲地責罵他們。我自己當時很受到甘地咕的「沙他格拉哈」這一理論的精神的影響，對於暴力非常痛恨。我叫犯事的農人，要承認錯誤，要當衆自首。誠實的農民們，因為一向很相信我，便在警察在場的這大會上，舉手自認。當然，其結果是逮捕了。

後來，我在和個別農民的私人談話之中，得知劫人的農民是誤信他人之言，深悔不已。可是，已經是後悔無及了。當時，被逮捕的，不只是當場二三十人，以後還續有拘捕。這一案子的審問，差不多經過了大半年之久的時間。很多農民被判決處以短期徒刑，有的死在獄中，有的所受徒刑時間較長，一直到後來我本人數度入獄之時，還在牢獄中會着他們中的一二人，顏憔悴地在獄中消磨其青春。

印度農民運動的持久力不强，雖然在當時曾顯示了很堅強的力量抵抗了政府與地主二者聯合的壓迫。但是，不久也便衰頹下去了。活動份子，有的被捕判處徒刑，有的因大飢荒而餓死。運動差不多消聲匿跡，只有少數的人，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把工作局部地支持下去。

政府看見這種農民運動之蓬勃，給嚇壞了。這才頒布了所謂「租佃法」。在這一項法律中，把佃農的命運加以局部的改善。主要部份，是規定佃農們對某一土地有終身租佃之權。可是，話雖好聽，而於農民的實際生活，仍毫無補益。並且，「租佃法」頒佈不久，政府因為看見農民運動的確已經給鎮壓下去了，便又馬上停止實施。

雖說已經被鎮壓，其實並未死滅。歐德區的土地運動，以後仍然時起時落，綿綿不絕。自一九二九年的不景氣開始以後，影響所及，印度的農民運動，又復死灰復燃起來。

不過，當年印度農民運動，雖然極其重要，可是，却是單獨地進行着的。既未受外界的任何援助，也不爲全國人所注目。當時在印度最引人耳目的，是旁遮布的慘案以及不合作運動等等。甚至「司瓦拉吉」(Swaraj)「註一」，當時也不大引人注意，這主要是由於領導者的關係。那時大家信仰甘地咭，而甘地咭本人就不談「司瓦拉吉」之類的問題。他以爲這是空洞而遼遠的事。他最喜歡的，是談些具體而微的策略。要有効而又一定。所以，他一向都只強調着他的不合作運動。他以爲這是一種最有効而又具體可行的手段。至於這種手段之採取，究竟欲達到何種目的，他却一句不談。影響所及，革命目的在羣衆之中，當時非常模糊不明。

註一：自治或獨立之意。

九 國民大會之轉變與不合作運動

一九二〇年的秋天，國民大會在加爾各答(Calcutta)召集一次特別會議。要討論行將採取何種步驟，主要是想來決定不合作運動一案。

這時，在年老一輩的領導者們之中，唯一能與甘地咭採取同樣行動的，只有我的父親。父親之做到這一步，也是經過了很大的困難的。他躊躇着，不敢向自己尚未十分了解清楚的境地移動一步。在加爾各答大會召集之前的那些日子裏，我很少和父親碰面。但是，每次當我碰着他的時候，我便看出他正爲了這一問題而深思熟慮，不敢馬上決定。即便除開關於民族的考慮不計，以他私人而論，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轉變。不合作運動，就是要他停止他的律師職務；就是要他和原來的生活方式絕斷而創造一個新的生活方式。這，對於年近花甲的他，頗屬難能。他一向是過慣了舒適生活的，停止職務，結果所屆，是必須降低生活標準。然而，他的理智，他的自尊之心，歷年以來的積怒，民族的尊嚴，都驅使着他，要他走上正確的新道路。結果，他終於不顧一切，加入了甘地咭的戰線。

甘地咭的人格，大大地使他心服。我父親的愛惡之情是十分強烈的。然而，他終於能和甘地

咭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們二人之結合，可以說是一種奇怪的結合。一個，是一位聖徒，一位崇教的信仰者，一位制慾主義者，一位畢生拒絕人生之一切享樂的人。另一個，恰恰相反，完全不信教，以全副精力享受人生之樂。但是，彼此在人格方面的互敬，使他們結下了篤厚的友誼。

這次的加爾各答特別會議，開始了國民大會的「甘地時代」。(自此以後，國民大會一直在甘地咭的領導之下，只有很短的時間讓位於達斯和我的父親所領導的「司瓦拉吉黨」但不久仍歸甘地。)衣冠楚楚的紳士作風消失了，代替牠的是土布，是下層選出來的代表。印度土話代替了英語。在會場上反對用外國語言的情緒，也越來越高漲了。大會的空氣，蓬蓬勃勃，充滿了活躍的精神。

開了大會，我和甘地咭回來的時候，曾經到參丁尼克坦 (Santiniketan) 去拜訪泰戈爾先生。在那兒勾留了數日。我還記得安特烈 (C. F. Andrew) 給了我好幾本書，我都很感到趣味。這些書討論帝國主義在非洲的經濟方面的情形。其中一本是 B. O. E. H. 的黑人之負擔 (Burden) 這書最使我感動。

就在這些時候，或者再晚一點，安特烈曾經寫有一本主張印度獨立的書。我想，書名叫「獨立，當務之急」(Independence - The Immediate Need)。這是一本很好的散文。在我看來，不但說明了印度獨立之必然的條件，也表達了印度人的內心思想。書中並無經濟的背景或社會主義的思想，純粹是民族主義的精神。安特烈，是一位外國人，而且，還屬於印度的統治種族，他竟替

印度人叫出了內心的呼喚。這是頗爲希奇的事。他會竭力主張，以爲印度之解放，必須依靠印度本身所發生之力量。由外部來的恩惠，借款，宣言，同情……等等，都無濟於事。

此後數月的局勢發展，證實了不合作運動之有效。抵制立法議員之選舉，大大地成功。很多的選民不投票，很多的候選人放棄被選資格。

但是，一部分老的領袖，却因國民大會作風之改變而告退了。最有名的是真納先生(Mr. M. A. Jinnah)。奈杜(Sarojini Naidu)曾把他呼爲「印回聯合之大使」。過去，他確實費了很大的力使印回合作。但是，國民大會此次大轉變，使他不能忍耐。他看不慣土布衣服，聽不慣印度土話的講演，終於退出了。據說原因是不贊成此時的政治立場。其實這是假話。當時還有很多比他在政治上還要落伍的人，仍留會中。真正的原因，是他和這批新人物合不上，只好退而隱居。然而，結果，這位「大使」終於走入反動的道路，和回教分區自治派最反動的份子混在一塊去了。

溫和派或稱自由黨人諸公，當然與這新型的國民大會無關。他們不但遠遠地離開牠，甚至加入政府機構，充任部長閣員之類以協助政府，共同壓迫不合作運動。然而，溫和派諸公却不能因此得到快活。和人民爲敵，到底不是一樁好過的事。到處碰到敵意，即使有不見牠，嗅不出牠，心里到底老不舒服。羣衆運動，或真正的革命行動，往往會發生這一種雙重的效果：一方面，牠鼓舞了羣衆以及和羣衆在一條戰線上的人們，使他們向前邁進；一方面，他在心理上打擊了和羣衆離開的人們。

在一九二一年全年，我們很多在國民大會中工作的人們，都在一種興奮的情緒之中生活着。既樂觀，也熱心。我們覺得面前擺着光明的道路，感到一種爲事業而赴湯蹈火的快感。我們知道國民大會與政府之間的衝突，必然地就要到來，都想努力在被捕之前多做下一點事。最重要的，就是我們這時有一種自由之感。對於這種自由，我們引以自傲。我們自由地做着一切自己要做的事，再也不像從前一般地需要戒備了。凡要說的話，我們都高聲說出，使從前跟在我們後面做情報員的人們束手無策。因爲現在無祕密可探了。我們手中的牌都公開地擺在桌子上。

我們不但因爲我們做着一些足以改換印度面目而將印度自由帶得更近的偉大工作而感到滿足，同時，在我們的革命目的和奮鬥手段雙方，我們都覺得較我們的反對者們的，來得高明。心中也大感滿意。我們對於我們的領導者，和他所發明的鬥爭手段，都認爲是足以自驕的。

當着我們的情緒高漲之際，政府方面的，便突然下降了。他們看見這種蓬勃地發展着的現象，手足無措。有時偶加抑制，結果，這種抑制反而發生了刺激作用，增強了運動的力量。政府此時的張惶失措之情，誠如當年的總督雷丁勳爵 (Lord Reading)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時所說，是：「迷亂了，昏了。」

英國官方，不得不退讓了。一方面，又因爲這種文明抵抗的不合作運動，並不使用暴力，無懈可擊，政府也無法予以壓制。一般的英國僑民。對於這種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的誠實性，不敢相信。他們總以爲這不過是一種顛幕，某種使用暴力的手段，有一天必定會到來的。英國人對印

度人，是不了解的。他自小即受到一種教育，以爲東方是個神祕的地方，東方人是一種神祕的人。在這個神祕的所在，這些神祕的人們，時時在謀劃着某些莫明其妙的神祕事件。他對於很多簡單的，不去直率地考慮牠，只把他由關於印度人的那些古怪的神話小說中學得來的觀點，去猜測印度人。他從來不設法去好好地了解他們。一九一九年四月在旁遮布的本可不必發生的慘案，即由這種心理所致。

一九二一年這一年，是萬分緊張的一年。一切業已發生的事件，當然已經够壞了。然而，在英人們的腦中所猜想的，其壞更甚。我記起一個最足以代表這種猜想的例子來。我的妹妹施華魯普 (Swarup) 的婚禮，決定在阿拉哈巴德舉行，時間定爲一九二一年五月十日。這日子，是翻黃曆，認爲是吉日而擇定的。甘地咕以及很多國民大會的名人，都要來吃喜酒。因爲想趁他們到來之便，有人發起要在阿拉哈巴德召集一次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 (Congress Working Committee)。本地的國民大會人士，也想利用這些大領袖們之到來爲號召，在本地開一次大會，想吸引附近的廣大農民羣衆前來參加。因是之故，整個阿拉哈巴德城都興奮了。街頭巷尾都以國民大會作爲談資。有一天，我由一個律師朋友處聽到一個消息，說，英國人已經從事戒備了。政府並指定某地作爲臨時事變時英僑集中避難之所。英國人們再也不敢相信他們的印籍僕人了。都自己把手槍拿出，隨身帶，以備萬一。我聽了之後，甚爲驚駭，不知究竟是何道理。仔細打聽下來，這才知道英國人們都以爲五月十日乃一八五七年米魯特叛變 (Mutiny at Meerut) 的紀念日，

國民大會準備在這一以暴動的方式來紀念哩！這真是見神見鬼。誰都知道甘地咭乃非暴力主義的發明者與實行者。他盡全力來勸大家遵行他的主義。而國民大會竟會在這位主張非暴力的聖徒到來之時使用暴力嗎。

甘地咭對於這種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特別常常強調牠的宗教的和精神的方面。他的宗教觀，可說是一種直接施用於實際人生的宗教觀，就羣衆而論，他確實大大地影響了他們，因而影響了這次運動。國民大會的人士，多數當然都模倣他們的領袖，甚至重覆他所使用的辭句。但是，甘地咭的領導同志們，如我的父親，達斯和拉吉帕特，雷意(Tarla Rajpat Rai)等，都是不信宗教的。他們只由純粹的政治觀點來觀察政治。他們向外演說時，都一句不提及宗教。不過，他們的話，實在不如他們的行動之能予人以影響。他們不都是拋棄了一切而來從事這一鬥爭的嗎？這種事實本身，就可以被人了解爲一種宗教思想的表現。因此，助長了甘地咭那種宗教觀的發展。

當時，我對於這一運動宗教性的因素之發展，大感不快。甘地咭在對羣衆演說之時，也竟引用很多宗教上的辭句。但是，我自己安慰自己說，甘地咭之所以引用牠們，是因爲牠們早已爲羣衆所了解，易於被接受，因此也易於發生效果的原故。甘地咭本是有着一種打入羣衆內心的奇怪力量的。因此我也並不爲此事而多所煩惱。當時我的工作，又極忙碌，也來不及去考慮這些事體。同時，我想，我們這運動，是一個龐大的運動。工作既繁重，參加分子亦極複雜。如果企圖統一，自非易事。這好像一條大河流，只要主要的方向不錯，其中即使多少有一些逆流倒水，原也

不妨。再則甘地咕之偉大，已經是周知之事，我們既然已經衷心信仰他，便不妨交給他以空白支票，一任其自由使用，至少現在應該如此。

但是，我們之中，有很多人太過於信仰甘地咕在革命手段方面之正確，因此也大大地受到他私人生活態度之影響。卽以我而論，自幼年以後，與宗教接近，從無如這一段時間之甚。不過，我終於仍能站在宗教圈外，並未投身其中。

對於這一次運動和「沙他格拉哈」的精神，我是尊重他們的精神的和道義的一方面。對於這種非暴力的學說，我並非絕對信仰，也不是永遠接受。不過，我當時覺得在我們的印度，有着如此特殊的背景和傳統，這種鬥爭手段，恰好適用。所謂政治的「精神化」，如果使用這字時，並不在於牠那狹意的解釋，我到認爲是很妙的。對於有價值的目標，必須使用有價值的手段。這不是一種道義性的說法，也的確是一種政治理論。因爲不良的手段，往往把高尚的目標弄壞，或者，在過程中增加新的問題和困難。

這就是我當年的思想。不合作運動，使我滿足。我的目的，是在於民族的自由和外族壓迫與剝削的終止。不合作運動卽可使我達到此種目的（當時我想）。這種手段也滿足了我的精神方面的要求，使我發生一種個人身體自由之感。這種個人方面的滿足，其力量十分偉大，有很多失敗，均因此毫不在意，認爲不過是暫時的現象。

對於迦泰經 (Bhagavad Gita) 中的神怪部份，我不喜歡，有時却喜歡讀其中的一些詩歌。這

些詩歌、甘地喏每天裏回到他那「精舍」(Ashrama)中去作禱告之際，他都背誦着的。這些詩歌說：一個人應該最意志堅定，不動心，專心做事而不計後果。我自己雖然並不「不動心」，但是這些辭句是很使我感動的。

一〇 英國皇太子印度之遊

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印度是充滿了各種主義的一年。但是，在甘地咭的偉大領導之下，竟能使各種力量，在某種程度以內，集中一起，可說是難能可貴的事。所以，會有人稱甘地咭爲「不同民族之各種希望的綜合的象徵表現物」，確是不錯的。

印度民衆對於英國的統治，當然是痛恨的。可是，我們對於英國人，可說是寬恕的。這，一方面，是甘地咭對非暴力政策強調的結果；他不止一次地告訴我們說：「惟勇者爲能恕人。」一方面，實由於印度人民對自己爭取獨立自由的力量，有自信。我們總以爲最後勝利是必然的。這只是時間的問題而已。對於一個終歸失敗的敵人，可以不妨大量一點。可是，我們這種「大量一點」的態度，却不能用之於我們自己國內的少數賣國者。我們對於這種出賣民族利益以求在異族統治之下安富尊榮的印度人，則十分痛恨。

一九二一年左右的印度革命，固然早已蓬蓬勃勃。「司瓦拉吉」一字，也已高唱入雲。可是我們當年對於印度革命的最終目標，實在並無清清楚楚的了解。對於「司瓦拉吉」一字的解釋，也各是其是。在大部分的青年人看來，「司瓦拉吉」是意味爲政治的獨立，並擁有一種民主的

政府；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來，則以爲其結果對於工人農民所受的壓迫與剝削，亦將同時予以取消。即是說，還含有社會經濟方面之革新的內容。可是，在老一輩的人們看來，似乎又比這樣的定義少了不少。甚至於甘地咭本人，對於這一點，都無明確一定的發揮。甘地咭平生所注重的，不是這樣的理論上的問題，他只有趣味於最具體的行動計劃。

在這些時候，我對於印度革命最終目標的問題，也缺乏一種明確的決定。我只管投身於工作之中，埋頭苦幹。每天大部份時間，都消磨在辦公室里。當日最風行的口號，是「到鄉村去！」所以，我也不時地到各地去跑。開會講演，一天忙到晚。因爲對於工作過於熱心，我忘掉了老朋友，忘掉了書籍，忘掉了一切社會接觸，甚至於忘掉了報紙，除非是有關於當日實際工作的東西，不然，我連看也不要看。更有甚者，我簡直甚至於忘掉了我自己的家庭，妻子和女兒。那時，我自己已不覺得，很久以後，我才知道，茹夢娜在這一段時期內，曾以多末大的忍耐心，去忍受我這種對她漠不關心的態度。

我更接近了下層的民衆，也更了解了他們。可是，雖然已經很和他們接近，而自己終於還沒有做到打入他們羣中那一步。然而，民衆們對我已經非常之愛，非常之信仰了。看見他們如此地信仰自己，我有時便覺得不安起來。想起自己的趣味，希望，背景以及生活方式等等，無論在那一方面，都和圍繞着我的這些民衆們完全不同。然而，他們竟如此地愛我，信仰我。我因此想，也許民衆們的心中，腦中，把我看成是秉賦有某種值得他們愛和信仰的性質的領袖，而其實我並

不是。他們崇敬的是那末一個人，和我不同。也許他們完全是誤看了。如果如此，民衆們將來一日認破，又將如何呢？想起自己在很多方面，不免有着虛飾。然而，在這些直爽而誠懇的民衆面前，我真正地感到大大的慚愧。我想起我和國民大會一些同事一塊時的那種無聊的裝腔作勢，不覺耳紅面熱起來。因此下了決心，以後應該免除一切假的面具，誠實地爲農民們做一點有益的事體。

一九二一年之中，由於不合作運動的蓬勃向上，很多的工作者已經個別地給政府捉去了。可是，發批的逮捕，尙未開始。阿里弟兄，以「鼓動印度軍叛變」的罪名，已經被判處以長時期的徒刑了。不過他們因而罹罪的行爲、言語，却爲千百個別的同志，繼續地做，繼續地說。我在那年夏天，已經因爲一些講演而受到警告了。可是還沒有實行逮捕。

本年年底，英國皇太子「註一」要到印度來，國民大會便決定以抵制徵貨的方法，抵制皇太子之來遊。此事一經決定，全印空氣大爲震動。十一月底的時候，國民大會孟加拉省的義勇工作團，已被政府宣佈爲非法組織，不許活動了。接着不久，聯合省的義勇工作團，也被宣佈爲非法。當時的局勢，十分緊張。達斯發了一份文告到孟加拉來，說：

「我已經感覺到手銬業已套上我的雙手，鐵鍊也已經繫在我的身上了。全印度便是一個大大的監獄。不過，我們國民大會的工作，總須繼續下去。如果我被逮捕以去，那有什麼要緊呢？不管我死或活，這是不關緊要的。」

我們在聯合省，不但申稱義勇工作團仍須繼續活動，而且，索性公開地把義勇工作團團員的名單，在日報上予以公佈。我的父親，本人並非工作團團員，可是，爲了表示反對政府命令起見，他自己就自願把名字加上去。並且，開列在第一。十二月初，正當皇太子到達的前數日，大批的逮捕便開始了。

大家都知道，鬥爭已到了短兵相見的時候。國民大會與政府之間的衝突，終於無法避免了。那一天，我正坐在辦公室里，時間雖然已晚，仍想埋頭努力，把日來積下的工作償還清。忽然之間，聽差來向我報告，說，警察已經把辦公廳包圍住了。接着，一位警察官走了進來，手中拿着搜索狀，要搜查國民大會辦公室。我當時因爲從來沒有碰到這樣的事體過，頗爲激動，可是我仍力持鎮靜，我叫另一位同事隨伴警察官前往各個房間搜查，叫其餘的同事，仍然繼續工作，不去理睬警察。不一會，一個就在門外被捕的同事，和着一位警察進來了。這位同事，因爲業已被捕，是特地進來向我告辭的。可是，當時我仍以爲對這樣的事體，應該力持鎮靜，要把牠看爲沒有一般。因此，便對我的同事說：請你等一下，讓我先把這封信寫完再說。不一會，更多的人被捕的消息又傳來了。我便決定回到家中去看一看家中情形如何。到家的時候，馬上看見有着一些警察正在搜索家里的一部份房間。他們是來逮捕父親和我的。

國民大會此次對於皇太子來遊的對付方法，可謂適當之至了。凡是他所到之地，都冷靜得好像一座死城，有時，連烟也沒有。當他到阿拉哈巴德的時候，該地馬士罷工，罷市。到加爾各答

之時，也是如此。其實，這罪過不在皇太子本人。印度人民也並非特別恨他。其罪在英國政府，他想利用皇太子的威信，來支持他自己的墮落。

聯合省和孟加拉省的國民大會領袖，都已被捕。一般的義勇工作團團員，是成千地被捕入獄。除此而外，還有很多並非團員而自動請求入獄的。國民大會省委員會的委員，是五十五人同時被捕的。被捕之時，他們正在開着會議。還有很多毫不相干的人，也被這次逮捕的潮水，一捲而去。有好些官廳里的書記們，剛剛由辦公室下來，正在回家的路上爲熱忱所動，跌入這股狂潮之中，登岸之時，不是家庭而是監獄。很多青年男女，潮水一般的跟隨着湧入監獄，不肯出去。每天夜里，我在獄中聽到外面載囚入獄的大卡車到來時，遠遠地便聽到車上的人們，高聲地大呼國民大會的口號而來。中心十分興奮。這些大卡車被派出去載囚犯，規定帶來一定數目的人，沒有寫出姓名，也不可能寫出，回來之時，所載來的數目，往往較名單上所開列的爲多。因爲有很多人自動地跳上車來，不肯下去，也只好一起帶進獄中。

後來，政府方面漸漸地把這種不分皂白的逮捕政策放棄了，只挑選出國民大會中有名望的人們，予以拘押。在民衆方面，那種熱烈的風氣，也漸漸地冷下去了。因爲主要的工作人員，多半已入獄中，外面的空氣，便變得沈悶起來。不過，這到底只是表面上的沈悶而已。據估計，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二年一月之間，因與不合作運動有關而被捕處罪的人，數目當在三萬以上。可是，雖然多數的有名的工作人員都已入獄，而政府對於領導者的甘地喏，却一直未予逮捕

。因爲當時政府恐怕把他逮捕了以後，會有不良的後果發生，尤其怕的是軍隊方面反對。所以，我們大家都入獄了，我們的領袖甘地咭一人，還在外面繼續發號施令，進行不合作運動的指導工作。

一九二二年二月初，我在獄中獲悉甘地咭忽然停止了這次鬥爭的攻勢方面的行動，決定不採用文明抵抗的手段了。原因是由於綽泥綽拉(Chauri Chaura)這個地方的農民，違背了非暴力的原則，竟在憤怒之下，焚燬了該地的警察署，結果，燒死了六七名警察。我知道這運動停止的消息，心中對甘地咭頗不滿意。以爲正在運動的力量日漸增強而陣地日漸鞏固之際，竟忽然停止了攻勢，實在是很不對的。文明抵抗停止，不合作運動取消以後，政府在數月的慌張忙亂之後，開始第一次舒了一口長氣。接着也就採取攻勢，於數星期之後，把甘地咭逮捕入獄，並且，還判決處以長時間的徒刑。

這次文明抵抗運動之停止，當然引起了我的不滿。我的父親，此時亦在獄中，他也很不高興。整個運動，因了這樣細小的理由而停止，尤其說不過去。綽泥綽拉，本是一個很小的地方，怎麼能够因爲這樣一個很小的地方的少數的人的局部行動，而停止了一個有關全印度人民之利益的鬥爭呢？甘地咭的不抵抗主義的原則，我是接受的。我之所以接受牠，並不是因爲牠是條最正確的路線，而是因爲牠是最有效的方法，如果這種方法能够被少數人（甚至於可能是敵人僞裝的同志）所破壞，那末，牠在本質上一定有着缺點了。不抵抗運動，在名字上是消極的，可是，在本

質上却是積極的。甘地咕之所以會獲得大家對這種方法的一致擁護，即是這個道理。他在一九二〇年寫的一篇文章里，說：

「我相信，如果只有怯懦與暴力二者足資選擇，我一定是贊成暴力的。……我甯可希望印度不惜訴諸武力以保持其光榮，而不顯其以懦弱之態度，成爲卑鄙之俘虜，但是，我確實相信，非暴力甚於暴力，而饒恕勇於懲處。」

「惟勇者爲能恕人。但是，只有當自己有力且足以懲處他人之時，竟不予懲處，乃得稱爲饒恕。如果一位無力的可憐虫而饒恕他人，殆爲笑話。……但是，我確實不相信，印度乃一無力之國，而我乃一無力之人。……」

「希望大家不要誤解我。力量，不自身體的物質能力而來，係來自一種不可戰勝的意志。……」

「我是一個空想家。我敢於宣稱我自己是一個富於實際性的理想主義者。……『非暴力』，乃吾人人類之規律，而『暴力』乃野獸之規律。精神在野獸身上，是沉睡不醒的，牠只知道使用身體之力。我們高貴的人類，則須服從更高水準的規律，他必須使用精神之力。」

「因此之故，我敢於在印度的前面，提出『自我犧牲』這一中古的規律。因爲，『沙他赫拉哈』及其派生物的『不合作運動』與『文明抵抗』，並非他物，亦即此一中古規律之新名而已。……」

「非暴力，在其動的狀態之下，亦即是自知自願的遭難受苦。牠並不是教人向侵犯之勢力屈服。反之，牠是教我們以全部的精神反對暴虐者的企圖。如果能在這一原則之下行動，則雖個人單獨之力，亦可以反對非正義的帝國，而挽救自己的光榮，自己的宗教思想以及自己的靈魂，並能藉此奠下使這一帝國崩潰衰亡之基礎。」

「因此，我之力勸印度同胞使用非暴力政策，並非因為此種政策是力弱的，不，我之勸用非暴力政策，其使用，乃係在自己知道有着力也有着權的自覺之時……我要全印度認識她自己秉賦有一種永遠不會死亡的心靈，牠可以克服身體上的缺點，而戰勝全世界若干身體的聯合力量。……」

「我把不合作運動從新芬主義 (Sinn Féinism) 隔離開來。因為，牠在本質上是不能和暴力並行的。但是，我甚至也願意請暴力之學校給這種和平的不合作運動以考驗。牠決不會因為本身具有弱點而失敗。牠之可能的失敗，必由於反應之不够，時至此際，才是真正危險的到來。那些有義氣的國人，不能忍受民族的恥辱，將流於憤怒。他們必將使用暴力。就我所知，此種人終必滅亡，而仍不克使其本身及其國家免於受難。如果印度訴之於武力，她可能獲得暫時的勝利。然而，這時的印度，再也不復是我心中之寶了。我之所以緊依着印度而不忍棄之以去者，原因是我受惠於印度者實多。我絕對地相信，印度對於世界，負有一種偉大的使命。」

他會如此雄辯地申述過他這種政策的精神。當時，我們都被他所感動，誠意地爲他的忠實信徒。因此，這一次的反感，也十分大。可是，不管滿意或不滿意，我們大家都一律困於監獄之中，也無可如何了。

不過，運動停止之後，在政治上所產生的壞結果實爲不小。一方面使士氣頹喪，一方面，使從前蟄伏不敢動的分區自治派（*Cooperators*）有機會東山再起，捲土重來。其後數年，他們的勢力，大爲增漲，在客觀上協助了英國對印度的分化手段。

我被捕以後，判處六個月的徒刑。父親的徒刑，也是六個月。不過，我們二人的罪名却不同。以政府方面而論，既然國民大會的工作人員如此公開地工作，不難由我們的講演之中，找出很適當的犯罪證據。可是，當時對於父親的罪名，却引用一個很有趣味的，即是認之爲非法團體的國民大會義勇工作團之一員。惟一的證據，是他的簽名。

我的罪名，是分散通知罷市的佈告。這行動在當時，根據法律，並經明文規定其爲犯罪行動。——雖然，我相信現在一定成了罪名了，因爲，我們不是漸漸地走向自治領地位了嗎？雖不算犯法而終於仍被判罪。當出庭受審之時，我們一律都不會辯護。只侃侃地略爲陳述對政治上的意見而已，讓裁判官自行裁判。

我的案件，被判決後，執行了大約三個月光景，忽然在獄中接到通知，說，我之被判處罪，是冤枉的，經檢察官認爲無罪，與予以釋放了。我聽了以後，反覺奇怪，因爲我並無人在外面替

我申訴，何以會忽然來此結果呢？這大概因為文明抵抗之停止，使久久不工作的檢察官們，又開始活動了罷！但是，這消息反而使我不悅。因為，出獄雖是好事，離開獄中的父親，却不大好。但，不管如何，終於出獄了。——這便是我的監獄生活的第一次。

出獄以後，我馬上到阿拉哈巴德去會甘地咭。我抵達之時，他業已被捕，我和他的會面，係在沙巴馬帶 (Saharnati) 的監獄之中。審問甘地咭的時候，我也曾在場旁聽。裁判官是位英國人。甘地咭受審之時，從從容容地作了一次長而動人的陳述。使聽者動容，大起敬意。我回來之時，他的那種慷慨的言詞，縈迴腦際，久久不忘。

這時，我身在獄外，反覺寂寞。因為很多朋友和同事都困於獄中之故。當時的國民大會機構，已經很不靈活了。我便決定重新整理。

這次運動雖然停止，而英貨抵制，却仍在繼續之中，尤以衣裝業之抵制英國布為最有力，最有效。差不多全體衣服店都用土布。他們並且組織有「衣商協會」，監督抵制之工作。那時，因為有一家商店，暗中購用英貨，我們便以集體的力量，壓迫他。結果他遵章承認罰款，款項交給「衣商協會」。同時，我們還要他重新宣誓抵制外貨，他也遵行了。

可是，這件事的後果，是我又二次被捕入獄。同時被捕的，還有一些和我一塊兒去與那一家西服店談判的同事。我們大家都算犯了「嚇詐勒索」之罪。我的罪名，除此而外，還加上「謀叛」一椿。經過了三次法庭的審判，我都不會辯護。仍照老例作簡短的講演完畢。結果，一共被判

了一年又九個月的徒刑。

這是我第二次的入獄。從第一次出獄之日算起，到這一次入獄之日為止，我一共在獄外生活了六個星期光景。

註一：即前數年轟動一時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溫德莎公爵。

一一 國民大會的分化

自一九二一年以後，政治犯之入獄，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體了。印度人民對於坐牢的觀念，也改了不少。自從反對孟加拉省分區問題以來，入獄者即已日見其衆。大戰結束，情形更甚。當時的革命領袖蒂拉克先生，已近晚年，仍被判六年的長時期徒刑。阿里弟兄和阿沙德 (Ashad) 「註一」等，也長留獄中。到旁遮布慘案發生後，更是大批入獄。而且，多半犯的是「謀叛罪」。自此時起至一九三五年左右爲止，據估計約有三十萬政治犯入獄。不過，其中的一部分，係以別的罪名被捕罷了。有的人受判無期徒刑，有的出出入入，不止一次。很多人只好設法使其生活方式，適合於監獄環境，以便應付當日的印度局勢。最初一次，對於入獄一事，誰都多少有一點特殊感覺；後來就變得非常平常，大家都滿不在乎了。

我第一次入獄那一次的情形，是十分有趣的。入獄者數目之衆，竟出乎管獄官之意料外。而且，這數目還天天增加。同時，這些新型的犯人和從前一般的囚犯，又大異其趣。因此，有很多對付囚人的老方法，此時已不適用。而同時又無新的規定可資援引。這是最使管獄人員無法處理的。國民大會的這一批政治犯，雖說在領導者方面，是抱着與管獄官合作的態度，但是，一般的

普通工作人員，即使身在獄中，也仍對政府人員採取攻勢態度。一方面，因為同伴的數目甚衆，一方面，獄外的羣衆，又同情擁護，所以，大家脾氣都很大，十分難於管理。有時，管獄官只好來把我們領導份子請去，對那些國民大會工作人員談話，叫他們安靜一點。要是不這樣，管獄官們更不知要麻煩到如何程度。這些犯人，都是自願入獄的，甚至有一部分連政府不去逮捕他們，也自動地跑了來。所以，逃獄一事，是不可想像的事。勒克瑞的監獄署長，甚至於會對獄中一個司閹者說，如果他能設法使國民大會的囚犯逃獄，他可以想法把他擢升。然而，這些囚犯却從不想到逃獄，使他無法可想。

一般的工作者，都給分別關在大牢房里，我和父親等十八人，是給特別選出，予以優待的。我們十八人共居一室。可以互相討論問題，可以看報，可以接見親友，還可以到那些大牢房里去和我們的工作人員說話，並且還開班教授身毒文 (Hindu) 烏圖文 (Urdu) 以及其他基本科目等等。不過，後來管理漸漸嚴格起來，這些活動也就漸漸減少了。正當管理逐漸嚴格之時，我的第一次獄中生活結束，被釋放了。

這次再度入獄時，已是四月內，回獄中一看，情形已經大變，不能和從前一般自由了。我的父親，已被轉送到賴力他耳 (Nairi Tal) 監獄中去。別의同志也關入了另一個大牢房。彼此之間，不能往來了。吃的飯也比從前越來越不行。不過，我每天用的食物，却可由外面送進來。這種管理之進一步嚴格化，可說是政府方面的一點小小的報復，想讓這些政治犯們受一點苦，這才會

悔悟反對英國政府之不智。但是，結果却激起了反感，我們全體決議拒絕見容，以此爲抗議手段，向當局抗議。這樣一來，便形成了監獄當局與國民大會政治犯之間的衝突。後來，當局方面，察覺是一部分人的煽動，設法分居，以圖減少麻煩。但是，往往麻煩問題還是綿綿不絕而來，使管獄官，大感頭痛。我後來被送到另一個牢房去，與其他同志完全斷絕；同時與外界也斷絕。因爲，此時政治犯已經不許閱讀報紙了，我只好乘此機會坐下來讀了很多書籍。

雖然沒有報紙好看，而我身在獄中，仍能獲悉外面的情形。這些消息本身，會自然而然地由門隙擠進牢內來的。主要是靠外面親朋們到獄中來拜訪時的談話，還有獄中許可的定期通訊。

這時，國民大會已經起了分化了。甘地咭還在獄中，我的父親則以期滿出獄。國民大會分成「派，第一派爲「修改派」(Pro-Changers)，這派的領袖爲達斯和我的父親。他們主張把運動手段加以修改。主張參加政府立法議員之選舉，如果可能，去佔據立法議院的席位，借此以影響政治。另一派爲「維持派」(No-Changers)主張國民大會不合作運動的政策，應一絲不予修改地繼續推行。當時，我身在獄中，當然不可能作何種主張。但是，我卻同意「維持派」的意見。因爲，「修改派」所主張的修改，其實是變相的屈服。

外面的這種變化，在獄中無法予以影響，我便只好決心於獄中生活。每天的時間，一部分消磨在運動之上，大部份則用以讀書。常時圍繞着牢房跑步，藉以鍛鍊身體。有時，和一二位同居囚犯，到附近牢房的一口水井去用桶汲水，以這樣的方法灌漑獄中的一塊菜園。

我生性喜歡讀書，這種對書籍的愛好，在造成我的整個人格上，厥功不小。在獄中，我仍時時讀書。我記得有一天，那位聯合省的監獄總檢查官，見我正在埋頭讀書，乃喟然嘆息，說，他自己不幸竟在十二歲（——）的年齡上，與書籍斷緣了。我聽了這話，心中想，這「不幸」，也許正是「幸」，因為，只怕就是這位先生之所以能够免於政治苦悶而竟獲擢升到今日如此之高位的原由罷！一個殖民地的人民，如果在教育上多受了統治者的教育，或者，完全不受教育，這對於統治者，是多麼有益的呢？只可惜事實不會如此。完全不受教育，或者，百分之百地受了統治者的麻醉教育的事，永遠不會有。因此之故，彼此之間的衝突，也永遠不會停止。

在我們困處獄中之時，在裡面一日一日地平靜地消磨我們的時間。獄外的工作與苦楚，都落到我們的婦女同胞們的身上了。他們的丈夫兒子，都在獄中，便只好挺身而出，在家庭中負上了他們遺下的任務。

在一九二一年的逮捕開始以後，警察便時常到我的家里去找麻煩。主要是去索取我和父親二人應繳納的罰金。——當時的不合作運動，是主張不繳納任何一種罰款的。所以，警察到了我們家里，便查封家中用具，有的擅自變賣，有的簡直順手攜去。這種劫掠行爲，無形地又造成了我那位時才四齡的女兒英底娜（Indira）未來的奮鬥生活。因為，警察們的這種舉動，一一在她的眼前表演，在她的小心靈之中，印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

在獄中的生活，使我更進一步地認識了英政府的殘酷，更具體地了解牠。監獄當局用盡方法

使我們不能和普通的犯人接觸，可是，這是無用的。結果，我們很多的政治犯，對於普通犯的情形，都看得十分清楚，知道了很多事實。看出他們在獄中過着一種非人的生活，吃着一些不能入口的食物。經常地被管獄員們勒索金錢，而且，這種勒索遍及其親友。其苦難情形，不一而足。後來，國民大會的政治犯們出獄以後，在獄外替這些普通犯人呼籲。主張改良待遇，結果，這才稍稍改良了一點。不過，一般地說，那種勒索行爲却從未消滅。對於我們政治犯，這種勒索行爲，當然無法施行。因此，他們對我們也就感覺到很討厭，很無用。只要一有短處給他們拿到，便賜予一陣苦打。我在獄中曾經親眼看見過一次，有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不知是犯了獄內的什麼規矩，給他們吊起來鞭打。這位青年是一位有志氣，有胆量的，每受一鞭，他便大叫一聲：「擁護甘地！」，一直到打得半死，打到暈迷過去之時爲止。後來這位青年出獄以後，變成了在印度北部活躍着的恐怖團的領袖之一。

一九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勒克瑙監獄的政治犯們，一律被開釋了。我也因此出獄。這，結束了我的第二次監獄生活。離開監獄，是使人高興的。但是，一出牢門，看見國民大會的政治活動十分沉寂，又感到苦悶起來。

註一：阿沙德即現在（一九四二）的國民大會主席。

一一一 格林武德爵士的引誘

我由獄中回到家中，接到的第一封信，是由一位叫格林武德爵士(Sir Grimwood Meares)寄給我的。格林武德當時是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的首席判法官。這信分明是在我被開釋之前寫來的。當然，格林武德是早知道這一天要開釋了。信中用詞遣句，極爲客氣，他請我時常到他家去玩。信中充滿了熱情。格林武德我是認識的。格氏到高等法院來的時候，是一九一九年。那時，我正在要擺脫我的律師職業，因此知道是知道，卻並不熟習。記得我在格林武德出庭時，只辯護過一次。那是我的職業的最後一次的執行。後來我碰到格林武德時，格氏對我說，他自己爲了某些原因，非常願和我交遊。他並且把他對於印度革命的意見告訴我。據他說，印度人與英國人之間之所以有衝突，主要的是由於私人方面的原因，並非政治上鈞原因。在印度革命中的急進派的領導者們，差不多有很多都是因爲受了英國人的氣，所以走了極端的路。他以為要解決英印衝突問題，便應該由改良個人之間的態度開始。主要的方式就是促進英印人士彼此間的友誼。

格林武德這種了解，正確與否，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可是，這確實可以代表當時很多英國人上的見解。當時曾經有着很多這一類的謠言，其中之一是說：我的父親本來是不做革命工作的，

只因爲有一次一個英人俱樂部拒絕他加入，他因此含恨在心，以後便漸漸地走上反英國統治的革命道路上去。其實，這是完全無稽的。父親根本就沒有碰到過這樣一件事。事實上，我和父親兩人，都有着很好的英國友人，而很多英人對父親均極敬重。

此後不久，格林武德藉某樁小事，到我處來談了很久。這一次談話是很有趣的。他閒談不久，便在我的面前大罵溫和派人士無氣節，不爭氣。並說，英國人士實在看不起他們。他罵得十分起勁，心中以爲我既然主張急進，罵罵溫和派，必然可以引起同感。但是，我心中却莫明其妙，不知道他爲什麼會對溫和派如此不敬。並且爲什麼在我的面前來發洩。但是，格氏還不斷地說着。到後來他稱贊我，說我如何有主見，有人格，有毅力。甚至很公開地說，如果我這樣的人出任政府中的教育部長，必可大施天才，使印度人民得充分的教育機會，而藉此使印度能很快有自治之能力。還說他願向總督推薦。我聽了以後，漠不動心，好像沒有聽見一樣。他這才知道他自己的話跑得太遠了，趕快收回來道：「當然，這不過是我個人私下的考慮而已。」

在我心中，出任政府的部長，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體。聽了以後，付之一笑。我後來也未嘗不考慮及諸如此類的問題，也曾想過是否可以去徵一點屬於正面建設的工作。但是，這種想法只是曇花一現而已，我馬上就感覺到，印度當然必有積極地建設的一天之到來。可是，在我們這一代人，其任務不是這。這樣的任務，恐怕要交給我們的兒子輩去，甚至可能要等候我們的兒子的兒子哩。

當時我專心致志於各種實際活動。在另一方面雖然對甘地咕的領導是十分信仰的，不過，對於他的一些計劃，一些主張，漸漸有着很多懷疑。然而甘地咕此時仍在獄中，亦無法面請指示，只有自己在心中猶疑着而已。

自一九二三年以來，我感覺到我的家庭常給我以很大的安慰，尤其以當我處於困難之境時爲然。茄夢娜本是一位聰明而自傲的女子，然而在我需要安慰之時，她却終于能够忍耐使我滿足。

自一九二〇年以後，我的家庭中的生活方式便已大大改換作風。從前的堂皇模樣已經漸漸減少了。僕人用得很少，用具也一部份賣了出去。對花園，一方面由於無趣味，一方面想節省，也就馬馬虎虎，不似從前那樣加意修飾了。我的父親本是習慣了奢侈生活的，一旦大改作風。他最初過不慣。但是，他却立志學習，決不想恢復以前的生活而破壞自己的事業。後來爲了增加一些收入以作家庭開支，父親便在自己的辦公室里做一些律師工作，仍不到法庭上去服務。可是，他却不願意使我因家事分心，所以從不贊成我拋開革命工作去做可以賺錢的事體。不過我常常感覺到這種在生活上對父親的依靠過大，心中老大不快。其實我和茄夢娜二人所化的錢也很少。我自己穿着土布，不用洋貨；走路則乘坐三等車，每年所費甚微。不過我也不擬長此下去。對此問題曾經考慮很久，終於無法解決。本來我要找一個賺錢的職業，是十分容易的。可是，這一定與破壞至少是減少我對國民大會的工作。拋棄大會的工作來賺錢，我又決不願意。因此有很多相當好的大企業公司請我去任相當賺錢的職務時，我都一一拒絕了。我心里明白，這些大公司之所以請我

做事，目的不在於使用我的辦事能力，主要是想在政治上縮減我的活動。因此我不肯接受。待要重振舊業，而於律師一職，我實在已經厭惡達於極點。所以，對這樣的問題，結果仍無法解決。

一九二四年的時候，曾經有人提議，國民大會的主要工作者應該給薪。我心里覺得這倒也未嘗不好。因為這樣一來，可以使我不必依靠父親。然而，這給薪的提議，反對的人甚多，無法通過。我的父親更大大地反對此事，還有我的一位同事，他本人也十分需要錢，然而，他也反對。結果不能實現。國民大會的人員仍然繼續不取報酬地工作下去。

我心中知道父親如果知道我在打算着經濟獨立的問題，一定會傷心。所以總不敢提及。有一次在談話之中，我溫和地婉婉地暗示到這一點，父親便說我真是笨得很，竟笨到去考慮這一類問題了。他說，他自己在幾天以內的工作，就可以得到我們夫婦二人經營一年才能得到的數目，叫我不要在這一方面耽心，好好地做國民大會的工作去。我從此不敢在他面前提及這樣的事了。

一三 印度土藩王國的行政

一九二三年秋天，國民大會在德里開會，我參加會議後，便遇到一次意外的事。

在旁遮布這個地方，塞克教徒 (Sikhs)，尤其是其中的阿克里斯人 (Akhalis) 常時和英國政府起着大大小小的衝突。有一次，派細亞拉 (Patiala) 和那巴 (Nabha) 這兩個塞克教的土藩王國大君之間，發生了爭端。爭端的結果，英國政府取消了那巴國大君的職位，另外委了一位英國的行政長官去統治那巴國。塞克教徒大大反對，在那巴國內外都提出抗議。有一天，在絕依多 (Jalandhar) 這個地方的一個宗教性質的集會被政府禁止舉行。塞克教徒爲了抗議這事，便派了很多羣的人到絕依多去，一定要繼續舉行集會，以當示威。這一羣羣的人，塞克教徒名爲「甲他」(Jathas)。這些「甲他」給警察阻止了。警察們任意鞭撻他們，並且把他們捉到很遠的森林中去，便把他們放在那絕無人煙的地方。這次國民大會閉幕時，我聽說塞克教徒又正派遣大批的「甲他」繼續前往。他們並且請我們前去參觀。那時，因爲這些「甲他」就在離德里不遠的地方，去看看，也不過化一二日的工夫，我便決心到絕依多去。同行的還有這次出席國民大會的代表季晚尼 (Girdhari) 和桑他那蒙 (Santannam) 二人。我們計劃抄襲另一小徑直到那巴國境的一個車站上去。

時，前進着的「甲他」正好到邊該地。當我們走到絕依多的時候，那位英國的行政長官下了一道命令給我，不准我走入那巴境內，如果已經入境，便得馬上退出。同時還有一道命令給我的兩位同伴。我當時便對這命令的警察官說明，我們一行三人，並非那些「甲他」之一部份，是當着旁觀者而來；同時，也決無違反那巴國任何法律的企圖。再則，此時業已入境，未入境的情形當然已不存在。現在既已入境，而下一班由此地開出的火車又在數小時之後；我們又不能忽然之間化為烏有，只好準備在絕依多勾留一夜了。於是，不容分說，被捕了。「甲他」到來之時，也被同樣地以野蠻方法對付。

我們被捕以後，馬上給關在一間小屋內，關了一個整天，夜里，徒步到火車站去，加上了手銬，由警察像牽狗一樣地牽着，走過絕依多的大街，又登上火車，關在一間小屋里，連夜送到那巴監獄里去。一路氣也不是，笑也不是。到那巴監獄後，又給關在一間又髒又臭的小牢房中。手銬帶着，兩人合銬一處，動一動也得兩人合作。晚上睡又睡不好。我常由夢中驚醒，原來是一只老鼠或一只小貓由我臉上跑過。其苦真是一言難盡。

關禁了三天以後，開審了，審問者連書也沒有讀過，不認識字，胡亂地說了一陣。我們也無法辯護，也不想辯護；因為那巴國的法律是奇奇怪怪的。然而，案子雖極其簡單，審問却經過了很長的時間，未得結果。幾天以後，忽然又給帶到另一間小屋內去，又是另外一批人來審問了。案情也變了。前幾天問的是「抗令入境」的罪，這一天問的是「謀叛罪」了。由逮捕我們的那位警察官起訴。還捉了一位根本無關的窩克教徒來證明同謀。而這位窩克教徒我們並不認識，只在

絕依多車站上看過一眼。

我本人是做過律師的，看見一樁謀叛案竟如此輕易地開審，大為吃驚。這案子完全是假的，但卻又一定要經過一次司法手續，我便提出質問，指出我們事前並未接到通知，而我們是應該布置自己的辯護事宜的。可是法官卻理也不理。關於應該准我們被告聘律師代為辯護一節，說道，如果要請律師，應該就地聘請，不能由外面請來。我們只好靜候裁判了。但是，問了又問，毫無若何結果。這時，我們只希望他快點裁判，如何判決都不管。每天都等待着被提出去審問，因為這等於暫時逃出了那間又臭又髒的小而濕的牢房。但，案子却老是拖下去，不得結果。同時，監獄署長又私下代表濟行政長官來對我們說，如果我們願意表示悔悟，並且給予保證，不再來那巴國，案子即可了結，放我們回去。我們對他說，我們並無何事可資悔悟，要表示悔悟的反面該是行政長官。同時，也拒絕給予任何保證。這樣，又繼續被拘押下去。

被捕後半月之久，審問終於結束了，而且判決了。如何判決，也並未把判決書讀給我們聽。只簡單地告訴我們說，因為抗令入境，各處以六個月的徒刑。至於「謀叛案」亦於同日判決，好像會處以十八個月或兩年的徒刑，我忘記了。兩者一共是兩年或兩年半的監禁。——就這樣無法無天地判決了，我們亦無可如何。

這次事件，使我有機會認識印度土藩王國內的行政，或者說英國的政府在土藩國內的行政之一場糊塗。在我，已經在國內的政治上相當有名氣了，尚且受到如此莫明究竟的待遇，其他不

出名的人們之命運我不知道要成什麼樣子！

我的父親對於土藩國行政之無法無天，本來知道一點。他得知我這次意外被捕，知道不妙，甚爲焦急。可是，除了知道被捕而外，別無所知。無從得到更多的消息。他甚至於打電報給印度總督，打聽消息，但也毫無結果。他要到那巴國來看我，也多方受阻。最後才獲得允許，可以在獄中一會。父親在那巴獄中見了我時，他對於此事，也無以爲力。因爲我本人對於此案毫不辯護。我勸父親自己回家去，這事並不打緊。他只好回去，但仍不放心。結果，留下一位年青而能幹的律師，請他在那巴照顧我的案件。可是，這位很能幹的律師，也毫無辦法。

印度的土藩王國的行政，多半如此，一半是封建專制，一半是現代的獨裁。而在英國行政長官直接統治的那巴，還加上英國的假而空虛的民主機構，結果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東西，便也做着不倫不類的事。這位行政長官，是印度文官部之一員，只向印度政府負責。照英國法律，本有些基本人權可以享受。然而，他可以引用那巴國的法律來否認我們的這種權利。所以，我們得對付兩種機構：一個是封建制度，一個是現代官僚機構，他們混合起來，我們蒙兩端之不利，無一端之利。

我們就這樣被判了長時期的徒刑。究竟判決書的內容如何，不得而知，我們請求照抄一份，但是，上面的答覆說，要用正式的手續請求。

那一天夜裏，監獄長忽然叫了我們去。把手中拿着的行政長官根據刑事訴訟法的一遺命令給

我們看後說，我們的罪予以緩刑了。此外還有另一道命令，是屬於行政命令，是叫我們馬上離開那巴，以後如無特別允許，不許重來。這命令也是由行政長官發出的，我要求抄一份這兩道命令的內容，但是，他不許可。當夜又把我們三人裝上車，押解到鐵路車站。就在車站上予以釋放。當時我們三人在那巴一個認識的朋友也沒有，並且城門也因為夜深關了，只好離開那巴，乘開往亞蒙把那 (Ambala) 的最後一列車到亞蒙把那，我再從亞蒙把那回到德里，回到阿拉哈巴德。

我們三人算是「緩刑」了，那第四位的塞克教徒的可憐虫，却毫無消息，不知究竟下落如何。很可能含着不白之冤，永遠沉淪在那無底的深淵里了。

回來以後，我們三人都由那小而濕的牢房里帶了很多傷寒菌回來。三人都患過很重的傷寒病。我的病狀在三入之中，要算最輕，只在床上病了三四個星期。其餘二人則病了相當長久的時間。

是後大約六個月以後，季晚尼又在國民大會中充任代表，並被派與塞克教徒的團體接觸。那時，塞克教徒又派遣了一個「甲他」到那巴去。季晚尼又決定和他們一同去，仍然充當旁觀者。此時已具戒心，決定不走入那巴境內。這支「甲他」一到邊境，警察就向他們開槍掃射。結果，有很多人死傷。當時，季晚尼看見有人受傷，急忙上前救護。忽然之間，警察蜂擁而來，把他拖了就走。交給那巴監獄後，問也不問，就監禁了很久，一直到身體完全弄壞以後，這才放他出來。

當季晚尼被捕未放的時間，我寫信問那行政長官，爲什麼如此亂來。他回信說，季晚尼抗命

入境，所以予以監禁。我又寫信質問他爲什麼逮捕救護受傷人員的人，他就索性不理我了。我無法，決定親自到那巴去讓那位行政長官也像對付季晚尼那樣對付我。但是，我的同事們的想法卻兩樣，勸阻了我；我沒有去，心中大感不安，覺得非常之對不起朋友。

一四 印度教與回教

一九一三年在南部的科科那達 (Coco nada) 召集的國民大會，會議主席爲譚罕默德·阿皇 (Mohamad Ali)。阿里勸我充任他任內的國民大會全印委員會的祕書職務。我當時很不願意充任此職，主要原因，是我自己以爲自己對於整個革命局勢以及革命目標等，還缺少很明確的認識，頂好還是以不担任如此重要的職務爲好。然而，照當時的情形看來，除我一人而外，能够和主席阿里合作得很好的，差不多沒有人了。因爲他是一位個性很强的人，有着極強烈的愛惡。而我便算是他所愛好之人之一。結果我只得答應了。

在阿里的主席任期內，我和他過得很好，意見極爲融洽。不過，也常時有着一些很小的異趣之處。有一次，我提倡在國民大會內，同志之間的稱呼，應該予以改良。把印度習俗所特有的那些稱呼如「麻哈子媽」(Mahatma)「莫拉那」(Maulana)「伴特」以及「慕洗」(Munshi)等等，一律取消，直呼其名。一來表示平等，二來表示親熱。不料，這樣的建議，却遭到很多人的反對。阿里發了一通電報給我，說，他以「主席」的資格「命令」我停止此項改革計劃。對於甘地之稱爲「麻哈子媽」，「註一」尤爲不可更改。結果我違命了。在萬能上帝的問題上，我

們之間，也常有爭議。阿里時常提到萬能上帝，因為他是信教的人。他甚至到國民大會議決案中，都要加入宗教的詞句上去，每當此時，我便很嚴厲地指責他不應該把這種宗教性質的觀念加入政治理論之中。這種指責，觸怒了阿里，使他大發雷霆。不過，脾氣發了之後，却又很嫵媚地解釋說，「加瓦哈拉爾在表面上不信宗教，而基本上說來，其實還是篤信着的。他那末反對我，也不過口頭說說罷了，並非有心的說話」。我此後也就力求避免和他提及此類問題。因為，我知道不相信宗教，總會使阿里傷心的。

阿里對我，也非常之誠懇。不過，在政見上，我們之間總不免也有些不同。我和阿里，後來在一九二九年國民大會的那哈爾 (Lahore) 大會時，作最後一次會面。那時，我對於印度革命的見解，在阿里的看法，已經大大地較前為急進了。阿里便很嚴密地批評我那篇充任主席時所發表的主席致辭。並且很直率地警告我道：「加瓦哈拉爾，我警告你，你現在的同伴，將來會遺棄你的。他們將來會在危急之際拋掉你。你自己的國民大會的同志，將來就會把你送上斷頭台的，請你留心罷！」

科科那達會議閉幕以後，我於一九二四年回來，回來之後，又碰到一樁有趣的小衝突。

在阿拉哈巴德的恆河和贊木納河的交流處，(俗稱三江口，因為俗傳神話上的沙那施瓦蒂河 Saraswati，也在此交流，) 印度教徒常時舉行他們一種宗教上的沐浴。一九二四年的時候，(河口的水流甚急，足以危及人命。政府便決定禁止本年在三江口沐浴。這事馬上引起了衝突。主要

的反對者便是大乘會的領袖馬拉維亞 (Madan Mohan Malaviya)。他已經公開地在報紙上主張必須舉行沐浴，而且，在宗教的觀點說，一定須在三江口才行。英國政府對於這樣的事體，本可以設法和平解決，而政府總老是用一套死硬的辦法，非禁止不可。

那一天到來了，我清早便到河邊去。主要想去看看這一次大集會的情形，倒也並不想參加沐浴。那天，馬拉維亞已經向政府致送了最後的通知，請他們取消禁令。而警察毅然拒絕。馬拉維亞便和差不多二百名左右的同志，蜂擁到河口處去。我也加入隊伍了。這時，當局已在該處設立了高大的障礙物，把下水的路阻擋着。同時，大量的警察和軍隊，都已集中起來，把這幾百人包圍着。只不許我們下水，也不對我們加以傷害。馬拉維亞便也不下水，就地坐下來了。我們大家也就跟着他坐下。當日日光極烈，直射人頭，我們也不去管他，一直坐下去。

大家在地上坐了大半天，陸軍的騎兵隊也圍繞着四週，他們似乎也感到疲倦了。我們都很餓，然而，誰也不想對政府屈服。我坐得不耐煩了，便一躍而上，到那木柱堆成的障礙物上去。有的跟着我，甚至把木柱也拔起幾根來，結果開出了一條通路。靜坐地上的人們，又熱又渴，非常想下水去。但是，大家都不便發動。停了一會，馬拉維亞似乎忍耐不住了，便不顧一切，縱身躍入。其餘的人也隨着一律下水了。警察及騎兵等最初設法阻止我們，後來阻止不了，也只得不管了。結果是大家勝利，凱旋而歸。

回來以後，我們都以爲政府也許又要來逮捕我們了。大家也存心等候着入獄。可是，政府卻

竟一聲不響，大概是不打主意觸犯馬拉維亞，這一樁小事體也就不了了之了。

本年年初，甘地咭在獄中大病的消息傳出來了。這消息震動了整個印度人民，大家焦急地耽心着他的安全。政府也因此懼怕起來，趕快把甘地咭由獄中抬出，送到醫院去醫治。但是，罪仍未赦免。各地的人民，都紛紛集到浦那的醫院去看他，不過，醫生却只准許少數人會見，我和父親便進去看他病。

甘地咭的病，危險期過了，便漸漸地好了起來。政府也不再把他送回獄中去了。並趁此機會把他的徒刑免掉。本來判決六年，這一來，只坐了兩年。出了醫院以後，甘地咭到附近孟買（Bombay）海岸的局胡（Juhu）去休養。

這時，我的父親正和甘地咭在政治意見方面，有了衝突。他已經另組自治黨了。甘地咭遷到局胡去休養的時候，我的父親也把家庭暫時搬到那兒去。他的主要目的，想藉此多和甘地咭談談，爭取甘地咭，使他在政治上同意他的主張。至少，想獲得甘地咭消極方面的不反對。可是，經過了不久次數的友誼的談話，父親的企圖，仍然失敗。不久也就離開了局胡，搬家回阿拉哈巴德去了。

在局胡勾留之時，我也和甘地咭談了很多次。我把我從前對甘地咭政策執行方面的疑惑提出問他，並詢及整個革命的前途和他的政綱。可是，他却沒有給我一個確定的明白答覆。我回來時，心中也感覺不滿。

甘地咭自從在印度的政治活動界出現以來，他的威望是日高一日的，從來不會退後過。此情尤其以在羣衆之間爲然。大家都把他認爲是一個無條件的唯一領導者。雖然在知識分子之間，對他的尊敬和信仰，時有盛衰。然而，他到底是我們一切人的領袖，誰也不願意去公然反對他。即使甘地咭有些地方明明使我們不滿意，我們也願意在小的地方容忍下去了。我在政見上，可以說和他相差了很多。然而，我總仍信仰着他，願意服從他的命令。

一九二四年的國民大會，係在比爾高蒙(Belgaum)召集。這次是甘地咭親任主席。本來甘地咭已經是國民大會的永久領導者了。這次之親任主席，是因爲當時外部內部的問題，都很嚴重的原故。在此次會議，我由於甘地咭堅決的主張，又繼續充任祕書職務。也似乎漸漸地成爲永久的祕書了。

在這一段期間內，國民大會對內的主要工作，便是調解印回間的衝突。使其能在政治活動上採取同一的步驟。印度教與回教，在印度幾乎成了死對頭，到處都是衝突。這種衝突，多半是宗教上面的。其衝突的原因，往往是微小的生活上的小事。如以牛作犧牲一事，便是一椿多年以來無法解決的衝突原因。又如回教徒反對在他們的清真寺之前，有任何的樂聲發出。尤其在他們禱告之時，更須萬籟無聲才行。可是，在另一方面，印度教的廟宇，却又時時打鐘敲鼓，鬧個不休。有時一遇集會遊行，更把全條街道，弄得鬧哄哄的，極爲吵鬧。而往往印度教廟宇大敲鑼鼓之時，又恰值回教徒禱告之際。因此之故，衝突幾乎日日發生，有時甚至於爲此流血。影響所及，

在政治上便不容易採取一致的態度。一直到近年以來，這種情形，雖略有改進，然而，澈底的解決，仍然沒有辦法。

一九二四年，經雙方領袖的努力，結果在德里開了一次聯席會議，覓取合作基礎。會議之進行，情形尚稱良好。可是，在事實上，剛剛在聯席會議閉會不久，阿拉哈巴德便發生一次很大規模的印回械鬥。我趕快回到阿拉哈巴德。到時，械鬥已過。不過，接着還有不少的流血事件和歷時長久的案子，都是這一次大械鬥的後果。

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這兩年以內，我曾負責進行阿拉哈巴德區的市政工作。負責期限本定三年。但是，我開始工作以後，感覺政府方面掣肘之處太多，屢欲擺脫此項工作。但是，同事們堅持要我負責下去，我也只好繼續着。到一九二五年的秋天，因為要到歐洲去，三年未滿，終於擺脫了。

註一：麻哈子媽，直譯是「大魂」之意，有的人譯為「聖哲」或「聖雄」，這是印度人特別用以稱呼甘地的，十分尊敬。我用的是音譯。

一五 歐洲之遊及不魯塞爾會議情形

一九二五年秋天，茄夢娜大病，在勒克璠的醫院中，臥病數月，仍無起色。這時，國民大會
在孔坡開會。我自己還充任着秘書職務，因公因私，僕僕於勒克璠，孔坡和阿拉哈巴德之間。後
來，有人建議把茄夢娜送到歐洲去醫治。這意思，我本人很贊成。因為，除了茄夢娜的病一個原
因而外，我自己也想不妨暫時脫離印度政治，以幾個月的光陰，到歐洲去生活。由遠處以旁觀者
的態度，看看印度政治。仔細冷靜地想一想。一方面，去呼吸一點西歐方面的最近空氣。也許，
這於我個人和印度革命都有益處。便決心和茄夢娜到歐洲去。

一九二六年三月初，我和茄夢娜及我們的幼女一起三人，由孟買起身，坐船到威尼斯（Venice）去。同行的，還有我的妹妹和妹夫雷吉特（Ranjit S. Pandit）。

此次歐洲之遊，對於我個人的影響極大。我自從前次由英國回印度以來，已經十三年之久。
這些年頭，是充滿了戰爭和革命的年頭，我所熟知的老世界，業已死於戰爭的血泊與恐怖之中，
一個新的世界正等候着我。這次到歐洲去，本來只想勾留六七個月，不料，結果却一共住了一年
又九個月之久。

在歐洲的生活，於我心身雙方，都可以說是一種休息。我們的大部份時間，係消磨在瑞士，在日內瓦，在蒙他那 (Montana) 的一個療養院里。我的二妹克呂惜娜 (Krisina)，一九二六年夏天，由印度來歐，一直就和我們一塊兒生活。

我想到歐洲各地去遊歷，最初因為茄夢娜病重，不便長久地離開她，未得盡興；後來，她的病好了一點，我們這才一塊到英國，法國，德國等地去遊玩。在日內瓦的時候，我對於國聯和國際勞工局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的各種活動，很感興趣，因此，也非常之注意牠們。

身在歐洲，我自己覺得和印度革命暫時脫離了。有時，自己一人化了很多時間，以一個旁觀者的地位，去注意和研究印度的各種活動。有時，則去學習滑冰。生活是極其平靜的。後來，茄夢娜的病完全好了。我們還得和一些印度被放逐的革命者會面。對於他們，我狠同情，同時，覺得他們漸漸與印度的實體遠離，也漸漸要給印度人士忘記了。我們還碰到很多漂流於歐洲各國的印度人士，他們之中，有很多對於印度問題，缺乏清楚的了解，卻又高聲地大談各種激烈的革命主張，好像有意要引起英國祕密警察的注意似的。我對此深表不滿。

除了印度人而外，我們當然還碰到很多英美人士。曾因甘地咭之介紹，和茄夢娜到維倫魯夫 (Villeneuve) 去看過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也會見過德國的青年詩人及戲劇作者多勒 (Ernst Toller) [註一]等。

在我們到達瑞士不久，英國當年的總罷工便開始。我得知這消息，心中十分興奮。我是完全

同情於罷工者方面的；痛恨着英國的資本家階級。後來，罷工崩潰，消息傳來，我心中極為悲憤，感覺得像是自己個人的失敗。不久，我到倫敦去玩了幾天。那時，總罷工業已停止，然而，部份的鑛工罷工，却仍繼續着。我曾親自到德比夏 (Derbyshire) 的鑛區去看過一次。看見工人們的生活條件，十分惡劣。大家都面黃肌瘦，十分可憐。罷工之後，罷工的案件，由政府審判。審判官們之中，有很多本人便是工廠經理之類的人物。因此，工人們受到很殘酷的處治，多被判決處以很長時期的徒刑。他們的妻室，也因此受到無理的待遇。曾經有幾個鑛工婦女，只因爲對破壞罷工的工人們譏笑，即被判處徒刑。我這次在英國，看了英國資本家種種無恥舉動，心中極為憤懣。同時，也在英國工人的鬥爭里，看出資本主義制度埋伏在工人階級里的大危機。

一九二六年年底，我到柏林去。當時，在柏林，盛傳着有一個國際被壓迫者聯合會議 (Congress of Oppressed Nationalists) 即將在不魯塞爾 (Brussels) 召集。我聽到這項消息，心中很贊成。馬上打電報到印度去給國民大會，向大會建議，應由國民大會正式派遣代表，參加此次會議。國民大會同意了我的建議，並且，就委派我到不魯塞爾去參加該會，代表印度國民大會。

國際被壓迫者聯合會議，係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初召集。當時的柏林，和現在的完全兩樣。那時，這地方是全世界各國的革命者集中之地。共產黨及各國工黨左翼分子，都集中到柏林來。被壓迫者一致聯合以對付帝國主義的聲浪，甚囂塵上。主要的反對對象，是所謂擁有殖民地的帝國主義，如英、法、意等。當時的德國，係在歐洲大戰大敗之後，早已不復是擁有殖民地的列強之

了。因此之故，德國對於這種運動，抱着同情之心。並且還予以鼓勵。這也就是柏林當時成爲一切革命者集中之地的理由之一。這一運動的主要活動人物之中，有着中國國民黨的人士。這時，正是中國國民黨改組之後的事體。大會召集的動機，也許即出自國民黨在歐洲的代表。拉丁美洲，因爲都痛恨美國的經濟剝削，由墨西哥領導着，反對美國。當時，墨西哥的總理，是一位急進黨人。因此，改府政策，也很急進。拉丁美洲布洛克(Latin American Bloc)，即爲墨西哥所領導。因此，墨西哥政府，對於這一次會議，十分贊成。因爲不便於直接以國家政府之名義參加，便派了他自己的優秀的外交家，到不魯塞爾來，以來賓的資格，參與大會。

除墨西哥而外，還有爪哇(Java)、印度支那(Indo-China)、巴力斯坦(Palestine)、敘利亞(Syria)、埃及(Egypt)、阿剌伯(Arab)以及北非(North Africa)和非洲黑人(African Negroes)的各種組織的代表。歐洲各國的工黨以及各種勞工組合的代表。也都出席。共產黨在會場中，發生主導的力量。

大會主席爲喬治·蘭斯包雷(George Lansbury)他在會場上作了一篇非常激烈、非常動聽的講演，很使我感動。蘭斯包雷不但充任大會主席，並且，決定担任由大會產生的常設機關——反帝同盟(League Against Imperialism)的主席。可是，後來他所屬的工黨，在英國將由反對黨變成忠實於英王的政府黨時，他藉口多事過忙(其實，是他的工黨不批准他的行動)，辭去主席之職，甚至於連反帝同盟之一員的會員資格也辭去了。我後來看見他這種行動，心裏非常看不起。

他。想不到兩三個月之前，還那麼激烈地演說着，而兩三個月之後，便如此不爭氣了。我也因此看出英國工黨的領袖們，究竟是些什麼東西。

反帝同盟當時有着很多世界聞人參加，愛因斯坦(Einstein)便是其中之一。還有孫中山先生夫人宋慶齡女士和羅曼羅蘭等等。不過，後來愛因斯坦因為反帝同盟處理巴力斯坦的「猶阿問題」之時，採取了袒護阿刺伯的政策。他不贊成，自己退出了。

這次大會以及後來的反帝同盟的各次會議，對於我的影響甚深。一方面，使我更清楚地了解現代殖民地問題的真正解決途徑，另一方面，也使我更進一步地了解歐洲工黨的內部衝突。對於工黨的衝突情形，我本來也略知一二。這次大會，使我得以清楚了解。當時，對於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我的同情，是屬於後者。因為，第二國際的真面目，已經由英國工黨的領袖代表着，在我們印度給我們看得清清楚楚了。不過，在反帝同盟開會的時候，對一些小的問題的論爭，我總常時站在英美同志一方面，至少在手段方面，我和英美同志往往有着相同的看法。我們都贊成一些短小而迅速施行的決議，反對宣言式的長而龐大的計劃，後者是一種歐洲大陸的作風。在共產黨與非共產黨之間，也常時有着爭執的地方。不過，我們遇此種情形之時，往往彼此同意一個折中的辦法。後來，我自己回到印度去了，無法繼續參加會議。

當時的大會，甚為帝國主義的國家所注意，這是不消說的。甚至代表本身，也有着一些便是帝國主義派來的密探。曾經有過這樣一回事：我的一位美國友人，也曾參加大會。閉幕以後，他

到巴黎去。在巴黎時，有一天，忽然有一個客人前來拜訪，和他談了很多問題。這位來客，原來是法國政府祕密情報部的人員。談話完畢時，來客問主人還認識他不認識。主人審視良久，無法辨認，只好直說並不認識。結果，來客說道：「我們曾經共聚一堂開會哩！那是不魯塞爾會議，我是充當非洲黑人的代表，身體手足都用漆漆黑了的！」

反帝同盟，當然不是共產黨的組織，不過，他一開始就抱着和共產黨友好的態度，這是事實。後來，却也一步一步地走上共產黨的路線了。我回到印度以後，只和同盟有着通訊的聯絡。後來，爲了德里協定簽訂，國民大會向政府讓步，得到暫時的妥協，反帝同盟把我開除了。我承認，同盟之出此，自亦有其正當理由，不過，卻先應該予以申辯的機會。——這就是我參加這次會議的始終。

一九二七年夏天，父親到歐洲來。我在威尼斯碰着他。其後數月，我們都在一起生活。十一月裏，正當蘇聯紀念十月革命的時候，我和父親，茄夢娜及二妹克呂惜娜一同到莫斯科去。在莫斯科只勾留了三四日，因爲此次遊蘇之決定，是十分匆忙的。可是，這三四天的勾留，却使我們大爲滿足。對我從前讀過的很多關於蘇聯的書籍，這次莫斯科之遊，給了我一種實際的印證。新的蘇維埃以及各種集體的觀念，對於父親，則是新奇的東西。他腦子裏，一向都是一些舊社會中的法律想頭，這些活生生的事實，根本地動搖了他的老觀念。

因爲父親之到歐洲來，使我們回印度的時期，遲延了很久。看看年底已到，我們本來還想在

途中順便一遊東南歐各國以及土耳其和埃及。但是，因為下一次的國民大會會議，已決定於聖誕節內，在馬德拉斯召集。因為怕時間來不及，我便匆匆趕回印度。和茄夢娜，二妹及幼女，一行四人，由馬賽(Marseilles)坐船向科倫波(Colombo)駛去。父親則在歐洲多勾留了好幾個月，這才回家。

一九二七年年底，我們回到了家裏。

(註一)多勒後來給希特拉放逐了。



一六 西門委員會

我此次歐遊回來，身體很好；對於世界的看法，眼光也寬大了很多。回到印度時，總覺得自己國家裏的民族運動，和外面的世界斷絕了關係，成爲非常狹義的一種民族主義，非常不好。我想，政治自由，當然是民族主義運動的目標，但是，不必是唯一的目標。如果社會經濟得不到整個的解放，則此種政治自由，必定是假的自由。而且，連這點假的自由，也無法保障。蘇聯產生以後，使我抱了一種新的希望。我相信，舊的壓迫人的世界，必不能久，而新的社會，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出現。印度在此時，至少必須有所準備，以便應付這即將到來的新社會。現在，無論如何，應該把自己的鬥爭最終目標，弄個清楚。應該對印度之完全獨立，有堅定而明確的認識。不該再去談什麼爭取自治領之類的糊塗問題了。不過，我也很了解，如果要把國民大會引導到社會之徹底改革的鬥爭道路上去，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爲，國民大會在本質上，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族主義的政治組織。然而，我以爲，至少，準備工作是應該做的。而且，也可能做的。我當時以爲，國民大會以外的廣大青年和農村裏的農民，必然可以在這一方面，有更大的推動力量。因此，很希望暫時能夠走出國民大會的辦公室，到農村區域去仔細地調查他們的情形。然而，事實偏

不准許，到底還是給牽在國民大會的活動圈子裏。

我當時一抵馬德拉斯，便馬上參加會議。並向國民大會提出了很多提案，主張決定印度革命之最終目標，爲「爭取完全之獨立」，以及和反帝同盟取得密切的連繫等等。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凡是我所提出的提案，都完全經大會通過。完全獨立的主張，尤爲畢善夫人所竭力擁護。當時，甘地咭也在馬德拉斯，他也參加國民大會的公開會議。不過，形成議決案的工作，他却並未參與。他也並不參加國民大會的常務委員會。自從國民大會會一度被自治黨所領導以來，他便採取如此的態度，以迄今日。不過，國民大會的任何重要決定，差不多都一定得去徵求他的同意。我當時特別留心甘地咭，想看看他對我的各種提案，作何表示。我心想，他一定不十分贊成。可是，甘地咭却一點也沒有批評。我的這些提案，在本質上說，完全和國民大會一向所採取的態度，大異其趣。然而，大會却很快就予以通過了。這反使我覺得無聊起來。因爲我想，大會代表們對於這些提案，不是完全沒有了解，便是把牠們錯誤地理解爲其他別的什麼東西去了。會中有一部分人，分明是持反對態度的，但是，他們也舉手贊成。我看出他們的態度，是以爲對付這類不打擊的空洞提案，最妙的辦法，是快點把牠們通過，好討論到別的要事去。因此之故，我心裏倒反覺不快。

後來，大會討論到英國派遣西門委員會 (Simon Committee) 的事體，大家決定反對其來印。同時，溫和派人士又提議召集「各黨會議」(All-Parties Conference) 以製定憲法。由後者，

可看出他們對我的提案的眞態度來。他們實在是敷衍了事。因爲，這些溫和派人士，選正希望着一個自治領的憲法之頒佈哩！

我回印以後，又負起秘書責任了。我本來已經不想再負上這種責任。但是，因爲當時我自己的提案已通過，很想把牠們付諸實行。同時，我又恐怕國民大會會在溫和派的影響之下，藉所謂「各黨會議」之類爲工具，走上開倒車的路線。所以，決定繼續負責下去。

一九二八年一年之內，是政治活動最爲鬧熱的一年。全國各地都充滿了生氣。在產業工人羣中，在農民羣中，在中產階級的青年羣中，和知識份子羣中，革命的空氣，都十分濃厚。「職工聯合會」的組織，大大地發展了。農村裏的農民，也都十分活躍。在歐德區的農民們，當時有很大的集會，爲保護佃農的利益而鬥爭。青年運動，也在這一年之內，十分活躍。各地都有「青年同盟」的組織了。

西門委員會到印度來，可是，全印度無論何處，都反對牠之來印。印度人民看見西門委員會來了，都搖着黑旗揮手道：「Simon, go back!」（西門，回去罷！）印度的一般老百姓們都不懂英文，然而，西門委員會之來，卻教育了他們這兩個英文字。而且，也單懂了這兩個字。西門委員會所到之地，都遇着反對他的示威遊行。在那哈爾，情形尤爲激烈。一個數目龐大的遊行隊伍，在那吉帕特·雷意（Jala Rajpat Rai）的領導之下，和警察衝突起來了。那吉帕特被打，受了傷，可是，遊行隊伍還繼續着，仍不斷地叫着：「西門，回去罷！」的口號。拉吉帕特，年紀相

當大了，身體又不甚好，給這次毒打，後來不久就身死了。印度人士，以為他之死亡，即使不是毒打所致，也是毒打所加速。因此，羣情益為憤怒。反抗的情緒，也更為高漲。

在勒克璠，反對西門委員會的示威遊行，也十分激烈。我到勒克璠去的時候，正是示威遊行正進行的時候。這些示威運動，並不使用暴力，政府本來無理由可以制止。但是，因為想保持自己瀕於死亡的威信，只好利用政治權力，禁止遊行。遊行隊伍給明令禁止後，國民大會的人士，便另想辦法。不出以集體赴會的形式。我們把羣衆分成小組，每十六人為一組，各自地分頭到某一地點後，再行集合。其實，由技術上而言，這方法也是十分愚笨的。因為，十六人之衆，一起走路，同時還舉着旗子，本身就屬於遊行性質的隊伍了。當時，我領帶着一組先行。隔後不數步，又由巴拉哈·潘得 (Govind Ballabh Pant) 領帶着一小隊，接在我們的後面。我們一隊，前進還不上兩百步光景，一支警察騎兵隊，迎面而來。他們大約有數十匹馬之多。警察馬上鞭馬直前，把我們的隊伍衝散。同時，執着警鞭，遇人便打。不一會巴拉哈·潘得所領導的一組，也上前來了。他們明知我們的一組，已被衝散。然而，仍繼續前進。結果，當然是給騎兵隊衝散，一樣被鞭打。警察把我們的隊伍，打得落花流水，我的身上也受了不少的傷。可是，這一羣打不散，打不怕的人，雖在被鞭之時，本能地避免着鞭子，理智却驅使他們，使他們一步也不離開該地。隊伍雖散，而成員尚在。警察一陣鞭打之後，似乎也疲倦了，立馬吁視。我們便又重新集合起來。大部分都已被打得頭破血淋了。集合之後，大家坐在地上，不動，也不說話，面對着

警察。他們停止鞭打以後，也只好立馬吁視，想不出進一步的辦法來。這樣地對坐約有一小時光景，政府方面的官員，越來越多，民衆們也越來越衆。大家都圍繞着我們。這樣地支持了相當時間，結果，警察無法，只得同意我們繼續着沿原來路線前進。警察騎兵隊則跟着我們，一塊兒走，好像護送一樣。

這一次被鞭打，我得到了很大的益處。除開意識上的不說，這使我在身體方面，體念出自己對於這樣的鞭打，還能忍受。此點於我甚爲有用。其後每遇困難當前之時，我估量自己的身體忍受得下，便勇敢地做去。

這事發生之後，第二天，是西門委員會到達勒克瑙的時候。我們的遊行示威，還是決定繼續舉行。

這時，我的父親在阿查哈巴德，我洎他得知此項消息後，就心我的身體，心中不安。便馬上打了一次電話給他，說，情形尙好，自己的身體無恙，想藉此使父親安心，然而，父親終於不安心，當夜睡不着，馬上決定乘車到勒克瑙來探望我的實情。但是，最後一班火車，業已開出，趕不上了。他便駕汽車星夜趕來。終於在早晨五點鐘光景，到了勒克瑙。到達之時，他的身體已經十分疲倦了。

父親到達勒克瑙的時候，正是我們起身前往火車站集合以便遊行示威的時候。第一天的鞭打，又把整個勒克瑙激動了。羣衆的憤怒情緒，益爲高漲，決心從事更擴大的示威運動。各方面的

人，都各自分成小組，分途到車站上去。主要的隊伍，每四個人一組，由國民大會的辦公室出發。其數約在數千之譜。到了車站，大家集合起來，很整齊地排列着。那時，警察的騎兵隊，步兵隊以及正規軍隊，都已開到車站，密切地監視着我們，不許行動。羣衆隊伍也就站着不動。不一會，大約是西門委員會就要到車站的時候，另外一大隊騎兵來了。仍如從前一樣，先把隊伍衝散，繼續大事鞭撻。我當時也各處受傷。被鞭打之時，我估量當時情景，如果把坐在馬上的兵一手拖將下來，自己坐上馬去與之對抗，是十分容易的事。但是，不抵抗主義的精神，叫我們不要如此行動。因為這樣的結果，一定是警察開槍掃射，一定會使我們很多的同事死亡的。

這樣不久以後，混亂局面又歸澄清。我們又被打得頭破血淋。可是，我們仍然又重新集合起來，站在一塊。此時，警察們也收手不打了，退後幾步，彼此又對壘着。這時，西門委員會就要抵達車站了。他們尙未到達車站，便悄悄地繞道偷走過去了。不過，即使如此逃避，在路上仍然不免遇到黑旗的招展，和「西門，回去罷！」的口號。

事體結束以後，羣衆的隊伍，仍然集體地回到國民大會辦公室門口，再行解散。我馬上回到家裏，會着父親。這時，他正坐在家裏，焦急地等着我。

事後，我這才開始感覺到身上創傷的疼痛。我遍身都被鞭打，到處都有傷痕。可是，十分幸運，要害之處，都沒有受傷，不至害及性命。當時，很多同事所受的傷，都是外部的，不久也就好了。只有當天立在我身旁的巴拉哈·潘得，因為身體十分高大，目標甚爲顯著。結果，被打得

很厲害。身上要害，多被鞭打。因此振及內部。後來經過了相當長時期的醫治修養，這才慢慢地復原。

這次事件，除了身上的傷痕而外，我腦子裏還有一個很深的印象。我看見當時被鞭毒打的警察，多半是歐籍警察，印度籍的警察們，手段十分溫和，他們時常避免打中羣衆。而歐籍警察，則十分殘忍，冷酷。這印象深深地刻在我的記憶之中，歷久而不滅。

英國政府，派遣西門委員會到印度來，目的在於實際地調查印度經濟，政治，民情以及印回關係，革命力量等等各個方面的實況，想依據他們的實際調查，透徹地明瞭印度情形後，好決定英政府的對印政策。這是顯而易見的。想依其報告製定憲法，這不過是此項政策的表面形式而已。即使完全爲了此一目的，其所產生的憲法的性質爲何如，也大可想見。所以，即在委員會人選裏面，也不容許可以代表印度的印度人士參與。結果，引起了這樣澎湃洶湧的反抗，也是不可避免的。

一七 「領袖會議」與職工聯合會議的活動

在一九二八這一年，我仍然充任着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的秘書。在這一年中，經常去主席各種青年的集會。在一年之中，我記得曾主席過四次國民大會的省委員會。有時到民衆羣衆中去，參加工人農人的集會，向他們致詞。從此時起，我在自己的講演之中，都強調印度革命的兩大目標，即政治之獨立與社會經濟之變革。在在努力由印度的政治獨立問題引導到社會經濟變革上去。我當時想，大會的人士和會外一般的智識份子，乃印度民族革命的主力，所以時常同他們介紹社會主義的思想。當時，國民大會人士，多半強調地提到印度古代的光榮歷史和現在被外族統治的恥辱等等。我對於這些因素，認爲只是在養育全印人民的革命情緒上有用，形成革命理論的來源，却須由他方尋求。

我當然無論如何不是印度社會主義的先驅。反之，我是相當落後的，在許多地方別的人老早已前去了，我却只能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當年職工聯合會的運動，在理論上說來，確是社會主義的，很多青年同盟，多數也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我由歐洲回來的時候，印度已充滿了一種模糊的社會主義空氣了。前此一二年，已有很多個別的社會主義者存在，可是，他們走的都是烏托

邦的路線，還未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洗禮。不過，現在也漸漸受到影響了。

蘇聯之存在和五年計劃的進展，大大地影響了印度的情緒，助長了這種思想的發展。此情正與歐美略同。我們在國民大會聯合省省委員會上，便已草擬了一次溫和的社會改革草案。主張既存的土地制度應該取消，在國家與生產者之間，不允許中間份子的存在。

自一九二八年後半年和一九二九年起，政府要逮捕我的消息，越傳越厲害了。這種盛傳着的消息，產生了一種效果，使我感覺到自己生活本在不安定的情況之中，乃不得不使我的生活適合於這種不穩定的環境。隨時等候着入獄，也時時加意地愛惜入獄以前的每一天每一時。總說法使每日每時必有所獲得而過去，不任其自化。

一九二八年年底，國民大會的加爾各答大會要開會了。主席決定是我的父親。在這一年內，我和父親彼此間在政治意見上的不同，可說達於極點。父親想使國民大會接受他們在勒克瑙召開的「各黨會議」的報告，主張草擬印度憲法，爭取自治領的地位。我呢，對於印度完全獨立的信仰，始終信守不渝。對自治領地位的爭取，當然是反對的。我們之間公開爭辯也少。不過彼此心中因此事而苦惱着。這時，父親已經公開宣稱，如果國民大會拒絕他的主張，他決定不充任大會主席，詞意極為堅決。

後來經過兩派不斷交涉，結果採取了折中辦法。國民大會同意各黨會議的報告。但是，附加上一個條件，說，如果英國政府不能於一年內批准印度的憲法，則國民大會必須恢復他爭取完全

獨立的路線。這折中案是十分聰明的，一方面避免了兩派的分裂，一方面，明明知道英國政府必不能接受各黨會議的憲法草案（其實這份憲法草案內容，連印度的完全自治領的地位都沒有），因此，替次年的鬥爭，作了準備。使大會能在不分裂的情形下從事鬥爭。這種鬥爭乃是不可避免。照當年的情形，如果沒有甘地咕的英勇的領導，這樣的鬥爭，是無法發動的。在這次大會裏我會公開地反對這個決議，然而結果，還是被推繼續充任祕書。

在這次加爾各答大會開會之前數日，「全印職工聯合會」也在鴉利亞（Allahabad）開大會，我會參加該會的首二日，後來趕到加爾各答去了。我從前曾經參加過農民運動，這次又參加工人的羣衆會議，所以在工農大眾間，都起了相當的信仰。這次在職工聯合會中，我也看出溫和派與急進派的鬥爭。意見的分歧，係在於加入那一個國際的問題；反帝同盟呢，或者，是泛太平洋聯合會。急進派主張前者，溫和派主張後者。在鴉利亞時，我是同情急進派的。但是自己是一個新加入的人，所知不多，只取超然態度。我離開以後，職工聯合會召集年會。我到達加爾各答時，得知我被選舉充任次年的主席。我是被溫和派提出來的，他們係用我去和急進派所提出來的一位鐵路工人的候選者競爭。選舉之時，如果我本人在場，一定不任而讓位給那位工人。因為，我自己是一位新參加者，同時，又不是工人，充任斯職，可謂不倫不類之故。職工聯合會當時竟選舉我充任主席，這點，也可以說就是當年職工運動聯合會的大缺點。

一九二九年三月的時候，政府打擊了職工聯合會，逮捕其中急進派的很多有名人物，如孟買

和孟加拉各地的工人領袖。其中有的是共產黨，有的是左傾份子，有的簡直就只是職工聯合會的毫無色彩的人物。這次逮捕，便是當年有名的「米魯特大審問」的開始；這次審問，經過四年半之久。該案開始審問後，印度即有爲被告辯護的「米魯特案辯護委員會」(Meerut Case Defense Committee)之組織。我也是其中委員之一。主席是我的父親。這個委員會的工作甚堅苦繁瑣，因爲被告的種類既多，案情亦繁。最大的困難還是經費問題，很難募集，有錢的人，對共產黨社會主義者，職工主義者們，都不贊成。而律師本是非要錢不可的，雖然也有有名的律師如我的父親等，願意盡義務，可是，他們也不能經常地住在米魯特，其他的律師，我們也去延請過，不過，他們却想把這案件當成勒索金錢的機會。結果終於解散了。解散後，我只得以個別的方式協助他們。(不過，一九三〇年的政治局勢越來越壞，後來，我本人也入獄了，無法繼續替他們辯護。)

這時，甘地喏仍與政治活動遠隔，雖然許多領袖仍然去向他請示，而他本身則毫未參加活動。他盡全力從事的，是他的關於着用土布的宣傳。同時他集募振款，振救窮人。他爲了宣傳土布，曾走遍印度南北。他到聯合省來的時候，我會陪伴他走了很多地方。每到一處，羣衆們都集中起來瞻仰甘地喏的容顏，來聽他講演。我並未陪伴他走完聯合省，因爲宣傳穿着土布的工作，範圍太小。我本來頗不贊成甘地喏此舉，又因當時還有着別的很多事體要做，我隨着甘地喏走了幾個地方以後，便離開了他，自己去做別的活動去了。

甘地對於窮人的振濟，主要的是靠富人們的恩惠。他對貧窮的態度，是贊美的態度，我對此却不甚贊成。我認爲貧窮不足以贊美，只是一種可怕可惡的東西，必須根本剷除。而剷除這種窮困，不能依靠富人的好意，必須根本推翻形成此種貧困的社會而後可。

這時的立法議院，早已引不起人們的注意了。後來，巴加特·新格 (Bhagat Singh) 和都德 (B.K. Dutt) 向裏面投了一個炸彈因而造成所謂「恐怖案件」，英政府大批逮捕恐怖黨徒。一年之內，因「謀叛罪」被捕的政治犯不計其數。一律不加審問而拘留成爲所謂「拘留犯」，(Detainees) 這些拘留犯，爲數甚衆。在那哈爾監獄中，後來因爲獄中待遇不良，起了一次「飢餓同盟」，大家發動絕食抗議。那時我恰巧正在那哈爾。獲得允許去探望一部份的政治犯，因此在獄中看見新格和加丁得朗拉士·達斯 (Jatin Das)。兩人都很溫柔地和我相見。談話過於細聲，差不多等於沒有談。因爲兩人都絕食一個月以上了。後來加丁得朗拉士·達司在絕食後第六十一天上死了。

加丁得朗拉士·達斯之絕食而死，在印度全國激起了很大的憤怒。在政府方面，也引起了改良食物的考慮。結果，政府委派了一個委員會調查此事。後來，也會頒布了一些新法令改良膳食。然而，法令是法令，事實是事實。獄中膳食依然不見改良。

一九二九年的國民大會那哈爾會議，就要來了。入秋以來，大家都在準備推選主席。差不多全印人士都希望甘地咭出來，可是，甘地咭本身却無論如何不肯。後來，國民大會全印委員會在

勒克璣開會，舉作最後決定了。那時，大家都以為甘地咭總會答應。然而，直至最後一分鐘，他仍堅決地謝絕了，並且推薦了我來担任。結果，我被選充任本屆主席。這事很使我覺得傷害了我的自尊之心。充任國民大會的主席是光榮的，這我並非不知道。如果我係由正規的情形被選，我一定十分高興。而這次我之走上主席座位，非但不由大門而進，抑且不經側門；好像是由一個什麼奇怪的門，消息一掀，門開了便突然進去；使觀衆大爲迷惑，結果承認了我。我心中因此深覺有損自尊之心，大爲不悅。但是，我終於不露感情，悄悄地走出會堂。惟一因此事而高興的，恐怕是我的父親。他並不贊成我的政治路線，但却很歡喜我。我之被選，果然是一樁光榮的事。兒子繼承着父親任此職位，在印度可謂僅有。這時，我正是四十歲。很多人說，主席當中只有我是以最幼的年齡充任，其實不然，郭哈爾好像也以同樣的年齡充任。阿沙德雖然較我爲長，然而充任主席之時，尚在四十以下哩！

當那哈爾會議就要到來之前，印度的革命空氣十分濃厚。英國政府爲了要緩和這種緊張空氣，便由當時的印度總督依爾文勳爵〔註1〕(Lord Irwin)宣佈行將召集圓桌會議(Round Table Conference)之消息。此項圓桌會議之不能產生有益於印度獨立的議決案，是顯而易見的。但，印度方面已同時在德里召集「領袖會議」(Leader Conference)以應付了。當時出席「領袖會議」的，有甘地咭，我的父親，和當時的議院主席配特爾等。溫和派的領袖如薩普魯也參加了。結果決定有條件地響應總督的宣佈，發表聯合宣言，申明如果諸條件能達目的，即可與政府合作。

當時所提條件大致如下：〔註二〕

一、一切討論，均須以印度之完全自治領的地位作談判基礎。

二、在會場上，印度國民大會應有多數的代表。

三、大赦全國政治犯。

四、印度政府從今日起，即須遵循自治領政府的方式行使其行政。

可是人們對此諸條件，意見仍不一致。在國民大會派看來，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決不可再行讓步；在溫和派看來，以爲條件如此提出是可以的，不過，也還有討論之餘地。所以，到後來政府對諸條件概不接受時，我們表示不合作而被捕入獄。而與我們共同簽字發表宣言的溫和派諸君子，却去和政府合作去了。當發表宣言之時，我們對此種可能的結局，並非完全沒有想到。不過，我們却抱着一種希望，以爲藉此還可以使溫和派人士不致於和英國政府合作。同時，可以保持我們國民大會的統一，把我們的右翼也推上去。而且，這也不過是幾個星期的問題，因爲，那哈爾會議就要召集了。

然而，當時的宣言，放棄了我們爭取獨立的要求，雖然說這不過是暫時的，終歸又錯誤又危險。因爲這樣一來，好像我們一向要求着的獨立，不過是用爲討價還價的最高價而已，並非勢所必爭的目的了。所以，我最初不想簽字，然而結果終於讓他們把我說服了。雖然簽了字，我心中仍不快，第二天決定拒絕充任國民大會主席。我寫信給甘地咭，結果他回我一信，安慰我了事。

我自己沉思了三天，心里也就鎮靜下來了。

正在那哈爾會議開會之前。有人企圖在國民大會與政府之間，尋出一個共同的立場，竟致妥協的途徑，因此，提議派代表晉謁總督依爾文。後來甘地喏和我的父親，去會見總督，陳述國民大會的立場及觀點。但是，毫無結果地回來。國民大會宣佈爭取獨立爲其永遠的目標，開始進行爭鬥了。

正當那哈爾會議開幕之前，全印職工聯合會也在拉格普爾 (Nagpur) 開會。我因任本會主席，便前往參加。我當時一人同時任這兩個大會的主席，是頗不容易的。因此，在國民大會方面，力求其社會主義化，普羅利塔利亞化。在職工聯合會上，我便設法力求其加入民族鬥爭。民族主義的國民大會，除非停止爲民族主義的組織，不然，便不能社會主義化。所以這企圖是不容易達到的，但，我以爲或者也有可能。因爲，民族主義不能只局限在民族的範圍以內，必須在社會主義與普羅利塔利亞的方向上，才能發展，另一方面，勞工運動對於布爾喬亞的國民大會，應該予以幫助，影響牠，和牠合作。最近以來，國民大會本已接近農民，如果繼續這種作風，是可以成爲一個農民佔優勢的團體。因此十分努力。

在職工聯合會裏，我的主席職務做得很好。當時英國政府派了一個印度勞工問題皇家委員會到印度來，即有名的惠德萊委員會 (Whitley commission) 職工聯合會中的左派主張抵制，右派則主張與之合作，其中還夾雜着一些個人問題，右派的人士之中，有的已經被請爲議會委員了

。我是較傾向會中的左派。不過，我仍力求公允，不露偏袒的態度。後來左派勝利，右派退出，不幸聯合會終於分裂。我在一九三〇年以後，因為入獄之故，也走出聯合會了。

註一：依爾文即今日英國駐美大使，前任外相的哈里法克司勳爵。

註二：此處各條件文字，在作者原書中，係列入註釋之內，經譯者插入本文中。

十八 那哈爾大會與文明抵抗

那哈爾大會，此刻仍留在我的記憶之中，情形有如昨日。這也是必然的，因為我當時在會中充任主要角色之故。我永遠忘不了當時擁擠中的一切情形。民衆們對我的信仰，可說達於極點。我們開會的決議，是向大家號召作實際之行動。我們革命之遼遠的將來的情形，究竟如何，那時誰也不敢說。可是，最近將來的情況，却很清楚，一目了然：行動之後，我們必將過一個寂寞而受苦的監獄生活，這是不言而喻的。

大會的主要決議案，是通過了爭取獨立案。此案表決之時，差不多是全體贊成，幾千人之中，只有十餘人投反對票。通過以後，授權給國民大會全印委員會草擬鬥爭綱領，並領導實行這次鬥爭。

這次那哈爾大會，參加者有很多是邊區省 (Frontier Province) 的年青人士。本來，邊區省的個人代表，老早參加國民大會，加發爾汗 (Khan Abdul Ghaffar Khan) 老早就和我們在一塊，參與問題之考慮了。這次的那哈爾大會，才第一次得到大批的邊區省青年加入。從此，邊區省已經和印度其他的部份，連在一塊共同奮鬥了。邊區省是最後加入，可是，自一九三〇年以後，

都一直扮演着十分出色的脚色。

那哈爾大會閉幕以後，因為要與議決案的精神符合，我的父親便向在印度立法議院中的國民大會同志呼籲，請他們退席。結果，差不多全體都辭退了。大會通過了鬥爭的議案。大會開會之時，情緒雖極熱烈，但是，前途究竟如何，尚不可知。尤其不知全國人民對於這樣一個行動綱領的反應，究竟如何。因此之故，一方面用作爲鬥爭的開始，一方面想測驗人們的反應，國民大會便規定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六日爲「獨立節」(Independence Day) 這一天，要求全國人民宣誓願爲爭取印度的完全自由而鬥爭。

(譯者按：誓詞甚長，其內容大略如次：

「吾人深信，獲得自由及對本身勞苦之果實的享受，以及保有生活必需品俾得有充分的生長機會，乃一切民族之特權，如有那一個政府將某一民族的此種特權剝奪以去，則該民族卽有更進一步的權以反對此種政府或從而改組之，消滅之。英國政府，已在經濟方面，文化方面以及精神方面，都使印度人破產，置印度於萬劫不復之境了。因此，我們認爲，必須與英國脫離連繫，而達到印度之完全獨立。

「吾人深信，爲對於使吾國受種種不幸的血腥統治，長此屈服，乃一背天違人之罪惡。對此種統治，必須起而消滅之。

「吾人以爲欲達此目的，可以不必使用暴力，但能將吾人獻與英國政府的自願之協助收回，

並拒絕繳納賦稅，即可達到目的。故不合作運動，實爲當前有效之手段。

「吾人因之於此鄭重宣誓，吾人必須摧毀英國政府之無理統治，以達完全獨立之境。因此之故，決進行國民大會爲爭取此偉大目標而不時發出之命令，一致行動，務求最後目的達到。」

在一月上半月內，我都留在家中。這時，因爲正值宗教上的賽會之期，成千累萬的人民香客，都到阿拉哈巴德來。其中各色各樣的人都有，主要是農人，此外有工人、店員、藝術家、商人、大商業家、職業界人士、一應俱全。他們到阿拉哈巴德來，甚想一瞻國民大會名人們的風采。最主要是想看看我的父親。這時父親不在家，我便只好代替了他。而我們的家又臨近一個進香聖地，所以他們都蜂湧地到我們的家裏來，我忙於招待他們。他們十數人一羣，最初我對他們每一組人都作簡短致辭，後來越來越多，簡直無法應付了。

在這一段時間內，印度人民對我的好感，可以說極盛一時。知識分子對我很贊成，一般的人士，幾乎把我看成英雄了。即使我的敵對者，也不得不說我不無好處了。有些人做了一些關於我個人的歌曲，各地報章雜誌也競相刊載關於我的文章。街頭巷尾，也因而流行起很多無稽的謠言來。其中有一個，是說我在小的時候，曾與英國皇太子既同學又同班，皇太子一九二一年到印度來的時候，他還找我談話哩。其實，我不但沒有和英國皇太子同過學，甚至見面以及談話的機會都不會有過。還有人甚至把我稱呼爲「天亞加穆蒂」(Tyaganuti)或「巴拉特布參」(Bharat Bhushan)，前者是「犧牲的化身」的意思，後者是「印度之寶」的意思。後來我的妻女，也把

這些名詞拿來和我開玩笑了。

一九三〇年元月二十六日「獨立節」的這天，全國各地的人民，以一種莊嚴而和平的儀式舉行宣誓，其生動情形，連甘地也給感動了。他看見全國人民的這種高漲着的革命情緒，便立刻斷定：這是行動的時候了。

於是，文明抵抗運動便大規模地開始了，其情緒之高漲，比較從前因綽尼綽拉的小事而停止了的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的運動，有過之無不及。全國人民比較從前是受過了更多的鍛鍊了，大家對於鬥爭的性質，也了解得更為清楚。當然，甘地也還堅持使用非暴力的手段，同時，大家也都信仰着他及其主張。不過大家都不免考慮到：如果有和從前的綽尼綽拉同樣事件發生，鬥爭會不會如老例中止；大家都認為恐怕不能和從前一樣了。我們都和甘地一樣，認為此項非暴力的手段，實為良好的手段。但是我們卻認為牠並不是絕對不可更易的。可是甘地則不然，他認為這種手段，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手段。即使環境極為不佳，也仍須堅持。

獨立的目標決定了，文明抵抗的手段決定了。但是，此項鬥爭，究竟應該從何處着手呢？大家都懷疑着。最後，甘地也給予啓示了：從食鹽着手。自製食鹽，反抗徵收鹽稅。工作一經決定，全國各地都開始，到處自製食鹽。與此食鹽運動同時，甘地也又發表了他那有名的「十一點申明」(Eleven Points) 列舉很多關於政治社會方面應行改革之點。同時，他的「但地食鹽長征隊」(Dandi Salt March) 開始了，由甘地也領導着，從沙巴馬帶起，一直走向鹽海去。另一方面

，國民大會全印委員會在阿米達巴德召集會議，討論對於即將到來的鬥爭之應付。那時，領袖的甘地咭不在場，他已到海邊去掘鹽去了，不肯回來。大會委員會開會時，討論到如果政府逮捕工作人員，如何應付的問題。結果決定付予委員會主席以指定繼任委員人選之權；並可指定繼任他本人職位的人；在會議無法召集的時候，執行會議的職務。省的以及地方的國民大會機構的主席，均獲得此項權力。稱主席為迭克推多。付予他以迭克推多的權力。國民大會這一個決議案，驚動了英國政府以及印度總督。他們大聲疾呼，說：國民大會宰殺了民主，走向專制之途了。甚至於印度溫和派的報紙亦叮嚀着，要國民大會尊重民主政治的精神。這些當然是很有趣的言論，印度在英國殘酷控制之下，毫無自由，而僞君子的總督統治者，却來高唱保衛民主了。

國民大會當時如此決定後，大家都了解前面就是大難關。國民大會當然會被宣佈為不合法的團體。領導者當然一定被捕。前面的人所指定的繼任人，當然一定要遭受同樣的命運。這是不待說的。所以，委員會閉幕後，我和同事們，大家彼此告辭，因為誰也不知何年何月再行會面。告別之後，分別到自己崗位上去。猶如奈杜所說的：「去整理行裝，好旅行到監獄中去。」

我回來以後，便和父親一道到加蒙布沙爾(Jambusar)去看甘地咭，父親更向甘地咭說，把他自己在阿拉哈巴德的那座寬大的阿難館，捐贈給國民大會，作為公用。這時，甘地咭正領導着他的長征隊向海邊走去，他手中持着一根手杖，走在隊伍的前頭，步伐遲緩而態度堅定。跟隨着他的人們，都有着很大的決心要貫徹到底。

父親回到阿拉哈巴德後，便馬上進行贖房的工作。國民大會把房屋接受後，便把這座大而寬的房產的一部變為醫院。

四月到了，甘地咭的隊伍差不多抵達海岸了。印度全國都靜候着他的命令，以便開始文明抵抗的鬥爭。國民大會則積極地趕緊訓練義勇工作團團員，教育他們如何開始工作，如何對付羣衆等等技術，我的妻子蒲夢娜和妹妹克呂惜娜，也都穿上了男裝，參加受訓。四月六日來了，甘地咭在但地海岸開始反抗鹽稅。三四日之後，各地的國民大會組織便接到命令在各地作同樣之行動。

全國開始行動了。大家自己設法自造食鹽。國民大會的人們，本來對這鹽技術，毫無經驗，祇好到處找尋參考書，研究以後，寫成小冊子到各地分發，用以指導人民製造。東弄西弄，終於有出產品出來了，大家十分高興，把這些粗糙的出產品，以高價贖賣。後來技術熟練，便漸漸越產越好，也越產越多。到這個時候我們這才深深地佩服甘地咭的遠見。

反抗鹽稅的運動一開始，英國政府也就開始了他的逮捕政策。我於四月十四日被捕，並根據「食鹽條例」(Salt Act)判以六個月的徒刑。被捕之時，我正要到中央省(Central Province)的雷意普爾(Raipur)去參加某項會議。我會在被捕之前，行使了國民大會迭克推多的特權，事先指定甘地咭繼任我的主席職位。但是，又怕甘地咭會拒絕担任，便指定我的父親為第二繼任者。我入獄後，甘地咭果然拒不出任，結果父親挺身而出。當時他的身體極為不良，但是，爲了整

個的革命運動，他不顧身體，終于出任了。

在我入獄的這些日子里，全印度大混亂。遊行示威以反對逮捕之事，不時發生。而警察對民眾任意鞭打，尤為司空見慣之事。這些時日，對外國布以及一切英貨之抵制運動，做得十分徹底。對於這種鬥爭，自我入獄後，我的母親、妹妹和妻子，都一律參加。尤其是茹夢娜，他除了參加抵制外貨的運動而外，還參與阿拉哈巴德的各種活動。我在獄中得知此項消息，心中極為高興。（後來父親也入獄，和我關在一塊，我由父親的口中，知道茹夢娜所表現的組織能力，使我大為驚奇。）想到她的病體和一向的優逸生活，這種消息，完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在獄外，政府警察對反抗的民眾，用機關槍掃射。這以邊區省方面的情形尤為嚴重。這類的事件，把全印度激動了。革命情緒更因此而高漲。在政府命令警察開槍射擊民眾的時候，很多印籍警察，按槍不放。因為他們同情這些赤手空拳的民眾。同時，心中以為英國統治的末日，即將到來，不服從命令，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問題了。

在此時，最引人注意的，莫過於印度婦女之參加鬥爭。差不多任何場合，都有婦女們的足跡。後來，還有很多婦女，在省的以及地方的國民大會機構的主席被捕後，她們出任主席，繼續工作。

這次運動，本以反抗「食鹽條例」開始。後來發展開去，遍及於其他各項。政府見這運動進展着，便頒發很多禁令。禁止這樣，禁止那樣。可是，禁令越多，反抗的對象也越多。前一個禁

令失效後，總督又發第二個。在國民大會方面，則來一個禁令，便發一次反抗命令的指示，向民衆指示反抗的方法。國民大會的主席，第一個入獄，第二個繼任，第二個入獄，第三個繼任，從不間斷。而民衆們對國民大會又極服從，命令極易推行。

五月五日，甘地咕也被捕了。甘地咕的被捕，在各地，尤其是西部海岸，激起了很多的事變。警察無情地毒打民衆。孟買成了這種事件的中心。因此，該地的民衆也被警察大批地毒打。孟買是一個大城市，甚引人注意。小的城市村莊，也同樣地發生着同樣的事件。不過不大爲人知道罷了。

六月後半月的光景，父親和我的母親及茄夢娜，一道到孟買去。他們在那兒得到廣大民衆的歡迎。六月三十日，當他回家後，和許德·馬穆特(Syed Mahmut)一塊被捕了。他們二人之被捕，係因充任不合法團體的國民大會的主席與祕書之罪。兩人均被判決處以六個月之徒刑。父親之被捕，大概還因爲他發表了一份申明，論及一位士兵當接到上峯對平民開槍之命令時的職責問題。這其實是在印度法律允許的範圍以內的事，並且，所援引的，都是英國或印度政府的法律命令，然而，終於被認爲是一種危險的文書而被捕了。

這次父親孟買之行，極爲勞苦。因爲身體不支，醫生叫他一定得馬上休養，他本身也想如此，本已決定到莫沙里去的，然而，當他準備到莫沙里去的前一天，終於給帶進賴力中央監獄(Nalanda Central Prison)來。

一九 妥協企圖之失敗及抗租抗稅運動

我在獄外生活差不多七年光景，又入獄了。這次是在賴力中央監獄，被禁在兩間小牢房里。一間充浴室和馬桶間，另一間作爲休息睡覺之所，尙稱舒適。入獄不久，暑季便到。有時，他們還許我露天睡覺，以避免暑留在牢房內的餘威。我給關在裏面的這四間牢房（其餘兩間空着許久無人來住）是中央監獄內有名的「狗房」（Kochstube）。不過，這是一個古舊的名稱，與我之居其內並無關係。這「狗房」，在中央監獄內，和其他的牢房隔離得很遠。最初建築時的目的，是以作禁閉危險犯人之用的。到後來，才漸漸用以禁閉政治犯。我入獄時，他們不許我走出那個小小的範圍以外去。主要是怕我看見其他的同志，或者被他們看見。所以要出去運動時，他們只許每天在天亮不多要亮之時，走出半個鐘頭。

這次在獄中，我看到一樁有趣的事體。獄中有着不知其數的無期徒刑的既決犯。無期徒刑，通常本只以廿年爲滿的。有時還不上廿年。可是，這裏面有很多都超過了二十年。照獄中的辦法，每個既決犯的衣服上，在肩膀部分，都釘有一塊小小的木牌，上面寫明所犯之罪以及定罪年月和刑滿年月。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囚犯的刑滿期爲一九九六年！那時，是一九三〇年，他已在獄

中過了好幾年了。年紀已是中年。共計判了七十五年之久。也許因為陸續地發見罪名，陸續地加上去的罷！這些無期徒刑囚犯，與人間完全斷絕了。世界也忘記了他們，然而，他們却不忘記世界。有一次，有一個到我的面前來問我道：「你看我們如何是好？司瓦拉吉會不會把我們救出去呢？」

在獄中無報紙好看。但是，卻有着一份身毒文的週刊，把不少的消息，由外面傳入。因此，我知道甘地咭的人格在印度起了很大的作用。無論誰人，在他的感召之下，都會堅強起來，變得十分英勇。所以，昔年郭哈爾曾說甘地咭能够「把泥土捏成英雄」。甚至獄中的犯人以及管獄員等，都互相談論着甘地咭及印度的革命。大家都盼望着獨立之到來。外面各種英勇鬥爭的消息，不斷地傳入。尤其是學拉普爾(Cholapur)的戒嚴令，連張掛印度國旗也要判處十年徒刑一事，最使我動心。我因此感覺到印度民族精神之偉大。聽到外面的鬥爭十分激烈，反顧己身，在獄中過的生活，似乎還較為安逸，心中因此起一種慚愧之感，很希望能夠出去。現在既然不能出去，我便設法使自己在獄中的生活，堅苦一點。每天都做幾個鐘頭的工，讀很多的書，洗自己的衣服及作清潔地板房壁等工作。

在牢房里過了很久的單獨生活，後來，在六月底，父親和許德·馬穆特來了，和我在一塊。生活才變得有趣一點起來。

與父親之被捕同時，國民大會便被指為不合法團體。從此以後，委員會的人員，常時在開會

之時被捕。後來由主席的指派，委員的任務很多都落到婦女們的身上。茹夢娜便會充任省委員會的委員。

到本年七月末的光景，薩普魯和加雅卡爾 (Jayakar) 在努力使政府和國民大會妥協的消息傳出來了。印度總督依爾文和他們彼此通信。他們兩位還去晉謁總督。據說他們之所以出此，還得力於我的父親之鼓勵。因為父親在被捕之前數日，曾作有一項申明。當時某新聞記者和他談話後，曾把牠公佈。這申明說，如果政府同意某些條件，文明抵抗是可以停止的。父親入獄後，曾經對我說及此事，他談他甚為懊惱，當時不該匆匆出此易於被人誤解的空泛申明。現在，果然被人誤解了。

七月廿七日，薩普魯和加雅卡爾帶了甘地咭的一張便條到賴力監獄來會見我們，商討此事。那時父親正在大病，身體正發熱，但他仍勉強支持，和薩普魯們交談。結果，我們表示在未得與國民大會同人等尤其是甘地咭晤談之前，決不作任何一種建議。我們還把這意思寫信告訴甘地咭。

八月八日，薩普魯又到獄中來。還帶來了總督的回答，總督同意我們到耶拉普達 (Yeravda) 監獄裏去會見甘地咭。但是，不得與其他仍在獄外活動的國民大會人員會面。兩天以後，在八月十日，一輛專車把父親和我以及馬穆特由賴力送到浦那去。因為恐怕在路上引起羣衆的集會，凡大的車站都不停留，只在小站略停。可是消息傳出，仍然有很多民衆集合起來迎送。十一日夜深

時，到達克爾幾 (Kilkee)。在甘地咭的獄中，和薩普魯等作了三日的談話。由八月十三日起到十五日止。終於決定了政府應該答應的條件。願意在達到目的後，與政府合作。當時會議情形極為熱烈緊張，父親的病又因此重了起來。十六日未能起身回賴力，直延到十九日這才坐了專車回來。車子仍停小站，但是，民衆們却仍集了很多。監獄當局方面對父親的病，可說十分關心。他們多方設法，使他安適。到耶拉吾達的時候，監獄署長問父親要些什麼食物。他說，只想吃一點清爽簡單的東西。後來他開了一個單子交給這位監獄署長，其中列有山羊奶和紅棗以及其他一些食物。在父親方面，其中各物，果然是很簡單了。而在監獄署長看來，則十分奇怪，有的東西聽也沒有聽到過，買也無從買起。父親的生活，一向本是十分奢侈的。在賴力監獄的時候，食物都是由家中送去的。

父親的病，日重一日。很多醫生都來看病，一些是他自己的醫生，一部分是由政府方面派來的。監獄中自非療治之地，因此，在報上曾有人建議，請政府釋放，以便治療。然而，父親本人很不以為然，他恐怕別人誤會這意思是出諸他自己。他甚至於拍電報給總督依爾文，說明自己不願意接受某種特惠而被釋放。不過，病越來越重，結果於九月八日釋放了。他在獄中剛剛坐滿十個星期。

父親被釋放後，我們在獄中反覺無聊起來了。不過，後不數日，我的妹夫雷吉特也入獄。也和我關在一起。空氣又較為熱鬧起來。

一個月後，十月十一日，我期滿出獄。這時，薩普魯和加雅卡爾等的和平企圖失敗了，政府更進一步，又頒佈了更多的禁令。我看看當時情形，心想鬥爭必須繼續，自己的獄外生活，想必也不會長久。決心在這爲時甚暫的自由期內，努力作一點有意思的工作。這時，妻子茄夢娜在阿拉哈巴德，正忙於做國民大會的工作。父親則在莫沙里醫病。母親和妹妹在父親的身旁。我便到阿拉哈巴德去，住了一天，和茄夢娜一起到莫沙里去看父親。

這時，我們的面前擺着一個大問題。因爲又是徵租收稅的時候了，是否應在農村發動抗拒繳納租稅的鬥爭呢？農民們，因爲農產物價值低落，租稅已經無力繳納了。佃農們，當時如果務須繳納，只好出於借貸。但是，大多數的佃農，連借貸也無路了。這時的環境，抗租運動的條件，十分成熟。在我看來，發動抗租運動，可謂適得其時。卽就政治運動方面而論，也應如此。因爲這時的不合作運動，雖然仍舊繼續着，仍有人陸續被捕，可是，空氣却較前爲冷了。必須加入新的血液去。這新的力量，當然最好的是由農村中吸取了。在我出獄到阿拉哈巴德的一天半短短的時期里，我和一些國民大會省委員會的同事，共同考慮這事。結果，決定發動抗租抗稅的運動。阿拉哈巴德區決定第一個開始行動。我們並且決定在一週後召集本區農民代表大會，討論進行一切。也就在這一天，我參加一次羣衆大會，向他們講演。這次的轟動，就成爲再度被捕時罪名的根據。

和茄夢娜同往莫沙里看望父親的病。這時父親病體稍微好了一點。我們留了三天又回到阿拉

哈巴德去了。我於十月十三日到莫沙里，因為十九日要開農民代表大會，便於十七日和茄夢娜同阿拉哈巴德。父親心中想，我在獄外，既然非如此繼續鬥爭不可，則再次入獄之期，必不在遠。想多和我會幾次面，便於十八日也趕回阿拉哈巴德。

我由莫沙里到阿拉哈巴德的途中，沿途參加農民的羣衆會議，於十八日晚才到達目的地。

農民代表大會開會時，參加代表有千六百餘人之多。大會決定發動本區的抗租抗稅運動。少數工作者當時曾猶豫不決，不能把握究竟能否成功。因為怕以政府作後台的地主力量太大，鬥爭不過。可是代表們終於通過議案了。開會時，我也是講演者之一。會散後，我便到車站上去接父親及母親等。接到了父親後，馬上又和茄夢娜一塊去參加一次農民與城市人的聯席會議。讓父親獨自回去。會議結束，我和茄夢娜乘車回家。兩人均極疲倦，同時因為父親回來後，尙未談話，想趕快回家去看父親。不料車子開到已經看到自己的家的地方，給止住了。我於是又被捕。渡過贊木納河，又送到老地方的賴力監獄來了。茄夢娜一人駕車獨歸，向正等候着兒子的父親母親們報告我被捕的消息。

我這次在獄外的生活只有八天。又回到老地方和馬穆特們一羣了。這次帶罪名，分了好幾個，都是由前次出獄的第一天所作的講演內尋出來的。審問之後，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A項，判處十八個月之監禁，罰款五百盧比(Rupree)；又根據一八八二年的食鹽條例判處六個月的徒刑，一百盧比的罰款；又根據一九三〇年的法律第六條，——這條法律講的是什麼，我也忘

記了——判處六個月的監禁，一百盧比的罰款。因為後二罪屬於併發事件，結果所判徒刑一共為二年，再加以代替罰款的五個月，一共為二年又五個月。這是我的第五次入獄。

二〇 茄夢娜之入獄

我這次之再度被捕，結果激動了整個印度，更加連了不合作運動的步伐。連父親也忍耐不住了。茄夢娜回去報告被捕消息後，他勃然大怒，用手掌在桌上一擊，立誓不再休養，不作殘廢之人，決心再出去從事工作。他的病體在這樣的決心之下，似乎也好了許多。他到獄中來看我時，告訴我這種精神上的決心，如何影響了身體上的毛病，表示十分高興。十一月里，在我的生日那一天，父親開了一次擴大的慶祝會。在會上，把我因而被捕的那篇講演辭，公開宣讀。結果，大大地感動了全國人民。全國發生警察棍擊人民的事件，據估計會有五千以上的人被捕，這真是一
次偉大的生日慶祝了。

不過，父親的身體，終於不行，不能支撐這樣強烈的工作。我勸他作完全之休養，他不肯。同時，印度當時的環境，也實在使他無法安心休息。後來我向他提議，要他離開印度，到西貢或新加坡去。再進而到印度支那，以作長期的休養。父親同意了，並請定了一位做醫生的朋友一塊前往。他便離家到加爾各答去。可是一到孟買，病忽轉重。便在孟買郊外留下。家中各人都跑到那兒去，和他一塊兒生活。只有茄夢娜一人，留在阿拉哈巴德做着國民大會的工作。

我這次再度被捕之所以如此迅速，大概還有一個原因，即因我參與抗租抗稅運動，政府想阻止這種運動。可是，逮捕的結果，適得其反，當時農民代表大會剛剛閉幕。各代表仍在阿拉哈巴德，得知發動抗租抗稅運動及我之被捕的消息後，他們把牠帶到各地鄉村去，任一個角落都知道抗租抗稅運動業已開始了，都一致地行動起來。從前國民大會的交通，十分困難。報紙因為受政府的壓迫，不敢刊載消息。電報信函，又常被檢查停滯。所以多半靠差人送信，但是，這也不可靠，因為送信的人也往往被政府捉去。而這次的抗租抗稅運動，因為各代表尚未回里，打破了這個難關。

消息傳到各鄉村後，租是不繳的了。國民大會的人士，進一步向地主宣傳，叫他們不去繳稅。力求使他們明白這次運動的性質，不是「階級的」，而是「民族的」。可是地主們終於多數繳稅。不過佃農們卻一致拒絕繳租。結果，抗租抗稅運動，變成單純的抗租運動了。

另一方面，政府的壓迫也增大了。國民大會的各種機構，以及「青年同盟」等，都被認為不合法組織。在監獄裏，對政治犯的待遇，也嚴格起來了。尤其對釋放不久又復入獄的人，更為嚴厲。

一九三一年新年那天，茄夢娜被捕的消息傳到了我的耳朵里，這使我心裏十分高興。茄夢娜一年以來，對於工作，甚為努力，也大有成績。如果她不是女子，恐怕老早就被捕了。因為，最初政府是竭力避免逮捕婦女的。可是，這種忍耐終於不能持久，茄夢娜於是被捕。聽了這項消息

。我一方面心中引以爲毒，一方面也引以爲憂。因爲她的身體很壞，恐怕受不了獄中的苦。

在茄夢娜被捕的時候，有一位新聞記者在場，他請她發表一點意見，她馬上很簡單地說道：「我今日得追隨吾夫之後，心中既覺高興，亦引以自豪。我希望我國同胞，繼續保持吾人的旗幟，永遠飄颺空中。」

這時，我的父親正在加爾各答。他聽到茄夢娜的被捕的消息，萬分激動。決定停止出國養病的計劃，馬上決定回到阿拉哈巴德來。他就叫我的妹妹克呂惜娜先行，自己和家中其餘的人隨後趕到阿拉哈巴德。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二日，他到賴力監獄來探望我。我看到父親的臉色不佳，心知身體已經更壞。可是，我卻努力不使此種感情表現出來。父親對於自己的病，告訴我說，現在比在加爾各答時好得多了，日來的面容不佳，係因偶然的原因。可是，我的心裏確實得了一驚，開始想到父親的年齡，也想到死亡的問題了。不過，我心中總以爲時間大概還相當的久。

這些時間，正是第一次圓桌會議開會的最後數日，我在獄中知道圓桌會議的消息。自己完全了解，投資於印度的主人翁們，因爲要保障自己的未來利益，正以「國家主義」爲名，欺騙着印度。而在印度的男女被陸續地逮捕入獄之際，仍有少數印度同胞，正企圖與政府尋求合作方法，實在是痛心的事。不過，我也不去十分注意圓桌會議究竟在弄的什麼花樣，因爲，我知道，印度的路，在印度目下進行的鬥爭之中，與倫敦的會議無關。而且，一九三〇年一年的進展情形，已經使我認識了印度的革命力量之偉大。對於前途，也有了很大的把握。

一九三一年一月廿六日的「獨立節」第一週年紀念日，更使在獄中的我增加自信。這一天，全印度各地，都召集羣衆紀念大會，並在會上重申爭取印度自由與獨立的決心。進行國民大會的命令。我在監獄之中，正靜靜地坐着，默想過去一年的事，以及明年要來到的，究竟是什麼。不料在中午之時，獄中人員告訴我，父親的病轉重了，我應該出去看看他，當時嚇得一大跳。他們又告訴我，我現在已經因為父親的病被釋放了，馬上可以回去。同我一道回去的，還有妹夫雷吉特。

在我被釋放的那一天夜裏，在各監獄中的很多國民大會的政治犯都被釋放。政府的意思，是要讓我們大家彼此會會面，好重新考慮目前的新局勢。所以，不管在那一個情形之下，我都一定會被釋放的。不過，父親的病況，使我比其他的人們早出來幾個鐘頭而已。

茹夢娜被囚於勒克慕的監獄中。這一天也一道被釋放了，她的獄中生活，一共只過了二十六天。

二二 父親之死

父親的病狀轉劇，面色極爲蒼白，聲音亦已變小，頭腦也有點昏了。不過，他那種不屈的意志，却仍然存在，他看見我和雷吉特回來，十分高興。可是，一二日以後，因爲雷吉特之出獄，不是作爲國民大會出獄人員之一，只是叫他出來看看父親的病而已，因此，又給請進獄中去了。這事很使父親傷心。他非常抱怨，說，很多人都由各地前來探病，而自己的女婿却無法來看，實是不合道理之事。醫生看見此情，心中十分焦急，因爲這是於病體有損的。三四天之後，大概由於醫生的請求罷，雷吉特終於被釋放出獄了。

就在我被釋放的同日，甘地咭在耶那吾達的監獄中，也被釋放了。我很想甘地咭能到阿拉哈巴德來。便把甘地咭出獄的消息告訴父親，父親也切於會晤甘地咭。甘地咭出獄後，在孟買遇着一次空前的盛大歡迎會。第二天，他由孟買出發，晚上很晚的時候，抵達阿拉哈巴德。這時，父親正在病牀之上，醒着等他之到來。甘地咭和父親見面後，雖然只說了很少的話，父親心中便已感到了非常的安慰。連我的母親，也因爲甘地咭之來而大感寬心。

當時已釋放出獄的大會人士，都迫切地等候着指示：究竟應該如何地繼續行動。同時，他們

都很關心我父親的病體。都想到阿拉哈巴德來看病。因此，便有人提議在阿拉哈巴德召集一次會議。決定召集會議之後，數日內到阿拉哈巴德來的人，有三四十位。會議的結果，是決定繼續不合作運動。這時我因為父親的病，不常參與討論，只去了一二次。

參加會議的人，很多是新由獄中出來的。他們都想要看看父親，似乎要作最後的訣別了。每天早晨和夜裏，他們二三人一次到病室中來看他。父親都要坐起來一批一批地接見他們。很微弱地說着很少的話。面容表現出很愉快的樣子。客人去時，他還勉強地舉起手來打招呼。有時，因為說不出話來，還用筆寫下心中一些要說的話。

當時，正在隔壁舉行的會議，他已不甚關心了。他自己知道已經瀕於絕境。他向甘地咕說道：「我要去了，麻哈子媽咕！我無法看到獨立之到來。但是，我知道你已經打了勝仗，很快就會看到他之到來的。」

很多的人們，都散了，回去了，只有甘地咕和三位伴着父親很久的醫生以及一些親戚還留下。二月四日的早晨，父親的病似乎有了轉機，心志忽然十分清醒。大家因此十分高興。想趁此機會把他送到勒克瑙去。因為勒克瑙有深度愛克司光的設備，阿拉哈巴德沒有。就在當天，我陪伴着他，坐車向勒克瑙去，甘地咕和親戚們跟在後面。車子行駛得很慢，可是，父親仍然十分疲倦。第二天，疲倦似已過去，可是，晚上卻又沒有睡好。六號的早晨，我正在牀邊侍候着他，他因為心中痛苦似乎在掙扎。忽然之間，他的面容轉變得很沉靜，掙扎的努力隨即停止。我看看，以

爲父親睡去了，心裏很高興。可是，我母親的觀察力却比我銳敏，她失聲大哭起來了。我正要阻止母親不要驚動父親的睡眠，但是，也馬上看清楚，這是最後一次的睡眠，永遠不會醒了。

當天，我用車將父親的屍首送回阿拉哈巴德。車上還有父親的一個老僕人，雷吉特別開駛車子。後面一部車，是我的母親和甘地咭。再後面的幾部，是很多別的親友。在勒克瑙有大批的羣衆前來瞻仰遺容，並歡送靈柩。到阿拉哈巴德時，情形尤爲熱烈。晚上，家裏舉行祭禮後，在恆河岸火葬。前來執紼之人甚衆。當夜色籠罩着冬日的河濱時，大火熊熊地燃燒起來，吞食了這個對我們及印度民衆都有很大的重要性的身體。甘地咭在羣衆面前，作了一次短而動人的演說。葬了之後，我帶了一顆沉重而寂寞的心，回到寂寞的家裏。星星高照在天空之中，倍增淒涼。

葬了之後，各方所來唁電極多。印度總督依爾文夫婦也電致我的母親，表示哀悼之意。甘地咭在我的父親死之前後，都竭力安慰我和母親。因他之故，我們減少了很多悲哀痛苦。

我對父親之死，極爲傷心。最初差不多常時忘記父親竟已死去。葬後不久，我會和茄夢娜及女兒一道到錫蘭 (Ceylon) 去。在錫蘭某地，覺得環境很好，想到很合父親休養，如何不打電報叫他來呢？當我正想打電報到阿拉哈巴德去的時候，這才發覺父親已經看不見我的電報了。

由錫蘭回到阿拉哈巴德的那一天。我接到一封信，一看，是父親寫給我的。信壳上印上了很多地方的郵戳。我急忙打開一看，果然是父親寫的。寫信時間是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離現在已五年半之久。這封信，是父親在我和茄夢娜一九二六年離開印度到歐洲去起身之前夕，由阿

米達巴德寄給我的。信壳是寫交孟買，由意大利依羅德號輪船轉交。我們當時是乘搭該輪赴歐的。可是，信到孟買時，船已開出，沒有給我接到。於是，這封信便周遊了很多不同的地方。也許還在什麼地方攔了很久。結果，在五年半後的今天，送回來，送到我的手中了。湊巧得很，這也正是一封分手的信哩。

二二 德里協定

正與我的父親死去同日，差不多同時，參加圓桌會議的一羣印度代表，由英回印，在孟買登岸。上岸後，接着就到阿拉哈巴德來了。這些代表們中，有薩普魯，沙時德里 (Srinivasa Sastri) 等等。甘地喏和國民大會的其他一些人物，當時正在阿拉哈巴德。便開了一次私人集會，聽他們報告其圓桌會議的結果。可是，這些代表們並沒有告訴我們一些我們當時所不知道的重要事件。只向我們報告了一些私下的陰謀。如某某先生如何說，某某公爵又如何做之類。我們的這些自由黨諸公，一向是把私人活動看得比印度局勢的實在性爲要緊的。我們和這些自由黨人非正式的會談，毫無結果，不過證實了我們從前認爲圓桌會議之無絲毫價值的預言爲不錯而已。因此，當時便有人提議由甘地喏前往會晤總督，重作一次很坦白的談話。甘地喏也同意，他是非常願意和與他意見不同之人晤談的。往往也能說服對方，爭取到自己一方面來。不過，與私人談私下小事，是一回事，和代表英帝國主義的印度政府晤談，又是另一回事。他深知此情，所以他雖願意去，却並不對此抱若何大的希望。這時，不合作運動雖然勢將退，却仍在進行之中。

聽見總督的事準備好，甘地喏便到德里去。臨行時說，如果重要問題時，再叫大家都去。

後來不幾天，我們一羣人都被召到德里。每天討論各種問題。甘地則常與總督會面。不過有時也停數日不會，大概是印度政府和倫敦的印度事務部須要交換意見之故。在這些時日里，有時費了很多時間去討論字眼問題。如「暫停」文明抵抗的「暫停」二字，總督堅決反對。而甘地則堅持。他說，文明抵抗，乃印度人民手中唯一的武器，只能暫停，不能放棄。爭論結果，雙方同意改用「中止」的字樣。

這時的新德里，引動了人們的注意。有很多美國記者住在德里打聽甘地依爾文談話的消息。人們對甘地也很看重。最有趣的是很多地位很高的人也來拜見甘地了。他們從前對於甘地，對於國民大會，都是敬而遠之的，可是，現在國民大會日壯一日，誰知道將來情形如何呢？到不如和大會及其領袖弄好爲妙。不過，一年之後，當他們看見局勢變動，便又回頭來責罵國民大會的許多工作，並且宣稱自己一向與國民大會沒有發生過接觸。連分區自治主義者們，現在也感覺到自己將來怕不能在新局面內佔優勢，也都來拜見甘地，向他保證，願意在很多問題上同意他的提議了。我在這些時候，常時在清晨散步時，和甘地一道，我們和他談話，差不多只有這個時候，因爲其餘的時間都不空。即使這個時候，有時也給客人來佔了去。我們二人什麼都談，談過去，談現在，尤其談未來。我記得有一次談到國民大會。我以爲印度獲得自由以後，國民大會便得自動死亡。而甘地則以爲還要繼續下去。但是，必須通過一個決議，規定其中人員絕對不能接受政府的給薪職位，違者出會。他以爲國民大會，這樣便可以成爲對政府的一個極有力的

道德方面的壓力。藉此使政府不致於走到不正確的路上去。甘地咕的奇怪思想大批如此。往往不易使人了解。他的所謂民主，亦復如是；他所謂民主完全是一個抽象的觀念，與多數以及代表制之類的普通概念無關。他是以服務以及犧牲為基礎的。他曾這樣說過：「我是一個天生的民主主義者，我以為，只要一個人能夠與世界上最窮的人生生活打成一片，他就可以自稱是民主主義者的。」

甘地咕自我的父親死後，特別關心我。十分誠懇地待我。每當我對他說話的時候，他必定十分虛心地傾耳細聽。所以，有時我甚至想到我有可能把甘地咕吸引到社會主義的路上來。對於這一點，甚至甘地咕本人也說，他準備一步一步地慢慢走向前去。不過，我現在已經了解，甘地咕的思想，與社會主義的目標，是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的。

這次甘地咕與總督依爾文的談話，終於在三月四日的夜裏結束了。那天夜裏，我們靜候着甘地咕從談話會回來，一直到午夜才睡。差不多兩點鐘的光景甘地咕回來了。喚醒了我們說，協定商妥了，並且馬上把協定草案交給大家看。其中的各條，都是大家討論過的，我也早已知道。只有第二條的內容，完全出於我們的意外。在文字上規定：「（註一）關於憲法問題，未來的討論範圍，限於在英國政府同意之下，考慮在圓桌會議上所討論的印度憲政政府的方案。這方案主要內容，曾大略述及印度政府中，聯邦政體為主要之部分。此外印度職權之保留或印度利益之保護，如外交問題，印度財政問題，國內少數民權地位以及其他，亦為主要部份。」我見了心中大為

不滿。

這時看完之後，大家各自去休息，也不發表意見。各自到床上去攷慮去了。此時，還有什麼好說的呢？我們的領袖本人既已同意，則反對亦無益處。如果定要反對，那末，我們將把他一脚踢出去嗎？和他分離嗎？發表申明不承認嗎？這些雖可使個人獲得滿足，却無補於事。如果一定反對，則結果必致引起很大的破裂。

再者，這時，我們業已疲倦於牢獄生活，不擬再讓我們的同事們再走進去。同時，甘地咭和依爾文談了三個星期之久，已在國內造成一種印象，認為協定即可成立，大家都期待著。所以，我們本都決定暫時與政府講和，但必須不掉我們基本的立場。我最注意的是兩樁事體：是獨立之目標不可放鬆，而聯合省的運動必須解決。——甘地咭也會把這點和依爾文說得很清楚，他說明農民們實不能繳納政府所課的重稅。目下抗租抗稅運動雖已停止，但是，農民實無力繳租，則我們國民大會不能勸他們繳納超過其能力所能繳出的租稅。

然而，德里協定內容如此，難道我們過去的犧牲奮鬥，其目的即在於此嗎？當夜我臥在床上，翻來覆去地睡不着。總是焦急地考慮這個協定的內容。甘地咭間接地知道我因了這次新德里協定而苦惱，他第二天早上便派人請我去和他一同散步。非常誠懇地向我解釋新德里協定的精神。並非向敵人投降。也並未有什麼基本立場因此犧牲。他努力由有利於印度革命的觀點去解釋協定內容，當然十分免強。他特別強調第二條文中所謂「印度利益」四字。協定簽訂後，當新聞記者

來訪問時，甘地咭也特別公開強調這一解釋，並申明，印度革命決不放棄爭取自由獨立的目標。後來他又去謁見總督依爾文，把這種觀點解釋清楚，以免外人誤會。至於國民大會派代表到圓桌會議上去的問題，甘地咭申明，派去時，必須以他這種解釋為基礎，而進行討論。依爾文當然不贊成，不過，他說，也不否認國民大會有權如此提出。這樣一來，我也只好同意這樣協定了。因為我知道，當時確別無第二條路好走。

關於這次不合作運動的國民大會入獄人員之釋放，在協定之中，已有明文規定。但是，還有不少的一般的政治犯的釋放問題，却仍未解決。甘地咭主張應予釋放，不一定是作為這次協定的條件之一。而在減輕政治上的緊張程度以便造成更正規的空氣的觀點上，要求予以釋放，但是，政府拒絕了。

協定簽定以後，我便離開德里到勒克瑙去。第一件事便是設法停止全國不合作運動。這事是不容易做的，受到很多同事的反對。但是，這些人終於服從命令了，不過，却都不斷地批評着牠的不正確性。因此次不合作運動入獄的人，也都完全出來了。只有一般的政治犯仍然留在裏面。這些被釋放的工作者們，回到各自的家鄉，都受到熱烈的歡迎。可是，警察仍然來驅散各種集會，鞭打集會的羣衆。

德里協定結束以後，我因為獄中的生活很苦，加上因父親之死所受的悲傷，再加上在德里終日集會的疲勞，身體變得很壞。回到家後，病了相當時期。幸而在國民大會加拉契（Karachi）大

會時，身體健康恢復，終得參與會議。

加拉契大會，主要是討論德里協定，和圓桌會議的問題。我在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上，是已經接受了這些決議案的。但是當甘地咕叫我將決議案提到大會上去的時候，我却很不願意。但是，後來仔細考慮，自己只有兩條路：要末贊成，要末反對。在常務委員會上既已贊成，若不向大會宣佈，反使羣衆不知究竟，那是不對的。不過，當我在大會上講演時，很公開地向大家說明我內心的苦衷，和我之所以終於贊成了新德里協定的各種大小原因。同時，因了這些同樣的原因，我希望大家也接受他。結果，這種誠實而委屈求全的態度，感動了到會人員，結果十分圓滿，大家贊成。

在這次加拉契大會中，却也有使我高興的事。除了德里協定及圓桌會議的決議案而外，還有些別的進步提案。其中尤以關於「經濟政策的基本權利」一案，最使我心中得到安慰。這一議決案，可說是在國民大會的歷史上開闢了另一個新的境地。前此國民大會的決議，全是政治的，民族的。這一個決議，却干涉到經濟的，社會的問題了。因爲在這個決議中，會定有很多減輕民衆負擔的辦法。還有重要工業收歸國有的主張。此案通過後，政府方面對於國民大會的性質，開始轉變看法了。其實，這并非社會主義的提案，其全部內容，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是都可以接受的。然而，有的人以爲布爾希維克的紅色勢力，已闖入國民大會之中，而且，赤化一部份的國民大會領袖了。當時，並且還流傳着一種謠言，說，這份提案，是某些共產黨員起草的，擬好以後

，他們把牠交給我，我當然贊成，又把牠交給甘地咭，使牠成爲國民大會的決議案。又說，我同時還向甘地咭提出「哀的美敦書」，說，如果甘地咭不贊成牠，則我也將誓死反對德里協定。結果，甘地咭只好屈服，國民大會也只好接受了。其實，這全是一套鬼話，我對於甘地咭，即使有時偶而不贊成他的意見，也決不如此。決不會和他用市場上那種討價還價的手段的。

不合作運動就如此結束，德里協定就如此簽定了。

「註一」條文文字，在作者原書，係列於注釋中，此處經譯者插入本文。

二二二 第二次圓桌會議

我的身體需要休息。醫生也勸我另覓他地從事休養。當時印度之大，却難得找到一個地方可供靜養之用，因為革命風潮遍於全國，政治組織，亦在在皆是，我無論留居何處，都無法不去參加。結果，只好決定和妻子及幼女一塊到錫蘭去。這是我自一九二七年由歐洲回來以後的第一次休息，也是第一次和茄夢娜作安靜的休養。

在錫蘭的生活，十分使我感到安慰。該地的農民，差不多天天有到我們的家裏來談話的，有的甚至由很遠的地方跑來，常時攜帶着很多的禮品如花木蔬菜和自製牛油等等，送給我們。我也常和農民們接談，心境甚為舒暢。

後來，我們又由錫蘭到印度南部去，到印度極南端的哥摩林角 (Cape Comorin)，到特拉凡哥爾 (Travancore)，到可城 (Cochin)，到馬拉巴海岸 (Malabar)，到賈索爾 (Mysore)，到海得拉巴 (Hyderabad) 等地。這些地方，有的在教育方面辦得很好，有的在工業方面又很進步，有的却又十分落伍。到賈索爾的班加羅爾 (Bangalore) 時，我曾在那裏開過一次集會，升印度國旗。我離開之後，該地政府把那很大的鐵旗柱打斷成小段。我聽了十分發氣。但是，也無可如何。

。在特拉凡哥爾，雖然不合作運動結束，國民大會正式恢復合法地位了，然而，該地的國民大會組織，却仍被認為非法團體。在海得拉巴，則政治集會是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東西。即使是宗教集會，也被政府以懷疑的態度監視着。到可城的時候，曾去參觀在該地的「白色猶太」區。他們生活在此地，似乎是把該地認為聖地耶路撒冷了。在這些地方，我還看見很多的聶斯托利人 (Nests, Bogians)。這次我之所以到海得拉巴去，目的之一，是想訪奈杜夫人及其兩位女公子。我們勾留在那里的時候，曾有一個婦女組織開會歡迎茄夢娜。茄夢娜在會場上說話，把她最愛講到的題目拿來講。她主張的是婦女們聯合起來，反對男人們所造成的各種法律和習慣，爭取自由。後來當地有一位男人寫了一封信給她，告訴她說，自從她那一次講演以後，他的妻子回到家里，簡直無法無天，不聽他的話了。

周遊了南印各地以後，我們又由孟買回到錫蘭。接着不久，又回阿拉哈巴德，又開始參加國民大會的工作了。

德里協定成立後，依爾文總督離開了印度，繼任總督為惠靈吞勳爵 (Lord Willingdon)。當時，印度人認為事態越來越棘手。因為惠靈吞比依爾文難於講話。這些人們，習慣於由人的因素去了解政治鬥爭。忽略了英國政府的政策之是否轉變。德里協定簽定以後，並未使印度和平過日子。在孟加拉，參加不合作運動的人員被釋放了。但是，却又有不少新的逮捕事件發生，性質相同而名目兩樣。現在都用「作煽動講演」的罪名逮捕了；在聯合省方面，農民的土地運動，仍舊時

有爆發。全國各地都向國民大會埋怨，說政府方面並未遵守德里協定，仍繼續進攻民衆。國民大會把這事的嚴重性告訴政府，而政府反說協定簽訂以後，國民大會人員毫不遵行，蓄意破壞。彼此反覆責難，毫無結果。

究竟甘地咭要不要去倫敦參加第二次圓桌會議呢？問題久懸不解。在政府方面，認爲印度憲法問題，第一次圓桌會議討論的聯邦制度，已經給這問題奠下了討論的基礎。根據德里協定，第二次圓桌會議應該在這一基礎之上，繼續討論。在國民大會方面，認爲國民大會在德里會議時所接受的聯邦制，其內容決不是第一次圓桌會議上的那種性質。所以，這問題不是繼續討論，而是從頭開始。這樣，彼此之間在意見上的不同大得很，甘地咭是否前往倫敦，久懸不決。

當時政府與國民大會之間的鴻溝甚深，實無法架橋。我們都不再希望在第二次圓桌會議上能與政府成立有利協定。甘地咭一向都很樂觀，對此亦甚懷疑。但是，我們總覺得仍應努力爲之。當時，有兩種情形足以阻止我們派代表前往參加。第一、我們希望在圓桌會議上，對於自己的立場，作自由的陳述，不能以「此事業已決定」這樣的話來阻止。同時，第二、印度局勢的發展，可能在政府和我們之間，產生衝突。這種衝突，也使我們不能派代表在倫敦從容地作和平的談論。在孟加拉，政府仍繼續壓迫我們，而聯合省的土地運動也日趨惡劣了。

在邊區省，政府的無理壓迫，已引起了衆怒。加法爾汗已經起而領導民衆，反對政府了。他到各處，都組織紅衫社（Red Shirts），從事工作。他在邊區省的聲望日高，大家都稱他爲「邊區

督的甘地」。強悍的邊區省人民，此時也接受了非暴力政策。後來加法爾汗甚爲甘地所吸引，兩人便親密地發生接觸，邊區省因而成爲整個運動的一部了。

局部的衝突，其實還不甚重要，重要的是有一種發展，其結果所屆，必致引起更大的基本衝突。這種衝突，絕非由個人而來，乃由於印度民族革命及英國欲壓制革命這一基本背景而產生。我們的民族革命運動，在其原始的時期，乃由於我們的上層分子需要發展所致。這種需要的後面，隱藏着經濟的要求。這種運動發展以後，遍及於全國，乃吸收了下層分子，而漸漸地煽動了農村的鄉村。這些農村羣衆，越來越發見自己不能繼續在這種生活標準之下生活了。老的自給自足的經濟，已經不復存在，家庭手工業發生，本可以減輕一些土地的負擔，然而，這種工業給政府的政策擊破。他敵不過機器工業而滅亡了。廣大的印度農村，從此成爲世界的市場。其本身又因生產手段的缺乏，以及受傳統的土地制度所影響，無法自謀進步。於是，農村階級，無論地主也好，佃農也好，情形日趨於下。而地主階級却想把自己所有的負擔，轉嫁到佃農身上。於是，佃農的貧窮化過程，便以大速度進行，而這種貧窮化的結果，驅使他們走向革命的道路，加入民族鬥爭。農村無產階級，被激動了。當時的民族主義，或「斯瓦拉吉」，在這些農村階級的眼里，意思是社會的基本改革；土地制度的變新；而因此減輕他們的負擔。但在政府方面，他們以爲印度的問題，完全由於一些「煽動家」之作祟。只要把他們壓服，則一切自無問題。

一九三〇年的印度民族運動，因爲同時有着這一種社會的力量存在，增勢不少。國民大會即

代表着這一種民族主義的運動，民族主義運動之日趨發展，可由國民大會之聲望日高一點看出。農民當然轉向國民大會而將其力量加入大會身上。中產階級的下層分子，則成爲國民大會戰鬥部分的主幹。甚至於上層階級，也覺得甯可與國民大會保持友誼爲妙了。

國民大會的力量愈大，政府壓迫之心亦愈切，而彼此的衝突，也就成爲無法避免的了。但是在國民大會方面，覺得如果還有可能，仍應設法派出代表到第二次圓桌會議上去。於是，甘地咕去和總督會晤，作了二次的長談。他們第一次的會晤，毫無結果，第二次會晤之時，情形是無論如何必須有所決定的了。但是，甘地咕因見當時在孟加拉省、在聯合省，各地都有衝突，就決定：如政府對印度的和平不予保證，他決不前往倫敦參加會議。結果，一直延到八月底，載圓桌會議代表前往倫敦去的郵船，即將開駛之前，政府這才與他成立一項臨時協定。目的完全在於使他倫敦之行成爲可能。這時，已是最後一分鐘，連最末一班火車也開了。甘地咕是坐了專車到加爾加(Katla)去的。爲了讓這部專車接上輪船，使別的火車也誤了點。

在八月末的一天，我送甘地咕到孟買。他坐船由阿刺伯海起程，到倫敦去了。甘地咕此去，是充任國民大會唯一的代表。國民大會曾辯論了很久，結果仍只決定由甘地咕一人前往參加。一來，因爲在此重要場合，最好還是只以國民大會最傑出的人物前往參加爲好。二來，我們都認爲今日的重要問題，不在倫敦而在印度。印度的實際運動，可以影響到倫敦的會議的，不該把我們重要的人物，全部派去。除此而外，還有一種重大而實在的理由，是我們大家當時對第二次圓桌

會議，並未抱著何大的希望。甘地咕之去，主要是去試探英國政府究竟能够賦予印度以若何之權力。如果在這一問題上無成就，則整個圓桌會議，勢將無益於印度。如果能够在這一方面成立有利的基礎協定，則甘地咕可以臨時電召我們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的一部份或者甚至全體委員前往倫敦，共同考慮。

在會議上，英國政府當然不會使印度人民的利益得到滿足。他只想把一些小的問題，拿來討論，藉此把重要的基本問題，拖延下去。國民大會提出基本問題時，他們答以必須詳加考慮，盡力拖延。他們最得意的傑作，便是談論「分區自治」的問題。會議上其他的印度代表，大多數都跌落在政府的圈套里。一些是願意如此，一些是出於不得已。這些人們，雖然充任代表，其實並不代表什麼，只代表了他們自己。會場之上，無一人提及自由印度之建立的問題，也完全忘掉了爭取獨立的鬥爭。終日討論着，爭吵着，津津樂道的，是職位之類的問題。那種人應該充任那些職位，在那一種會議上又應該佔多少席位。在他們考慮之中的，是印度教徒，回教徒，塞克教徒，英印混合種以及西歐人士等等。總之，都屬於社會的上層份子，下層羣衆，却從無一字提及。一個應該成爲與英國帝國主義鬥爭的會議，却完全成了印度同胞互相爭權的場所了。其中最無聊可恥的，是阿加可汗(Aga Khan)，他和英帝國政府，緊密地聯合在一塊。因爲他本人的利益，可說就是代表帝國主義的，封建勢力的，產業資本的，金融資本的，宗教的以及分區自治派的各種不同利益的混合體。然而，可惜得很，他還自稱代表印度人哩！他在會場上，最爲活躍。此

時，反動的英國保守黨，和這些印度惡勢力結合着，操縱着這一次會議。

這種情形，對於當日在座的甘地咭，當然是難於應付的。遠在印度的我們，每日讀着倫敦會議的消息，心中想，甘地咭到底總會忍耐不下去罷！然而，出人意料之外，甘地咭仍以偉大的精神忍耐下去。他多方設法，想覓致某種基礎的談判背景。他當然十分痛恨分區自治派所提出的很多只有利於回教徒而害及民族主義的提議。但是，他對於這些，都表示全部接受。不爭論，亦不拒絕，只要求他們同意他一點，即一致行動，向會議提出獨立案來。他這種要求，完全被分區自治派拒絕了。誰也不會想到阿加可汗竟可能同意爭取獨立的。

由這一事實看來，可知印度主張分區自治的人們，其真正目的，並不在於分區自治，而是反對印度的獨立以協助英國的血腥統治而已。他們不過使用分區自治的花樣，作為表面的掩護。所以，當時的英國，對於這次會議，無論代表也好，討論的主要問題也好，都選擇得非常適當，足以制止印度真正自由的提案，得到出現機會。

這次圓桌會議本身，對於印度，並非失敗。因為，會議的本質，便決定牠自己非如此失敗不可的。印度人對此，不能負絲毫之責任。不過，牠對於把國際上對印度的注意，由重大事件轉向一些細小問題去一點，却得到了成功。在印度，則產生了一種幻滅，失望的情緒，和一種受辱之感。他給反動勢力以藉口，重新抬頭。

至於印度的實際革命，却不會因為倫敦的這些手腕花樣而停止。這情形，只不過造就了一些

不利空氣而已。民族革命運動，代表着農民以及一般中產階級的利益，仍舊繼續着不屈不撓地鬥爭下去。這一運動的發展，只有二途：或者得到成功，達到其民族自由之目的，完成任務後，讓位於其他運動去；或者，暫時地被政府壓迫一些時候，然而，牠總會仍然繼續下去的。

二四 大逮捕

在甘地唔起身到倫敦去開會之後不久，印度即有兩番事體發生：第一，是喜吉里 (Dumra) 的拘押犯 (Detenus) 之暴動。喜吉里這地方，是一個拘押犯的拘留所。在拘留所內，不知怎末一來，一些拘押犯攻擊所中職員。職員們就向他們開槍亂射，結果死者二名，傷者無數。這消息傳到外面，羣情鼎沸。政府乃就本地官吏，派定數人，調查此事。調查結果，說，職員們開槍射擊，乃是合理之舉。政府的公報發表後各方得知其中弊病的，更表不滿。後來，另由孟加拉政府委派一個由高級司法官員們組織起來的調查委員會，重新調查。這才發見責任完全在職員方面。另一件事，是在起塔貢 (Christown) 有一個恐怖分子暗殺了一個回教徒的警察，也因而牽連了很多人。

我對於暗殺手段，頗不以爲然。我認爲暗殺並非革命的正當手段，其結果反而引起很多不利。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到加爾各答去，在那兒參加一些羣衆集會，在對羣衆講演的時候，我曾指稱暗殺手段之不正確。不過，對於這些恐怖主義者，我却並不如某些人那樣，罵之爲懦夫。因爲，一些經常冒生命危險以工作的人，名之曰懦夫，似亦不大妥當。這次講演，引起了一樁意

外之事。當我正要離開加爾各答到車站上去的時候，有兩位二十多歲的青年人前來拜訪。一看，不認識。但是，我也就馬上了解了來客的意思。於是，在匆忙之中，和他們辯論。我仍舊堅持不以爲恐佈政策乃正當手段。二位青年終不信服，臨辭之時，告訴我說，我這次的講演，對他們很有不利，希望我以後不要如此；如果不然，便將以對付過別人的手段來對付我。離開加爾各答後，我在車中仔細考量，甚悔未得作較長時期的勾留，把二青年由理論上予以說服。這些青年，如果能將其說服，使他們把他們的身體與毅力，用之於正當途徑，也許會產生好大的好處。

十二月里，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在阿拉哈巴德開會。會後，我和茄夢娜到孟買去。這時，茄夢娜又生病了。我準備把她留在孟買醫治。我剛剛到孟買的時候，便聽到了一個消息，說，聯合省的政府，又頒佈了一項法律，本是用以對付該地的土地運動的。但是，這項法律的內容，却十分廣泛。嚴格地實施時，差不多任何一種政治活動都成爲不可能了。並且，規定對於犯罪者的家庭，亦予以同樣的處分。這時，甘地喏已經在由英回印的途中，大約一週之後，即可在孟買登陸。我本應等待甘地喏來後，再回阿拉哈巴德。可是，這時實在等不住了。很多同志同事又在阿拉哈巴德被捕入獄的消息，不絕於耳。除此而外，該地國民大會的省委員會，也定於週內在依他瓦(Etawah)召集。我必須前往參加。便決定把茄夢娜的病體，留在孟買，自己趕回阿拉哈巴德。打主意六七日後，如有暇，再回到孟買來接甘地喏。

還沒有到達阿拉哈巴德，我便接到一份根據這項新法律所下的命令，禁止我，不許作很多活

動；一到阿拉哈巴德車站，又看到一份同樣的命令。一抵家，又看到，不許我公開講演，不許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任何一種文章，不准走出阿拉哈巴德市區以外等等。同樣的命令，有很多同事都接到。第二天，我寫了一封信給本地縣長，說命令都已接到，不過，我仍須以平常的態度，做我平常的工作。並且，在我的工作計劃之內有到孟買去接甘地咭一項。同時，我也還得參加一次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會議，因為，我是該會的祕書。

我這次回阿拉哈巴德，本是想來設法延緩省委員會之召集。因為，這剛好與甘地咭到來之間相衝突。我一到，便得悉聯合省省政府已經通知國民大會省員會委的主席希爾晚利 (Sherwani) 說，如果這次省委員會所討論的，是關於土地運動問題，那末，便不許召集。顯然的，我們要討論的，正是這樣的問題。我們同志之中，本有很多人主張延緩召集的。政府這種干涉，反而激怒了這些人。因此，很多人反而主張一定得如期召集，不顧一切。但是，經大家仔細討論後，認為甘地咭就要到來了，不妨忍耐一點，避免衝突。免得甘地咭一上岸就碰着困難問題。於是決定暫緩召集會議。

希爾晚利和我，決定離開阿拉哈巴德，一同到孟買去接甘地咭。那是十二月二十六日的上午。我們進車廂以後，讀到本日的晨報，知道很多同事，又被捕了。正在苦悶之中，火車忽然在一個小地方停了下來。走上來一位警察，把我們二人加以逮捕。拖在路旁等候着的一輛卡車，又給送到賴力監獄來了。

我被捕的後二日，甘地唔在孟買上岸。上岸後，才知道最近國內情勢的發展，以及同事們又大批被捕的消息。很明顯的，和平之門緊閉了。但是，甘地唔仍努力着，想找出一條出路。他計劃與總督惠靈吞晤談。總督的答覆說，晤談是可以的，但是，必須有一個條件，即不許提及最近在孟加拉省和聯合省等地所發生的事體，亦不許提及聯合省這次頒佈的新法律以及根據此項法律而逮捕人員的事體。這些事體，本就是當時轟動全國的事件，也正是甘地唔所欲馬上解決的事件，捨此而不談，則這次晤談，其結果豈不是晤而不談嗎？事實非常明白，政府是決心打擊國民大會的了。他不需要什麼和平。我們常務委員會的面前，只剩下一條可走之路，即非恢復文明抵抗運動不可了。如此做去，大家都知道個人的前途都是被捕入獄，但是，大家仍然堅決地通過了實行文明抵抗運動的議決案。當時甘地唔却未放棄和平的希望，他打第二次電報給總督惠靈吞，要求作一次無條件的會談。這一次，總督先生的答覆，是把甘地唔以及國民大會主席配特爾予以逮捕。這是一九三二年一月四日的上午。情勢如此，鬥爭已無法避免了。

就在甘地唔被捕的這一天，我的案件也就開始審問。這次是根據所謂聯合省緊急權方法。希爾晚利被處六個月的徒刑，一百五十盧比的罰款。我呢，則被判處以二年之徒刑，五百盧比的罰款，罰款折合徒刑六個月。但是，我們二人所犯的罪，是一樣的。其間之不同，也許是由於我會經寫過一封信給縣長，說自己要到孟買去，公然反抗命令，而希爾晚利則並沒有做過這樣的事罷？不過，他之要到孟買去，報紙上也是公開刊載過的。除這一點而外，我們二人的情形盡同。一

樣地接到命令不許活動，一樣地而且同時地上火車前往孟買。又同時被捕。因此，被判決後，希爾晚利問負責審判的法官，他之所以得少處徒刑，少罰款，是不是由於「分區自治」的想法。這話，使得在場的其他人們都笑了起來，而法官先生則狼狽不堪。

元月四日這一天，是最激動的一天。在阿拉哈巴德，大批的羣衆和警察及軍隊，大起衝突。警察又是拚命亂打一陣，結果，羣衆死傷均重。各個監獄的囚犯，越來越多，擠不下，後來只好另建新的臨時監獄。國民大會當然被宣佈爲非法團體了。非法組織的名單，以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爲首，其次是各省的省委員會，再次，是不計其數的地方委員會。除了國民大會而外，還有很多別的團體，也都是一律成爲非法了。如農民組合，青年同盟，學生聯合會，稍爲進步的各種政治組織，一部分中學校與大學校，醫院，國貨公司，以及很多的圖書館。總之，多得數不清，每一張名單都疊看也看不完的。

這時，茹夢娜正在孟買患病。她心中十分惱怒，深恨自己無法參加文明抵抗運動。我的母親和兩位妹妹，都出來參加實際工作了。後來，兩位妹妹也都一律入獄，各被判一年的徒刑。

外面的報紙，對於此項消息，很少刊載，一方面由於嚴格的檢查，一方面由於對報館那嚴厲的處罰。在一些省份中，甚至連提及獄中某人之名亦成罪名。

我們困住在獄中，用各種方法，消磨時間。我自己則除讀書織布等工作而外，用了很多時間，考慮整個革命的前途，同時，很詳細地，很理智地檢討自己個人的缺點。

時光是不快不慢地由監獄門口過去了。四月裏我在獄中聽到母親受傷的事：四月六日到十六日，是「民族週」，這一天，阿拉哈巴德又發生了遊行示威的隊伍。我的母親也參加其中。隊伍給警察阻止了，警察們又是一陣亂打。打過之後，隊伍當然也就中止前進。有人替我的母親找了一張椅子來，把椅子擺在隊伍的前頭，她就坐在椅子上。本來最初有人在側照顧她。後來，警察開始逮捕人，照顧的人也給逮捕去了。接着，警察到她面前來了，把她由椅上拖下，用手杖在她頭上亂擊。頭給擊破後，血流滿地，她也因此暈過去。被遣於路旁，過了相當時間，一位警察官過路看見了，這才把她放在他自己的車裏，送她到家。當夜，因為外面流傳着謠言，說她已重傷斃命，羣衆們得悉此訊，大爲憤怒。大家全忘記了非暴力的精神，竟向警察進攻。警察開槍掃射，略有死亡。事後二三日，我才得知母親被打的消息。心中極爲傷心。她的傷漸漸好了之後，在第二月裏到獄中來看我。

這一次英政府的態度，與一九三〇年那次大大不同。在一九三〇年的時候，國民大會係採攻勢。這次，採攻勢的是英政府。對於婦女，從前政府是有意寬容。這一次，因為印度婦女竟和男兒一樣地英勇鬥爭了，便改變了態度。對於婦女也同樣加以逮捕。入獄之後，故意虐待她們，想藉此滅殺她們的鬥志。對於革命人士的財產，這次也是肆意掠奪。我家的住屋也給警察封佔。有的東西給拍賣折充父親和我應繳納之賦稅。

被捕後，在賴力監獄關了六個星期之後，給轉移到百呂尼監獄（Bareilly District Jail）去

。在裏面關了四個月，又送到在喜馬拉亞山麓的德赫拉東監獄。自此以後，就一直是在其中生活，差不多一直到二年徒刑期滿之時。

在獄外，不合作運動是日趨向下了。漸漸地也就失掉了羣衆運動的性質，加以英國政府不斷地予以嚴重的打擊，其後，終於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中停止了。此後的不合作運動，在理論上，雖然仍舊討論着，宣傳着，在行動上却一點也沒有了。而另外一部份印度人，則正在這一段時期內，在倫敦替印度起草憲法。想藉一九三二年的第三次圓桌會議，來完成此項工作哩！在獄內，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三年，對政治犯的待遇，亦顯然與一九三〇年之時，大不相同。一九三二年時，一位監獄總檢查官，曾於六月三十日，發出一道命令，指示各監獄對政治犯的態度云：「對於因不合作運動而被捕入獄的政治犯，如予以特殊之待遇，殊屬不合。自此以後，對於此一類人，應待以嚴厲之態度。」以後，各監獄中，對於政治犯之鞭撻，日有所聞。對於婦女亦然，我住的牢房隔壁，便是一個囚禁女犯人的所在，中間以高牆阻隔。然而，隔壁嚴酷地對待女犯人的嚴厲的聲音却越過高牆，走入我的耳裏。

由百呂尼監獄送到德赫拉東監獄的時候，是和巴拉哈·潘得一道。監獄當局恐怕惹起羣衆的遊行示威，不敢讓我們在百呂尼上車。另用小汽車把我們送到距離百呂尼五十英里的小站後，才讓我們上火車去。

在離開百呂尼的時候，百呂尼地方的警察署長（英國人），把一卷報章雜誌送到小汽車裏，

交給我，並且說，他知道我正學習德文，這裏面是一些德文畫報，轉意地替我找來作消遣時光之用。我並不認識他，自那次以後，並未曾再度碰面，甚至於連他的名字我也不知道。這樣小小的事體，使我心裏十分感動，在火車上的全部時間，差不多都是用以考慮着這一樁小小事體所引起的很多問題。想到英國個人與印度個人之間之關係；想到英帝國逼個人而實施其殘酷政策時所發生的各種情形等等。

我的獄中生活，由一般的請形說，可說是比較好的。在獄中，有很多時候都可以閱讀報紙書籍，可以會見家人和寫信等。我算是「甲級」囚犯，還蒙特許在獄中寫文章和做讀書筆記。我常常時以運動來鍛鍊身體，以閱讀來充實自己。有時，我還繼續不斷地寫信給我的女兒，教育她。在這些長長的兩年徒刑之中，我會寫了不少的信給她。信中雜談歷史上的瑣碎事件。這些信件，她都一一保留着。現在已集成一書，名曰「*Glimpses of World History*」出版了。

在這幾年以內，國民大會雖然在政府方面已經宣佈為非法組織。但是，國民大會的人們，却永遠不會把牠拋棄。曾經計劃召開過兩次大會。一次擬在加爾各答，另一次擬在新德里。一個不合法的團體，要來召集公開會議，其必然的結果，是不言而知的。兩次會都被強暴的力量驅散。一方面大事鞭撻，一方面擇要逮捕。會議雖然沒有得到良好結果，但是，全國各地的人們，在此種困難局面之下，仍能不遠千里前往指定地點開會一事，實足以證明印度革命人士的英勇了。加爾各答的大會，係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底召集。我的母親也堅持非去參加不可。但是，在赴加爾各

答的途中，和馬拉維亞咕一道被捕了。並在阿參沙耳(Azarsol)拘留了好幾天後，才予以釋放。母親在這幾年之中，一方面看見父親爲印度革命犧牲，至死不屈；一方面又見我們已生活在監獄之中，一個兒子，兩個女兒，都同時嘗鐵窗風味。她也因此下了決心，要全家爲此偉大事業而奮鬥。所以，雖然年事已老，她仍竭其所能，參加各種活動。我在獄中得知她的消息，一方面興奮，一方面也就心她那老弱的身體。

二五 文明抵抗的停止與白皮書的公佈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的時候，我在獄中得知甘地咭因反對麥克唐納(Mr. Ramsay MacDonald)關於賤民階級 (Depressed Classes) [註一]單獨選舉區的劃分問題，決定「絕食以至於死」了。我得知這一消息以後，心中甚為苦惱。甘地咭又作了如此絕對的決定，我恐怕再無緣和他碰面了。最後一次看見他，是一年前他正登船赴英的時候。

甘地咭正當我們全民族全面鬥爭的此時，又為這樣的小問題而採取如此絕對的犧牲。此結果一定影響我們的運動，這是不消說的。我因此心中十分苦悶。我對於甘地咭對政治的那種宗教的觀點，甚不贊成。他常時把上帝援引到政治鬥爭上來。他甚至於好像暗示說連他絕食的時日也是上帝決定了的。這是一個多麼不應該樹立的榜樣啊！

我想了又想，思考十分混亂。我感到憤怒和絕望，同時，又愛着引起我這種苦惱的甘地咭本人。我當時不知如何是好。對於任何人都動輒亂發脾氣，不過，很多時候，却是對我自己發氣。

但是，好像奇蹟之到來一樣，我在憤怒苦惱達於極點以後，忽然又鎮靜下來了。我想，甘地咭往往會做出一些出人意外的好事，而於整個革命運動發生好的影響。同時我還想到，即使甘地

咭因此死亡，我們的民族革命運動也決不會因此死亡。所以，我甚至於準備着等候咭之死，仍把自己的意志緊緊地把握着，毫不動搖地準備應付世界的一切事變。

果然，甘地咭的行動在印度教徒中，引起了一個很大的熱情之波。我想，這位坐在耶拉吾達的短小身材的人，是如何地能把握人們的心啊。這時，他發了一個電報來給我，這是我被判罪後第一次接到他的音訊，電報內容是：

「在這些苦惱時間當中，常時想起你。我非常迫切地希望得知你的意見。你知道我對你的意見是很尊重的。看見了英底及施魯蒲的孩子們。英底看來更有力氣了。經過甚好。電報。愛。」

這電報是特別能代表甘地咭的性質的。他竟在他絕食的苦惱當中，不忘提及我的女兒英底和我妹妹的孩子們去拜訪他的小事。並且還提及英底娜長得更有力氣了！（這時，我的妹妹也在獄中。孩子們却在浦那讀書。）他永遠不忽略人生中的小事。其實這些小事是很關緊要的。

這時，關於選舉區問題業已有某種解決辦法的消息傳來了。我同時回覆甘地咭一通電報，說聽到他絕食消息以後的感情上的反應。並說，自己無法從宗教的觀點出發供獻意見。在浦那，很多人聚集起來，商就一個「協定」了，英國首相也很快地予以接受，把他從前的決定修改了。於是，甘地咭的絕食終止了。對於「浦那協定」，我是歡迎的，但是，並非歡迎牠的內容。

哈里人 (Harijan) [註二] 運動在甘地咭的指導之下，發展甚速。但我對這事，却大不滿

意。誠然，這一運動確實有利於賤民階級，他們的身份也確實應該提高。但是，當時我們還有着更重要的工作文明抵抗在。甘地咕此舉，事實上是把大家的注意力，由重大事件上引到部分的小運動上去了。這時，有很多國民大會的工作者，受此影響，避難就易。我們的運動氣勢，因此日衰。不過，文明抵抗運動，當時仍然繼續進行着，並且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的時候，加爾各答的國民大會還有着羣衆的大示威。而甘地咕却專心於別的事去了。他在獄中，獲得允許繼續指揮「哈里人運動」。這一切，甚使我苦悶。

幾個月以後，在一九三三年五月之時，甘地咕又開始了他的二十一日之絕食。消息傳來，我也不免憂心，然而，我却也習慣了。這種絕食，在我看來是不可思議的，如果我事先被叩詢意見，我一定要反對。但是，我因尊重甘地咕的意見，心中雖然不快，也仍力求忍耐。他開始絕食之前不幾天，曾經寫一信給我。這信使我十分感動。因為他要回信，我便發了一個電報給他：

「信悉。關於我所不能了解的事，怎能開口呢？我迷途在一個奇怪的國土裏，你是我唯一的指路碑，我想找尋可走的路，然而，失足跌倒了。不管什麼事行將發生，我的愛和思想，終於永遠和你在一塊。」

我是不想在外表上表示出我對他的行爲的反對來，但是，我這電報分明不會給他以快樂。我想，我們應該接受一切，應該盡可能地在他的苦惱時間安慰他，便發另一個電報給他去，說我對他的行動，現在較為清楚地了解了。

他終於沒有因絕食而死，第一便就被釋放了。因了他的勸告，文明抵抗運動，彼中止了六個星期。這次的中止，給這運動以一個致命的打擊。在六月中旬的時候，中止的時期，又延長六個星期。然而，在政府方面，對於我們的打擊，却從來沒有停止攻勢過。在安得曼島 (Andaman) 上的政治犯，因為待遇問題，發動了絕食同盟，實行抗議。結果有一二人因絕食而死。這些政治犯們都是孟加拉判罪以後送到安得曼島上去的。印度有些人因安得曼島上對政治犯的虐待，表示不滿。在印度的集會上演說表示抗議。這些人們也因此被捕了。幾個月以後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之時（當時我已出獄），很多有名的人如泰戈爾，安特烈等發表呼籲，要求對安得曼島的犯人應施以人道的待遇。當時簽名在這呼籲書上的人，大半是與國民大會無關係的人。印度政府的內務部，對此大為不滿。對於同情政治犯的人們，大加指責。後來，我記得在孟加拉連表示同情政治犯也成爲罪名。

在中止文明抵抗的第二個六星期結束之前，我們在德赫拉東的監獄內，聽到甘地咭在浦那召集了一次會議的消息。在這會議上，甘地咭勸告大家終止了羣衆式的文明抵抗，採取個別式的行動。這次會議最使我們驚奇的，是完全沒有對現在的局勢和我們的目標，加以討論。國民大會人士，差不多兩年不相會了。在這兩年以內，在國際上尤其在印度國內已有很多重大之事發生了。如英國政府白皮書的公佈便是。其中是關於印度憲法之改革計劃。這時，外面已有很多傳說，不但來自對國民大會的擁護者，也來自自由黨人。都說，國民大會已經放棄爭取獨立的目標了。我

想，當此之時，至少應該強調地指出我們的態度，使大家明白了解。如果可能，還該提出關於社會的經濟的目標，以資號召。然而，會議却並不如此。甚至會場上還有和政府謀取「和平」的聲言哩！甘地咕送了一通電報給總督，要求晉謁判談。總督的回答是：「不行」。於是，甘地咕又送出第二通電報，提到「光榮的和平」。此時，政府方面，在勝利之餘，正企圖完全粉碎印度的民族運動；在我們方面，有不少的政治犯在安得曼島餓死。還有什麼和平好講呢？

重大的壓迫仍繼續着。自一九三三年二月起，公衆集會都一律被禁。那時，連舉行一次紀念我的父親周年祭的會，也不准舉行。而這次會，在性質上並非國民大會的會議，而且，當時的主席是準備由薩蒲魯去担任哩。

至於印度的未來，英國政府給我們的恩惠，是那份子皮書。這是一份大可注意的文書。牠規定印度成爲一個光榮的印度國。其中的政治組織是聯邦制。佔優勢的，是封建勢力的代表。至於封建的土藩行政，則一仍其舊。不許外部干涉。我們仍被一條鐵鍊鎖在倫敦城上，金融也仍被英國銀行所成立的一個準備銀行所主宰。對於投資利益，必須保護。新的投資亦將增加上去。在國家組成上，高高在上發號施令決定一切的，還是總督先生。這樣一個憲法擬定了，主要內容是把印度的手足加錘，使其無法活動。

這就是第三次圓桌會議結束以後，英國給予我們的恩惠。在這一段期間，我們還聽到很多話，說：英國政府對我們，現在是空前的慷慨哩。

這時的國民大會，在長時間的鬥爭之後，精疲力竭了，對於政府無法施以有效的壓力。

註一：賤民階級是不列入身份之內的一羣人。印度教本有四身份之區分，第一是「婆羅門」，第二是「刹帝利」，第三是「吠舍」，第四是「首陀羅」。賤民，是有身份之人所不齒的，大家不與之接觸，麥克唐納的選舉區獨立，在甘地看來是把賤民完全與印度教分離，他認為要在印度教之內去提高賤民的身份，誓死反對這一定。

註二：「哈里人」是甘地用以稱呼賤民階級的一個名辭。

二六 長時期徒刑之終了

我出獄之期快要到了。因爲在獄中「行爲良好」，三年徒刑減少了三個月。被釋放的消息，反把我在獄中的平靜心情——或者，無寧說獄中所產生的麻木狀態——打破了。我出獄以後，如何做呢？這種困難問題，把我出獄的高興趕跑了。不過，這到底是暫時的感情，我精力久被壓抑，心中實在迫切地要求出去。

在一九三三年七月的月杪，我得知孫加普他 (J. M. Sen-Gupta) 在獄中病死的消息。鮑斯 (Gubhas Bose) 在獄中，身體也弄得不成樣子。不過，政府准許他到歐洲去醫治去了，這時，老戰士聖特爾也病在歐洲。真的，我們有多少的同事，都在監獄的非人道待遇之下，破壞了身體啊！孫加普他之死，使大家看出這種可怕的無聲的監獄苦難，正在國內各地繼續着。我也感到身體疲倦，心情衰弱。這種情形的發展，其將伊於胡底？不過，我還算好的，身體比他人爲康健。一方面，由我身體的先天結構，本來很好；另一方面，我在獄中，又加意保養，因得免於大難。我的家庭，和一般的斐羅門教徒一樣，是肉食的。但是，自一九二〇年的不合作運動以後，我便已改爲素食。一九二七到歐洲去，曾一度吃肉，歐洲回來，我又改食素了。一直到此次入獄，仍保

持這種習慣。在獄中的時候，我每食不過飽過饑。所以，雖曾有一次小病，結果仍無傷大體。八月初，我正在獄中等待着釋放的時候，甘地喏（此時他已被釋放）又在外面發動不合作運動了。他向政府致送最後通牒，決定八月一日開始行動。正當他向古者拉特的農民們解釋不合作運動的時候，政府又把他逮捕了。又送他到老地方的耶拉吾達監獄中去。判處一年之徒刑。入獄後，他仍要求政府和從前一樣給予他在獄中自由地對哈里人運動給予工作指示，政府不答應，他於是又開始絕食。絕食一週後，身體變壞，政府仍不答應他的要求，也不釋放他，只把他送到醫院中去。他身體已臨絕境，已和朋輩訣別了，並且把一些遺物，分贈各人。可是，政府却不讓他死在他們的手中，當夜把他釋放了。這一來，終於又救活了他。安特烈趕到印度來，終於把甘地喏由死境挽回。

正與此同時，我於八月二十三日從德赫拉東的監獄被轉送到賴力監獄。這時，我母親的病重入院的消息傳來了。我本來應於九月十二日才出獄。這一來，提前了十三天，於八月三十日釋放

了。
我一出獄，馬上便到勒克瑙去看母親的病。並在勒克瑙侍奉母親很久。這次入獄為時甚久。出來之初，覺得世界大變，左右人物，也與前不同了。各種客觀事物，都上前跑了許多路。只有自己給遺留在後面。看見這種情形後，我的第一個反應，是要趕緊使自己適合於這個新環境。可是，第二個反應，却以為自己恐怕在外不久又必須重回獄中，倒也不必急急於使自己適合於一種

即將離開的環境了。

這時，以政治的觀點說來，印度頗爲沉寂。是富有極大的重要性的沉寂。政府在各方面都嚴格控制。任何一種政治活動，尤其在農村里的活動，一發生，馬上便被制止。全國充滿了警察、軍隊和情報組織，公開地也祕密地監視着印度人民。一切曾以不合作運動入獄了又出獄的人們，政府由多方面設法禁止其參加市政工作以及在市立學校任教等。各種機構受到警告，如果任用他們，即停止政府津貼。此事在孟加拉方面，政府甚至頒布法律，不許某些工作機構雇用參加過國民大會的人士，以及一切曾以政治罪判決處刑的人們。

這些時候，正是納粹黨徒在德國大肆猖獗的時候。英國方面的理論，也多起來了，鑿說，如果印度在納粹統治之下，其殘酷又不知要到如何程度。由此觀之，足見英國是多麼民主，多麼客氣的。真的，如果印度在納粹統治之下，其痛苦也許更深。但是，這我難以判斷。一方面也許更痛苦之壓迫，另一面，是已經很痛苦的壓迫。然則，我們被壓迫者唯一的出路，便是非接受其中任一方面不可麼？並且，當時的英國政府，對於印度，其統治手段，究竟與納粹的法西斯手段相差幾何呢？

我此時關心着母親的病，也關心着仍在牀上的甘地咭。很想去看看甘地咭，一方面也有必要和他討論一些政治上的問題。不但對於印度的政治，對於國際的局勢，我也以爲有詳細地加以考慮的必要。但是，母親的病太重，使我無法離開她。

自父親死後，家庭生活作風大變。我自己已經不備用小汽車了。一來因為負擔過重，無法開支；二來這一類的東西，只要一有事故，必須鬥爭，便往往馬上被政府查封去。而我之入獄，總是無可避免的事。雖然我自己已經數度入獄，對於獄中生活，早已萬分厭倦，也不想再去嘗試了。可是，除非我決定完全脫離政治，不然，我和英國政府之間的衝突，總是無法免除的。出獄後不久，自己知道不久於獄外，我的二妹妹克呂惜娜就要結婚，我便主張趕緊準備，免得會有無法參加的情形。這時，克呂惜娜也剛剛出獄不久。

母親的病情稍佳的時候，我就馬上到浦那去看甘地。我和甘地唔不見面以來，已經兩年多，看見甘地唔雖然仍臥病床中，而身體已日益走入好境，我很高興。我們談了很多，有時甚至出於爭辯。不過，甘地唔總是常想盡方法使我得到滿足。而我也盡力不去過分地說到使甘地唔不能接受的話。我們彼此在革命主張上的不同，在於我不以當時國民大會的政策為滿足，總希望國民大會注意到整個社會改革這方面去。甘地唔呢，他不去提到較遠大較原則的問題，他只想計劃着各種局部的、具體的支節行動。關於目下仍未停止的不合作運動，我們兩人均主張繼續。即在十分低潮嚴重的期間，也不停止。同時，我自己則決定把羣衆的注意力吸引到社會主義的理論方面和國際局勢方面去。

在離開浦那回來的途中，我到孟買去玩了幾天。在孟買碰到了許多朋友，差不多都剛從獄中釋放出來。這時的孟買，社會主義運動的空氣很濃厚。大家對於國民大會這幾年來的政治路線，

及國民大會的上層領導者們，尤其是甘地咕，多所批判，對於這些批評，我多半同意。不過，我自己却很明白，在這些政策決定的前後，無論我也好，整個國民大會也好，都經過了長久時期的內心的鬥爭的。同時，我有一種感覺，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對甘地咕的批評，說他反動，由理論上說來，倒也真是無懈可擊。而且，國民大會却也有應受指責之處。但是，甘地咕本人，其實是很知道印度，很了解印度的。年來之所以如此，也確是遵照着實際的需要與可能性後，才決定的。並且，除了國民大會而外，別的進步份子，似亦並無若何具體辦法足以代替國民大會所採取的活動方式。另外一方面，我還深深地感覺到國民大會機構上的不够完全。我以為，國民大會的政策，應該歡迎大家的批評。把自己的路線，建立在客觀的正確批判上。但是，國民大會却無法做到這一步。很多的大事，事實上的確非依靠甘地咕的決定不可。雖然我自己很虛心地聽社會主義者的批評，而對這些批評，却也有着自己的把握。我以為，當時的印度，除孟買，加爾各答等大工業城市的產業工人外，其餘的地方，主要生產者還是農民。印度的社會革命，差不多可說完全是農民問題。科學的馬克斯主義，對於幫助印度革命者去了解國際問題和印度問題，無疑的有着很大的好處。但是，如果機械地應用他，機械地把資本主義國家內的社會主義革命方法盲目地用於印度，恐怕也不合用。因此，當時社會主義者指責國民大會的缺點，我是同意的。不過，他們有很多地方，都純粹由工人為主體的立場而出發，在殖民地的印度，是否正確呢？我却懷疑着。

二七 獨立乎？自治領乎？

當我到浦那去看甘地咭的時候，曾陪伴他到印度服務社去過一次。社中一些人員，問甘地咭很多政治問題，他都一一答覆。不過，他們所問的都是一些無關重要的問題。他們問及甘地咭前次拜謁總督而總督竟毅然謝絕等問題。印度服務社的很多份子，是自由黨（即溫和派）的骨幹，當然是活動於政治界的人們。然而，在印度正激烈地鬥爭着的今日，無數的政治組織被認為非法團體，農村破產與工業不景氣產生了無數的失業羣衆，在孟加拉，邊區省等地，有很多慘案發生。集會、出版、言論、等自由，被殘酷地摧殘着。此外，還有着很多本國的及國際的其他重大問題。然而，當此之時，他們所向甘地咭提出的，却是這些瑣碎的事體。

我覺得，自己好像走入了一個修道院中，其中居民，早已不知現代社會正發生些什麼事。然而，他們還正是一些活躍於政治界的人物呢。

一般地說來，由於問題之如何提出，可以測驗出一國的政治發展情形爲如何。革命之失敗，往往亦由於問題之未能正確地提出之故。我們過去斤斤於對政治作各種小問題之討論，足以表示出國民大會之落後性。同樣，由自由黨人當日對甘地咭提出的這些問題，也可以想見印度服務社

的活動，其實際究竟如何了。

印度的自由黨，其實並不如名稱所示的那樣好聽，是很容易被人誤會的。自由黨究竟本質上是什麼樣，很難說。因為，他們並無一定不易的立場。人數雖少，却往往彼此衝突。他們在這個社會裏面到處看出錯誤，在在設法避免錯誤。想藉此方法尋出真理。真理，在他們看來，是存在於兩極端之間的。凡遇着他們認為過激的事體，便大加批評，以示自己之穩重。

溫和與保守以及對於危險和突變之事的力求避免，本是老年人的特性。可是，印度的社會已在大大轉變之中，而溫和派諸公，却不計及此。他們本是代表一部份生活優裕的人士。如果說「印度獨立」，他們也可以贊成，也可以靜候。但是，對於任何一種徹底的革新，便誓死反對。在這種反對的工作上，他們却絕對不溫和。所以，自由黨，在最後，他們非接受英國政府的觀點不可。

其實，自由黨與國民大會，其間的區別，實不在於態度之溫和與否。國民大會人士之中，亦多溫和之流。所以，一般的國民大會人士與一般的自由黨人，其間區別雖大，仍然沒有很明顯的分界線。自由黨的較前進的份子，和國民大會的落伍份子比較起來，其勇敢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由於甘地咕之領導，一切國民大會的份子，都未與現實工作脫離，都與國人保持着接觸，而自由黨則反是。因此，前者趨向實際，而後者則日趨空虛。

在過去十七年之間，成爲影響國民大會之政策的人物，差不多都是由中產階級出身。無論自

由黨和國民大會，其份子都最屬於同一的中產階級層。也在同一的環境中生長發展。其社交生活等等，無一不同。由意識上說，彼此相似。只在氣質上或心理上略有差異。彼此之間的分野，或者也就由此開始。結果，一部份傾向於政府以及中產階級之上層，另一部份傾向於中產階級之下層。後者的後面，還有一部份失業的知識份子以及由其他較低下的社會組織中出來的人們跟隨着。由於這種發展的結果，溫和份子爲求安全，退而隱居。但是，在國民大會中，最初仍充滿着上層階級的氣色，後來才漸漸是中產階級的下層份子佔優勢，相當地和農民發生連繫。自此而後，便越來越接近農民，自由黨與國民大會之間的鴻溝，也就越來越深。自由黨人是無法了解這些下層份子在政治上的各種活動的。其實，在最後的分析上，雙方的意識形態還是民族主義的，是布爾喬亞的，彼此之相差，是程度上的問題，而不是性質上的問題。

在自由黨看來，印度的問題，只是改變目下行政顏色的問題。或者，至多是換一個新的行政組織而已。他們是不會想到另外建立一個新國家的。他們是喜歡「斯瓦拉吉」的。不過，在他們看來，所謂「斯瓦拉吉」者，是一切既存機構之繼續，所不同者，是在這新環境中，其主宰者爲他們自己。他們代替了現在英國人所佔的地位，其餘則一律如舊。由本質上說，他們所希望的，是現狀維持而人事調動。欲達到這種目的，他們的方法是靠英國的好意。所以，他們的政治活動，是以大英帝國之繼續存在爲基礎。他們把大英帝國認爲是不可動搖的。只企圖把自己適合於大英帝國的政治的以及經濟的意識形態，甚至於道德標準。而這種意識形態和道德標準，是確保大

英帝國之永存不垂的要素。

至於國民大會，其主張則有根本上的相異。國民大會要求的，是一個新國家之出現，而非行政之更變而已。至於這一個新國家將以何種姿態出現，也許目下仍無明顯計劃，而意見也許仍多不同，但是，在國民大會人士之中，有一種共同立場是很明顯的。這種共同的立場，即主張必須掃除既存機構，作基本的改革。這裏，就是「自治領」與「獨立」間的不同。前者是保存着現狀，外表獨立而實際上有形地或無形地被大英帝國所束縛，而後者，是獲得一切真正的自由。

印度問題，既不能依靠英國人的好意而解決，印度革命運動之發生也決非印度人對英國人在感情上不睦所致。我現在是坐在英國監獄之內撰寫此書。過去數月之內，我也曾飽受各種苦惱，也會遭受各種痛心之事。然而，我仔細地檢討我自己的情感，實在毫無反對英國或英國人的因素存在其間。我痛恨大英帝國的帝國主義政策，痛恨英國統治階級之壓迫印度。但是，我却從不想到要全體英國人負此責任。甚至即使我果作如是想，其結果亦無不同，因為，向全體英國民族大發脾氣，或者，向他們唾罵，是頗為愚笨的事。其實，他們也正和我們一樣，是環境的俘虜。以我本人而論，我的學校教育，差不多完全是在英國受的，在養成人格上說，英國的意識形態是佔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的。我實在應該感謝，我因為受了很多先入觀念的影響，態度往往是袒護英國及英國人的。在很多一般的問題上，我的觀點，多與英國人相同。然而，這一切却絲毫沒有能力阻止我對英帝國主義的反抗。所以，印度問題實與英印人民之感情無關。印度人反抗的，並非

國的統治而決非英國或英國人民。我以為，印度人應該盡可能地與英國人和其他外國人接觸。印度因年老而力衰，應該向外面去吸收一點有益於印度的空氣。不過，如果英人以虎狼之勢前來，印度人當然不能和他們交好。現在，事實上，印度人是拚死命地與一只老虎鬥爭。真老虎是可以設法教馴的，可是，帝國主義却不是可以教馴的東西，必須出以死鬥的方法而後可。英帝國主義和自由印度，是絕不可調和的東西，無論用武力也好，用糖菓也好，總無法在兩者之間誘致調和。必須英國的帝國主義，整個地在印度消滅，才能產生一種英印合作的背景。

自由黨和各色各樣的和平主義者們以及英國的所謂社會主義者們，都唱着一種好聽的高調。他們對我們說，爭取獨立，是一條很窄狹的道路。因為，現在的國際局勢，是越來越發展為彼此有關彼此依靠的情形了。如果自己獨立，豈非倒開鐘錶麼？但是，這些先生們的結論如何呢？他們說，印度要過這種互助互賴的生活，必須與大英帝國並在一塊。

我不知道印度獲得自由之後，其情形將為何如？亦不知彼時的印度，將作何事？不過，我却知道，印度主張民族獨立的人們，亦必主張與國際作擴大的合作。我們今日要求獨立，並非要求孤立，相反，我們却和別的國家一樣願意犧牲此獨立之一部份，加入一種國際秩序。只有帝國主義的體系，才和我們願意加入的這一種國際秩序相敵對。如果我們希望通過這種帝國主義的體系而達到國際的合作、世界和平的目標，那全是夢想。最近的發展，可證明帝國主義的體系，正以獨霸的經濟的帝國主義政策把自己由其他部份孤立起來。我們所看見的，不是一種國際主義之發

展，而是相反的情形。這種原因，不難尋出。這是表示現存的經濟體系之日趨衰頹。結果所屆，他一方面和他所獨佔的區域作更大的合作；另一方面，也即是與此外其他部份的分離。我們印度早已成爲英國工業的隨從者，緊緊地跟着他走。和英國以外的國家，都斷絕了關係。此種情形，除開目下所產生的壞結果不談，將來的發展，亦必非國際的接觸，而是自己的孤立。這種自治領的地位，於印度有何益處呢？

我們印度目下的問題，是：我們要一個新的國家嗎？或者，只想換一個新的行政形式？自由黨人的答案，十分明顯，他們要的是後者，決不多一分一厘。自由黨的人士，他們全不去考慮此外的問題。他們只希望行政上的變動，不希望新國家之出現。他們以爲，要達此目的，必不可出以直接的方法，或者，出以其他別的任何進攻姿態。唯一的方法，是向英國政府表示我們有着能力和經驗，態度亦復穩重，足以治理印度。他們以爲，如果自己的行爲好，工作好，英國政府必可讓與權力。換句話說，就是以爲英國之所以不贊成印度之獲得自由。要末，是由於印度人所採取的進攻姿態所惹起的憤怒，要末，由於英國人對印度人的能力懷疑。或者，兩個原因都有。這種對帝國主義政策之分析，是頗爲荒謬的。

在每一個民主國家之內，關於澈底的經濟方面的改革，究竟是否可以以一般的方法，通過憲法機構而予以解決，這樣的爭論，是時常發生的。有人認爲可以，有的以爲不行，必須另外採行非常的革命手段。這問題在我們印度，照我看來，我們根本沒有由憲法的手段以達到吾人所期之

目的的可能。在印度，除革命和非法手段而外，別無他路。在印度，今日之情形，尤爲非常。英國政府對於任何足以危及本身利益的活動，都予以禁止。那末，我們如何幹呢？除非停止一切活動，不然就一定和政府衝突。然而，停止活動，却是我們絕不能採取的辦法。

所以，撤回文明抵抗運動，自然是自由黨人所歡迎的事。在我們國民大會實行不合作運動的時候，自由黨人在旁邊說風涼話。當政府以高壓手段壓迫我們的時候，他們說：「我們不是說過了嗎？誰叫你們一定要做下去呢？」這真是一種奇怪的論調。我們站立起來，從事一種鬥爭，接着，被對方打倒了；這時，別人向我們說：「站着便是一樁不應該的事。在地上爬來爬去，最好，也最安全。在地上爬行之時，無人可以把你打倒，也不會由這地平面落將下了。」

二八 印度之今昔

印度民族主義之痛恨異族統治，乃自然而不可免的事。然而，奇怪的是在十九世紀末葉的時候，我們很多的知識份子，自覺地或非自覺地都接受了英帝國的意識形態。他們在這種意識形態之上，建立他們的理論。對於牠的批評，只及於外表方面的某些地方。在學校或大學中所用的歷史和經濟方面的教本，都是以英帝國的意識形態為基礎而寫成的。其中強調我們的弱點和英國的優點。我們在相當的程度上接受了這一種歪曲的理論，甚至於當我們本能地反對牠的時候，同時就受了牠的影響。最初，我們因為沒有其他的理論和事實，我們無法逃出牠的範圍。因此，在失望之餘，我們只好到宗教的民族思想中去找尋安慰。因為，我們想，至少，在宗教和哲學的領域以內，我們該不亞於其他民族了。我們在不幸與衰亡的命運中，以一種理論來安慰我們自己，是這理論：相信我們雖無歐洲那種外表上的光華燦爛的東西，在內部說，我們却有着一種東西，更為寶貴，更有價值。很多哲學家們對於我們古老哲學發生趣味，使我們恢復我們的自尊之心，使我們會以過去的歷史作為自傲的材料。

後來我們漸漸地懷疑起英國人對我們的過去以及現在的各種說法了。然而，即使是這時，我

們也還在英國的意識形態的圈子裏思考和行動。如果有什麼東西不好，我們說，這是「非英國的」。如果英國人在印度行爲不正，我們說：這是他個人的問題，並非整個制度之罪。但是，英國統治的各種實際材料，終於漸漸使我們養成了民族主義的思想，很多作者如郝德（Romea Dutt）之等人所著的書，更助長了這種民族主義思想之發展。

雖然一方面我們對英國的各種歪曲理論予以反擊，然而，我們終于還在他們的意識形態的範圍以內。這是二十世紀初印度民族主義思想的一般情形。就是自由黨人及國民大會中的溫和人士的立場，現在也仍然如此。他們雖然時時因感情之衝動而前進着，基本上說，他們還停留在十九世紀之內。即以此故，自由黨人便無法把握印度自由的真義。因爲，二者之間，在基本上是不相調和的。他們以爲他們可能一步一步地向上走。既存的政府機構仍可順利地工作。而英國的軍隊，可以作他們自己的保護人。這就是在英帝國範圍以內的自治領地位。國民大會，尤其是另外一些進步組織的看法，却不同。他們以爲，英國軍隊之由印度完全撤退，乃印度自由的初步。

十九世紀，印度知識份子之向英國的意識形態屈服，並非不可理解之事。所可驚奇者，乃經過二十世紀的大騷動大變革以後，有一些人，竟仍沉醉在這種幻想之中一事。在十九世紀，英國乃全世界的主宰，有着財富，有着力量。他們以爲他們是天之驕子，他們的帝國乃地上之天堂。如果他們這種特殊地位被承認，那就很好；如果有誰否認牠，攻擊牠，這就等於違反天命。

如果說這是英國對世界其他部分的一般態度，則此種態度以在印度爲尤甚。他們對印度人，

有如主人之於僕人。所以，我們越能接受英國的理想目的，我們越適於有一個「自治」的政府。只要我們能够表示，保證我們能依照英國的意思而使用「自由」，則我們即可以獲得「自由」。

我想，英國人和印度人，對於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歷史，其看法是彼此大不相同的。這也許是很自然而不足驚奇的事。但是，如果英國的高級官員，對印度的過去與現在，作種種毫無事實根據的妄談，確是令人吃驚的。英國人，除了一些專家而外，對印度之不了解，可謂到荒謬絕倫的一步。英國把印度攪到手，據之爲己有後，一切完事，他們從未了解印度，也從不曾設法去了解她。英國人的眼睛，看着別的地方，而印度的呢，則因受辱而下垂。因此之故，我們經幾世的接觸，彼此的面孔都很熟習了，然而，還是陌生之客，一個恨一個。

印度目下雖歷盡滄桑，此時一弱至此，然而，她仍保留着她靈魂的尊嚴。並未墮落到不可救藥的一步。印度已經走過了一條很長很長的旅途，在途中拾取了很多智慧。在這個旅程當中，她雖歷盡艱險，飽受坎坷。然而，她終於未拋棄她的古老文化，她仍不斷地由她的文化之中，吸取力量，而與其他的人共同享受。她時而上昇，時而下降。既曾想高入天堂，以窺其祕密，也會低及地獄。在她的可悲的迷信空氣之中，她卻從未失掉她的求真的智慧。猶如今日千百萬印度人在禱告之時所唸着的一般，她是日日在要求：「由不真之境地，導我於真之境地，由黑暗，導我於光明，由死，導我於生。」

雖然在政治上她時常給外力擊破，而精神上却仍永遠有着一種統一。她就好像其他的古老國

家一樣，有其好處亦有其壞處。但是，好處埋沒着，壞處也尙待尋覓。每當衰亡之際，壞處乃得一一出現。在意大利與印度之間，有着很多相同之點，兩者都是富有歷史的文化傳統的國家。不過，由歷史之悠久說，意大利比起印度來，略爲年青，而由國土的幅員說，則印度也較意大利爲廣大。除此而外，兩者都會在政治上給外力擊破，而兩者當此之時，其精神均未死亡，終能保持精神上的統一。不過，意大利的統一，是所謂「羅馬的統一」。因爲，羅馬在意大利，是突出的大城市。因此，可成爲統一之中心。而印度則缺乏這樣的中心。印度的文化，遍於全國，因此，無一特殊地點可稱爲文化中心。自東至西，自南至北，觀念大抵一致。如果某一個地方有着觀念上的衝突，則其聲音亦將傳至遼遠的各地。恰如意大利之把羅馬文化傳播於歐洲一般，印度也把印度文化傳播於東方的亞洲。不過，亞洲的中國却也與印度一般老大，一般令人尊敬。梅特涅 (Metternich) 會把意大利認爲只是一個「地理上的名詞」。很多未來的梅特涅也把印度如此看法。把英國比之於奧國，尤爲有趣。二十世紀的英國，不是和十九世紀的奧國一般無二嗎？一樣地高傲，一樣地厲害，然而，一樣地在根本上漸漸動搖，日趨衰微。

今日的印度，變成了 Bharat Mata (印度母親)，是一位美麗的太太，年紀雖大而外貌十分年青。她現在被異族殘酷地待遇着，乃大聲呼喚，要她的兒女們前來救她。於是成千累萬的印度男女，爲情感所動，不辭任何犧牲，一致起而救之。印度今日正以其古老之文化與英帝國的文化鬥奮。當然，印度的古老文化將敵不過英國的近代文化。因爲，這種近代文化帶來了科學，科學

又替千萬人民帶來了食物。不過，牠同時也帶來了別的一點東西，即社會主義的理想，合作的理想以及爲公共利益而服務的理想。

老的印度，變成了新的印度。新的印度，將披上新裝，因爲她的舊衣服已經破碎了。她的新裝，將要是既適用於目下的環境，亦符合於她自己的古老思想。因此，她所採取的理想，當是她本國上的土產。

二九 英國統治印度之功過

英國統治印度的功績如何？我想無論英國人也好，印度人也好，想就此問題作一客觀而無感情作用的觀察，怕都是不可能的。有人曾經告訴我們，說，「英國曾經把印度經歷數世紀之努力而仍未得到的東西給予印度：一個權力遍及全部半島的政府；」牠曾建立了一個法治的，有效力的行政系統；牠曾把歐洲的議院政治以及個人身體自由等等概念帶給印度；並且「藉印度之統一，使印度人中，產生一種政治統一的感覺。」而因此養育了民族主義思想之幼芽「註一」。這些都是英國方面的說話。這之中，確有很多是事實，不過，我們對於所謂「法治」和「個人身體自由」之類的東西，已經久違多年罷了。

在印度人方面，則所強調的又是另外一些因素。常時指出異族統治替我們攜來的物質方面與精神方面的創傷。彼此觀點之不同，往往英國人引以居功的東西，恰是印度人痛罵的東西。像古姆拉斯瓦梅博士（Dr. Ananta Coomaraswamy）所寫的：「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最明顯的特點之一，是：最給予印度人以創傷的東西，在外表上，都是很幸福的。」

實事上，過去一世紀以來在印度所發生的變化，其實是世界性的變化，東方西方一樣地發生

的。在西歐，後來在世界其他部份所產生的產業革命，帶來了民族主義的思想，也帶來了統一的民族國家的欲望。英國人首先打開印度的門戶，使之與歐洲的產業革命發生關係，這一點誠可引以為功。然而，如此做了之後，英國却回頭來阻止印度的產業，不許作更進一步的發展了。印度老早是兩種文化的交會地，其一是西亞細亞的回教文化；其二，是東方的自己的文化。現在，由西歐來了第三種文化。於是，印度成爲各種新舊觀念的戰場了。不消說，西歐來的新文化戰勝一切，因而也解決了印度的一些老問題。但是，協助印度，把牠們帶來的英國，却從此設法阻止這種文化之進一步的發展。他們阻止了我們經濟方面的發展，因而阻止了我們在政治方面的發展。同時，却又保留了很多封建力量。所以，布爾喬亞泥之在印度產生，並非由於英人之好意與協助。不過，他們既然輸入了鐵路以及其他工業產物以後，他們就無法使牠們停止發展。他們只能妨礙牠，使牠遲緩一點而已。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自東印度公司於一八五八年，把印度全部領土獻奉英王以來，印度在教育方面及物質方面的進步，遠較其若干年來之努力所獲者爲多」〔註二〕。退一步說，就算這話說得不錯，但是，這是以現在的產業時代與往昔互相比擬。因爲有了產業革命和科學之故，差不多任何一國家都已經有了這種教育方面與物質方面的進步了。而且，都可說是「遠較其若干年來之努力所獲者爲多」的。難道在產業時代之今日，沒有英國的統治，我們便不能得到這種進步嗎？而且，當我們把自己和別的國家互相比較後，我們還想，如果我們沒有遇到英國的居心阻止

，我們的進步不更快麼？鐵路，電報，電話，無線電之類的東西，不能就算是英國統治的好意與慈悲。這些東西在我們是必要的，我們也歡迎牠們，碰巧英國第一個把牠們帶來給我們，我們應該謝謝英國人。但是，即使這一點點功勞，其動機也不過是爲了鞏固他自己的統治，替英國貨尋找市場而已。我對於工業化和最近發展的交通，是歡迎的，然而，每當我旅行時，橫跨印度平原之際，我覺得這些東西好像鐵鍊一樣，緊緊地鎖住印度。

英國統治印度的觀念，是一種國家警察的監督觀念。他們的財政，其用途在軍隊、警察、內部行政、放債利益等等，人民的經濟要求並未予以考慮，並且要使我們爲英國的投資利益而犧牲。人民的文化需要完全被忽視。在別國所有的工人疾病保險，公共衛生，社會教育之類的用途，政府完全不予考慮。

英國統治的特點，在於集中力量於那些足以增強其對印度的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的統治的一切事務，其餘的事體便一概不管。所以，即使他們果然建立了一個有效力的行政系統，其利益是他們的，印度人殊不必引以自慶，不必沾沾自喜。國家統一好的，可是統一起來成爲他人之奴隸，被他人所控制，似亦不甚可賀。英國在印度的優勢，果然造成了印度的和平。我們確實也需要和平，尤其自蒙哥爾王朝以來，連年變亂，真的是希望着和平的。然而，我們所得到的和平，是墳墓里的、籠欄中的、監獄內的和平。是盜賊去後的園中的平靜。外族征服者帶來的和平，往往不是眞物而是贗貨。

英國人給我們以政治的統一，這是大可喜的一件好東西；不過，不管我們有沒有這種統一，只要印度的民族主義思想一經發生，這種統一，我們自己會要求的。印度的統一，其實是英帝國發展進程中無意地產生的一種副產物。後來，當着這種統一和我們的民族主義思想連成一氣的時候，他們却設法來破壞我們的統一了。

自從英國在印度稱雄以來，於今已一世紀又四分之三的時候了。他們有着極大的自由足以把印度照着他自己的模型而改造。在這些年月里，世界已經大變。美洲經過奮鬥之後，目下成了最富的獨立國家了。蘇聯昨日還在沙皇手中，今日已成爲自由的土地，在我們的眼前建立起新的世界來了。在印度呢，也有着大的變動，印度確實與十八世紀時大不相同了——鐵路，工廠，大學以及龐大的政府……等等。然而，雖然有着很大的變動而印度實況究竟如何呢？她是一塊不能自由呼吸的土地，她的統治者是由很遠很遠的地方前來的陌生人；她的人民困窮無比：短命，無力抵抗疾病，文盲到處都是；各地均缺乏衛生設備與醫藥設備；失業之人，所在皆有。我們在他國內聽到有救濟失業的計劃，我們千百萬的失業之人到何處去好呢？我們也聽到別國有居住計劃，我們千百萬無家可歸的人們，到那兒去好呢？別的國家有教育，有衛生設備，有醫藥救濟，有文化，而生產事業大步地邁進，我們能不羨慕嗎？蘇聯以十餘年的努力，差不多完全剷除了文盲，建立了一個合時代的教育制度了。落後的土耳其，在凱末耳的領導之下，也得到驚人的進步了。

人們常時責備我們，說，印度人說得太多，做得太少。英國人呢，不少的委員會，做了不少的報告，結果擺在辦公桌上完事，然而，印度却依然故我。他們的努力，到是大可佩服的。別的國家討論如何上前邁進，在印度所討論的，是如何制止前進，不然，我們便走得太快了。

當然，把印度的一切罪過都拋在英人身上，這是完全不對的。這種責任應該放在我們的肩膀上，我們也不能規避他，不能把自己的缺點所產生的結果，歸罪於他人。

人們告訴我們說，英國人如果離開印度，則印度馬上陷於混亂。我想，這種說法，不無真理。如果各機關的英籍長官忽然之間把他們的職責放棄，而交與他的下屬，則該機關的效能一定馬上便下降。但，其所以如此者，乃由於整個制度之構成，本來如此，下屬多半並非具有能力之人，而且，他們從來不會有權肩上責任。我相信，印度實在有大好的人材存在，只要存心招攬，則在短時期內，亦可網羅而來。不過，如果這樣，那就是說，我們的政府及社會，都要有一種完全的革新。這就是一個新國家出現了。

然而，事實上呢，不管我們將在憲法上作着何之改革，而老的行政大樞子却永不去掉。在英帝國的這些機構之中，最最突出，最最重要的，是文官部，英國在印度的政權的功過，差不多都可以歸之於牠。牠在政府的權力，差不多是絕對的，只在理論上向英國國會負責。他們中的成員，都是無法應付印度所發生的變動的。他們完全不能了解印度的現實。大戰以後，全世界的變動，尤其在經濟方面的變動，在他們看來是無足輕重的。他們沒有發覺他們自己所代表的秩序，是

一種業已過時的東西，不適用於現代環境。

然而，這一個秩序却仍舊繼續下去，只要英帝國主義存在一日，牠必將存在一日，而且，牠現在還有相當的力量，保持牠這種存在。現在，英國在印度的政府，好像一個出牙，已經被蟲所蝕，漸漸潰爛了。但是，它却強有力地依附在牙床之上，不易脫落。有着這個蟲牙，十分痛苦，然而，要把它拔掉，却不容易。如果這個蟲牙不拔，或者，牠不會自潰以至於完全消失，則此種痛苦，勢將繼續下去。

印度的人口，雖然在大災荒之下，在最高的死亡率之下，仍然不斷地增加。對於此種人口之增殖，人們是提倡着生育的節制。關於生育節制的知識與方法的傳播，我是很贊成的。但是，使用這種方法，本身便需要一個更高的羣衆生活標準。在目前的印度環境之下，生育節制是完全不可能的。再則，今日遍佈於全世界的問題，其實不是缺乏食物或缺乏其他生活必需品的問題，而是缺乏此種食物的購買力的問題。甚至以印度而論，食物也是增長着，而且還繼續地增長着的。以人口之需要爲比例，只會多而不會不夠的。

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印度一經獲得自由，她便需要無數的印度兒女爲她服務。好的人才，往往是不易得到的。尤其在我們印度，因爲在英國的統治之下，缺乏發展機會，尤爲難於發見。將來我們必然在很多部門上，尤其是需要技術的部門上，需要外國專家的協助。這之中，很多目下在文官都爲英帝國服務的人們，亦將受到吾人之歡迎，此乃當然之事。不過，有一點我却敢事先

斷定，我們的新秩序，如果仍然有着目下的文官部的那種精神和觀念存在，則此種秩序即無法建立。這種精神，或將粉碎吾人之自由，或將爲吾人所粉碎，其唯一能存在的環境，惟有法西斯帝式的政體。

至於講到印度政府中的國防部 (Defense Services)，我們幾乎無話可說，無法批評。因爲，關於牠，我們知道什麼呢？什麼也無從知道。我們只能日日納稅，別的無法問及。一九三四年的時候，印度軍總司令菲立僕爵士 (Sir Philip Chetwode) 曾經在演說中對我們說過了。我們應該管自己的事去，不要去干涉他的工作。

我們曾經聽說過，英國正在準備推進軍隊之「印度化」的工作，又說，大約三十年或更多數年之後，一支有力的「印度化」的軍隊，必將出現。也許，不上一百年，這個「印度化」，會有相當可觀的成績罷。不過，講到此地，容易使我們想起，爲什麼當危機之時，英國便能够在二二年之內組織數百萬的有力量隊伍呢？也容易使我們想起，蘇聯的軍隊，差不多是無中生有，他們毫無基礎，並且在列強的包圍之下，建立了現代在全世界號稱強大的一支陸軍。

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其功績爲何如呢？一言以蔽之，對於英國人，第一個使我們接近科學以及科學所產生的一切文明，這，我們應該感謝他們。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一事實，我們也不可忘記，即英國在印度，同時也努力地鼓勵着蒙昧主義的，反動的，宗派主義的，以及機會主義的各種因素之生長。不過，這對於我們，也許是必要的罷。在印度新生之前，她必須受到各種各樣

的試驗，她要走過一道大火，這大火將掃清、改變和焚燬一切弱點、污穢和腐敗。

註一：以上所引，均來自一九三四年的「印度憲法改革聯合議院委員會報告書」(Report

of The Joint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on Indian Constitutional Reform.)

三〇 克呂惜娜的革命婚禮

一九三三年九月中，在浦那和孟買勾留了大約一星期之後，我回到勒克瑙去。這時，我的母親仍在勒克瑙的醫院中。不過，身體却漸漸地復原了。茄夢娜自己的身體雖然還不十分好，却也到勒克瑙來，想侍候母親。我的兩位妹妹，也常由阿拉哈巴德來看母親的病。

在勒克瑙勾留了二三星期，在這時期內，我每天到醫院去二次，其餘很多剩下的時間，都用來替各報章雜誌寫文章。我的文章在很多地方發表。在這些文章之中，有很多篇是連貫一氣的短文，總題目爲「印度到那兒去？」最引人注意。我在這些短文之中，檢討那些和我們印度有關的國際局勢。這些文章，後來在德赫蘭 (Teheran) 和喀布爾 (Kabul) 都被譯成波斯文發表過。這些文章的內容，在時常和國際局勢接觸的人們看來，本非新奇。但是，當年的印度人士，因爲年來都埋頭於自己國內的事體，不管國外變得如何，這些文章，對於他們，確實發生了很大的作用，使他們的眼界因此廣大一點。

後來，母親已疲倦於醫院生活，我們便決定把她送回阿拉哈巴德去。除此而外，還有一個原因，卽妹妹克呂惜娜，既早已訂婚，家庭都希望能夠趕快結婚。因此，便回到阿拉哈巴德去籌備

• 再者，當時的不合作運動，仍是國民大會綱領之一。而國民大會此時又還是非法團體，則我之被捕入獄，其可能性甚大。因此之故，我也希望能在入獄之前，得參加妹妹的婚禮。

結婚典禮，定於十月在阿拉哈巴德舉行。這一次的婚禮，事體雖小，却有三方面的革命。第一，克呂惜娜是和一位婆羅門教徒結婚，打破了我們喀什米爾婆羅門不與外族結縭的自封俗習。這種不同身份 (Caste) 的結婚，在當時的印度法律之下，不得出以宗教儀式。幸好，當時正有一種文明結婚法 (Civil Marriage Act) 剛剛頒布。我們便遵照文明結婚法舉行典禮。第二，我們的家庭，本來就很富裕，在印度，對於婚禮的鋪張，又可說是極其能事。在這種素主以奢侈方式舉行結婚典禮的環境當中，我們却主張免除一切鋪張。當時的主要理由，是認為不合作運動仍在進行之中，大批同志仍被困於內，當此之時而來對結婚典禮大事鋪張，未免不對。第三，請客帖子，在我的堅持之下，係以印度土話拉丁化的形式書發。此舉連甘地咕也大不贊成。不過，當時我之主張使用這種形式，也並不一定是因為我已經十分相信這一種改革，然而，「拉丁化」之引起我的注意，却已很久。牠在土耳其和中亞細亞的成功，給我以很深的印象。而當時各地主張「拉丁化」的理論，亦甚堪重視。我想身處斯坦尼話「註一」，也可以由這方面形成一個新的大眾文章形式，使大眾教育，易於收效。即使如此，我當年仍然尚未完全相信牠，即使我完全相信，我也知道牠無法於今日之印度實現。各種集團，各種組織，民族主義的，宗教的，印度教的，回教的，總之，一切新老勢力，勢必強烈地予以攻擊反對。同時，我也想，這種反對，也並非完全

出自感情。對於任何一種有着豐富歷史的語文，字體之改變，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因為，字體差不多成爲一種語文的文學之一部分了。

身壽斯坦尼話之行將成爲印度的一種共同語言，我一點也不懷疑。真灼，目下的身壽斯坦尼話，在日常應用上，已經十分廣泛了。不過，他的進步，實在因爲有很多人對於字體方面的改革作盲目而愚笨的反對，因而大受阻礙。

有些人認爲英文可能成爲印度的一般語文，在我看來，這似乎是一種怪誕的想法。我以為，英文只能在少數上層知識份子之間流行，無法遍於大眾，牠與大眾之教育和大眾之文化無緣。英文，可能在技術的，科學的以及商業交通的領域內起相當大的作用，因此之故，我們印度人，應該設法學習此種有用之語言。但是，決不可把牠認爲是唯一應學的東西。此外如法文，德文，俄文，西班牙文以及意大利文等等，也都需要學習的。如果特別強調英文乃印度人所必修，這又是英國式的意識形態之應用。我們常以英國式的意識形態爲基礎而觀察一切，所受的害處，實已不少。此後決不可再蹈覆轍。而印度話拉丁化如果在我們的革命發展上有推動的作用，我們是不應該反對而應該提倡的。

正在克呂惜娜的婚禮舉行前後，配特爾 (Vallabhbhai J. Patel) 在歐洲病死的消息傳來。配特爾本是因爲病重之故，才由政府特許釋放出獄，到歐洲去醫治的。他的死信，使我甚爲傷心。因爲，他是我們的一位老戰士。死後，大家爭頌他生前的功勞，但是，大家所強調的，差不多都

是說他充在議院主席的成功，說他是一位很好的議院政治家。這種頌揚，是一點也不錯的；不過，單單重覆地述說着這一點，却頗使我覺得不快。這樣的議院政治家，我們印度有的是，不是嗎？配特爾之偉大，還略多於此。他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參加印度的實際革命鬥爭，爭取印度之自由。他會是我們印度的一位不可征服的革命戰士。而追悼他的人們，却單單忘記了他的這一面。

十一月里，我到貝拿勒斯城 (Benares) 去，被那兒的印度大學，請去演講。當時開會的主席，為大學附監督馬拉維亞先生。我在講演之時，抨擊印度大乘會 (Hindu Mahasabha) 的分區自治的活動。抨擊印度教的分區自治主義者的反動行爲。馬拉維亞咕，是大乘會的主要人物之一，我竟在他所主持的大會上抨擊大乘會，似乎是很不近人情的。不過，我當時並未想到這一點，因為，我當時以為馬拉維亞，在事實上，那時已經和大乘會無甚關係的了。

這一次講演，引起了很大的風波。大乘會的領袖們，都一致向我攻擊。不過，他們所攻擊的處所，大都偏於私人方面的事體，並無中肯之論。我本來不想捲入一種無意義的辯論之中，但也想趁此機會說明分區自治派的真相。於是，寫了一篇很客觀的文章，指出印度教和回教中的分區自治主義者們，其實並非真正在主張分區自治，他們不過使用這種假面具，掩蓋他們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反動而已。我當時主要是指出分區自治派的領袖們，和印度以及英國的很多反動分子，聯合一致，阻止印度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進步。他們的一切要求，完全與羣衆無關。

這篇文章，在印度民衆當中，發生了很大的作用。我本計劃再繼續對這個反動活動，作理論上的攻擊，使其真面目呈現於大衆之前。可是，後來不久，又被捕入獄，無法從事此項鬥爭，只好終止了。

註一：即印度最通行的土話

三二 分區自治主義者的真面目

自從一八五七年的大暴動以來，英國關於運用分區自治這一問題的政策，由基本上說，是在於竭力阻止印度教與回教之一致行動，更從而驅使他們，使其互相鬥爭。自一八五七年以後，英國的鐵手，是多傾向於放在回教徒的頭上的。他們認為回教徒有勇好兵，對於英國統治又常表示不滿，對於英國式的教育，回教徒又往往敬而遠之，在英國政府機構里面做事的人也很少。似此情形，是十分不可靠的。

後來，民族主義的思想，漸漸在能說英語的上層階級的知識分子羣中發生了。這種思想，自然只在印度教徒的範圍以內發生，因為回教徒在文化上是較為落後的。英國在這個時候，便多方設法，務使回教徒遠離民族主義的思想。許德·阿馬德·汗爵士 (Sir Syed Ahmad Khan) 在這一企圖上，大大地幫忙了英國政府。在和他同時代的人們之中，英國政府最器重的是他，他也最贊成英國政府，一八六九年到歐洲去遊歷時，他寫信回家說：「一切在人類身上能發見的好東西，是上帝特別賦予歐洲人尤其是英國人的。」他深信，如果沒有西方的教育，回教徒社會，會還要退後，還要無力的。受英國的教育，也就等於得到職位，安全，勢力，光榮。他竭力使他的同

教徒全體，都跟着他作如是想。在印度教徒的布爾喬亞中，所產生的民族主義思想，當然和他的想法背道而馳。他便決心反對這種思想。這一來，英國政府對他當然是歡迎之不暇了。

不過，許德爵士竭力把英國教育介紹給回教社會，其結果不無好處。如果沒有這種影響，在後來形成印度的新型的民族主義思想之時，也許回教徒仍不能參與。他們也許會永遠在政治上趕不上印度教徒的。許德爵士的阿里加爾學院 (Aligarh College)，在回教徒中，確也造就了很多人材。這個學院充滿了封建思想，畢業學生，大都專心致志於能為英國服務；但是，同時，牠也把一般的學問基礎，介紹給回教徒的青年們了。

到二十世紀之初，英國政府竭力擴大回教徒與民族主義之思想中間的鴻溝時，印度的回教徒，還未能完全脫離許德爵士所給他們的不良影響。一直到一九一五年之時，回教徒的知識分子，才終於打破了各種鐐铐，與國民大會一致行動。十年之內，回教徒甚至超越了印度教徒而實際地領導國民大會的民族運動。

然而，回教徒之走向民族主義，確是不容易的。阿加可汗 (Aga Khan) 之成為他們的領袖，就足以證明他們仍在封建思想的範圍以內打轉。阿加可汗本人，並非布爾喬亞。他是一位富有的王公，和英國的統治階級，有着很密切的關係。回教徒的布爾喬亞不滿於既存社會而走向民族主義之時，阿加可汗便對英國政府作建議。他在一九一四年寫的一篇文章里，說：英國政府應該放棄使回印分裂的政策，應該把雙方的溫和分子集中一塊，造成一個有力壁壘，用之以阻止青年印

度的過激的民族主義的傾向。

但是，可惜阿加可汗也好，英國政府也好，總無法阻止回教徒的布爾喬亞之走上民族主義之路。歐洲大戰，更加速了這一過程。別的領袖產生以後，阿加可汗也就等於退隱了。甘地吧回教徒吸引入不合作運動之中。終於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三年之間，他們發生了對這一運動的領導作用。

可是反動終於又來了。在印度教徒中和回教徒中，都有主張分區自治的落後分子跑出來了。他們代表着很少數的上層反動分子，利用着大眾對宗教方面的熱忱，以達其政治上的反動目標。他們不斷地提倡一種莫明其妙的理論。特別強調在印度的「回教民族國家」，強調「回教文化」，強調印度教與回教之間的「文化」的不可調和性。結論呢？他們說：因此之故，英國的統治，必須永遠存在於印度，俾得調和雙方文化的衝突。我們印度教方面的分區自治主義者，在各方面表現，除了很小的不同而外，其主張大抵亦與此相同。

這些「理論」，在我看來，都是可笑的胡說。所謂「回教民族國家」者，由政治方面言之，頗覺其模糊不清，泛而無當；由經濟方面言之，更覺其荒唐無聊，差不多不值得予以考量。如果說有「回教民族國家」之存在，那末，世界上實無民族之存在，無國家之存在，只剩下各個宗教信仰不同的集團罷了。其實，在最後的分析上，這一個「回教民族國家」，不過是他們的一種自覺的或非自覺的希望而已。在事實上是會存在的。

什麼是「回教文化」呢？難道就是從前阿剌伯人，波斯人以及土耳其人在歷史上的偉大事業麼？要不然，是回教徒的文字語言嗎？音樂嗎？風俗習慣嗎？這一切都是空虛的。我們從來沒有聽到誰援引到現代的「回教音樂」，或者，「回教藝術」之類的東西。影響印度回教的語言文字的本有兩種，其一為波斯文，另一是阿剌伯文。尤其是波斯文，影響最大。但是，波斯文的影響，毫無宗教意味存乎其間。波斯文和波斯風俗之傳入印度，經過幾千年之久，而且，遍佈於全印度各地。從前的波斯，是「東方的法蘭西」，他把自己的文化送到任何一個與他鄰近的國家里去。所以，波斯文化是印度全國所共同受到的影響。很多印度教徒和回教徒，同樣地接受到波斯的語言及風俗習慣的影響。而回教徒的農民和產業工人，實在和印度教徒的一模一樣，毫無區別。

所以，分區自治派的目的，完全和他們所宣傳着的東西兩樣。明眼人一看便知。然而，他們竟能够利用羣衆對宗教的盲目信仰，大肆猖獗。而英國政府當然最高興這種猖獗，便仔細地利用他們，以達其離間印回俾得永遠奴隸印度之希望。

在一九三三年年終的這些時間，我行將被捕入獄的消息，又傳得很響了。我自己也想到，這可能性非常之大。自己時常戒備。很多地方請我去旅行，可能之時，我都予以謝絕。我並不怕坐牢，也知道我之坐牢爲不可避免之事，但是，仍想盡可能地避免牠。有時因了別的目的而出外，如前往拜訪甘地咕或別同事等，也仍然不免要遇到羣衆大會，不免要對他們講演。在這種場合

，講演之時，我却也仍儘量說話，毫不顧忌。在加步坡爾 (Taherpore)，在德里，我都曾參加羣衆大會。尤其在德里參加大會後，我行將被捕的消息，尤爲盛傳。然而，我却終於安然回到阿拉哈巴德。(途中又曾在阿里加爾停步，到回教的大學去向學生講演。)

這幾個月內，國民大會的常務委員會二度集會考慮全國局勢。這時，國民大會已屬非法團體，然而，我也不管這些，仍以大會之祕書名義自稱。

這時：甘地咭身體的健康恢復，又忙於他的哈里人運動去了。他正作一次長途旅行，周遊印度。到德里時，我們國民大會的同志們把他包圍住，請他決定問題。這時的問題，是究竟應否繼續不合作運動。有的朋友主張繼續，有的則以爲不妨暫時撤回。因爲最後的決定，總須依靠甘地咭，我們便在德里攔住他。他說：「繼續下去」，於是，不合作運動此時雖然已經不十分起勁了，然而，仍然繼續下去。

同時，我也仍繼續寫我的文章，不斷地寄到各報紙上去。我執筆爲文之時，因爲目的在於發表，對於一切意見，大凡在人們看來過於激烈的，我已先打些折扣來寫，各報紙雜誌，對我也很好，然而，文章仍往往被檢查員刪了一部份去，或者，甚至整篇不許刊載。我這些時候的文章，主要是宣傳社會主義的理論，反對之人甚不少。我自己以爲自己所宣傳的東西，既然是正確的，便不管他人之批評如何，總要繼續下去。如果國民大會也反對我，我願意辭掉國民大會的職務。不過，這時的國民大會，既屬非法團體，而實際上又不工作，也無所謂辭職不辭職的問題了。不

過，我總漸漸地感覺到本身和國民大會之間，有着距離了。這種感覺越來越明顯。在十二月的時候，達於極點。這時 甘地咭由馬德拉斯寄了一些由報紙上剪下來的文章給我。文章是記述一位訪問者和甘地咭的問答內容，談話中間，訪問者向甘地咭問及我。甘地咭問他替我的活動辯護。甘地咭談話的立場和態度，很多地方和我完全相反。尤其使我感到頭痛的，是看到甘地咭竟主張采邑制度之繼續存在。我看完這篇文章以後，心中極爲苦惱。想起自己和甘地的意見，其出入如此之大，以後如何能够一道工作呢？我對於自己是否必須仍留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中的問題，也開始予以考慮了。不過，考慮雖考慮，仍無一定決定。並且，此後不久也就被捕入獄，這種麻煩問題也就不存在了。

在這些時間內，母親的病漸有進步。不過，仍然睡在床上。我會經關心到家中的經濟問題來，自父親死後，家中生活的奢侈程度，業已大減。但是，好些地方爲了母親之故，不能不力加維持。對於我的女兒的教育費，我覺得也不該略受影響。這時，我自己別無收入，不過，我卻相信我有着一種隨時可能找到金錢的能力。因此，家庭中的經濟，也並未使我十分感到麻煩。我們家里是擁有着相當多的財產的。財產對於一個人是有用的。不過，如果他是時常旅行的人，則用具之類對於他便成了累贅。一方面想減少這種累贅，一方面也可藉以開支家用。我便想把東西賣掉一點。結果，把茄夢娜的很多金銀首飾都賣掉了。這些東西，她本想留下來，傳給我們的女兒去的。

看看一九三四年元月又到來了。國民大會的工作人員，在阿拉哈巴德又到處被捕。元月二十六日，是「獨立節」的紀念日，當然不能讓牠無聲地過去。但是，這時又無領導機構，我和很多同事們商量，應該如何紀念。一致的意思，都認為必須做一點什麼事體才好。但是究竟做些什麼事，却都沒有定見。當時的情形，我們無論誰人，都想設法避免足致被捕的行動。結果，由我下了一個通告，請各地方分別舉行紀念。具體的紀念辦法，由各地方自行決定。在我們阿拉哈巴德，則決定召集一次相當擴大的紀念大會。

我料想「獨立節」這一天，各地一定又要大肆逮捕。我自己之被捕，想是意中之事。因此，想在入獄之前到孟加拉去一次。一半是爲了去會會幾位在那兒的同事，一半想藉此行向孟加拉人民表示一點敬意。因爲在過去這幾年以內，他們遭受了很多非常的不幸。除了這些理由而外，我也想在入獄之前，和茄夢娜一塊到加爾各答去，問問醫生，把她醫病的事體計劃一下。

於是，我決定和茄夢娜於元月十五日起程到加爾各答去。並決定在「獨立節」到來之前，趕回阿拉哈巴德，以便參加紀念大會。

元月十五日下午，印度各地地震。我們在地震聲中到加爾各答。在加爾各答勾留了三天半。在這短短的三天半時間里，我會向三個羣衆集會講演過。演詞內容，是批評恐怖主義手段之不當，同時，也抨擊孟加拉政府對此項事件所採取之嚴酷對付辦法。

離開加爾各答後，我們又到參丁尼克坦去拜訪泰戈爾先生。我到此地來拜訪他，已是第三次

。茄夢娜還是第一次來，她心里十分興奮。會了泰戈爾先生後，回家途中，我們又到巴特拉(Bairat)去拜訪巴布(Rajendra Babu)，和他商討此次地震的救濟事宜。巴布一向是做著非官方的救濟工作的，最近剛剛由獄中釋放出來。

第二日，我到馬查法爾普爾(Masafarpur)去。這一天，已是地震發生後第七日了。除了幾條大街而外，其餘的地方，連瓦礫也尚未除掉，死屍遍地都是，情形慘不忍睹。

回到阿拉哈巴德的時候，振款已聚積了相當的數目。無論國民大會人士或非會人士，大家都很熱心地做這一項工作。有的工作同志，認為因了這次地震，「獨立節」的紀念，可以取消。但是，我和另外的一些同志，都覺得不應如此。結果，阿拉哈巴德的大會，仍照原定計劃舉行。結果出乎意料之外的良好。

由貝哈爾回來後，我發表對於此次地震的意見。對政府之侵吞公款，辦事不力，只顧保護自己的財產而將人民屍首棄之於不顧，大加批評。這種批評，引起了貝哈爾政府方面的痛恨。英國在印度的政治機構，是不容批評的。他們所做的一切，都不會錯誤。如果對他們批評，便是損壞了他們的尊嚴和威信。尤其當指責他們貪污無能，更令他們痛心疾首。

阿拉哈巴德地震救濟委員會，派我到此次地震影響所及的各區域去調查其受害情形，以及該地所採行的補救辦法。我一個人前去，走了很多地方。經十日之久，每天由早晨五點鐘起一直到午夜才得休息。十日以後，我回到家里時，家人一見我那種疲倦的神情，有如患了大病，大為吃

驚。那天回到家里，我本想馬上寫報告給振濟委員會去。但是，終於抵不過過度的疲倦，倒床睡了。一直睡了足足十二個鐘頭。

在這次地震調查途中，我得讀到甘地喏對於這次地震的解釋，非常使我不滿。甘地喏把這種科學已經解釋得清清楚楚的現象，認為是神對於不替賤民想救濟方法之人的處罰。

回家後第二天下午，我剛剛和茄夢娜吃過茶點，站在涼台上休息，忽然一架汽車在我們的門口停止了。一位警察官由車上跳下，向我走來。我一看，馬上明瞭這是什麼一樁事體。我自己上前向警察官打招呼道：「Bahut dinon Se apka intazar tha」（我候君已久矣！）警察官很抱歉地說：「這實在怪不了我們當警察的！」

這次的逮捕狀，是由加爾各答發出的。於是，在五個月又十三天的獄外生活之後，我又回到獄中去了。

三二一 印度的「民主政體」

被捕以後，給送到加爾各答去。我已經經過了好幾次的受審坐牢的生活了。這一次卻稍稍不同，這是我第一次在孟加拉省入獄。從前的入獄，每次都碰到熟習的面孔，這一次到處看到的，都是陌生人，因此倍感寂寞。罪名是因為我在加爾各答的三次講演，觸犯了政府。到加爾各答後第二天（二月十六日），審問完結，被判處以二年之徒刑。

到加爾各答後，最初給關在孟加拉管區監獄 (Presidency Jail) 內，其後轉送到阿里坡爾中央監獄 (Alipore Central Jail) 去。這次被捕，我自己知道是必然的。因為心理上早有準備，故能泰然處之。入獄以後，自己慢慢地回想起在獄外的這五個半月的生活，覺得十分滿意。在這一段時間之中，差不多一切我要做的事體都已經做過了。拜訪甘地，看母親的病，計劃兒女的教育……一切都弄得很好了。然而，也仍有兩樁小事，耿耿於懷。第一是關於茄夢娜的病，醫治計劃，終於尚未定妥；第二、我的工作同志們，因為我的提倡，大家都到阿拉哈巴德的農村中工作去了，而我自己却未能跟他們一塊兒到農村中去。

在阿里坡爾的監獄中，我感到很多地方不滿意，因為衛生條件不好，身體也受了相當的影響

。但是，最使我不能滿意的，是獄中竟無報章雜誌好看。到孟加拉後，尙未定罪之時，還看到一些報紙。一經定罪，送入阿里坡爾獄中，便與牠們絕緣。自一九三二年以來，聯合省方面的監獄，對於甲級囚犯，每天都准許看報。不過，報紙須經政府審查過。因此，我以為別的地方也一定如此，而不知孟加拉的情形，却大不相同。後來幸蒙准許閱曼徹斯特導報（Manchester Guardian），便日日埋頭於該報，由其中得知國際局勢的發展情形。

正當我入獄的這些時候，歐洲有着很大的變化。法國的紛擾，結果是法西斯帝的暴動及「國民」政府之成立。情形最糟糕的，莫如奧國的政變。陶爾斐斯（Chancellor Dollfus）之屠殺工人，社會民主政治的大廈，於焉崩潰。奧國的政變消息，最使我喪氣。這時，整個的歐洲和美洲，法西斯的運動都在發展着。當希特拉在德國登台之初，我深信希氏之政權，一定為時不久。法西斯納粹之徒越上前一步，我越以為他更走向死亡一步。而不料希特拉倒越來越厲害了。心中不免略略感到迷惑起來。

我正讀着的唯一的刊物，曼徹斯特導報，對於奧國的局勢，以十分激烈的態度予以批評。說，這時的奧國民主政治被毀滅了。十分可惜。不過，爲了牠的永久的光榮，牠將繼續戰鬥，將造出奇蹟，重使歐洲自由的精神，再度恢復。說，現在的歐洲，由萊茵河到烏拉爾河，成了一個大監獄了。總之，英國人對於歐洲的民主政治，似乎十分努力擁護。我讀了以後，心中的第一個反應，是：「但是，我們的印度又如何呢？」印度有什麼民主政治之存在呢？英國是自稱爲民主的

，自稱是擁護世界的民主政治的。但是，在這個擁護民主政治的民主國家的英國所統治下的我們印度，却連民主的影子也看不到。

英國民族，是一種富於偏見的島國民族。由於他們過去的成功以及現在的繁榮，使她們對於世界其他部分的民族，十分看不上眼。英國統治階級對全世界民族的劃分等第，是這樣的：（一）大不列顛——（一個長長的破折號之後），是，（二）不列顛自治領（非白種人不在其內）和美洲（只限於盎格魯撒克遜人種，其餘不在內），此下，是（三）西歐，（四）歐洲其他部份，（五）南美（拉丁種），最後，（又是一個長長的破折號）——（六）亞洲和非洲等地的稷種，黃種以及黑種。

這樣一看，我們印度人是在最末一個階層。離開我們主人的英國多遠啊！所以，英國人士所談論的一切，都與吾人無關，印度是，「不得與焉」的。他們常時談到的所謂「自由」哪，「民主政治」哪，諸如此類的好聽名詞，都不是為印度而存在。英國自由黨的大政治家約翰·莫萊（John Morley）不是說過了嗎？他說：他不能想像印度竟可能存在一種民主政治的憲法，即使是遼遠的將來，也不可能。真的，民主政治，好像加拿大的厚毛外套，我們印度的氣候，不適宜於使用這種東西。所以，當自由黨在英國勝利的時候，對於印度的態度，是馬上恢復一九二四年的孟加拉法律。在該黨第二次組織政府的那時候，其情形更為惡劣。

在稱呼的時候，英國人裝腔作勢地稱我們為「親愛的弟兄們」，事實上，待遇我們之時，却

須應用另一個不同的標準。然而，自由黨的報紙，對於奧國的民主政治之死亡，却如喪考妣一般地哀傷呢！

勒吞 (Lord Lytton) 是從前印度的一位省長。後來也曾一廬任過印度總督。大家都把他看為自由黨中對印度最抱同情的人。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的英國上議院演說時，他說：「印度政府，比起國民大會的政治家們來，政府是更能够代表印度全體人民的。牠可以代表官廳，軍隊，警察，土藩王公，以及印度教和回教雙方說話。可是，國民大會的政治家們，在這些集團當中，却一個也不能代表。」他還繼續地發揮得更清楚：「當我談及所謂『印度人』的意見時，心中所想到者，乃和我合作而我也仰仗他們的合作之人。他們的合作，未來的省長們和總督們，都必須仰仗的。」

由他這話當中，可以抽出兩點最中心最精彩的東西；第一、印度人，除了那些協助不列顛政府的一部分而外，一律均不足道，不必「想到」；第二、印度政府，是最能代表印度人民的，因此，也就是國內最民主的政體。這種事實，可以使人想起很多英國字眼，只要一越過蘇彝士運河，到達印度的時候，其含意就會變得與原來的不同了。如果照這種理論推去，則必然的演繹，一定是這樣：因為國王最能够代表一切之人，因此，專制君主「朕即國家」的政體，也就是最民主的組織了。

在英人的眼中，所謂民主政治者，如果應用在東方的國家里，那真的意思，應該是：實行統

治者的帝國主義的一切命令，不害及其投資利益。如果與此相符合，則「民主政治」是可以自由地發展下去的。

三三三 甘地咕的思想基礎

一九三四年四月到來了。我在獄中不斷地聽到由外面傳來的各種消息。最使人痛心的，是監獄署長曾對我說：甘地咕業已停止文明抵抗運動了。我聽了之後，大感不快。但是，經過了一番理智的檢討以後，我知道這個結果，是必會到來的。甘地咕之必在此時作如此之決定，是一種不可避免之趨勢。

過後不數日，我由雜誌上看見甘地咕關於撤消文明抵抗的申明書。我反覆讀了幾次，一方面驚奇，一方面傷心。心中關於文明抵抗之類的概念不在了，代替牠們的，是懷疑和內心的衝突。甘地咕的申明書內容，把文明抵抗撤消的理由，歸之於個人的行動。他說，他之所以發表這篇停止文明抵抗的申明書，其動機係由於和他那一「沙他格拉哈精舍」(Satyagraha Ashrama) 中的一位同居同志的談話所引起。他的一位老同居，不願意作指定的工作，不肯完成全部的監獄工作而自己自由地選擇自己願意做的事體，此種行爲，無疑地是違犯了「沙他格拉哈」的條規，未能盡文明抵抗的責任。

我又再一次領教到甘地咕這一類莫名其妙的理論了。個人的缺點或錯誤，本是小事，無關大

體。即使退一步說，承認這種錯誤是很重大的，但是，一個直接與數萬工作者有關而間接感數萬萬人民的偉大門爭，怎好因一二人之細故而停止？甘地咭這種理由，分明是不對的。我對於甘地咭的所謂「沙他格拉哈」，一向是贊成牠的道德方面的精神。我認爲牠的這一方面，可以使政治活動走上一個更高更尊貴的水準。但是，如果他的實行方法害及我的基本信念，我是不贊成的。甘地咭有很多行動，都是出於本能的衝動，下意識地做下了一些事體以後，再來援引一些事後想出來的理由去解釋。當然，甘地咭以這樣的態度面臨印度的重大問題，以一個民族運動的領袖而論，殊不適宜。他的所謂「沙他格拉哈精舍」中的同專們，對於他那種宗教的道德的主義，深信以後，會宣誓服從，甘地咭當然有權以任何樣的方式左右他們。可是，國民大會人士，却未曾作過此種宣誓。我也沒有作過此種宣誓。爲什麼我們要讓甘地咭把我們擺來擺去呢？他怎樣能够以這種神祕的理由，要我們純以政治的觀點從事印度的革命活動的人們，去受牠拘束，聽牠左右呢？

甘地咭的申明書，其全部內容，在我看來，一無是處。他在申明書內告國民大會同人的一部分，主要意思是叫我們「認清苦行與安貧的生活之美」，要「盡力作建國之活動，藉手紡手織的方法，推廣土布運動。大家互相之間，應以個人之接觸，促成精神上的聯合一致，」在個人生活方面，「尤應竭全力以戒忌煙酒，遠避其引誘。」同時，要我們「多與嗜好煙酒之徒，作個別之接觸，從而感化他們，務使全國成一良好風氣。培養個性的潔白。」

是這末一套毫無意思的話。我讀過了之後，大為不悅。深深地感覺到甘地咭和我之間，距離過大。這樣一套話，怎好拿來充當一位民族革命運動的領袖對其信徒的指示呢？我覺得，很多年以來，使我對他信仰之一根細繩，今日是完全折斷了。我不能繼續這樣地信仰他了。在我的內心之中，對於甘地咭，早有一種激烈的鬥爭存在着。關於甘地咭所做的很多事，我都無法了解。他提倡文明抵抗的鬥爭，可是，當信徒們正熱烈地從事鬥爭的時候，他自己却掉換方向，做別的活動去了。（如前次之專心於哈里人運動，並因而絕食。）在獄中，則當時絕食，出獄以後，又屢萌退志，想退出政治活動。凡此種種，我都不贊成。當此次入獄之前的幾個月內，我已經察覺出甘地咭這種行為之不正確，心中早表不滿。甘地咭和我之間，不同之處過大。他曾說過：我們二人之間的不同，乃是氣質上的不同。在我看來，未必盡然。我們之間之不同，恐不止「氣質上的」而已。因為，我有很多關於各事各物的確定意見，往往為甘地咭所不贊同。不過，在已往的若干年內，我總往往把這些不同之點，認為無關緊要。當時的國民大會，正為着爭取整個民族之自由而鬥爭。在這種偉大事業之下，這些不同，當然是很小的事體了。我自己時常有着一種信念，以為在這種大門爭之中，每一個人都應該盡忠領袖，對同事合作誠實。有很多關於理論上的互相不同，應竭力遵從他人，委屈求全。一方面，我希望着將來事態的發展，會漸漸使別的人們接近自己的觀點。在目下，應該力求能與大家協力，共同在甘地咭領導之下，爭取全民族之自由。

現在，甘地咭這末一來，使我深深地感到寂寞，大感知音稀少之苦。覺得平生所受到的教訓

，實以此次爲最令人傷心。同時，也更進一步地了解，對於重大問題，應該自力更生，不能依靠他人。自己應該有單獨作戰到底的能力，如果一味依靠他人，結果一定歸於幻滅。

甘地喏的宗教性質的政治鬥爭手段，在我的心中，這時是完全失掉地位了。積年累月的憤怒，使我對於宗教和宗教對百事萬物的觀點，大大反對。宗教不是完全以感情和衝動爲基礎的嗎？牠是「清楚地思考」的敵人。牠想到的是另一個世界，與現實的人生無關。牠具備着很多先入觀念，這些先入觀念使牠不去，也不敢去正視現實。因爲恐怕看出這些現實和這些先入觀念互相違背。牠以爲牠本身已經是建立在真理之上，十分確信自己確已發見了全部的真理。牠再也不自尋麻煩，去尋求真理了。牠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認爲是真理的「真理」，向人宣傳就行了。牠天主教張着和平，同時，牠卻對於一種非依暴力即不能生存的組織，予以擁護。牠痛斥暴力之不對，可是，這兒有着一種不聲不響地到來的暴力，以「和平」的方法，殺死人，餓死人，更有甚者，是不動聲色地從內部毀滅人們的志氣，粉碎人們的精神，擊破人們的心。然而，牠不去反對，因爲，牠主張的是「非暴力」。

同時，我也想起作爲我的苦悶煩惱之由的甘地喏本人來。甘地喏是一個多麼奇異的人嚮呢？他具有着一種差不多是不可抵抗的吸引人的力量，有着一種壓倒之勢的力量。由他所寫的文章，所說的話，有時還不能表達出他的人格來。他之爲人，是遠較其言其文爲高遠。甘地喏對於印度的服務，是如何之多而巨大？他如何使全印度的男女都充滿了一種勇氣，一種男兒氣概！他如何

使他們富有紀律，富有能耐，富有一種快樂地爲一樁事業作偉大犧牲的精神，富有自尊心！甘地喏曾經說過：「勇氣乃品格之基礎。沒有勇氣，便沒有道德，沒有宗教，沒有愛！」，「無論誰，只要一日存有恐懼心理，即一日不能實踐真理，實踐愛！」他平生最痛恨暴力，最不主張暴力的。然而，他仍說：「怯懦，是比暴力更使人痛恨的東西。」又說：「紀律，是使一個人能够專心的保證。沒有犧牲、紀律和自制，便沒有獲救的希望。然而，無紀律之犧牲，仍屬無效。」

當然，這些辭句也許看去是很陳腐的。然而，這些辭句的後面，存在着一種偉大的實際力量。因此之故，甘地喏成爲全印男女之神聖了。他差不多完全可以代表印度，可以代表這個歷盡坎坷的古老國度的精神。可說甘地喏便是印度，甘地喏的情感，便是全印度的情感。因此，對於甘地喏的一次很小的怠慢，可以說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差不多是對印度全民族的侮辱。印度很多的總督，常以輕蔑的態度對待甘地喏，所產生的結果，他們是不知道的。一九三一年，甘地喏在倫敦參加圓桌會議經由羅馬回印時，羅馬教皇拒絕他的往訪。羅馬的天主教皇，對於在他自己的範圍以外的聖徒，是不贊成的。尤其因爲有一些基督教徒把甘地喏稱爲「宗教偉人」，認他爲一個真實的基督教徒，羅馬的天主教皇，自然更不要和這位「異端」發生關係了。可是，教皇却不知道他自己這樣的行動，在印度所引起的反感爲何如。當時，差不多全印度的人士，都不滿意於教皇。那時，我心中也十分憤慨。認爲這不是對甘地喏個人的怠慢，而是對整個印度的侮辱。

甘地喏之偉大與其對印度之功之高，是毫無疑義的。我也由甘地喏身上得到不少的好處。

然而，甘地咭在革命問題上，仍不無不正確之處，這也是毫無疑問的。因為甘地咭的一切活動，其最終目標何在，無人敢於斷言。我自己和他有着很多年的不斷接觸，然而對於他的最終目標，心中仍茫然無所知。我想恐怕連甘地咭本人也弄不清楚罷。甘地咭說道：「一步於我已足。」，他於是死也不想向前再看一看，試尋出一個確定的遠景來。甘地咭不憚煩地說了又說的一句話，是：「但去尋找方法，結果自會產生；只求個人本身生活良善，則他人自會效尤。」。這當然並不是一種「政治的」，「科學的」的態度，也許甚至於也不是一種道德上的態度。因為這兒還有一個問題：什麼是「良善」呢？他只是個人的問題嗎？或者，是一個社會的問題嗎？甘地咭時常強調着的，是品格。他完全忽視智力的訓練與發展。沒有品格的智力，固然是危險的，但是，沒有智力的品格，又是像什麼東西呢？真的，品格究竟如何發展的呢？有人會把甘地咭比之於中世紀的聖徒。他所說的話，確與中世紀的那些聖徒們的符合。可是，却不適合於現代。

我想，一個人對於自己的活動目標，糊糊塗塗，無明確的認識，實在不對。行動，應以確定的最終目標為準則。此種行動，乃得為有效的行動。生活環境，不一定都是合理的，吾人必須有着各種不同的目的，以與之適應，可是，某一一定不易之最大目標，則必須時時保持，以為一切之南針。決不可漫無目的。

有時，我也想到，也許甘地咭對於自己的一定目標，也並不糊糊塗塗，也有着一定的方向，不過，他的種種目標、這種方向，和現代的理想、現代的環境互相違背罷了。甘地咭是無法適應

這種現代的理想和環境的。他這種目標和方向，自從他在南非洲領導他的哲學以來，便已十分清楚。一九〇九年的時候，他曾經這樣寫道：

「印度之振救，在於使大家忘掉過去五十年以來所學得的一切學問。鐵路，電報，醫院，律師，醫生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必須剷除；所謂上層階級的人士，必須以自覺之精神，宗教的心理，和敬謹的態度，對於農民們的樸素生活，加以研究，認清楚，只有這種生活才能產生出真正的快樂。」

「每次當我走入火車車廂之中或乘坐汽車之際，我總覺得我自己損傷了我自己的是菲感。」

「企圖以高速度人工化的快速度的火車頭來改造世界，不啻企圖作不可作之事。」

上面的這些話，既然是甘地喏在一九〇九年之時就已寫下的，能否完全代表他的思想，當然未便確定。但是，由這一點，也可以看出甘地喏的思想來源為何如了。所有這些，在我看來，都是錯誤而且有害的理論。同時，也是不能實現的妄想。在甘地喏這種理論的背後，是甘地喏對於「貧窮」「痛苦」以及一種「制慾主義」的生活之贊美和喜悅。在甘地喏看來，進步與文明，不在於需要之增大，不在於更高的生活標準之產生，而是：「對需要作自動的、苦心的壓制。這種對需要的壓抑，可以增進快樂和滿足，可以增加一個人服務的能力。」

如果我們對於甘地喏的思想的這一個基礎予以接受，則對於甘地思想之其餘諸部份，亦可因

而了解。對於他的活動，也可以清楚了。可是，當時我們大多數人，並未接受他的這一種基礎；因此，現在對他的很多活動，便覺得十分不滿。

我對於甘地咕之贊美「貧窮」「困苦」，極不歡喜。這些東西，都不是人們心中欲得的東西。我們應該設法予以全部剷除。對於甘地咕所主張的「制慾主義」，我以為或不妨用之於個人，但是，決不可能是一種社會的理想。對於樸素，平等和自制，我本是十分了解也十分贊成的。但是，樸素平等和自制，却不能意味為磨折人的肉體。我以為，正和一個體育家之必須鍛鍊其身體一樣，我們亦必須鍛鍊我們的思想與習慣。一個人如果過於縱慾，則不可能期其於危機到來之時，忍受痛苦。如欲有良好的道德，必先有健全之身體。可是，這却不是自己磨折肉體或制慾主義之謂。

對於甘地咕所主張的「簡樸的農民生活」，我也不贊成。我對農民們的此種可憐的生活，覺得十分可怕。不但自己不願意去過，而且，想把農民們也從此種苦境救出。我也並非主張鄉村都市化。我不過想把都市的文明，擴大而及於鄉村而已。這種農民的生活，不但不能使我們獲得真正的快樂，簡直使我感覺到這是一種可怕的監獄生活。把人類理智返歸於原始的環境之中，在此種環境之中，理智不復被重視，這簡直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主張。這樣一來，足以使人類引以自豪的東西，便這樣地歸於毀滅，殊不值得。現代的文明，其中既有惡，亦有善。同時，牠本身中還有一種可以剷除此種「惡」的可貴力量。如果把這種文明連帶地予以毀滅，不就等於毀滅了這種大可寶貴的有用力量嗎？使世界重返於渾渾噩噩之境，過其可憐的原始生活，這，退一步

說，即使是好的，也是不可能的。世界不斷變動的潮流，我們無法停止牠之向前，我們也不能離牠而自去，這是很明顯的事體。

甘地咕的活動，其主要目的在於對個人的振救，使其能免於罪惡。我們却時時以整個社會之福利爲念。我自己無法把握「罪惡」一詞的概念。也許即以此故，我不能了解甘地咕的一般理論。甘地咕並不是要來改革社會機構的，他要努力的，是要求個人不爲罪惡。他曾經這樣地寫過：

「『司瓦底習』的信徒們，是從不去自討麻煩，作改造社會之企圖。因爲，社會之改造，本係依據上帝所定之規律而進行，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

所以，甘地咕對於社會的工作態度，是積極的，可是，他心目中的對象，卻祇限於制止個人的情慾而已。他認爲這種情慾，甚至於欲放縱情慾之動機，都是罪惡。由此觀之，甘地咕的觀點和我的觀點，距離實在太遠，無法覓致一致之道。

了解了甘地咕的這種理論基礎，對於甘地咕對性的看法，也可以認識了。性行動，在甘地咕看來：

「任何一種結合，如果其動機和目的，並不在於後裔之生產，便是罪惡。」

「以人爲之方法勉強行之，其結果必致身體虛羸，精神衰弱。」

「如果行動之後，仍欲避免其必然產生之衰弱結果，是錯誤的，也是不道德的……一個入，如果自縱其性慾，縱慾之後，乃欲藉補品或藥物以避免其必然之衰弱，這是不對的。尤

爲不對者，乃係既已縱其獸慾矣，而竟亦避免其必然之結果。」

甘地對於性的生活，作如此的看法，當然是不正確的。如果甘地之言不謬，則我老早犯了罪了，成爲神經衰弱了。羅馬天主教，也反對性的行爲，但是，他們卻也顧慮到人類天性之一般的要求。在二者之間，覓取一種折中的說法。甘地則不同，他簡直認爲，除了對於欲坐產後裔之時而外，完全否認人類的性要求。他否認男女之間有性的引誘力之存在。他說：

「但是，有人對我說過，我的這種想法是不可能的；他們說，我沒有估計到存在於男女之間的那種天然的引誘力。但是，我以爲這種男女之間存在着性的因緣，不能認爲是天然的。男女之間的天然的因緣，是存在於兄妹之間，母子之間，父女之間的引誘力，而非一般男女之間的引誘力。此種天然的兄妹之間的，母子之間的，父女之間的引誘力，乃世界之支柱。」

更有甚者，甘地還寫道：

「我一定得使用我所有的全部力量這樣主張：性的誘引力，即使是夫妻之間的，也非自然的。」

對於甘地時的這種主張，要末，接受他，要末，拒絕他，別無中間之途。因爲，這完全是盲目信仰的問題，並非理智的問題。在我看來，甘地時的此種主張，絕對錯誤。他的主張，也許未嘗不適用於某種個別の場合，可是，如果用之爲一般的手段，則其結果一定會產生各種不正當的

病態。

性的節制，是必須的。可是，甘地咭如此極端的主張，卻非正確之道，亦絕不可能實現。因為太極端了，一般人認為非能力所及，結果仍一行其素，不去理睬他。如果一定要矯揉造作地進行，則雖夫妻之間，亦必有衝突發生了。甘地咭之所以會對這一問題作如此奇怪的主張，也許是當年在文學上所有的性的氾濫所引起的反應罷。我自己知道自己是一個正常的人，並未如甘地咭一般地對性生活如此地壓制。而在事實上，我的性行為既未使我神經衰弱，也不會防礙我的其他活動。因此益發覺得甘地咭的奇怪主張，真是奇怪之至了。

我坐在阿里坡爾監獄內，左思右想：想起蓬蓬勃勃的革命運動，給甘地咭一紙申明書停止了；想起一向信仰着的領袖甘地咭，其思想與行動，竟和自己的如此背道而馳。心中一種寂寞、苦悶、悲觀的情感，油然而生。對於國家前途，個人未來，均感彷徨。但是，不久以後，漸漸恢復原狀，走出了悲觀之境。又加以茄夢娜曾到監獄中來看過我一次，我心中想，到底自己也還有着一個永遠在一塊的人，便更覺得安適了。

然而，印度局勢與甘地咭個人，卻仍長久地留在我的腦中不走。

差不多一般的偉人，都是怪人，甘地咭，尤其是一位大大的怪物。如果只讀他的文章，沒有和他作私人之接觸，常時會把他誤認，以為他一定像天主教徒那樣無趣，那樣的難於接近。反之，他是一個很有趣的人。他的笑容，最易引起人們的快感。當他走進一間屋子里去的時候，室中

空氣會變得十分融洽，十分有趣。所以，如果只引出他的文章的一部分，用以了解他之為人，或竟以之而批評他，時常會走到錯誤之路。我和他多年相處，知之甚稔；但仍有很多地方，無法了解。常使我覺得奇怪的是，甘地咭對於爲人奴隸的印度及印度人民，極爲關心，極爲愛護，然而，他本人却支持着一個迫害印度及其人民的機構；他反對暴力，痛恨暴力，然而，他本人却支持着一個以暴力爲基礎的、政治的，社會的機構。也許，說他支持或擁護這樣一個機構，是不正確的罷。因爲，我們可以說甘地咭是一位哲學上的安那其主義者。但是，理想的安那其世界尙未到來；這是一個難於實現的理想。因此之故，甘地咭便接受目下的既存秩序。

有時，甘地咭甚至還把他自己認爲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不過，這個爲他所使用的「社會主義者」一詞，只能用之於他一個人，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爲，他還一位「社會主義者」，其實與實際的社會的經濟的組織無關。一般的國民大會人員，也追隨着甘地咭應用這一名詞。因之，牠的意思實在是指一種模糊的人道主義者。

甘地咭本人如此自稱，其實並非他本人不了解社會主義，胡亂引用。恰恰相反，他曾讀過很多關於經濟的書籍，關於社會主義甚至馬克斯主義的書籍。並且也常和別人討論着這些書籍的內容。不過，真正地處理大問題的時候，這些知識却一點也沒有發生作用。甘地咭早年在南非的時候，思想曾有過一次轉變，從那時以後，便成了定型。以後對於萬事萬物，他都抱定了一個確切不移的看法，決不動搖。也決不接受一點後入的意見了。當別人向他說話向他提供意見之時，他

十分用心地去聽。然而，聽了以後，他却仍然一點不改變他一向懷抱着的見解。他對於自己所認定的理論，過於深信，以致其餘一切諸事，都屬次要了。

甘地喏對於社會主義尤其是馬克斯主義，是懷疑的。因為，社會主義，和「暴力」有關。「階級鬥爭」這一個名詞，本身的意思，就包含着彼此間的衝突，包含着暴力。所以，在甘地喏看去，是不行的。對於大眾的生活水準，提高到某程度以上，他也不贊成。因為，在他看來，有着更高的生活水準和更多的閒暇時間，其結果所屬，一定是對情慾的放縱。目下少數富有的人們的放縱情慾，已經使甘地喏覺得罪過已極。再把大批的下層民衆，也引到放恣情慾之路，那更不行了。如果你對甘地喏宣傳，說：假使沒有投資利益的作梗，則今日的科學和工業技術水準，已足以使人民的衣、食、住、行各項問題得到相當的解決。生活水準即可提高。這些話，他是聽不進去的。因為，這樣的結果，他根本便不希望。因此之故，社會主義的中心思想，便無法引動他的心，促起他的注意。至於資本主義社會呢？因為其中存在着罪惡，他也只能予以部分的容忍。他對於社會主義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兩者均不贊成。可是，他却容忍後者，因為在他看來，後者總算是少用「暴力」，因而也少有罪惡，並且，又已經是既存的體系。

甘地喏不希望人們有着一種安逸閒暇的理想，只要他們幻想着一種道德上的生活，除掉一切惡劣習慣，漸漸減少縱慾的機會，如此個別地由精神方面自圖發展。至於那些願為大眾服務的人們，也不必去企圖提高勞苦羣衆的生活水準，但求把自己的生活水準降低，與農民們混成一塊，

過同樣的生活。據甘地咭的意思，這就是「民主政治」的精神。

他時常強調一種概念，即信任封建王公，大地主以及資本家等。教皇曾經說過：

「富人，應該把自己認為是萬能上帝的奴隸。是上帝的財產的保護人和支配人。耶穌基督即把貧困窮苦之人的命運，付托於他們之身上了。」

庸俗的印度教徒及回教徒，都重覆地宣傳着這一理想。把富人們認為是大慈大悲的。他們因此得到的報酬，是富人們替他們建造廟宇，同時，把一些用不了的小錢，分之於窮人。甘地咭的理論基礎，正與此同一。教皇的理論背景，是很久以前的社會。那時，逃避現世苦惱的唯一可能路線，便是希望於來生。現在，環境雖然變動，物質的發達，大勝從前，然而，基本未動，不過所強調的不同，現在是強調着一種模糊而空洞的精神價值了。

甘地咭決心要由道德上，由精神上，由內部去改造個人。再藉此以變革外部的發展。他的這種理論，要大家終止惡劣習慣和縱慾情感，而由此變成純潔無疵。他強調抑制性慾，戒酒忌煙等等。即使只由個人的觀點而論（就整個社會而言，更不必說。），難道天下之事，便無比這些個人的情感更有害的東西了嗎？如：自私自利，貪得無厭，個人間因私人利益而起的兇猛衝突，集團派系的殘酷鬥爭，某一集團對另一集團間非人性的壓迫與剝削，以及各民族，各國家之間的可怕的戰爭等等。當然，甘地咭對於這些現象，也一定要反對。可是，這些不都是與今日這貪得無厭的社會有着關聯的嗎？——這個社會的規律，是弱肉強食。現代社會中的獲利的動機，無疑地

會產生彼此之間的衝突。既存的社會組織，對於這種搶奪的天性，竟予以保護，使其在各方面均有機會發洩。既然這個社會對於這種動機，予以鼓勵，那末，甘地咕的理想——道德人性——能够在這種環境之中實現呢？他或能個別地達到他的目的，然而，惡社會却會把其餘大多數的人們，吸引到牠的道路上去。

我對此，認為並非僅僅是道德的或倫理的問題，而是目下迫切的現實問題。因為整個世界都在混亂之中，印度人士不能坐待世界變革，每天以批評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為事。當此之時，我們只有在如下的二條路上，任擇其一：要末，印度設法向後退，要末，被潮流衝上前去。也許，甚至於還不能作如此的選擇，因為，「向後退」，實在是一樁不可思議的事體。

然而，甘地咕真正地要向後退去。他的主張，不僅使人想到其結果將成爲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而且，簡直是一個自給自足的鄉村。他只想藉農村小工業在很小的範圍內，提高農民的生活水準。不擬任其作進一步的發展。可是，事實上的印度，確不能如此地孤立起來。因為印度本已與國際連在一塊。即使她果然要求脫離，也不可能。因此，一種窄狹的自給自足的社會，實無存在的可能。我以為，無論由那一種觀點來分析推論，都不能得出肯定的結論。

不可避免地，我們將被引導到唯一的決定，即須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新秩序。最初仍有着國家與國家間的界限，久而久之，全世界化而爲一。對於物的資產生產以及物資的分配，均以統制之形式爲之。其全部目的，則在於謀取公衆之利益。究竟我們將以何種手段達到此境，那是另一回

事。但是，爲一國以及全世界人類之福利的計劃，決不能因靠既存機構而獲利的少數人所反對而被阻止，此理至爲明顯。如果有某種政治的或社會的機構，對於這種變革有了障礙，則此種機構必須剷除。決不能犧牲吾人所企望着的實際的理想，而與此種反動的機構妥協。此種大變革之到來，一部分當然必受國際潮流之影響，然而，必須在得到有關國民大部分的同意或默許之下，始能成功。因此之故，必須爭取他們以從事此項工作。少數集團的暴力，無濟於事。甚至於對那些靠現存機構獲利的人們，亦必努力爭取，不過，能因此轉變的成分，恐不爲多耳。

甘地喏的土布運動，手織手紡的運動，可說只是在生產當中的個人主義之強化，而其結果，會使印度社會開倒車到工業時代的前夜去。對於這種運動，如果認爲是解決目下重大問題的一個方法，殊不足多，並且，還產生了一種心理上的傾向，一種有礙於向正當方向生長的傾向。但是，如果認之爲一種暫時的權宜之計，倒也不無用處。只要一日尙未實施關於土地問題以及工業問題的良好解決辦法，這種運動，也是頗值得予以提倡的。

當此之時，我以爲關於這種社會的大變革，即使不去討論具體步驟，對於此種變革之必需，一定得清楚地認識，得明白地陳述。如果一個領導者或思想家，連這點也不認清，也不對牠作明白之敘述，那末，他怎能够期待別的人也跟着他走呢？也跟着他想呢？怎麼能够在民衆羣中產生他所需要的心理準備呢？局勢的演變，當然無疑地是一位强有力的導師，可是，對於局勢必須先要有相當的了解：究竟牠是否可能被羣衆認識，正確的行動，是否能在其中生出。

無論那一種社會，政治的，經濟的以及社會的組織，在其組織的背後，必有其自己的哲學。每每當這些社會變動之時，牠的哲學基礎亦必須變動，始能與之相符合，並能儘量作有益之利用。以一般的情形而論，哲學往往會遠落在實際之後，這種落後，便產生出很多困難與苦惱。民主政治的思想，和資本主義制度，是一道在十九世紀發生成長起來的，然而，他們之間，彼此却並不互相符合。其間有着一種基本的矛盾。民主政治的思想，強調多數人的權利，而資本主義制度，却把權力付予少數人去了。然而，雙方仍繼續並存下去，此蓋由於這些資本主義國家中的議會政治，本是局限於一個很小的範圍之內的。這種情形，不會妨礙一種獨佔和權力集中的發展。不過，即使如此，二者之裂隙，却亦日益增漲，離婚之日之到來，乃不可避免之事。今日議會的民主政治，實已聲名狼籍，各種新的口號，於是甚囂塵上。因此之故，英國在印度的政府，也變得更加反動。藉口把給予印度形式上的自由，也收了回去。此風一開，印度土藩王國也順勢宜稱要維持中世紀的封建情況了。然而，議會民主政體之失敗，不在於他走得過遠，而實由於走得不够遠之故。因為，牠並未準備經濟上之民主，所以其本身即不可能是十分民主的，而且，牠的手段也太過於遲緩，不適用於今日的迅速變革的時代。

印度的土藩王國，可以說是現世界僅有的專制政體的極端的典型。他們當然臣屬於英國政府。不過，英國政府對他們之干涉，目的只在於發展或保護其投資利益一方面而已，別的事都不甚注意，全由王公們自行其是。這些土藩王國，好像有着一片煙霧遮蓋着他們，使外人無法看清楚

牠們的內部情形。在這些地方，報紙也不准發行。只有時有一二張官方的週刊出現。外面出版的報紙，是不准送入國內的。文學水準也十分低下。（只有少數例外，如可城和特拉文斯哥爾等地，其水準還較英轄印度為高。）由這些王國中所傳出的消息，都是一些無聊的東西。或者說總督來遊，或者又是某公結婚之類的新聞。對於這些王國，不准動輒批判，定有明律。在英轄印度也是如此的。在土藩境內，連最溫和的，最善意的批評，也受到嚴格的壓制。公眾集會，在這些地方，是從來未曾聽到過的東西。甚至於一些社會上的普通集會，也被禁止。由外面前往的聞人名士，是不許入境的。

各個土藩王國的境內，其情形如此。則國民大會出而代表王國之內的被壓迫民衆的基本權利，對王國的統治作正當之批判，殆為必然之事。然而，甘地喏却在國民大會內，發明了一種新奇的政策，主張對於這些土藩王國，應採取「不干涉王國內政」的政策。這種奇怪政策，即使當王國之內發生了很大的慘案或他們已向國民大會攻擊之時，亦繼續使用。很明顯的，甘地喏就心的，是國民大會的批評，可能得罪了這些王國的統治者們，而因此增加「轉變」他們的困難。

他的這種政策，甚至於對采邑領土以及收稅區制度，也一樣地應用着。這一種半封建的體系，已經是過時的東西了，老早成爲生產和一般的進步之障礙物，這已是毋庸置辯的事。牠們甚至於和發展中的資本主義，也互相衝突。類乎此的體系，已漸漸完全在世界上消失，而讓位於自耕農了。然而，我在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五之間，曾親領教過甘地喏的高論。他竟贊成這樣制度

，而希望牠能繼續存在下去。他在一九三四年七月的國民大會孔坡會議上，說：

「地主與佃農之間，如果雙方均能作良心方面之改變，則彼此之關係，即可變得較為良好。如果能够做到這一點，則雙方便能和平相處下去。」

因此，甘地咭本人的態度呢，是：「永不贊成消滅采邑領土制或收稅區制的。」

據說，甘地咭當向他們的一個代表團講演的時候，甚至說：

「我決不主張毫無正當理由便把有產者的財產剝奪的。我的目的，確在於說服你們的良心，想你們能夠為你們的佃農而代為保有你們的財產。並能夠以他們之福利為目的而使用之

……如果有什麼人企圖剝奪你們的財產，我即將站在你們的一方面而鬥爭。西歐方面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建立在一種理論之上。這種理論，和我們東方的，有着基本上的不同。他們的理論之中，其一，是相信人類天性的自私……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則不然。我們是以「非暴力」為基礎。以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的，佃農與地主之間的合作為基礎。」

東方與西方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有如此的基本區別，也不知是甘地咭的發明呢，或者是有所據而云然。這且不去管牠，但是，甘地咭却不該不對印度的佃農，作更進一步的認識。這是很明顯的事體。印度的這些地主，是永遠不會去想到犧牲自己的利益而為他們的佃農謀福利的。很多佃農，本來是擁有土地的自耕農，但是，因為受了城市高利貸者的剝削，失掉其本來的財產。自己的土地所有權轉移到高利貸者的手中，他們成了地主，而自己却一變而為自己原來的土

地的佃農了。這些由高利貸者變成的收稅區主，照甘地咭的說法，是佃農的依靠者。要靠他們來替農民謀福利了。

對於采邑制度與收稅區制之存在，我是絕對反對的。如果說這種制度很好，那麼，我們便可以把它在印度普遍地實施了。如果有人提議在古者拉特設立這種制度，恐怕甘地咭未必贊成罷！那麼，爲什麼這種良好制度，只適用於孟加拉，貝哈爾和聯合省，而於古者拉特以及旁遮布等又不適用呢？而全印度的人們，又並無主要的不同，他們的基本意識是同一的。由是觀之，事實是：無論如何，現狀總得繼續下去。目下的環境，無庸予以變革。甘地咭所要做的，只是改變「人心」而已。這是對人生及一切問題的一種宗教的態度，與政治、經濟、社會毫無關係。然而，甘地咭竟盡全力於此，想用他來救印度呢！

三四 國民大會憲法鬭爭派與社會主義派

在阿里坡爾監獄中，一來因為環境不衛生，二來心境不好，我的身體受了相當的影響。加爾各答的空氣和日漸炎熱的氣候，很使我就心。幸好五月七日，被轉送到德赫拉莫的監獄來了。這是我的老地方。但是到達之後，才知道這個老地方，已與九個月之前不同了。關我的地方，倒也清爽。有一個涼台連接着，門前還有一片廣場，可供運動之用。但，也有不好的地方。本來從前在德赫拉莫的監獄時，面對高山大樹，風景極佳。這次回來却大不相同了。這個牢房的四週，已築有高牆，看不見山了。在獄中數月，只得見幾株大樹之尖，大感寂寞。他們又不許我出去散步，只准在門前一片地上，作作運動而已。明明知道，離開自己不過數步之外，即有青山綠水的大自然風景，然而，可想不可及，這對於一向酷愛山水的我，當然是萬分遺憾的。一個人給關在一個地方，連與同伴共處之樂也失掉了。有時，監獄的鐵門，因為看守員之出入，偶然一開，為時雖暫，亦得一睹門外景色。深覺怦然開門之聲到來，也就等於身在獄外，感到無限的快樂。然而不久也就產生了一種相反的結果，因為門開為時過暫，景物一瞥即逝，心中煩惱之情，油然而生。反覺不如毫無得見為佳。後來，門雖怦然作響，我反而有意掉頭他顧，以避免那種一瞥即逝

所產生的苦悶。

這些時候，茄娜的病和獄外的政治活動，也甚令我不快。

茄夢娜終於又跌入老病的掌握之中了。我心中雖焦急，然而一籌莫展。我明知自己如果在她的身旁，她的病一定較輕。可是，身在獄中，有翼難飛，徒勞幻想。

在德赫拉東的監獄中，每天均可讀報。由報紙上得知，國民大會在巴特拉召開了一次全印委員會。三年以來，國民大會都被視為非法團體，無法召集會議。然而，在這次三年以來的第一次大會之中，對於三年以來國內所發生的大事，以及國際局勢的大變動，參加開會的人們，都未曾予以討論。甘地咭還是他從前那種迭克推多的老態度，仍然說着：「如果你們要擁護我的領導，你們得接受我的主張。」他告訴全印委員會說，大家必須遵行常務委員會的議決案。之後，他竟自去了。

這時的國民大會，分成了兩個主要集團。一個希望在法律許可的範圍以內，從事爭取良好憲法的鬥爭。另一個，則懷抱着一種頗為模糊的社會主義之革命的企圖。會中大多數人士，對此兩派，都不甚贊成。他們一方面不想返歸到憲法鬥爭的舊路，另一方面，也怕社會主義式的改革，將不利於本身。彷徨無所適從之餘，他們又把希望寄托在甘地咭的身上，唯甘地咭之馬首是瞻。因為甘地咭當時袒護憲法鬥爭的路綫，這一派便在會中佔了優勢了。——在這種局勢之下，對於國內的大事，即使作長久的討論，大概也無甚用處罷！結果所屆，國民大會大開倒車。領導者

們都在憲法問題上大兜圈子了。

這時的國民大會，政府已撤消禁令，又成爲合法團體了。但是，很多和大會有關的組織，仍被目爲非法。其中如「農民組合」，很多教育團體，「職工聯合會」，「青年同盟」以及某些少年團體，都還是非法的。當時，邊區省的紅衫社，也屬於非法組織。這一團體，自一九三一年起，便已成爲國民大會的組織之一。並在邊區省代表着國民大會。所以，這時的國民大會，雖然一般地撤消了他的攻勢行動的文明抵抗，返歸於憲法範圍之內的活動，而政府方面，卻仍保留着因文明抵抗而頒佈的各種法律，繼續禁止國民大會的主要附屬團體之活動。仍目之爲非法。對於「農民組合」和「職工聯合會」的壓迫，更爲注意。同時，很多官方人士，卻鼓勵着大地主們以及收稅區主們，叫他們自己組織起來。政府方面對於這些地主的組織，特別予以各種便利。在聯合省方面，大地主和收稅區主們的租稅，甚至於還由政府收稅機關代他們徵收呢！

印度教大乘會的一位祕書，甚至於很贊成政府對邊區省紅衫社的壓迫，公開表示。我得知這一消息，心中萬分憤怒。即便離開原則方面的問題不談，而邊區省的人民，在這次的鬥爭之中，視爲英勇，也受到很多痛苦，這是衆所週知的事。並且，他們的領袖之一的加法爾汗 (Khan Asadullah Khan) ，此刻仍在獄中，他是我們印度的一位最英勇的戰鬥員。我聽到這位印度教大乘會的祕書的理論以後，一方面很同情加法爾汗，一方面痛恨大乘會之無恥。當天下午，正當暑氣炎熱之中，我在獄中打盹，做了一個奇怪的夢，我夢見加法爾汗正在英勇地奮鬥之餘，復

爲四面八方之人所攻擊。我使奮身仗劍而起，爲保護加法爾汗而與各方面的攻擊作戰。甦醒之後，十分疲倦。枕頭已爲淚所濕。

在這一段時期以內，公私雙方，多多不愜人意。我在獄中的生活，可謂空前痛苦。每每在夜里睡不着，或者在夢中驚悸，大叫而甦。

正當我最感苦悶的這些時候，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的一項議決案，增加了我的苦悶與傷心。這議決案說：「因鑒於今日之修談私有財產之沒收以及階級鬥爭之必須」，故有此決議。接着，又喚起大家對加拉契大會的主張，說：「既不主張無正當理由即沒收私人之財產而不予賠償，亦不提倡階級鬥爭。國民大會的主張，以爲沒收私產和階級鬥爭，均與大會之非暴力的原則，互相違背。」這一決議，無疑地是在憲法鬥爭派佔上風的會議上通過的，其目的係用之以對付當時新組成的國民大會社會主義派(Congress Socialist Party)的。事實上，這一派的負責人士，誰也沒有談起過沒收私人財產的話。至於階級鬥爭，也不過往往在理論上說明其業已存在而已。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的這一決議案，似乎是向大家暗示，有誰相信階級鬥爭之存在，即不能成爲國民大會之一級的會員。這一議決案之目的，顯而易見，蓋在於爭取國內有產者階級對憲法鬥爭派的支持，而在下次立法議院選舉之時，好佔多一點的席位。同時，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越來越向右轉。對於很多的落伍者以及國內的溫和派與保守分子，都開始去作聯絡工作了。甚至於在那些一向和國民大會敵對，當文明抵抗進行之際站在政府方面的人士面前，也去說好話了。國民大

會之中的「騷擾」而「善於批評他人的」左翼分子，這一來，成爲他們這次「轉變」的障礙物了，勢非予以肅清不可。這次的決議案以及很多個別的談話，都已說明，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對於這次業已決定的新路線，決定堅持到底，決不爲左翼分子的「吹毛求疵」的批評所動。如果左翼分子不如議決案行動，便可以把他們驅出會外去。國民大會議院委員會 (Parliamentary Board of the Congress) 所發表的宣言，其語調之謹慎小心，態度之溫和馴服，實爲過去十五年來所僅見。

此時在政府方面，則趾高氣揚。深慶這次對文明抵抗運動之壓迫的成功。他們決定繼續此項高壓政策，尤其對國民大會中，農民羣中和工人羣中的前進分子，肆意壓迫。他們知道，雖然國民大會已成爲合法團體，而政府對於前進分子予以壓迫，國民大會的領袖們，不但不會抗議，而且，一定是贊助的。

我在獄中得悉這時的此種反動情形，苦悶之情，實難於言說。覺得現在一切既然不滿人意，便開始把已往的事，重新一一洄溯。並且，用很理智的態度，把過往的一切，加以檢討。看看在過去若干年之中，究竟有多少工作是正確的，而其正確又到如何的程度？有多少工作是錯誤的，而其錯誤又到如何的程度。同時，覺得把心中所想及評及的事，一一筆之於書，或亦不無用處，一方面又可以藉此消磨獄中的長久而寂寞苦悶的年月，於是，我從一九三四年六月起，便在德赫拉東監獄中開始這本自傳式的散文之撰寫。差不多一共八個月之久，都繼續不斷地寫着。

七月底，茄夢娜的病狀轉劇，數日以來，都在危險期之中。八月十一日夜，我突然被帶出監獄，由警察解到阿拉哈巴德。第二天上午，當我抵達普拉雅格 (Prayag) 車站的時候，該地的縣長告訴我，我已被暫時釋放出獄，目的在於使我能夠出來看茄夢娜的病。

這，是我被捕後六個月差一天的一日。

三五 茄夢娜之病

出獄是暫時的，一二天之內，即須回去。只要醫生認為對於茄夢娜的病體不是絕對需要之時，隨時均得回獄。在獄外的時間，不論長短，如有一定，便可支配而予以利用，然而，這次卻是不定的時間，使我無法計劃做事。

這次的忽然更動，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我事先並沒有料想到。忽然之間，由一個冷靜的生活環境，走到一個充滿了醫生、朋友和家人的環境來。我的女兒芭底娜，也由參丁尼客坦回來探病。這種生活與獄中生活，其空氣是完全不同的。然而，在這種熱鬧而又充滿了安慰與舒適的空氣之中，我仍然有着一種焦急苦惱之感，即是對於茄夢娜之病的耽心。

她躺在床上，骨瘦如柴，身體十分虛弱，正與病魔苦鬥。想到她可能離開自己而長逝，心中萬分傷心。坐在她的病床之側，漫溯往事，真是無限傷感。想起結婚當日的情形以及其後若干年的事來，我們結婚以來，已經十八年半；那時，我是二十六歲，茄夢娜才十七歲。她當時正是一個未諳世故的女郎，身段苗條，年輕美麗。我們兩人的年齡相差甚大。然而，在觀念上的相差尤大。因為我已是一個成人，她還十分年輕，彼此腦中思想，大不相同。當時，我自己雖然業已成

人，但亦仍然不無孩子氣。一點不會想到這位溫柔而慧敏的女郎的心，好像一朵剛剛開放的花苞，甚需要溫柔而小心的照顧。我們當年彼此愛慕，過得很好，但因兩人思想的程度相差懸殊，所考慮者各有不同，往往彼此之間，仍多不相盡合之處。當時爲了一些瑣碎的小事，而發生口角，有時處理不當，結果形成衝突。不過，這種所謂「少年夫妻吵架」，往往爲時極暫，在很短的時間內，又復和好如初了。我們兩人都有着一種快發的脾氣，一種敏感的天性，一種保持自尊心的孩子氣的觀念。雖然如此，我們的愛情仍深，婚後二十一個月的時候，便生產了唯一的女兒英底娜。

結婚之後，便來了很多的革命工作。結婚當年，正是「自治同盟運動」極盛一時之際，我專心致志於革命工作。不久，又來了「旁遮布的戒嚴令事件」和「不合作運動」，我更越來越專心於革命，不顧一切，也差不多是忘掉了她。正當她迫切地需要伴侶之時，我竟完全忙於工作，將她遺忘。讓她一人留在家中，過其孤寂生活。然而，茹夢娜却一聲不響，並且竭力安慰我，協助我，鼓勵我。她把被人遺忘之苦，埋在肚里。然而，我們之間之愛，也因此日深。

不久，她的時疫時止的病來了。而我呢，又時常到獄中去生活。我們只能在很長的時間隔離之後，在監獄探望時，得暫時之晤談。後來，文明抵抗運動的狂潮，也把她捲入了實際鬥爭的旋渦。也和我同樣入獄，過監獄生活。我們的心，因此更爲接近。因爲不容易見面，所以對於見面的機會，十分寶貴。往往屈指計算時日，渴望着面會之日之到來。我們雙方，永遠不會疲倦，每

次會面之際，在短短的談話中，總有着不少變的新成分加入，使我們的愛情，永遠新鮮，不會發生陳腐之感。我們彼此常時由對方身上，作新的發見，即使這些新發見是令人不高興的東西也好。在我們之間，有些屬於成人性質的衝突，也往往含有不少的孩子氣。

雖然結婚了十八年之久，茄夢娜一如昔日之天真美麗，而我則屢經困難，變了許多。我雖然在性質上還有着一點孩子氣，也還活潑，然而，面容卻使人看出業已「老成」了。頭髮已見灰色，額頭亦有皺紋，眼睛也有陰些影了。最近四年以來，各種問題，各種麻煩，使我愈見蒼老。而她卻仍然年輕美麗。所以，近年以來，當我們有時一塊到一個新的地方去的時候，人們有的竟把她錯認為我的女兒。她和英底娜差不多全像一雙姊妹。

在此十八年的結婚生活之內，我不知化了多少年月，生活在監獄之中，而茄夢娜呢，也不知化了多少年月，臥病於病床之上。究竟會有幾何年月，是我們快樂相處的時候呢？而現在，我仍是一名囚徒，只因她而暫時出獄，她呢，又臥在床上與死神鬥爭。想到此地，我不免略略發她的脾氣，恨她對於自己的身體，馬馬虎虎，以致如此。但是，同時又想，怎好責備她呢？印度在爲人奴隸的狀態之下，正值偉大的民族革命鬥爭之際，她常覺自己無能，未得參與行動，中心很慙。既不能投身實際戰鬥之中，而內心的火，又復熊熊地燃燒着，無寄托之所因此損及身體的健康，故走到今日的病境。罪過似乎也不能完全歸在她一人的身上。

正當我迫切地需要她的此時，她總不會竟瞑目長逝罷？我們正開始真正地彼此了解呀！我們

的共同生活，剛剛開始呀！我們互相依靠，有着很多的工作，必須一塊兒去做的呀！

我這樣地在她的病床之側沉思，幾無一日一時離開她。

很多同事和屬友們，都來看我。他們告訴我很多最近發生的事體，也開我很多關於政治方面的問題。但是，對於他們提出來的問題，我都沒有答覆。一來，因為心中正為蕭夢娜的病所苦惱，無暇及此；二來，在很久的與世隔離的監獄生活之後，對於局勢未有完全之了解，也不能馬上作任何斷言。長時期的鬥爭經驗告訴我，不能依靠在獄中所得的少許情報而認識、判斷獄外的局勢。要想有正確的意見，對於實際，必先有多方面的親身接觸。不然，所發表的意見，亦必多學究之論，與現實不相適合。再者，我既然尚未能和國民大會的同事們親身討論各項問題，驟然批評國民大會的政策及甘地咕或者別的領袖，似乎也不妥當。另一方面，我也不願意作任何積極的建議，因為一時既然未能出獄，我也不想去考慮這類的問題。

除這些考慮而外，我還想到，政府之讓我暫時出獄，其目的在於使我能來看蕭夢娜的病，我自己也不該利用這個機會作政治活動之用。我雖然並未向政府提供任何保證：決定不利用此種機會作政治活動之用，但是，心中也仍然以為不應如此做去。

除了闢謠性質的申明而外，我也避免發表任何方面的申明。即在私人生活內，我也避免談及目前的政治局勢。可是，我對於過去的事體，卻自由地批評其得失。國民大會社會主義派，剛剛組成不久。我很多親密的友人，都已加入其中活動。該派的政策，與我的思想一致。不過，這並

織是一個頗爲混雜的團體。當時即使我自己有着行動的自由，我也未必加入。不過，當時關於地方事體，卻略略顧及。就在我出獄的那些時候，阿拉哈巴德正在作國民大會地方委員會之選舉。這時會發生過一些惡劣的選舉戰。有時個人之間發生衝突，我被請去調解，我也去。不過，這種選舉戰，性質相當惡劣，我心中甚不贊成。並且想到如果自己必須在這樣的環境中工作，倒很討厭的！

這時，我曾寫過一封信給甘地咭，向他報告茄夢娜的病況。同時，因爲料想自己不久即將入獄，恐再無談話機會，便在信中把幾個月來自己的思想，略爲提及。因爲近來的事體，很使我不快，這封信也就不免反映出這些不快的色彩。不過，我並未作任何建議，以爲何事該做，何事不該做。我只把自己對於過往各事的反映，告訴甘地咭而已。後來才知道，這封信，曾大大地使甘地咭感到苦惱。

自我回家以後，茄夢娜的病狀，好了不少。我每天都等候着政府召回獄中的命令。政府方面，也日日催促醫生，把茄夢娜的病況，逐日報告。

政府對我的徒刑，那時本擬結束，予以釋放。但是，因了兩樁事體，終於停止了。第一樁，是因爲國民大會將於十月在孟買召開秋季大會；第二樁是十一月里的議院選舉。如果我被釋出獄，一定又成爲這兩個場合的麻煩因素。因此，又得叫回去再關三個月，讓這兩樁事過去以後，再放出來。不過，當時完全不必回去的可能性也很大，此種空氣日濃一日，我幾乎準備坐定下來了。

。但是，在我出獄之第十一日，即八月二十三日的那天，一位警察官坐了車子來了。他下車來告訴我說，時間已到，要我上車到賴力監獄去。於是，我便和家人告別，登車而去。當我要踏上車子去的時候，我那仍在病中的老母，張開兩臂跑上前來送我。她當時的面容，一直緊纏着我，很久很久之後，我仍然無法忘掉。

這次，爲了茄夢娜的病，在家中勾留了一共十一天。

這一來，又被提回獄中。我心里覺得自己好像成了一個雞毛毬子，給入踢進踢出了。

賴力監獄，也是老地方。從前在此地曾住過很久。這次心中打算，頂好仍能夠回到從前住的那間老牢房去。那間小屋子很好，有一個涼台，還有我的妹夫雷吉特從前栽下的一些花草。可是，事與願違，這間六號牢房已經關了一位「拘押犯」。把我和他關在一起，在當局看來，是不很妥當的。所以，把我關在另外一間牢房里去了。這間房子比較悶塞，也無花草可見。不過，我覺得居處所在，於我倒無甚要緊，因爲我的心是可以各地週遊的。

這次回家，當然使茄夢娜的病稍微好了一點，可是，這一點點好轉，仍然經不起我重回獄中的打擊。果然又漸漸重了起來。回獄中後，最初每天還得到關於茄夢娜的病狀報告看。這些報告，是由醫生打電話報告警察總署，再由警察總署轉知監獄的。但是，後來不久，這病狀報告也停止了，然而，茄夢娜的病，卻日益深沉下去。

等候消息之焦急和知道壞消息後的痛苦，使我坐臥不安。時間好像特別以最小的速度前進似

的。我料想孟買大會閉會後，當可獲釋出獄了。這也不過是幾個月的光景。然而對於這兩三個月，簡直覺得是無限長了，忍耐不下去。再度入獄一個月後的一天，警察忽然來把我帶出獄去，去看茄夢娜的病。並且告訴我，以後每星期可以這樣地出去看她二次。回來以後，專心等候第四天之到來。第四天來了，又去了。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都來了，又都去了。總不見警察來帶我出去。同時，茄夢娜的病又重入危險期。我覺得他們好像是在和我開玩笑了。

苦惱的九月，終於過去了。這時，由各方面傳來的消息，說，如果我願意提供保證（即使是非正式的保證也可以），保證在刑期未滿的這一段時期以內，不與政治活動接觸，則政府便可以把我釋放，不必再坐牢了。這時，我本也不想參加當時的政治活動。同時，在獄外這一天所看見的政治，也真使我感到厭惡，不攪染指。然而，向政府「提供保證」嗎？我不！我認爲這是不忠於自己的誓言，不忠於偉大的事業，而且，不忠於自己的同志，也不忠於自己。這是一個絕不可罷的條件。這樣做去，我以爲不啻在自己的靈魂上刻上一條傷痕，是侮辱了我認爲神聖的一切事物。他們還告訴我，說，茄夢娜的病越來越沉重了，我之出獄與否，關係她的生死。當時，我心目中，難道自己的尊嚴，會比茄夢娜的生命還要緊嗎？我可以保存自己一己之私慾，而讓妻子作這種私慾的犧牲嗎？心中覺得十分苦悶，進退爲難，不知如何是好。但是，這種苦悶，當時並未麻煩我。我斷定茄夢娜本人也決不贊成我爲了她之故而向政府提供此種保證的。如果我這樣地做了，一定反而嚇了她，使她傷心的。

十月初，他們又把我帶回家中看她的病。這時，茄夢娜正臥床中，已入半睡狀態。身上正發着高度的熱。她當然是萬分迫切地希望得見我在她的身旁，但是，當我向她告辭要回獄中去的時候，她勇敢地向我微笑，用手招呼我到她面前去，叫我俯身下來。我照樣做了，她低聲說道：「向他們提供保證嗎？這算什麼？決不要如此！」

當我在獄外那十一天的時候，本來已經決定，只要她的病體稍爲好了一點可以移動時，便把她送到另外的地方去療治。但是，病卻無好轉趨勢，反而日益惡化。結果，決定不再老等好轉，一任其日趨不治，乃決定不管如何，馬上轉移到萬山叢中的波華里(Bohali)去。當她準備離開到波華里去的前一天，他們又把我帶出去看她，好像是告別。當時病已沉重，我心中萬分悲哀。我想，什麼時候才能再和她見面呢？會不會從此永別呢？這一天，茄夢娜的顏色却很愉快。我因此心中也略覺高興了。她去了三星期以後，政府又把我送到阿爾莫拉縣(Almorah)去。因爲這樣可以使我能够常和茄夢娜接近。我們乘車到阿爾莫拉去的那一天，因爲茄夢娜療治之所就在途中，我們便在中途下車，前去看她。在她的住所坐了好幾個鐘頭。我看見她的身體好了許多，心中很愉快。便高高興興地登車而去，到阿爾莫拉縣監獄去坐牢去了。

從此時起，我就給關在阿爾莫拉縣的監獄內。此地建築雖甚簡陋，而地位寬敞，空氣也很好。每天我均可以在露天里晒太陽，看飛雲。有時看看天上的雲霞千變萬化，心中怡然自得，暫時忘掉了別的很多事，也忘掉了很多悲哀。盡心欣賞自然之美。我寧可生活在這簡陋而寬敞的地

方，不願在那窄小的牢房裏。這裏當然不免較為寂寞，但我寧可忍受這種寂寞。不過，心中也仍就心着茄夢娜那時愈時發的病。聽到一點不好的消息，常時使我心中不寧很久。在心志不寧之時，我便向山中新鮮空氣尋找安慰。然而這一次我卻比從前任何一次更希望出獄。看看孟買大會開過了，十一月來了又去了，議院選舉的風波也過去了，然而，我仍然留在獄中，不知是何道理。

正當此時，忽然傳來了加法爾汗又被捕定罪的消息。同時，政府還下了很多禁令給鮑斯(Bhāsa Bose)「註一」，禁止這樣，禁止那樣。鮑斯，是一位印度人士大家尊敬的革命者。他爲了父親的病，冒着自己的病，由歐洲趕回家來，不幸來不及得見父親之死。政府當時的這種行動，完全表示他們的一種不放鬆印度人的觀念。我因此想，政府態度既然如此，則我之被釋出獄，尤爲無望了。後來，政府的公報，果然證明這一猜想。

到阿爾莫拉監獄一月後，他們又曾把我帶出去看茄夢娜的病。自此以後，三星期去看一次。當我去看她的時候，和她閒談，在我自己覺得很高興，在她，病也因此漸漸好了一點。這時，我母親也病在孟買。我也常時接到關於她的病狀報告。我成爲專聽病人消息的人了。

註一：現已投入軸心懷抱，作了「印奸」。

三六 吾人之目標，究何在乎？

在獄中，由報紙上得悉這次國民大會孟買會議的情形。在會場上，有兩齣顯著的事體：一方面，甘地咭在會中，仍是佔優勢的人物，另一方面，有着由馬拉維亞喀和阿勃(Adab)領導着的分區自治主義的反動空氣之存在。

這次會後，甘地咭決定暫由國民大會引退。這不但是在國民大會的歷史上翻開了新的一頁，同時，這可說也是印度現代史中的重要事件。不過，在外表上雖是如此，實際情形則不盡然。因為，不管甘地咭願意與否，他個人在國民大會中的優勢地位，總一如往昔。所以，甘地咭之引退，似亦不甚有重大關係。

這次大會，通過了一個議決案，主張召集憲法會議，以自己決定印度的憲法。這使我聽了高興。我以為，這樣一個會議，無論如何，總有一天必須出現。而且，印度的憲法問題，除了以這種形式解決而外，亦別無他路。不過，事實也非常明顯，除非印度成功一次勝利的革命，不然，這樣的會議，當英國政府不予同意之時，欲望召集，乃決不可能之事。而在目下環境當中，要使英國政府同意，也一樣地不可能。所以，除非印度已經有了很大的力量作為背景，一次真正的

這種會議，還是不可能的。並且，一切政治問題，也都必須在印度有着一種力量之時，才能作澈底之解決。

這時，倫敦方面和英國在印度的政府，對於此案的反應，是饒有趣味的。由半官方面的消息得知，政府是同意的。很明顯的，他們之所以同意，是把牠認為和從前「各黨會議」一般的老花樣，其前途是一定要失敗的。所以，不妨同意牠，這叫「惠而不費」。並且，藉此還可以增強自己的地位。但是，後來漸漸看出這議決案的危險性和可能性，便開始來猛烈地反對牠了。

孟買大會閉幕之後，接着便來了議院選舉。我對當時國民大會的議院活動的綱領，雖然毫無熱心，但却十分有趣於這次選舉。並且，也很希望國民大會獲得勝利。戰勝其目前的敵人。這些敵人之中，是分區自治派以及一些流氓分子和一向拚死力支持英國政府的壓迫政策的一些人們。結果，國民大會果然獲得勝利。把不少的壞分子趕出議院了。

議院選舉結束不久，印度憲法改革聯合議院委員會(Joint Parliamentary Committee on Indian Constitution Reform)的報告書發表了。在各色各樣對報告書的批評中，所強調的，都是指出報告書內容表示出英國政府對印度人的「不信任」和「懷疑」，認為這是不對的。這在我看來，完全錯誤。我頗引以為異。我覺得，由此種觀點去看印度民族的、社會的問題，是不對的。難道英國與印度之間，並沒有存在着基本上的衝突嗎？目下的問題，實在是要看那一方面的勢力可佔優勢。難道印度還能承認英國的帝國政策在印度繼續存在下去嗎？英國的看法，一定要印度

依照英國的旨趣「自治」，印度如果表示確有此種能力，足以在這種條件之下「自治」。那時，英國對於印度的「保護」，當然可以取消。英國現在對印度「不信任」，「懷疑」。即是「不信任」這一點，「懷疑」這一點。這還得強調地指出嗎？如果印度打算讓英國的帝國政策長久地繼續下去，那還有什麼好說的呢？如果英國「信任」了，不「懷疑」了，則印度之前途，究何在乎？這次英國究竟打主義把多少自由給予印度，可由印度最溫和最落伍的集團，對此事的反應得知。因為，連他們也反對這項報告書了。有的甚至還十分激烈地批評，目之為反動。有鑒於報告書內容之不利，連自由黨人，也知道無法維持他們的理想，無法主張把印度變成英國統治下的自治領了。

這時，自由黨的領袖們以及一部分國民大會的人士，把印度的前途希望，寄託在英國工黨（Labour Party）的勝利之上，希望英國由工黨來組織政府。當然，我們若不努力去和英國國內的進步分子合作，或者，不去利用英國工黨在英國的勝利以裨益於自己，那是毫無理由的。但是，如果完全以絕望的態度依靠他，把印度的前途，寄託在命運的轉變上，實在有傷國家尊嚴，有損民族光榮。即使對尊嚴光榮之類而不顧，這也是完全毫無常識的希望。印度為什麼要如此地依靠英國的工黨呢？印度曾經碰到過兩次的工黨內閣了。應該還記得他們給我們的禮物罷？這些禮物，究竟是什麼東西呢？一九三四年南港會議（Southport Conference）時，美農（Mr. V. K. Krishna Menon）提出一個提案：「表示深信『給予印度建立完全自治政府之權』的自決原則，

應該立刻廢行。」亨德孫先生 (Mr. Arthur Henderson) 卽力言必須從速收回此項提案。並且，非常坦白地拒絕代表執政者提供保證，對印度自決的政策，予以實行。他說：

「吾人業已明白宣稱，一俟可能之時，吾人卽將就關於印度人民之各方面，必須使人人滿意。」

這就正是前次工黨政府的政策，此種政策的結局是：圓桌會議，白皮書，印度憲法改革聯合議院委員會報告書以及印度法案 (Indian Act) 等等。

其實，講到大英帝國的「對印政策」，英國的保守黨 (Tory) 和工黨之間，幾乎完全一致。當然，工黨的一般的人士，相當前進，這確是事實。但是，這種前進，與他們那些富於保守性的領導者的思想行動，均無關係。也許，工黨的左翼分子，有一天會得勢，但是，印度的民族運動能够靜待這種局勢以解決其問題嗎？

圓桌會議最顯明的一個結果，不過把土藩國王公們推上前來而已。保守黨死硬派對這些王公們及其「獨立」十分關心，這種關心，使他們活躍起來了。從前，他們對於英國人的話，不敢說一個「不」字。英國政府人員，對他們的態度，簡直是公開的侮辱；他們國家的內政，也屢屢被英人干涉。直到現在，有好些土藩國還是直接地或間接地被「借用」的英國官吏所統治。但是，這次邱吉爾 (Mr. Churchill) 和諾索米爾 (Lord Rothermere) 的爭論，才好像把印度的英國政府的氣勢稍稍減殺，不大敢肆意地干涉他們的內政了。這些王公們也因此神氣地說起話來了。

在獄中靜靜地注視着事態的演變。我覺得當時政治活動界所呈現出來的一切外表現象，都是空虛的，完全外表的。牠們那實實在在的背景，是一絲一毫也還沒有改變。這些背景是什麼呢？是：對印度自由的不斷的壓迫；民族革命運動，到處都受到阻礙，受到挫折，一種鼓勵反動勢力的傾向，則遍於全國；很多人還在獄中受苦，寂寞地度其實貴的年華；他們的家人親族爲痛苦所侵蝕；不少的組織，仍被目爲不合法團體，在在受到壓迫；緊急治罪法 (Emergency Power) 以及叛亂鎮壓條例 (Tranquillity Acts) 等等，殘酷地施行着；不少的書籍以及各種定期刊物受到壓迫，或者，根據海關條例 (Sea Customs Acts) 禁止入境；發表含危險性的文學作品，可以成爲長時期徒刑的原因；不准公開地談論政治的或經濟的問題；對蘇聯社會文化方面的實況作贊成之言論，尤爲危險。現代雜誌 (Modern Review) 因爲刊載過一篇泰戈爾先生遊蘇回印後所寫的關於蘇聯的文章，便受到孟加拉政府警告。以上這些，便是當時的政治活動界一切現象的背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印度政治活動界正提倡着改革啦，以及組織責任政府呀之類的事。

這時，由國際的範圍而論，各方面正大大地變動着，舊的世界即將死亡，新的世界即將到來。尤其是世界上的經濟方面的變動，其意義爲尤大。十九世紀的體系，已漸漸成爲過去，不能適用於現代了。

我們必須正面地對着很多問題，而且，必須勇敢地去正視他們。現在，既存的社會經濟的體系，既然不能大量地改善大眾的生活條件，牠還有資格繼續存在嗎？有沒有別的體系可以勝任此

種任務呢？僅僅是政治的改革，能够實現根本的改善到如何程度呢？如果英國的投資利益妨礙到我們心中所希望的革命變革，難道我們還能犧牲大眾之利益以維護這種投資利益嗎？當然，我們的目的，也並不是一定要害及這些投資利益。但是，我們一定得阻止牠們，使牠們不去害及別人。如果我們能和這些投資利益妥協，我們也未嘗不願意。對於此，其當與不當，人們容有不同之意見。然而，誰也相信獲得和平解決之爲得計。這一種解決，當然絕對不是消滅了一種投資利益後，又以另一種投資利益代之。無論何時，只要可能而且可行，則出以合理的賠償形式，蓋亦未嘗不可。因爲，如果彼此衝突，則其損失或將更大於此。可是，不幸的是，一切歷史告訴我們，投資利益對於此種妥協，決不接受。已經在社會上失掉了主導作用的階級，也往往連智慧也失掉了。他們寧可作全勝全敗的賭博，因此之故，他們也被注定必須全敗而衰亡下去了。

當考慮變革既存秩序之際，我們必須估計及物質與精神雙方之損失爲何如。我們決不可過於短視。必須認清其於人類幸福與物質精神雙方之進步的影響爲何如？我們心中亦必須記清，如不改革此種秩序，則其所受之損失與痛苦又何如？如此權衡輕重，以定選擇。

當然，社會主義所示之巨大變革，自然不能以卒然之間，通過少數法律而達其目的。如果我們必須在印度建立社會主義的體系，則不能靠一時之衝動爲之，亦不能以肆意破壞毀滅爲手段。當然，有很多障礙必須剷除。但是，應該認清，我們的目標是生產而非破壞。是把目前的「不足」，變爲將來的「有餘」。爲要如此做去，則道路必須掃清。很多的阻礙，各種自私自利，舉凡

足以使社會倒退者，均須剷除。我們所欲邁行的路，完全與愛惡無關。而必須其在經濟上說，是正確的，能够進步，能够適應環境，能够爲大多數人謀幸福，這才是我們應該邁行的路線。

利益之間的彼此衝突，似乎已是無法避免之事。此間蓋別無他路。我們每個人均應作理智之選擇，究竟應立於何方。我們必先知道，先了解，始能加以選擇。對於社會主義，如果只有情緒上的衝動，是不夠的；此外，必須有一種以事實、理論和詳盡的批判作爲基礎而產生的理智的認識，始克有效。在西方，有着很多關於這一方面的述作，而在我們印度，則大感缺乏。很多書籍都被禁止入口。不過，如果只讀在他國所出版的書籍，也不夠。如果我們必須在印度建立社會主義，則這種社會主義，必須由印度的環境中產生出來。因此，我們對於印度的環境，作深入之研究，實爲必須之舉。我們目下缺少能够研究、設計各種計劃的專門人才。很不幸，我們所有的專家，差不多都在爲英國政府工作，或者，在半官的大學校之內。他們在這一方面，不敢走得太遠。

要實現社會主義，僅有一種學術上的背景，仍然不够；別的力量，仍爲必需。不過，我覺得，如果沒有這種學術上的背景，我們即永遠無法得到要領。永不能創造一個强有力的運動。在印度，目下的土地問題是萬分重要的，未來，或者仍將屬於重要問題。但是，工業日趨成長，其重要性亦不減於此。然則，吾人之目標，究何在乎？一個農業國家呢？或者，一個工業國家？不消說，印度將仍是一個以農業佔優勢的國家。不過，我以爲我們必須而且可能力促工業之高度發

展。

我們印度的工業巨擘們，在意識上仍十分落後；他們甚至不能被目為現代的資本家。至於勞苦大眾，也仍十分貧弱。他們甚至於還不能認識他們是主要的消費者，也不會為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而奮鬥。印度的工業巨擘們，對印度的工業之全般認識，還是屬於十九世紀早年的方法。他們見有機可乘，即設法增加其利潤，工人們則一如往日地繼續着。如果物價跌落，他們便大聲埋怨，說，無法支持了，非減低工資不可。他們不但得到國家之協助，甚至也得到中產階級的政治家們的同情。如果把他們的奢侈生活和工人們的窮相一相比較，我們即可獲得一種很深刻的教訓。然而，對於這種對比，我們往往視之為當然，竟馬馬虎虎地讓其過去。並未予以應得之注意。

這是產業工人的命運，其困苦已如此。但是，如果僅就收入之多寡而論，他們比較起農人們來，似又好了很多。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間，旁遮布的農民，每人每日的平均收入為九個安拿 (Annas)，約值九個辨士。這數目到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之間，降為九個派士 (Piea)，約合三個法尋 (Fardings)〔註一〕然而，旁遮布的農民，一向是被認為比較聯合省的、貝哈爾的以及孟加拉的農民為幸福的。在聯合省東部區域如哥拉克普爾 (Gorakhpore) 等地，在不景氣之前的繁榮時代，每人每日的平均收入，只是兩個安拿囉！

對於此種苦狀，吾人究將何以除之呢？印度人民之境地如是低落，欲想提高，誠非易事，然

而，方法無疑是可能找尋出來的。所以，真正的困難，其實來自獲利集團之反對變革，同時，在英國的勢力佔優勢的今日，任何變革均成爲不可能。然則印度最近之將來的可能方向如何呢？現在看去最可能的兩種趨勢，一爲法西斯主義，另一爲共產主義。動搖於此二者之間的，漸漸消失了。

我在獄中對於目下各事，如此地作模糊而學究式的言論。不過，我也深信，當可能行動之時，我決不致於躲避的。在獄中看來，一切活動都遠離着我。我寫着關於印度政治以及有關金世界的各種事體，然而，這些東西，對於業已成爲我的「家庭」的這監獄小天地，有何用處呢？一個犯人，自有其最最主要的趣味，那是他自己的出獄之期。別的均屬次要。

註一：一法尋合四分之一辨士，乃英國最小之銅幣。

三七 結尾

我的故事，差不多就要結束了。這篇自我的敘述，寫至今日（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為止，我現在正在阿爾莫拉縣監獄之中。三個月以前的今天，我在獄中過了我的四十五歲的生日。我想，我還有很多年可以活在世上。我有時有一種年事已大之感，有一種老邁之感，有時又覺得生氣蓬勃，精力充沛。我身體既壯，心志也往往有一種能在打擊之後很快恢復的能力。因此之故，我想，如果沒有什麼突變發生，我總還可以生活很久的。不過，未來之事，此時無從下筆，必須先過了生活，才有文章好寫。

我的這些冒險故事，也許並不動人，因為，呆坐獄中，差不多不能稱之為「冒險」。同時，我這種生活，也不是獨一無二的。這種生活，差不多是我們很多男女同志的共同生活，不足為奇。我曾經是羣衆之一員，和他一塊而前進，受他的影響。然而，我同時也還仍是一個「個人」，與別的人們分離，而在羣衆的當中，度自己的個別生活。這些過往的年月，曾經帶給我一件可貴的禮物：牠使我漸漸把人生認為是一種饒有趣味的冒險了。其中有不少的東西，可資學習，有不少的事體必須去做。我漸漸因牠而感覺到自己日漸成長。這種感覺，現在也還有着。牠給我的影

響，是喜歡活動，喜歡讀書。一般地，把我的全部生活，變得很有價值。

當我撰寫這本自傳之時，每當敘述過往的某樁事體的時候，我總力求把當時我的感情依事實表達出來。不過，重新把握過往的情感，誠非易事。而吾人於最後所發生的事體，又往往不能忘懷。因此之故，後來的觀念，不可避免地，在敘述過往的事體時，予以影響。也許，即以此故，我所寫下來的東西，可能不是我的真正的歷史事實。而是我有時想要如此去做，或希望我能够如此的情形而已。

在遠處的高山看去似乎很容易爬上去似的，然而，每當吾人爬上之時，困難却多。而且，越爬得高，旅程之辛苦愈甚，而山頂反而籠罩在雲端里去了。雖然如此，這種「爬」，到底也是很值得的。而且，在爬的過程之中，往往自得其樂。也許賜人生以價值的，乃是途中之奮鬥，而不是最終目的之到達罷！那一條路是正確之路，常是難於認清的，然而，不正確之路，有時反覺較易認清。而能够避免不正之路，到底也已經是相當了不起的了。我想，我在這兒可以引用偉大的蘇格拉底 (Socrates) 臨終的一句話罷！他說：

「我尚不知死為何物——牠可能是一件良善的事。我並不怕牠；但是，我確實業已知道，拋棄自己的立場主張，確是一件惡劣的事。因此，我寧可選擇可能是良善的東西，而不要已經知道是惡劣的東西。」

我在監獄之中消磨去了的這許多年月啊！我獨自地坐着，沉入思考之中，而不知多少季節已

如流水而去，一個隨着一個地向無底之淵逝去了。我不知看見過多少皎月亮的虧，誠不知物換星移，春秋幾度，不知有多少的我的青春的「昨日」，即埋葬於此！有時，我好像看見那些已死的昨日之鬼，再度出現於我的前面，把過往的記憶，帶到我的面前，細聲地問我道：「牠有價值嗎？」對這個問題之答覆，是不必躊躇的。如果我還有機會用我現在的經驗和知識重新再過一次這些生活，無疑的，在私人生活方面，我將有很多地方要予以更改；我從前做過的很多事體，好些地方一定得加以改良。但是，對於好些在公衆面前的有關公衆之事的重大決定，我必仍然一絲不改。真的，我完全不能改變牠們。因為牠們較我本身爲強大，而一種我自己無法控制的力，把我拖向牠們去。

我自被判決以來，差不多整整一年了。兩年的徒刑，一年已經過去。但是，剩下的一年，亦必然將要一樣地過去。而我仍將出外。出外之後呢？我不知道。不過，我總覺得我的一頁歷史，業已翻過；另一頁必將開始。在這新頁里，將寫些什麼，我此刻無法猜想。生命之書的若干頁，於此關閉。

後記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於巴登惠勒爾·士茨華茲華德 (Badenweiler Schwarzwald)

本年五月，吾妻離波泰里赴歐洲醫病。

基達 (Gandhi) 地震之消息傳來。不久，我們在獄中得悉政府不許國民大會主席普拉沙德 (Rajendra Prasad) 到基達去做地震的救濟工作。甘地和其他的聞人，都不許去。

在印度，各地都充滿了軍隊和警察的氣味。英國政府，似乎是決心永與大多數的印度人民作對了。

警察的力量，是一種有用而且必須的力量。可是，一個充滿了警察和警棍的地方，卻不是可以生活之地。在這些時日里，印度各部之最墮落最腐敗者，厥為印度文官部。每當高級官員之空缺仍待委任之際，誰最能代表這種墮落腐敗之精神，誰就一定被選充任。

九月四日，因吾妻病狀轉劇之消息傳來，我突然被釋出獄。她是時，正在德國士茨華茲華德的巴登惠勒爾醫治。我的徒刑，是「暫停」了，他們這樣告訴我。本來尚有五個半月才是刑滿之期，這時，是提早釋放了。一出獄，我馬上乘飛機趕到歐洲來。

此時的歐洲，正在混亂之中，充滿了對戰爭的恐懼。同時，經濟危機四伏。阿比西尼亞已被侵略；阿比西尼亞的人民被炸。兩個不同的帝國主義集團，彼此互相衝突，互相威脅。帝國主義之中最強大的英國，一方面壓迫着他的臣服民族，一方面正在擁護國聯盟約和平。但是，在此地的「黑森林」中，卻平靜而安定，甚至連希特拉的萬字旗 (SWASTIKAS) 也不大看見。雲霧由山谷高昇，遮蓋了遼遠的法國邊界，蓋着一片風景。大霧濛濛，我不知給牠遮蓋了的法國，現在究竟如何了！

三八 最近五年（一九三五——一九四〇）的生活

五年半前，我坐在阿爾莫拉縣監獄中，寫完了我的自傳之最末一字。八個月後，我在德國的巴登惠勒爾寫了一段「後記」。這本自傳在英國出版後，幸蒙各國各種人士善意的歡迎，甚引以為快。我因此想到，藉此書之出版，已使世界各地友人，得與吾人之印度接近。在某種程度上，認識吾人為自由的鬥爭之重要，殊為欣慰。現在美國版行將印行，編者要我寫最近五年以來的歷史，補充上去，使之合時。我覺得這種要求甚有道理。於是決心來加上這一段。

過去的五年半，把世界改變了許多。我翻開我的這本自傳一看，好像是什麼人替我寫下的一本老故事了。我的妻子在瑞士之死，使我和我的過去斷絕。她之死亡，結束了我生命之書的一段。我當初差不多不能想像她竟終於棄我而去。其後我的母親之死，更使我完全和過去斷絕。我的女兒在牛津攻書，後來也病入醫院。我將在四處遨遊之後，返歸自己的家。自己孤獨地住着，連客人也不會，我在嘈雜之後，需要平靜了。

然而，我却無從得到平靜，我此刻與很多黨派組織均無法合作，甚至於與很接近的老同事亦不能相處。我不能照我所理想的去做，而同時却又妨礙他人，使他們不能照他們所理想的去做。

因此，在公衆生活里，我一個人變成孤獨了，雖然廣大的羣衆仍然來聽我講演，我也仍十分熱心。

歐洲與遠東所發生的事體，予我之影響甚大。「慕尼黑」簡直是一個難於支持的打擊。西班牙的慘劇，在我成了一個私人的悲痛。雖然這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慘劇，使我灰心，而對於世界未來之光明前途的堅信，却使我心中平靜。

現在呢，第二次歐戰業已到來，我在印度又坐在另一個火山之口邊。此時要我來寫過去五年的歷史，真是無法靜心爲之。即使我能够做，恐怕寫出來的又是一大本書，因爲要說的東西，實在太多了。因此之故，我只想在此力求其簡潔地，追述過去五年之中一些我參加過的或于我有影響的事。

(一) 第二任國民大會主席的職位

不幸的茄夢娜，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終因重病不治，死於瑞士的羅散城 (Lausanne)。在她死之前不久，印度來信，國民大會已選定我充任本年主席。這是我第二次任主席職。便很快就乘飛機由歐洲飛回印度了。

在我離開瑞士之前，羅馬方面來信，說，莫索里尼希望當我取道羅馬回印度時，和我一談。我雖然一向就討厭法西斯主義政體，但是，莫索里尼是現今擾動國際視聽的傢伙，如果此事在平

時，我也很想會會他，但，這時却不願意。這時，他對阿比西尼亞的侵略仍在進行之中。我恐怕我和莫氏的會面，會被利用爲法西斯蒂的宣傳。一到那時，雖竭力申辯，亦將無用。因爲從前曾經有過很多印度人，一到意大利，便被法西斯蒂用作宣傳資料。不管他們本身願意不願意。意大利方面，曾經向我保證，決不對我作此種利用。我和莫氏的晤面，決定完全屬於私人性質。但是，我仍然決定避免，向莫索里尼表示了歉意。

然而，我却無法避免羅馬，當日所乘的飛機，必經此地，並在羅馬休息一夜。我一到羅馬，便有一位高級官吏前來拜訪，請我當夜去會見莫索里尼，並說，連會面的一切也都安排好了。我聽了之後，甚覺奇怪。便對他說業已向莫氏辭謝了的。然而，他一定堅持請我前往晤談，我一定不去。爭執久之，一直到預定的面晤時間到了，他才退讓，結果仍然沒有和莫氏會晤。

回到印度以後，便馬上開始工作。不到幾天，便主席國民大會的年會。我發覺國民大會，經歷了很多次變遷，現在會中充滿了猜忌和衝突。但是，我最初很不以爲意，自問自己的能力，足以應付目下的環境。後來會暫時地使國民大會遵循着我的理想路線而進行。但是，不久以後，我便看出來，會中的猜忌衝突，業已根深蒂固，不易剷除。我想，倒不如辭掉主席職務爲好。但是，後來覺得辭職一舉，不過使局面更壞，便自己取消辭意了。

然而，不久以後，我又考慮這問題。因爲我看出我的同事們，對我所主張的活動，不甚熱心。他們並不是要反對那些具體活動，不過，對於一般的趨向，他們不歡喜。我覺得工作不能順利

開展。決定辭去。並寫信給甘地商量。可是，正當這個時候，西班牙的事變發生了。我因此覺得不應辭職，這才又繼續下去。

西班牙的叛徒弗郎哥 (Franco)，在德義的資助之下，向自己的人民開槍了。我當時估計，這樣的事件，可能發展成爲歐洲大戰。甚至可能成爲世界大戰。那時，印度必定捲入漩渦。此時辭職，必成國內危機，不啻自己減弱自己的力量而已。對於這種分析，在整個局勢的發展趨勢說來，我並未錯誤。不過對時間估計得太快了一點罷了。

西班牙的內戰，使我想起印度問題的國際性來。我覺得，中國、阿比西尼亞、西班牙、中歐各國以及印度，或者別的什麼地方，其所發生之事，不過是同一個世界問題的諸方面而已。除非這個基本問題得到解決，不然，個別的問題是無法解決的。並且，在大問題解決之前，必定有着很大的變革。必有很大的悲劇產生。大家都說和平不可分割，我看自由也不可分割。這片下的世界，一些地方自由，一些地方不自由，是無法支持長久的。法西斯和納粹的挑戰，其實，在本質上說來，是帝國主義的挑戰。他們是孿生弟兄，所不同者，帝國主義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等地方實施其壓迫與剝削，而法西斯納粹則在自己的國內也使用野蠻殘酷的方法而已耳。如果要在世界上建立自由，則不但法西斯與納粹應該打倒，即帝國主義，也非剷除不可。

當時，我的這種對國際局勢的反應，在印度是一般的情緒，連民衆們也注意起國際局勢來了。這種羣衆的情緒，因國民大會所發動的對中國、阿比西尼亞、巴力斯坦以及西班牙等國同情的

各種大會及示威遊行而日益高漲。有時，國民大會還實際地以贈送醫藥材料或食物的方式，對中國和西班牙增援。這種對國際局勢的關心，促進了印度本身的民族運動，使牠走上更高的水準，剷除了那些狹意的民族主義的成分。

然而，這種情形仍然尚未深入羣衆之中。當時的印度農民，正爲他們自己的窮苦以及把他們壓碎的苛捐雜稅所苦。在印度，土地運動到底總還是極重要的運動。當時國民大會對於土地運動的綱領，雖然已經相當激烈，然而，仍然承認着現存的制度。至於產業工人的情形則較好，當時發生罷工運動了。一般富有政治頭腦的人們，則正盡心力於討論英國國內所擬就並加之於印度的印度新憲法。這個新憲法，雖然曾予各省以一些權力，然而，真正的大權，却仍在英國政府及其代表人的手中。對於中央政府，則計劃一種聯邦形式。這種聯邦形式的中心作用，不過是把那些半封建性的專制王國和半民主的省聯合起來，一同支持英國的統治于久遠而已。這是一個稀奇的機構，永遠不會做出一點事體，但是，對於保護英國的投資利益，則可盡最大的責任。這項憲法，完全爲國民大會所反對。事實上，全印度幾無一人贊成牠。

憲法中關於省自治一方面，首先付諸實行。國民大會雖然反對這種憲法，却也決定競選。因爲，想藉此一方面可以和千百萬的選民發生親密的接觸，還可以和別的一些人們發生關係。我當時並不是一位候選人，但是，我却幾乎走遍全印度，爲國民大會的候選人作競選宣傳。差不多整整四個月的光景，走了五萬多里。從印度的北部走到南部。並且深入那些毫無交通工具可資利用

的農村中去。我這次周遊，使用過種種交通工具，從飛機起，一直到徒步止，中間的各種工具，差不多都使用過。我們帶着傳聲筒和播音機一塊兒走。我每一天幾乎要向十幾個羣衆聚會講演。每次集會的人數，都在二三萬人以上。平均每天要碰着十數萬羣衆。在這次的旅行中，大約的估計，我至少曾經向一千萬人民講演過。

這次競選，驚動了整個印度。各地都發生一種新的氣象。因爲，這種性質的競選，較諸一般的競選，可說還多着一層意思。國民大會這一次的活動，不但引起了三千萬選民的趣味，還引起了很多並未投票的人們之注意。

我這次競選宣傳的旅行，對於我還有另一種好結果，即是我得到了好多新的發見。靠這一次的旅行，我對於印度及印度人民，有了更深一步之認識。在各處親眼見到很多從前未曾見過的事物。我越多看見印度的實體，也越更覺得自己一向對印度了解之範圍的窄狹。

大選結束，國民大會大告勝利。於是，我們便發生了一種爭論，討論國民大會的被選人員，是否要出而組織各省政府。爭論結果，決定組織。但須在這樣的了解之下：即不能受總督或省長之任何一種干涉。

此次競選結束後，我會到緬甸和馬來亞去遊歷。第一處，即蒙該地人士們予以歡迎。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夏天。

國民大會人員，接受各省政府的開員職位，很多省的政府，都是國民大會的人士所組織。這

些充任關員的，有很多從前都生活於獄中。我的妹妹拉克希米 (Vijaya Lakshmi Pandit)。便會充任聯合省的一位關員。在印度婦女界，會充任如此高位者，她可說是第一人。國民大會人士出任各省關員以後，全國空氣，煥然一新，大家都有一種獲救之感，如釋重負。全國都瀰漫着一種新鮮空氣，連農工羣衆，也都興高采烈地盼望着，等候着，以爲即將有重大改革之到來。政治犯也都出獄了。各方面的自由也多了一些。國民大會的關員們，在各省的省政府里，非常堅苦地努力着。因此，別的人也只得跟着他們出力地工作。不過，他們得在一個舊的行政機構之內工作，這一行政機構，有的時候，不但不能協助他們，反而處處掣肘。曾有過兩次，省長和關員之間，發生爭執。關員們堅持自己的主張，以提出總辭職爲言，結果，省長放棄自己的主張完事。雖然如此，有一些老的機構，如文官部，警察署等，勢力甚大，各處都任意干涉，工作的開展，因而遲緩。令人不滿意之處，也在在皆有了。

這種不滿的情緒，在國民大會里面，也可以發見。進步分子大抵都深覺不滿。這時，我覺得我們這個戰鬥的機構，越來越變成只是一個選舉組閣人員的團體了，而我們是必須爭取獨立的，因此心中十分苦悶。一九三八年四月時，我寫了一封信給甘地咕，在信中說：

「他們是太過於設法使自己適應於那種老的行政機構了，因此，證實了此種機構的存在之合理。不過，這種情形，雖說已經很惡劣，然而還可予以忍受。尤爲惡劣者，乃係吾人以很多年之勞苦，始在人民之心中建立起來的崇高地位，於焉失掉。我們漸漸下降到一個普通

的政治家的水準了。」

也許，我是大可不必如此嚴厲地對待我們這些閣員的。他們的這種錯誤，實在是由於當時的各種客觀環境。環境如此，亦無可如何。憑心而論，我們的閣員們的工作，也已經做得很好了。不過，他們得在一個舊機構的範圍以內工作，而國民大會的工作，則必須超出這種範圍之外而已。在他們做下的良好工作之中，其一，便是通過了土地立法，這，相當地給農民以利益。此外，還有所謂「基礎教育案」。這種教育制度，規定兒童在七歲至十四歲之間，應受免費的強迫教育。這種決議，其功甚偉，因為印度本一窮國，幼齡兒童多半失學。這種創舉，可說在印度教育界實行了一次偉大的革命。高等教育以及公共衛生各方面，也都有改進。不過，凡此種種，結果仍不行，因為後來國民大會政府一律辭職後，也就人亡政息了。不過，成人教育的確產生了相當的結果，而農村建設也得到了相當的注意。

可是，不管這些國民大會閣員們如何努力，有如何大的建樹，這種工作，都不能解決印度的基本問題。印度問題之解決，必須有一種更深入，更澈底的改革，始能成功。並且，這問題的中心，是要剷除帝國主義在印度的機構。因為這種機構，保護着各種各樣的剝削印度的投資利益之故。

也就因此，國民大會內，在較為溫和的分子與較為前進的分子之間，發生衝突了。這種衝突，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召集的國民大會全印委員會上，尤有充分的表現。甘地喏對此種情形，十分

惱怒。私下激烈地發表意見，後來他還寫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內，表示對我以大會主席資格而從事的許多活動，不甚贊同。時至此際，我認爲我自己實在不應該繼續充任國民大會執行機關的負責人了。但是，當時我也決定不做任何足以引起危機的事。並且，我的主席任期將屆，不妨到那時再悄然引退。我接連二年充任主席，一共任了三次。正在這些時候，還有着再推我繼任主席的消息。可是，我自己心中知道自己決不堪繼續了。會親手寫了一篇文章，投登加爾各答的現代雜誌，力言我自己之不應再度被選。這事，我自己覺得十分有趣。因爲不用真名，文章刊出以後，大家猜疑不定，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幾無人會想到是我自己寫的。甚至連編者也都茫然。直到後來，約翰·根室(John Gunther)在他的亞洲內幕(Inside Asia)一書中提及此事後，大家這才知道此中原委。

結果，下次大會主席，決由鮑斯繼任。下次大會即決於哈利普拉(Haridwar)召集。

此後不久，我便決定到歐洲去。想到英國去看看我的女兒，她此時正在牛津攻書。然而，更重要的目的，是想去呼吸一點歐洲的新鮮空氣。

(二) 歐洲之遊與重慶之遊

然而，這時的歐洲，却不是平靜的歐洲。整個歐洲所表現的平靜，乃是暴風雨到來之前的平靜。這正是一九三八年的歐洲，張伯倫(Mr. Neville Chamberlain)的綏靖政策，極盛一時，以

慕尼黑(Munich)集其大成。我到這個混亂的歐洲去時，係由印度直飛巴塞洛納(Barcelona)〔註一〕。在巴塞洛納留了五天，每天夜裏看炸彈由天空降下。

我在歐洲勾留了一個月之久。覺得各方面都和從前大不相同。惟一絲毫不變的，乃張伯倫綏靖主義的高台。張伯倫勝利地盤坐其上，得意洋洋。後來，我又到捷克司洛伐克(Czechoslovakia)去，在這兒，我得機會領教到如何欺騙朋友和出賣自己的誓言之尊嚴的各種巧妙方法。此次歐洲之遊，使我看透了英法之無能與無恥。尤其是巴黎的態度，更其卑鄙難堪。使我想起，從前偉大的法國大革命，即發生於此，而今竟墮落至於此極！

由歐洲回來，心中裝滿了悲哀。路過埃及，該地華弗特黨(Wafd Party)的領袖納哈斯(Mustafa Nahas Pasha)和其他的領袖們，熱烈地歡迎我。我在該地和他們共同討論大家的問題，情感十分融洽。——其後數月，華弗特黨曾經派了一個代表團到印度來，並且參加我們國民大會的年會。

回到印度後，我看見印度一如往昔，老問題和衝突之情，依然如故。我知道又要來面對應付同事的困難了。當此國際間正在醞釀着大的變化之際，很多國民大會的同事們，仍孜孜於國內的小鬥爭，甚使我感到苦惱。不過，在上層分子之間，似乎已經有着相當程度的了解與合作了。在國民大會之外，情形之壞，更爲明顯。分區自治派的反動，其囂張程度，較前爲甚。在真納(J. M. A. Jinnah)領導之下的回教同盟，正以攻勢的態度，倡導一種反民族主義的主義，見解十

分窄狹，並且毫無定見。在理論方面，幾乎是什麼道理也說不出。全部工作，都是屬於破壞性的，充滿了仇恨和暴力的氣味。這很使我想起納粹黨徒的鬥爭方式來。在分區自治派的組織之中，成長着一種流氓意識。當然，有很多回教團體以及個人，因不齒於回教聯盟之所為，反而贊成國民大會的觀點了。

遵循着這一種路線，回教同盟，不可避免地越走越入歧途。一直到公開採取反對印度的民主政治之態度時為止。他們竟至主張分割印度！他們這種奇怪的要求，為英國官方所鼓勵。這些英國人的目的，係在於利用回教同盟以及其他倒退勢力，以圖削弱國民大會之力量 and 影響。正當小民族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已無位置而不能不為各民族大連合的一環之此時，在印度竟有人主張民族之分裂，實在是豈有此理之極，真納之徒，都把這種要求的理由，解釋為因有宗教信仰之不同，一究其實，這種分區自治的主張，甚至於與宗教信仰亦無關係。這種情形，純粹是國內兩派人的政治鬥爭。一派的要求，是一個自由的，統一的，民主的印度；另一派，是反動的封建勢力，他們在宗教的掩護之下，企圖保護其本人利益。宗教，在這樣的應用之下，簡直成為社會及個人之阻礙。牠的本質，最初原是提倡精神的互愛，這樣一來，便完全成為仇恨，偏窄，吝嗇以及最卑劣的實利主義等等的源泉了。

一九三九年的國民大會主席選舉結果，勝利者仍為鮑斯。會中情形極為惡劣。發生了很多麻煩問題，以致工作停滯。在特里普里會議(Tripuri Congress)上，情形尤為不雅。彼此猜忌鬥爭

，不一而足。這時，我的情緒也甚為低落。當時的政治局勢以及國內國外所發生的各種事件，當然給我以很大的影響。不過，最直接的原因，乃由於我之與公衆事業斷絕關係。我對我自己不滿起來了。我曾經發表過一篇文章，在文章裏面，我會說：

「我恐怕我很少能使他們（我的同事們）對我滿意，然而，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我自己對我自己，更不滿多矣！如此之人，殊不足以資領導，我的同事，越早能够發見此點，則對我和對他們，都越好。我的心力與智力，均能繼續工作，然而，給予他們以生命活力的源泉，卻完全枯竭了！」

後來，鮑斯辭掉了國民大會主席之職，並且，進一步脫離了國民大會，發起組織「前進布洛克」(Forward Bloc)，這個組織的目的，差不多完全在於與國民大會敵對。雖然不久即歸死亡，然而，在國民大會衰頹的過程中，實在發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事，甚使我感到憤恨。冒險主義者與機會主義者們，往往藉美妙的辭句而自圖其私。這使我想起納粹黨徒在德國勃興的事實來。他們的方法，是以一種動聽的綱領掀動大眾，謀取大眾對他們的擁護。一旦成功之後，便利用所獲得的這種大眾的擁護之力，以從事另一目的完全不同之活動。

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既然鬧得烏煙瘴氣，我決心不染指。因為，我自己知道在此種環境之中，我無法適應。國民大會所從事的那些工作，我都不高興。此時的甘地喏，其態度亦如從前，又正為某種事件絕食了。我曾經這樣地寫過：

「舉凡我所能了解之處，我無法行動。而目下事實，是：我對於很多正發生的事情，全然不了解。」

我又說：

「繼在我們大家面前的選擇，越來越困難了。而這又絕非右或左的問題，甚至亦不是作政治上的決定的問題。目下選擇的問題，是：要末，不假思索地接受某些決定，這些決定，有時彼此衝突，而且，毫無邏輯之後果；要末，反對他，或者，怠工。……不假思索地去接受自己所不能了解的東西，接受自己不心悅誠服地信仰的東西，其結果所屆，一定產生精神上的麻木不仁和軟弱無力。在這樣的基礎之上，不能進行偉大的運動；至少，一種民主政治的運動，一定不可罷。反對嗎？這是難於採取的態度，因為，這樣即減弱了自己的力量，同時，幫助了敵人。至於怠工呢？更不好，正當各方面局勢正要求吾人行動之際，吾人竟出以怠工態度，則其結果所屆，必致大受挫折，而產生很多糾纏而已。」

一九三八年年底回印不久，我會做過兩樁較有意義之事。第一，我曾主席過一次全印土藩王國人民會議 (All Indian States, Peoples, Conference)。這次會議，係在盧地亞拉 (Ludhiana) 召集。我參加了這次大會，使我能和這些封建的土藩王國內的前進的運動保持親密的接觸。在這些王國內，正醞釀着一種力量，其結果往往引導到人民團體與政府之間的衝突。政府當局，他們有着英國的武裝作為後盾。這些王國政府，本來就是在英國政府的掌握之中的，英國

政府利用這種中世紀的封建遺物，作爲壓制剝削印度人民的工具。有人曾經把這些王公稱之爲「英國政府之第五縱隊」，誠屬不虛。其間或有一二位文明的統治者，想和自己的人民大眾站在一條陣線上，倡導一些實際上有用的改革。但是，強大的軍事武裝的阻力，卻使他們不能不歸於失敗。

很明顯的，這五百五十餘個土藩王國，自己決無法以一個單獨的政治的，或經濟的單位而存在。如果印度成了一個民主的印度，他們當然不能再以封建的姿態而繼續生存。其中一些較大的王國，也許可以成爲一個單位，加入一個民主的聯邦之中，其餘若干小的王國，則勢必非合併不可。較小的改革計劃，不足以解決這一問題。這種王國制度，必須剷除，然後人民才能獲得幸福。但是，這些王國之剷除，其先決條件乃是英國帝國主義勢力在印度之首先剷除。

我的另一個較有意義的活動，便是充任一個國家設計委員會(National Planning Committee)的主席。這個委員會是由國民大會主辦的。一方面，與各省政府合作。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對象，差不多包括一國的一切活動在內。後來我們設立了二十九個分會。分頭設計各項題目——農業、工業、社會、經濟、財政各方，都一一顧及。其全部目標，在於擬定印度計劃經濟的整個方案。這方案，當然爲將來的印度所必需。我對此工作，甚感興趣。以爲是很有意思的工作。不過，我們所產生的任何計劃，必須在自由印度的國家裏，始能實施。此種工作，亦不過用作準備而已。因爲，在目下國際發展的一般趨勢之中，印度的經濟改革，無論如何，必須是攪構之社會主

義化。這在英國的統治之下，是絕對不可能實現的。

一九三九年夏天，因為錫蘭的印度人與當地的政府發生衝突，我爲了此事，再度到錫蘭去。我此次錫蘭之行，在印度與錫蘭的關係上，奠下了一種和善之基礎。到錫蘭時，受到各方面的歡迎。連在政府之中工作的錫蘭人，也來歡迎我。我認爲在將來我們的新秩序中，印度與錫蘭，一定會聯合在一塊。在我的理想中，將來我們要建立一個民主的聯邦。這聯邦的成員，包括中國、印度、緬甸、錫蘭、阿富汗等。可能之時，還再多包括一些國家在內。這不過僅就亞洲而言。如果我們能够使全世界聯合一致，建立一個民主的世界大聯邦，那當然更妙了。

一九三九年時的歐洲，正是充滿了威逼空氣的時候。在這種危機四伏之時，我本不想太長久地離開印度。但是，對於抗戰中的中國，仰慕已久，遊歷之心甚切。最後仍然決定到中國去一次。我由印度乘飛機直達重慶，很快就返回印度。因爲，那時的歐洲，戰爭終於降臨了。

在自由中國，勾留不上二週。但是，在這短短的十數日之內，對於我個人，對於中國與印度之間將來的關係，都有很好的影響。我這次遊華結果，深覺中國與印度，實在應該加強連絡，共同努力，一致爭取不可分割之自由。中國的領袖，也抱着如此的希望。在重慶時，和中國的偉大領袖蔣委員長及其夫人，面晤很多次。我們非常詳盡地談到目前的局勢以及將來的希望等等。

我到中國之前，對中國及中國人民之抗戰，早表深深的敬意。到中國後，實際地看出中國的英勇，更使我對他們的尊敬之心，增加百倍。我實在不能想像任何一種不幸的命運，可能把這個

已經回復到年青時代的古老民族的偉大精神擊破的。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印度

戰爭與印度。吾人行將徇以處之？過去若干年，我們也曾考慮及此，並且也曾把我們的政策公開宣佈過。然而，雖然如此，這次大戰一起，英國即已代替我們，把印度宣佈為交戰國之一了。不但沒者徵求印度老百姓們的意見，抑且連中央議院以及各地方省政府事前都不會知悉。似此情形，殊不易忍耐。因為，這即表示帝國主義政策之必將繼續在印度施行。一九三九年九月中旬的時候，印度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即發表一項很長的申明書。在這申明書裏，把我們過往的態度及目下的政策，明白宣稱。並且，讀英國明白宣佈其戰爭目標，尤其關於帝國主義本身的問題，尤應有所說明。我們已經不斷地反對着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了，但是，在我們國內稱雄的帝國主義，尤與吾人之切身利益有關。帝國主義的政策行將取消嗎？他承認了我們印度應該有權通過一種憲法大會而決定自己的國家形式這一事實嗎？應該採取何種方式以實現一種大眾掌握中央政權的計劃呢？

英國政府的答覆是明顯的。他們拒絕明白宣佈其戰爭目標，亦無意把中央的行政大權交於印度人民代表之手。舊秩序繼續着，而且一定得繼續下去。而英國的投資利益，亦不能不予以保障。於是，國民大會在各省政府的閣員們都辭職，因為我們不能協助英國進行此等戰爭。憲法於是

中止實施，專制的統治再度建立。西方各國的古老的憲法鬥爭，又在印度出現了。這種憲法鬥爭，是一個民選議院與國王之間的鬥爭，從前會因此在英國和法國殺了兩個國王的頭，現在這鬥爭又在現代的印度發生。

難關仍舊繼續存在。此時，政府方面又頒佈了很多禁令，國民大會的人士，又大批地被捕了。在我們的方面，痛恨的情緒高漲着，大家主張採取實際行動以反對。但是，戰爭開始後英國之節節失敗，使我們遲疑不決，因為，我們忘不了甘地咭所給我們的教訓，那是：「勿乘人之危，勿作落井下石之舉。」

四月來了，挪威淪亡。五月，荷蘭與比利時陷落。六月，法國崩潰，那美麗的巴黎城，破碎了。法國不但敗，而且，屈服了，投降了。我當時想，除非她本身業已腐至中心，不然，何以會一敗塗地至於此極呢？是不是英法代表着一個行將過去的秩序，而因此不能支持呢？是不是給他們以力量的帝國主義，在這種性質的戰爭之中，使他們軟弱的呢？英國本身如果否認自由，他即不能為自由而戰，而他的帝國主義，亦必像法國一般的投向法西斯主義。在英國，張伯倫及其老政策的陰影，尚存在着。渾細路，因為要緩靖日本，又封鎖了。在我們印度，則一切如故，毫無改良之消息，仍認我們印度人，什麼也不會做。英國政府之完全缺乏目光，不能了解世界新局勢，不能使自己適應新環境，這，甚使我驚奇。即使可說英國政府對吾人之了解過緩，甚至於不能由經驗而學習，然而，對於印度的政府，又如何說呢！

局勢的發展，把新的課題，擺在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的面前。甘地咭請求委員會把使用已久的非暴力政策引申爲一個獨立國政權行使時之原則。一個自由的印度，必須靠此方法以與內部的混亂與外來的侵略鬥爭。不過，這個問題當時並不存在，而甘地咭本人腦子中卻充滿了這種理想，他覺得這是明白宣稱的時候了。我們每個人都深信在我們的鬥爭之中，應該遵行這一個非暴力的政策。歐洲的戰事，更加强了他們這種深信。但是去決定一個未來的國家政策，卻是另一個問題，而且是一個困難的問題。

甘地咭自己感覺——也許是正確的罷——他不能放輕他對世界的使命。因此，甘地咭第一次開始走一條路，而國民大會常務委員會另走一條。不過，國民大會和他之間，並無破裂。因爲，甘地咭和國民大會的關係，實在太深了，所以，無疑地對於國民大會他仍將要以各種方式常時給予指示，甚至還來領導。然而，由於他此次之離開，我們的民族運動的歷史，確實也翻開了新的一頁。

在過去幾個星期中，國民大會在拉加哥派那查呂 (O. Rajagopalachari) 的主張之下，再向英國政府作再度的建議。拉加哥派那查呂，一向是被認爲國民大會的右派人物。當國民大會組織省政府時，他即充任馬德拉斯的總理。他很留心避免衝突，提出了一個建議，對於這個建議，他的一部分同事是躊躇着接受的。這建議內容是：英國政府承認印度之獨立，馬上組織臨時國民政府 (Provisional National Government)。這個政府，向目下的中央議院負責。如果能够如此做

，則此新組織之政府，即可負起國防之責，協助此次戰爭。

國民大會的這個建議，是可以馬上毫無困難地實現的。這個建議，不消說是非常溫和的。以戰爭的觀點而論，無論任何努力，均需要人民的信任與合作，此乃不易之理。只有一個國民的政府，才能獲得此種人民之合作與信任，帝國主義的統治，是無法獲得的。

可是，帝國主義的想法則不同，牠夢想牠還可以繼續行使職權而威迫人民，服從己意。即使大難已臨目前，他仍不願獲得人民的這種有力的實際援助，如果他因此必須停止對印度政治的和經濟的統治的話。他甚至對於在印度或帝國其他部分做了正確之事而必然獲得的道德上的威望，也不予顧及了。

今日，一九四〇年八月八日，我正寫着此文，印度總督把英國政府的回答送給我們了。這回答，其文章形式，還是老的一套，充滿了帝國主義的氣色，而內容方面，也與從前一樣，毫無變動。

我的很多同事，又到獄中去了，我有一點兒妒忌他們。也許，在獄中的寂寞生活之中，倒比在這樣一個充滿了法西斯主義以及帝國主義的瘋狂世界之內，更易於發展一種有系統的人生感想罷！

不過，對於這一世界，有時也可以暫時逃避的。上月，我在離開了二十三年以後，又到喀什米爾去。我在那裏，只住了十二天，然而，這十二天却是充滿了美的時光，我陶醉這塊迷人境地

的可愛山色。我在各山谷到處漫遊，也攀登高山冰河，而大覺此種人生之可貴。

註一：地在西班牙。

尾聲 分道揚鑣

如果說，在印度已經有某些事體發生，其結果所屬，招致了英國與印度之分道揚鑣，這是一種不正確的說法。因為我們的路，本不相同。只要英國在印度稱雄一日，印度人民仍為其臣屬人見一日，則彼此之間，其所遵行之路線，亦必背道而馳，無法合道。這種關係的基礎，是一種壓迫威脅。迫脅，是無法使人手攜手地共同前進的。牠的可能結果只有二端，其一，是稱雄的用鐵鍊把臣服的拖着向前走，另一，是這條鐵鍊之被打斷。

我們的路，其結果是，本是方向各異的，多年的難勝難決之戰，有時，這種衝突只是心理上的或口頭上的，有時，則出於革命行動。一八五七年的時候，曾爆發而成為一次革命反叛，結果被殘酷地壓止了。此種鬥爭却並未因而滅亡，卻不斷地繼存下來。不過，在表面上不十分看得出來罷了。民族運動之形成，又是這一衝突的另一表現，當其開始之初，態度極為溫和，時間一久，就漸漸更多地代表了人民的真正感情，氣勢日盛了。於是，促成了另一次革命反叛，那是不合作運動，牠不使用暴力，但卻較前此任何一次為有力而普遍。全印數萬萬人民，忍受多年之壓迫，剝削與貧困之後，毅然正面地對着稱雄於印度的帝國主義，起而要求自由了。

這數萬萬人民，會歷盡坎坷，飽嘗辛苦。然而，他們卻誓不反顧，一往直前。這種鬥爭繼續着，而同時，世界亦漸走進自毀自滅之深淵。於是乎，印度之問題，便也成爲國際問題之一部分了。雖然我們的眼光放大，然而，我們的問題，基本上還是印度的民族主義反對英帝國主義的問題。我們如欲對更大的世界有所供獻，則最初一步仍須先獲得我們之自由與獨立。進一步言之，即使在這一更大的世界之中，如仍奢忍帝國主義之存在，而侈談自由與民主政治，不啻開玩笑而已。

我們是反對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中歐各國的恐怖，在印度產生了一種有力的反應。但是，我們仍記得（我們如何能够忘記呢？）在印度所目擊的恐怖，我們仍親見親受對我們民族的日復一日的侮辱與剝削。我們實在不能聰明伶俐到這樣一步，認爲：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確實壞透頂了，帝國主義到底總好一點。

戰爭已來到印度，同時，我們發覺印度已被人代爲宣佈爲交戰國的一部分了。並未正式與任何人民代表商量過。即使國民大會可被認爲非官方的組織，然而，在印度還有中央議院，還有各省省政府，這些省政府，據說是享受有省自權的哩！這些機構，沒有一個知道此事，更未曾被詢問意見。

祈禱「自由」，宣稱「民主政治之聖神」之聲，甚囂塵上。這聽起來是十分好聽的。不過，從前我們對此，實在已經聽得太慣了，牠的結果也經驗不少了。我們現在是不易於一轟而前了，

我們已經變得十分小心謹慎，尤其當此次戰爭不願吾人之屢次警告而竟加之於吾人身上，其來也如此，尤使吾人加倍小心謹慎。這些「自由」，「民主政治」，是不是也爲了我們呢？或者，只是爲了那些生活在歐洲及其延長部分的選民呢？是不是說帝國主義政策即將在印度或別的地方一律取消呢？

我們會詢問英國政府，請讓我們明白了解，俾得以認清自己必須如何從事工作。我們的詞問，被認爲是不切要領的，是不適時的。所得的答覆，清楚地向我們指出，英國實無結束在印度之帝國主義的意向，就他們而論，亦無此可能。把政權轉交於人民代表之手，尤在問題之外。國民大會，並不替自己有所要求。牠並不要求高的職位，這些東西，牠不必要求亦能獲得。牠所要求的，是宣佈印度獨立，由民選代表，組織憲法會議，以決定自由印度之憲法，此自由印度，有充分之力量保障大多數人之利益。

在印度人民之心中，有着一種矛盾。我們深深地痛恨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不願見其獲得勝利。只要印度人能真信此次戰爭之目的確在於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保障真的自由，則印度人民即將竭其全力以赴之。但是，帝國主義和我們，是老友，是歷數世紀的多年老友。我們彼此認識，彼此懷疑，也彼此痛恨。在印度的背景，是：一百八十年來的仇恨，壓迫，痛苦，不履行的諾言，破壞性的與反動的運動之助長鼓勵，分裂印度民族統一的企圖。在印度，我們有着很多難於克服的障礙與錯綜複雜的問題，這是實情。但是，我們說過，我們一定會克復牠們，不過，如果

沒有一種足以改變印度空氣，振興印度人民之心的令人喜悅的衝激力，則即使是克復的企圖，我們亦不可能懷抱。這一種令人喜悅的衝激力，只能由宣佈印度獨立而來，並且馬上必須採取有效步驟使人民能推行其本身利益之行政。如果不這樣，則遍求全印，無一人，無一黨可以使印度人民毅然走上戰爭之途。

現代的戰爭，必須有人民之擁護，即使那些權能國家，也不得不以不斷的宣傳導致其人民大眾的擁護。只靠職業軍隊，在人民的惡意或冷淡的空氣中，即無法有效從事戰爭。所以，即使只由組織印度國防，發動印度參戰的窄隘觀點而論，一個平民代表的政府，亦為必需之物。帝國主義的政策能夠迫脅人民；但是，牠不能爭取普遍的贊助和好意。

總督與英國政府，均曰不然，於是，吾人之道路乃似乎十分明顯矣。各省的國民大會政府乃全體辭職，在這些省份之中的議院政府，於是結束。因為，他們不能違反他們所代表的人民之公意而屈服於英國政府。這是國王與議院的老鬥爭，現在以新形式而出現於印度了；總督與政府，代表國王的不認可權，我們那些被選出來的議院，則代表民意。在美洲，從前一羣高傲而酷愛和平的人民，堅決地反對其遼遠的國王之權威，終於在多年的鬥爭之後，建立了他們自己的自由了。

但是，在印度，現在是二十世紀，是在那個被人承諾了的新秩序即將到來之前夜，在高聲宣佈保護自由與民主之聲中，印度在各省所實行的這種議院政府制度，竟予以停止了。總督的權力

，至高無上；他可以製定法律，亦有權否定法律；可以不必對任何民意代表磋商而直接讓人民以重稅，迫脅人民。

國民大會各開員，雖有着在議院中的大多數之擁護，終於辭職了，這是真的。他們因為不能接受總督的上諭及英政府之政策而辭職了。然而，議院部依然存在。總督與各省省長，本可以把他解散而另行選舉，但是，他們很清楚，這種再選舉的結果，亦必是大多數地對業已辭職的國民大會政府之擁護。不可能選出別的內閣來，因為並無大多數的投票。因此，唯一的途徑，是讓各議院中止，不必另行選舉，而由總督與省長執行迭克推多的權力。這種鬥爭情形是很明顯，一方面是人民和議院，一方面是國王的代表們。我們常時聽到關於權能主義以及迭克推多的事實，聽到英國以最痛恨最有力的言詞大罵他們。然而，今日在印度，我們便看見一個血腥的迭克推多政體和權能主義。

我們的道路很清楚了。雖然我們自己人中，有很多向我們表示不滿，大發脾氣；雖然我們很多同事因為向自己的人民解釋我們的政策而被捕入獄，但是我們却竭力抑制自己。我們何以如此躊躇呢？因為我們希望有着進步人士和工黨分子的英國政府，或可改變其態度，放棄牠那頹於死亡的帝國主義政策。我們不會以任何方式鼓勵納粹之猖獗；想起納粹統治者之一旦統治歐洲或別的地方，是令人痛心的事。我們已慣於臣服生活的印度人，是深知其中苦味的。我們不能容忍納粹的那種種族理論和種族壓迫。比利時與荷蘭的恐怖以及法蘭西的大悲劇，深深地使我們動心。

英國的迫切危機，使我們感覺到不能作落井下石之舉，以增加其困難。雖然英國的統治階級可以虐待我們，英國的帝國主義政策可以粉碎我們，然而，我們對於英國老百姓，卻不能懷抱惡意，他們現在正面對着危機和極端的危險。我們堅苦地想設法覓致光榮之路，既有益於自己，亦有益於英國。我們提出建議，甚至越踰了我們前次國民大會蘭木加爾會議 (Ranagar Conference) 所決定的指示，向政府讓步。我們發誓願意組織印度國防以協助戰爭。但是，我們只能在數萬萬印度人民的好意與合作之下以自由民族之資格爲之。這種自由必須予以宣佈，而臨時的國民政府必須組織，這種政府，不但只代表一黨一派，而是代表着國內各種不同的重要分子。這個建議的基礎，是必須對帝國主義機構之取消，予以承認。

總督與英國政府，向我們及全印度說出了最後的一個「不」字了。當法國屈服的前夜，英國政府竟不正常到提出合併英法的建議來。這是一個令人驚奇的建議。可惜爲時已晚。然而，牠說明了英國政府當勢在必要之時，是可能走出他們一向所遵循的軌道而出此一舉的。但是，在和他們自己的利益有關的地方，如印度，他們則仍在那軌道之內做事。即使戰爭之危，已等燃眉，他們仍不肯走出一步。甚至於在此戰爭中所有的明顯利益，亦不能使他們放棄帝國主義政策所賦予他們的特殊地位。他們目下仍大談着自己的帝國及其保持帝國的企圖等等。說話之際，他們也許完全忘了他們聽去很好聽的字眼，在我們聽來，卻是我們的臣服，衰頹與貧困等等的化身啊！

我得重覆一句，說我們與英國之間，正有新的分道揚鑣，是不正確的。因爲，我們的「道」

，從來就是「分」的，沒有一「同」過。不過，英國的這種宣佈，確把那連繫着我們彼此之心的弱小連結線，最後打斷了；結束我們「或可攜手前進」的希望了。我甚覺不樂，因為我雖然痛恨英帝國主義和一切帝國主義，然而，我却很喜歡英國的事物，而願意在印度與英國之間，有着一種精神上的連繫。這種連繫，僅能在自由之中存在。我當然爲了印度之故而要求自由，但也爲了英國之故而要求牠。希望已碎，命運似已決定我們必須有不同的將來了。合作之路，已不可能；百年之大仇仍在，仍將在未來的衝突之中生長，而牠所發出的枝葉，當發出之時，必將仍屬於仇恨，而非友誼。

我會聽說，因我們沉寂已久，故所以英國政府已深信我們必馴伏地服從其命令。我們的努力抑制自己，使他們相信我們已無力行動了。在今日這樣的世界中，充滿了武力，充滿了飛機，坦克，以及武裝隊伍，我們是多麼無力的呢？但是，也許即使就在這樣一個充滿了武裝的世界之中，仍然有着一種東西，這叫人類之精神，一個民族之精神，這東西既非可以忽視之物，亦非軟弱無力之物，而且，除非自己想要冒險，是不可以忽視的。

英國政府的回答，對於密切地與印度政治保持接觸的我們，是毋庸分析，不必說明，清爽得很了。但是，也許還有一部分人看不出牠的重要之點來，由於其辭句之巧妙使用，曾誤認以爲其中仍有可貴之物，印度人民真可獲得政府中之權力罷。

牠計劃着，在總督的行政會議 (Executive Council) 中，增加一些非官方的印度人士。這個

會議，並非真的執行機構，也不是內閣；而是一種諮詢機關。真正的權力，在總督手中。總督常時是並不以會議人員爲心腹的。向總督進獻關於各種特別部門之意見的，是各部的部長。而一切政策，則源出於總督。在事實上，他是負責之人，他向英國議院內的印度事務部負責。只要這個老機構繼續存在，則不管把多少人或把誰加入那個行政會議中去，其結果仍然毫無二致。因爲，他們對於總督的地位，權力，權威，除非能够以說服之力去影響他，不然，他們毫無力量使之變動。

即使捨此不談，新非官方人士之加入，也不能使行政會議有重要的不同；其中大多數仍屬於那些指派的分子。而他們在事實上是百分之百地代表着帝國主義的官僚型的人們。他們的地位，完全依靠於總督之青眼。他們是必須向他奉承的。他們完全與人民生活，思想以及活動隔離，而生活於他們自己的一個官僚世界之內。他們所有的能力，是足以用之於推行一個老的警察國家的機構。他們遠離現代世界及其問題，並且，完全不能了解牠們。他們是屬於一個已在別的地方成爲過去而在印度亦將死亡的舊秩序里的人。

再呢，這些可以被委充行政會議之委員的那些「代表印人」(Representative Indians)亦必將由各種奇怪的團體之中選出，有的簡直屬於反動集團。他們甚至完全不能代表印度的前進人士，而在行政會議之中，他們必將各自採取中立態度，甚至把情形弄得更壞。他們將不出自民選，亦必不向人民負責。他們勢將爲印度總督所選拔。

很明顯的，就任何一種民族的觀點而論，或就轉移於人民之手之權的觀點而論，在總督的行政會議中加上這幾個印度人，倒還是沒有好一點。

第二個建議，是組織「軍事參議會」(War Advisory Council)，其中包括很多奇怪的人物，有着那些半封建的印度王國代表。這參議會亦將不時開會，開會之時，不過去聆聽教訓而已。他們將無何種執行權力。不過成爲一種無關緊要的擺樣貨色而已。

這就是目下的兩個建議，一如總督所暗示得清清楚楚的，英國政府毫無意將行政之權轉移於印度人民之手。更進一步的，是印度事務大臣所說的，當他指到「印度的民族生活之主要分子」時，他是包括着歐洲人在印度的投資利益的。也許，阿美利先生(Mr. Amery)「註1」和印度總督所懷抱着的印度民族生活的概念，是一個主要爲英國投資利益、印度的封建王公、大地主、分區自治主義者以及其他反動者所組成的概念。照他們的看法，這些才是我們印度的民族生活之主要成分，才值得保護，才值得代表。其餘三四萬萬的印度人民，他們勞動着，餓着，然而，不過是一些無用贅物而已。

在現在，或者，在戰爭繼續着的時期內，我們夢中的黃金的將來，那個已經聽得爛熟了的自由的新秩序，是如此地看的：在戰爭結束以後，「一個代表印度民族生活的主要分子的代表機構」，即將組織，俾得計劃新憲法之制定。在阿美利先生及總督的話里，我們已經知道這些民族生活的主要分子是些什麼人了。將來我們一定會看見很多佩金戴玉的土藩國大君，束帶武士，歐洲

的產業及商業巨擘、大地主，收稅區主，印度的產業資本家，英帝國各機關的代表，少數普通士人，濟濟一堂，共同地起草印度憲法，也許，主席便是總督先生。印度即將如此地實施其民族自決權。這個集會的出產品，一定是張很好看的圖樣，繡着一朵美麗的花，代表着各種投資利益和封建遺物，而其圖樣背景，則是大英帝國主義。最要者，對於英國投資利益，因其為印度民族的生活之主要部分，必須着上強烈的色彩，以示重要。我們必將呼此為「自治領地位」，俾得皆大歡喜。

但是，有一事必須記牢：即使是這樣一個集會，也還不能暢所欲言。英國無論如何，決不能失掉他保護英國投資利益的責任，所以，不管這個會議可能作何種決定，其批准之權，亦必待諸英國國王。

我們國民大會，則敢於作另一建議，說，印度憲法，應該由民選的憲法大會草擬。這建議，不幸是屬於一種民主思想的，對任何個人，均一視同仁。真的，這樣一來，總督與印度事務大臣所想的那些「印度民族生活的主要分子」們，是難於被選了。民主的選舉，對於這些主要分子們，和對於那些英國的以及印度的投資利益的人們一樣，往往是對不起得很。

總督更進一步說道：「不消說，他們（英國政府）爲了印度的和平與幸福，不能計劃把政權移於任何一種政府組織之手，這種政府的權威如爲有力而廣大的印度民族生活的主要分子所反對，他們也不能參加任何一種迫脅以圖使這些分子屈服於這樣一個政府。」

這種說話，頗有予以詳盡考慮之價值。很明顯的，無論任何一種爲印度而設計的政府組織，必將遭遇到很多奇怪的集團與利益之反對。誰也無法設計出一個組織，既可以使這些集團與利益贊成，又能得四萬萬印度人民之同意。每一個土地的立法，不能不去對付地主與佃農之間的衝突；每一個勞動的立法，必被印度產業首腦所不贊成。甚至只就工業家的範圍而論，英國的投資利益與新興的印度工業利益之間，因前者阻礙後者之發展，彼此之間，也一定有着衝突。這樣，在印度民族生活之中，有着不少的利益衝突存在着。因爲，在事實上有着不少不同利益的階級存在着之故。我們中有很多人想有一個無階級的社會，我也深信這一天終必到來。同時，解決這種衝突的唯一的已知方法，不是使用武力和迫脅，乃是民主的方法。如果有任何一集團，阻止了政治的，經濟的變革，即使這爲大多數人所希望，亦必引導到國家破壞，可能還招致內部的戰爭。英國政府的這種說法，意思是說：因爲有某一集團一定要反對，所以，不能作遠見的政治的或經濟的改革。即使沒有印度的集團來反對，英國的投資利益亦必如此做。何況印度有着很多反對集團，他們自會前來服務；亦即是說，爲了英國帝國主義之利益起見，現狀務須維持。這就是保留目下秩序使印度不致危及英國投資利益的方法。

至於說希望英國出來共同迫脅某些分子的說法，尤爲可笑。沒有誰會作如此暗示，除非是那些想來迫脅進步分子的反動集團或分區自治派。反之，我們要求英國政府的，是停止一切迫脅，從印度隱退，不復成爲一個政府。到這個時候，印度才會產生一些條件，足以使印度的各種分子

，在他們之間，自求妥協和解之道，因為，否則即須從事內戰矣。只要英國政府存在一日，牠必促弄吾人互相衝突，並能使一部分人存某種不良之念，投其所好，反對自己之國人而奉承之。

英國政府說，他們不迫脅某一集團使其贊成牠所不喜歡之政府組織，但是，同時，他必已迫脅那需要這種政府組織的另一集團了。在印度，英國政府的活動究竟如何，而現在又如何呢？那是迫脅整個的印度人民，迫脅每一個集團而保持自己的地位。那是壓迫印度的工業以利英國的工業。那是維持一個專於迫脅印度人民的軍隊。那是迫脅各土藩國內的人民以維持王公之地位。告訴我們說，英國不願用迫脅手段，這是稀奇古怪的。然則，他們在印度用的是些什麼手段呢？再者，說主要的一羣人並不需要一個特殊的政府組織，這成什麼話呢？普通情形，這一羣人投票，別的很多羣人也投票，這時，便可能知道各種不同的各羣人的意志如何，感情如何？他們可以找尋某種公共的妥協方法，否則，很不幸的，他們不如此，於是，衝突乃發生。

英國政府的建議，恰好理想地阻止了任何進步，任何變革。甚至英國利益亦將攔路。事實上，政府老早更進一步地說過，無論如何，他們必不放棄保護這些利益的責任。不管天倒地傾，這種利益總得永存；這樣一來，也不管天倒地傾，英國的財政的，工業的機構總得繼續稱雄於印度。碰巧，這情形正是我們印度人所必須驅除的。我們不能達此目的，則印度之貧困不舒，亦必不能進步。此外的一切，乃是次要之事。

也許有人說，總督的所說不迫脅任何廣大數目的不贊成某一政府組織的分子這話，主要是用

之於宗教上的少數。當然，我們一定同意在這方面必無此種迫脅之可言，而英國政府亦毫無理由可以如此。別的人也無理由此。那末，這所謂迫脅從何而來呢？是誰暗示的呢？

國民大會的建議，並不是主張將權交與國民大會或交與某黨某派，或交與某一宗教集團。牠所要求的，是把權力交與印度全體人民，由人民，以民主之方式決定其所需要之物爲何如。牠更進一步，是要保護少數民族的利益。牠主張對於這些少數民族，應予以獨立的選舉區域。他們的問題，不應以多數票決之方式解決。這些問題之解決，應出以同意之和解，如果不幸，對於某一特殊問題無法謀取和解，則只好出以公平之裁判。

如就印度回教而論，他們可說是一個少數民族。他們在數目上十分多，在其他很多方面，十分強有力，他們之不可被人迫脅，一如印度教之不可被人迫脅一樣，乃彰明顯著之事。如果此二集團彼此不能和解，實乃印度之不幸，無人能知其伊於胡底？不過，讓我們記清楚，在政治的和經濟的問題上，人們並不如在宗教問題上那樣行動的。此間區別甚大。

真正的少數民族保護問題，實發生於既非回教徒亦非印度教徒之人羣中。一個印度人，不管他是印度教徒也好，回教徒也好，塞克教徒也好，基督教徒也好，有着其他宗教信仰的什麼徒也好，竟至於到異族的身上去找覓保護以免被害於自己之國人，在我看來，確是大可驚奇之事。事實上，這種情形並沒有。除非很少數的分子，他們之如此做，並非由於宗教的信仰問題，實由於投資利益問題。

此事讓我們弄個清楚。分區自治的問題，基本上說，是投資利益之保護問題。宗教者，不過是用作掩護之物而已。那些擁有封建利益和投資利益的人們，懼怕大革命，乃成爲帝國主義營壘之追隨者。在另一方面，英國帝國主義亦樂於利用這種分區自治的理論以否認自由，民主，以及任何其他變革，而得以保持在印度的勢力與特權。如果說——如前面曾經提到的——印度王公乃英國在印度之「第五縱隊」，則分區自治主義者及其戰友，蓋亦未嘗不可列入「第五縱隊」之內。因此，諸王公與分區自治派之能和好無間，共同合作，確非怪事。他們有一共同工作須做——即阻撓印度之自由，俾使投資利益得以發展。

當然，雖說這是一種基本的觀察，但是，如果僅以這樣的簡單分折而處理分區自治主義一問題，那是不够的。此外還有很多因子。大眾分子之可被分區自治主義影響者，他們既無投資利益可資保護，亦不喜歡帝國主義，這是實情。要去了解他們之何以會被分區自治主義所影響而竟亦常時作違反自己本身利益之行動，即等於了解希特拉之何以能在德國人民之中給羣衆以影響。這種分折並不完全，但却很有助於了解此一問題。民衆們被他們所喜歡的口號所迷，接着，便被利用而從事其他另一目的完全不同的工作去了。在印度的分區自治主義最近的發展，和納粹的手段，在技術上，實在大有相似之處。

分區自治主義，在最初的時候，是一種對於立法議員的代表之類的要求。而現在呢，卻發展成爲一個公開地反民族的，反民主的運動了。牠主張着印度之分裂。中世紀那種宗教集團的學說

，造就了一種政治上的分區，在歐洲進步的民族主義運動成長之前，牠崩潰了。然而，這時又在印度復活。一種與十字軍相同的理想，基督教國對回教的理想，忽然在印度出現了（據說由於英國的鼓勵）。這是一個令人驚奇的倒遷。不管誰會因之得益，或誰會因之受害，這些事，慢點去說，首先得到利益的，是英帝國主義，這是很明顯的。——

說來是奇怪的，甚至在早年的和中世紀的印度，這種思想也並未如歐洲那樣作用過。別的宗教被歡迎了，被收容了。一世紀的時候，早年的基督教徒進來，馬上找到了一個家。猶太人們，也被收容了，回教徒也被歡迎前來宣傳他們的教義，並且坐下來，怕回教徒來了，也被吸入。後來，回教徒的領袖，主張建立一個單獨的國家以容納新來的回教徒和印度教以及其他。這基礎是偉大的阿克巴爾（Akbar）奠下的。新的文化因素被吸收，於是，一種共同文化乃得發展，特別在印度北部，尤為如此。

而現在呢，我們聽說，要回到阿克巴爾之前的年代去了，要反復歷史的過程了，要以中世紀主義來思考了。正當民族主義要進一步地讓位於國際主際之此時，我們印度來了一個比民族主義還要窄狹得多的教條了！而這東西，竟為英國政府所贊成，所保護哩！正當全世界走向一個真正的各民族大聯合之今日，有人竟提議，印度應該分裂為很多不同的部分了！

回教回家——土爾其，埃及，伊拉克，敘利亞，波斯等等——都老早拋棄這一個中世紀的學說了。他們都是熱烈的民族主義者，把自國的中古文化引以自傲。他們之中，有的人處心積慮地

走回到「前回教的」(Pre-Taiatico)時代去，目的在於找尋文化的鼓舞。中國的回教徒，把中國的文化引以自傲，同時，正爲着中國之自由而戰鬥，這才是歷史的必然進程。真的，這是一個已經走過了歷史進程，而一種強有力的大革命，今日正在全世界發生着，這大革命行將奠下另一個歷史進程之基礎——向一個世界大聯邦走去，這一個大聯邦的基礎，是民族的自由，是一個更公正的經濟體系。特權以及投資利益，都將剷除。

這就是印度的最終目標——一個統一的，自由的，民主的國家，與別的自由民族一道，密切地連繫在一個世界大聯邦之內。我們要獨立，但是，並非那古老的窄狹型，那種排外的獨立。我們相信，分離的，敵對的，民族國家之時代，業已成爲過去了。

我們要的是獨立，不是自治領地位，更非其他的什麼地位。只要是能够思考的人，都知道：自治領地位這一概念，已屬於過去的歷史；牠並無前途。在此次戰爭之後，他不能再存在，不管這次戰爭之結果何如。而且，不管牠將來存在不存在，總之，我們不要牠。我們不願意被繫在一羣家國之下，而這些國家曾經剝削我們，壓迫我們；我們不願意加入一個帝國，在這個帝國的某些部分，我們被以奴隸之資格對待，而這些地方，種族主義的思想霸佔一切。我們由倫敦城的財政從屬地位離開。我們要完全的自由，無保留，無例外，除非這些保留、例外、是我們自己和別人共同地同意的，其目的在於加入一個民族聯盟(Federation of Nations)，或者說，一個新的秩序。如果這樣一個新的秩序或這樣一個民族聯盟在最近的將來尚不能出現，我們却寧可與

、我們的隣層好友——中國，緬甸，荷蘭，阿富汗，波斯等密切連繫。我們準備冒險，準備面對危險。我們實在不要所謂英國陸軍或海軍的保護。我們將自己處理自己。

如果說「過去」不能在此作證，而「現在」則實已使我們得到了如此之決定。因為，即使正當此危機之時，英帝國主義仍無若何態度上的改變。好罷，讓那些想尋求帝國主義之恩惠與保障的人們，走他們自己的路。我們呢，走我們自己的。分道揚鑣之時，業已來到！

尼赫魯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日於阿拉哈巴德

註一：現任英國印緬事務大臣。

傳記叢書

斯大林傳

徐巴
懋比
庸塞
譯著

尼赫魯自傳

尼畢
赫來
魯
譯著

拜倫傳

陳鶴
秋見
子祐
譯著

多列士自傳

多朱
列世
士論
譯著

列寧傳

蘇·馬恩
列學院編

新知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4768B



S1200